

透視
香港

4

- 港英默許左派陣營到港督府抗議
- 北京支持香港左派發動騷亂？
- 北京為何不願重提六七暴動？
- 暴動如何改寫曾鈺成、曾德成命運？

香港六七

暴動

第三版

內情

張家偉◎著

Inside Story of 1967 Riot
in Hong Kong

透視香港系列之四



香港六七暴動內情

張家偉◎著

太平洋世紀出版社 出版

©太平洋世紀出版社有限公司 2000

本書版權為太平洋世紀出版社有限公司所有。除獲本公司書面允許外，不得在任何地區，以任何方式、任何文字翻印、仿製或轉載本書內容。

國際統一書號 (ISBN) : 962 - 8274 - 29 - 5

香港六七暴動內情

作者： 張家偉

出版： 太平洋世紀出版社有限公司

承印： 新華彩印出版社

發行： 田園書屋

設計： 余文生

版次： 2000年9月初版

Inside Story of 1967 Riot in Hong Kong (in Chinese)

Author: Cheung Ka Wai

©The Pacific Century Press Limited 2000

All Rights Reserved ISBN: 962 - 8274 - 29 - 5

Published by the Pacific Century Press Limited

Printed in Hong Kong

目錄

序言

引言：	改寫香港歷史的六七暴動	1
第一章	六七左派暴動的前奏	11
	一、六六年天星小輪騷亂	11
	二、澳門「一二三事件」和文化大革命的衝擊	17
	三、六七暴動前的工潮	22
第二章	六七暴動的導火線——新蒲崗香港人造花廠事件	26
第三章	「你升級，我也升級」——左派將勞資糾紛政治化	39
第四章	花園道事件：誰在撒謊？	55
	——左派發動罷工車輪戰	63
	——香港右派積極支持港英當局「平亂」	65
第五章	《人民日報》「六·三」社論：北京打算收回香港？	66
	——廣東省支援香港左派的行動	69
第六章	左派發動聯合大罷工和罷市	74
	——中學和大學校園的異動	76
	——左派「欲罷不能」？	81
第七章	港英的民意戰和宣傳戰	84
第八章	沙頭角事件與真假菠蘿陣	88
	——「人民戰爭」遍地開花	89
第九章	林彬事件與火燒英國駐華代辦處	103
	——三報事件觸發紅衛兵鬧事	105
第十章	左派暴動進入尾聲	110
	——一場代價沉重的「戰役」	113

第十一章	北京支持香港左派發動騷亂嗎？	115
	一、中共五十年代以來的對港政策	116
	二、周恩來對「反英抗暴」的指示	118
第十二章	六七暴動的影響	122
	一、左派徹底失去民心，軍心動搖	122
	二、促使港英推行社會改革	124
	三、造就政經新貴	132
第十三章	左派陣營內部承認鬥爭失敗	133
第十四章	對六七暴動的不同詮釋	136
	一、左派社團負責人如何為六七暴動辯解	136
	二、大陸學術界和傳媒對六七暴動的詮釋	138
第十五章	左派陣營在暴動期間的極左表現	140
第十六章	壁壘分明：中英官員與暴動參與者的回憶與反思	144
	一、姬達的難過與不安	144
	二、曾德成對青春無悔	150
	三、曾鈺成由港大精英到親北京的曲折道路	165
	四、黃建立：「反英抗暴」的路線出了問題？	173
	五、胡棣周：觸發紅衛兵火燒英國代辦處的報人	185
	六、糊塗政治犯翟暖暉	202
	七、充滿困惑的左派電影界元老廖一原	209
	八、蔡渭衡拒當代罪羔羊	226
	九、葉國謙在漢華中學的火紅歲月	242
	十、對六七暴動感到愧疚的左派報人羅孚	248
	十一、遭無妄之災的左派教員張雲	256
	十二、無怨無悔的李連生	262
	十三、訪前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梁上苑	268
註釋		272

附錄：

一、六七暴動文件匯編	283
1. 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抗議書	283
2. 港九各業工人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發言人談話	286
3. 〈堅決反擊英帝國主義的挑釁〉	288
4. 周恩來關於堅決支持香港愛國同胞反英抗暴鬥爭的講話	291
5. 〈放手發動群眾，進一步壯大反英抗暴鬥爭的隊伍〉	293
二、六七左派暴動大事表	296
三、鬥委會常務委員名單及近況	300
四、六七暴動期間香港各級議會非官守議員名單	308
五、左派暴動統計數字一覽	309
六、參考書目	311

劉兆佳序

二次大戰後，反殖民統治運動在世界各地風起雲湧，大英帝國亦因其殖民地紛紛宣告獨立而分崩離析。不過，英國在香港的殖民統治，卻從來沒有受到致命的衝擊。在香港的特殊歷史與政治環境下，反殖民統治的群眾運動從來沒有出現過，而獨立運動領袖更屬聞所未聞的人物。大體而言，英國在香港的殖民統治，從來沒有受到嚴峻的考驗。

一九六七年發生的左派「暴動」，其主要成因並非來自香港內部的反殖民主義訴求，雖然英國人的高壓統治及低下階層的生活困頓為「暴動」的推展提供了有利的條件。平心而論，六七暴動主要由外來因素所牽動。如果沒有大陸的文化大革命及極左分子的奪權，如此大規模的「暴動」實在難以出現。

六七暴動雖然主要是中國政府駐港官員及左派人士對文化大革命的積極回應，但在相當程度上他們也訴諸於民族主義及反殖民主義的情緒。即使六七暴動沒有達到推翻英國在港管治的目標，而它本身最終亦被中國政府及香港市民所否定，但它的長遠影響卻是十分深遠的。這些影響至低限度包括以下方面：

一、它削弱了英國人的管治權威，暴露了殖民管治的陰暗面。為了維護殖民管治，港英政府被迫在「暴動」後調整管治策略，從而穩定及強化其管治根基，為日後香港順利回歸中國添置了障礙。

二、六七暴動加深了香港市民對中國共產黨及左派分子的恐懼與不滿，並損害了香港同胞與中國政府的關係。香港同胞對中國政府的不信任，至今仍未消除。這種對中央的逆反心態，不單使香港回歸中國的過程充滿曲折，它而且亦對回歸後香港同胞與中央建立和洽關係增添困難。

三、六七暴動使得左派人士長期受到其他香港市民所排擠及港英政府所打壓，從而逐漸形成一個與主流社會隔離的社群。這種與主流社會的隔膜，久而久之在不少左派人士心中形成了一種受壓迫的感覺。基於這種感覺，他們對自己在回歸後的際遇，便抱有一種不切實際的渴望「翻身」與「出頭」的期望。當這些期望沒有得到實現的時候，他們對特區領導人自然有所不滿，而這些不滿又不容易消除。由於左派力量對特區政府的支持相當重要，特區政府如何好好處理它與左派人士的關係，不啻是一個重大的政治考驗。

四、六七暴動也使得中國政府自一九四九年以來所奉行的「長期打算，充份利用」的對港政策在執行上遇到挫折。其中原因當然與制定該政策的中央領導人在文革期間未能駕馭中國對外政策有關。但無論如何，在文革結束，中國對港政策恢復舊觀之後，中央自然對六七暴動採取否定態度。不過，對於那些因為民族意識的感召或因對殖民法治不滿而積極參與「反英抗暴」，並因此而蒙受極大損失的左派人士來說，中央對六七暴動後的否定態度，是他們難以接受，但卻又是敢怒而不敢言的。如何撫平左派人士內心的創傷，無論對中央而言，或是對特區政府而言，都是一個政治難題。

五、六七暴動亦代表着一種港人反抗管治權威的集體行動。即使該行動最後以失敗告終，但它仍然產生了一些政治示範效應。可以說，它為七零年代以後出現的各種對殖民地政府抗爭的行動起着催化的作用，並為香港在「暴動」後的政治生態帶來了深刻的影響。

不過，儘管六七暴動有着相當的重要性，但在「暴動」後各有關人士卻對此諱莫如深。在「暴動」後的殖民統治歲月中，港英政府刻意淡化該事件。究其原因，除了因為它在英國在港殖民統治史上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外，英國人也不希望該事件為中英關係繼續造成困擾。

中國政府由於在文革結束後認定六七暴動是一項錯誤的行動，自然也無意舊事重提，以免影響中國共產黨的威信及予反共者以口實。

左派人士作為六七暴動行動的失敗者，並且在社會上受到孤立，更無意欲重提此事。他們當中雖然有人堅持六七暴動背後有着良好的意願，並且六七暴動在某些方面對香港的長遠政治發展有良性的影響，但礙於中央的立場，對六七暴動亦只能三緘其口。

在各方面有關人士對六七暴動保持緘默的情況下，要對該事件進行探討研究，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所以，有關六七暴動的研究，寥寥可數。對有興趣了解香港歷史的人來說，確實是十分可惜的事。

隨着英國人在港殖民管治的結束，香港重歸祖國懷抱，六七暴動也逐漸不再是研究的禁區，至低限度，六七暴動研究不再如過去那般政治敏感。更為重要的，是曾經參與該行動的左派人士較能坦率表達他們對該事件的看法及分析他們在該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

張家偉這本新著，是率先利用香港回歸後所帶來的對六七暴動研究機會的成果。大體上本書可以為讀者對六七暴動的前因後果提供一個不錯的輪廓。本書也初步填補了六七暴動研究空白。無庸諱言，六七暴動的研究，仍然嚴重不足，仍有待研究者作進一步的深入探討。

我誠摯希望家偉這本新作能夠起到牽頭的作用，鼓勵更多人對六七暴動以至於對香港的殖民地時代歷史進行廣泛的研究探討。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講座教授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一日

梁上苑序

一九六七年的「反英抗暴」或所謂「左派暴亂」已經過去三十多年了。對香港來說，除了二十年代的省港大罷工外，「左派暴亂」可說是最重大的事件。當時甚至有鬧到提早收回香港的可能性，暴亂涉及的範圍很廣，參加的左派群眾以數十萬計，影響了全港市民的日常生活。從一九六七年五月至年底，幾個月的時間，也不算短。但北京方面和香港左派領導至今對此沒有明確的說法，所以這次暴亂在香港的歷史意義仍有很多人不清楚。張家偉先生撰寫這本關於「反英抗暴」的要書，整理這段歷史，是非常有意義的事情。

當年挑起暴亂的是香港左派，領導者是中共中央香港工作委員會，簡稱香港工委（我當年擔任工委副書記），公開出面的是新華社香港分社。按照中共的組織原則，下級服從上級，香港工委必須服從中央領導。換句話說，香港新華社必須執行北京國務院的指導方針。所以香港左派掀起暴亂，如果沒有北京點頭，決不能自行搞出這麼大規模的暴亂，也可以說，香港左派出面鬥爭，北京政府是幕後的領導者。

中國政府一直認為清末割讓香港是莫大的耻辱，如果中國政府用武力收回香港，英國毫無辦法抗拒。在六七年反英抗暴期間，《遠東經濟評論》英國人主編曾公開表示，只要中國政府一個電話，我們就要撤走，北京何必搞這種騷亂呢？

但收回香港不是那麼簡單，當年北京領導層沒有統一的共識，所以不可能有統一的部署。除了當權的毛澤東、周恩來以外，尚有唯恐天下不亂的「四人幫」和林彪集團。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主管的《人民日報》，就不是宣傳毛、周的對港政策；因為當權派曾公開聲明不使用武力收回香港，《人民日報》卻恰恰唱了反調。毛、周兩人

雖然同樣不想收回香港，但毛澤東要擺出「盤馬彎弓故不發」的姿態嚇唬英國人，而掌握對外關係實權的周恩來卻堅決禁止解放軍越過深圳河。六七年正值國內文化大革命最混亂的期間，周恩來似乎不同意文革的各種政策，但也不敢公開反對文革及紅衛兵運動。他要解決國內各方面的問題，不可能照顧對外關係各種事項。總之，隨時都有漏洞，江、林集團和香港工委就此鑽了反英抗暴的空子，結果便產生無人負責也不能追究責任的局面。

在反英抗暴期間，周恩來曾嚴令制止解放軍越過深圳邊界，國內沒有提供任何武器軍火或炸彈給香港左派使用，而在輿論上也從不宣傳收回香港。這些事實說明不是北京方面發動反英抗暴，而是新華社香港分社（即中共港澳工委）所發動的，同時扮演了指揮的角色。

我的看法可概括為幾句話：中共領導層不想收回香港，可是運動已經搞起來，當然不能認輸。相信北京同意香港左派罷工和罷市的做法，至於後來的「真假炸彈」就不支持，終於下令停止。這是在錯誤的時間爆發的一場錯誤的暴亂。

反英抗暴期間，香港左派損兵折將，隨時隨地被抓進監牢，無法抵抗軍警，他們用盡全部力量搞了罷工和罷市，仍然沒有效果，最後只能搞出所謂「真假炸彈陣」的鬧劇。結果左派戰鬥力逐漸消失，自身困難越來越多，被開除的罷工工人需要吃飯，死難者的家屬也要救濟，港澳工委束手無策。真假炸彈陣更弄得怨聲載道，完全喪失人心。反英抗暴引起的市面蕭條冷落，損失數額之鉅難以計算，卻是所有香港市民遭殃。反英抗暴就是這樣糊裏糊塗的鬥爭，但北京沒有追究錯誤的責任，新華社也沒有官員受到懲罰或警告，因為這是一筆糊塗賬。

事隔多年，國內仍然有人提出這樣的問題，當年港英為甚麼敢用如此強硬的手段進行鎮壓？若能稍微分析一下統治者的心理，即可明白其中原因。港英不想放棄香港，現在明明知道中國領導人對香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針，而且明知當時形勢不容許中國收回

香港，因此必然採取強硬手段維持殖民統治。

一九九九年五月於北京

（註：梁上苑先生六七暴動期間擔任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九九年七月於北京病逝。）

羅孚序

香港最終是「九七回歸」，但曾經有人叫出過類似「六七回歸」的口號，不過，這已經被遺忘了，很少人再把它提起。

一九六七年香港發生過「五月風暴」。五月六日，新蒲崗人造花廠工人為反對資方的剝削而開展鬥爭，港英當局出動武裝警察和防暴隊進行鎮壓，拘捕二十一人，毆傷多人。其後又拘捕到警署抗議的工會主席和工人代表。各界代表和青年學生紛紛出動支援工人，也都被港英當局鎮壓，四天中先後被拘捕四百多人。五月十五日，北京外交部發表聲明，嚴詞譴責，並向英國政府提出最緊急、最強烈的抗議。五月十六日，左派宣告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成立，「仿效國內『文革』方式，開展了群眾運動」，這是《人民日報》出版的《香港大事記》的用語。在香港，也就有了「香港式的文化大革命」的說法。在左派口中，這是「反英抗暴」；在一般人口中，卻是「左派暴動」。嚴格意義的暴動是沒有的，有的是左派群眾用暴力反對當局的暴力鎮壓，只是列隊上街，到法庭，到港督府去抗議，最後是在街頭，在警署門口，擺上了真真假假的炸彈。這些就是「文革」式鬥爭或「香港式文革」了。

此外，各界鬥爭委員會曾經組織過罷工、罷市，口頭上提出過「港英不低頭就走頭」的口號。低頭，是接受提出的條件、認錯；走頭是廣東俗語，也就是「走路」，放棄香港，下旗歸國。

這不是北京的語言。北京一直認為，讓香港留在英國手上比較好，要對它「長期打算，充分利用」，到適當時機才談判解決。「低頭、走頭」只是在香港信口開河，並不是北京的授意，也沒有得到北京的認可。北京正忙於全國的「文化大革命」，香港問題上不了議程。它的提上議程要到一、二十年以後，不是一個年代，而幾乎是一

個世代——一、二十年，「九七回歸」不正好是一個世代嗎？「走頭」是在錯誤的時間提出問題。這問題是在一、二十年後，而且是由港英首先提出的。港英只是試探，並不真正想歸還。在香港提出「走頭」論的，也並不認真是要在當時收回失土，但如果鬥爭發展下去，不加以收斂，就很難預料會發生甚麼結果了。這會把一個錯誤的結果強加給北京，要它不得不提前三十年來處理香港問題。

「反英抗暴」，這是一個對敵鬥爭的問題。香港回歸以前，總還是敵佔區，有關這次鬥爭的內幕不能在敵人佔領下在他們面前一一攤出，這正是這一場鬥爭當年不聲不響，悄悄收兵，從此不提的原因。除了《人民日報》的〈香港大事記〉外，人們從內地的出版物上，也很少找得到「反英抗暴」的記載，事情錯了，不說也罷。

事情過去已經一個世代了，這方面的歷史紀錄仍然空空如也，彷彿香港根本沒有發生過這樣的事，這總是不正常的。現在難得有張家偉先生這本《六七左派暴動內情》，還訪問了當年雙方許多位當事人細說經過和對事件的體會，這實在是很難得的事。

這本書還是到目前為止這方面唯一的著作，它當然存在不足之處，有待補充。這裏必須補充說明，參加「五月風暴」的群眾是英勇可欽佩的，他們慷慨慨，不怕犧牲地去鬥爭，鬥爭沒有錯，錯在在錯誤的時間（「文革」初期），用錯誤的方式（「武鬥」），喊出了錯誤的口號（「港英不低頭就走頭」）。

一九九九年八月三十一日

翁松燃序

二十世紀末期在美國有一個新生術語，叫“politically correct”，意思是政治上要能過關，過不了關的人事可能被批判。在中國大陸異曲同工，凡事要「講政治」。人們早知要不犯政治錯誤，否則失職丟官不在話下，下牛棚坐長牢都不稀奇，還可能被官方歷史完全否定。胡耀邦、趙紫陽貴為黨總書記，但是在許多官方文獻中，他們等如不存在，就是例證。

一九六七年中國大陸文革的火花延燒到香港，造成六七暴動。這是一次「政治錯誤」，在中共的史實紀錄至今見不得光。見不得光是因為它既違背了中共當時對香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政策，又不利於今日在香港實施「一國兩制」的方針。

不過，官方要「講政治」，記者卻得報道現實，學者應根據實證作分析，史家更不可不忠於史實。胡、趙之事，相信不會被當前官方文獻完全埋沒，六七暴動也不致因當局認為「不提也罷」就完全不見於傳世經傳中。

在這一意義上，張家偉君的《六七左派暴動內情》一書，是十分難得的。張君是《亞洲週刊》的出色記者，頗具慧眼，在採訪工作中，獨能洞識六七暴動產生了改寫香港歷史的作用，並進而深入檢驗史實，訪問各界人士，整理成書，為歷史作初步存證，並供識者參考。他的貢獻是很實在的，是值得其他香港記者仿效的。

在我記憶中，六七暴動也有一點插曲意義。那年夏天我在台灣參與一個美國教授團的學習參觀活動，在回美之前首次涉足香港。當時我在美國擔任的功課之一是中國政治制度，可是對大陸資訊掌握極為有限，到了香港便要求參觀有關中共之事物。朋友帶我去看中藝和裕華國貨公司。她自己遠遠指引，讓我單獨入內。

我看到的是大賣貨場裏除售貨員之外只我一人，場內到處是黃底紅字的政治標語。出來後，朋友說香港人「如今談共色變，多不願有所牽涉」。我是多少曾對中共革命有過幻想的人，在課堂上有時還為「革命者」乃至「文化大革命」的合理解釋公開說項，在校園裏，聲名複雜，有人說我反共，有人說我「粉紅」。六七暴動在八月我抵港前已經告一段落，可是那次短短的香港之旅，在我腦中引發了好多對中共及其革命的疑問。

家偉君是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的高材生，政治學識和敏感度都強。他說六七暴動既促使港英政府推行社會改革以紓緩矛盾，又喚醒港人的本土意識和日後的社會運動，這是有見地的。他又指出香港左派人士愛國犧牲，卻反成罪人，至今仍遺痕未癒，也是的論。

拜讀此書初稿後，我得到的啓發不少。此書出版應能增加大家對香港政治發展的認識和研究。這也是我對張著的祝願。

台灣埔里暨南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系教授
二〇〇〇年二月二十四日旅次

引言：改寫香港歷史的六七暴動

「我是街燈。對於這天晚上的事，我看得最清楚。八點敲過，有幾百個人拿着刀子、炸彈、鐵棍、石頭、汽水瓶、削尖水喉鐵、火水等物從橫街像潮水一般衝出來……群眾向警察投擲石塊與汽水瓶。站在最前面的那個警察，用擴音器勸告群眾散去。群眾不散，催淚彈爆發，人群散開。緊張的情勢漸告緩和，但是街中心還有一枚炸彈。警車裏走出一個軍火專家，將那枚炸彈爆了。炸彈爆開時，有不少彈片從我身旁飛過。約莫一個小時過後，警隊離去，人們又從屋內走出。一個人被另一個用刀子刺死了。」（劉以鬯，《動亂》，1968）

六七年仲夏時節，香港幾乎成為「恐怖世界」，部分左派群眾發動暴力抗爭，市民被「土製炸彈」、魚炮及催淚彈散發的煙霧嚇破了膽，居港多年的作家劉以鬯記下了六七暴動期間香港街頭的可怕亂象。現在人們一想起六七暴動，腦海裏自會浮起類似《動亂》的情景。

這些圖景也映進了劉千石和廖一原的眼簾。儘管兩人政治背景迥異，卻同樣對事態發展感到痛心。現在位居立法會議員和工運領袖的劉千石，當年只是一名收入低微的工廠工人，但廖一原已貴為左派新聯電影公司董事長和左派各界反英抗暴鬥爭委員會（鬥委會）常務委員。一九六三年，二十出頭的劉千石隻身從廣州偷渡往香港，在新界葵涌石蔭邨寶星紗廠任職化驗工，後來轉往一家毛紗廠工作，嚐盡「被資本家欺壓」的苦頭。他記得當時工人日薪一般為四至五元，「但老闆看我是大陸來的，每天只給我四元」，其他工人工作時間為早上七時至下午三時，他卻要傍晚六時半才下班。他表示：「當時一頓午飯要花八角至一元，由於我收入低，每三天就有一天中午要啃麵包。」

六七年四月香港人造花廠工潮爆發，劉千石從報章獲悉這件事，頗有「工人出了一口氣」的感覺。五月六日港英防暴隊與工人發生衝突，一些工人被毆，他對防暴隊的鎮壓行動很反感，認為工人只是爭取正當權益，卻「受到港府欺負」。當時持類似看法的市民並不罕見，更有不少社會人士同情工人。

廖一原也支持人造花廠工人與資方抗爭，以為左派發動的「反英抗暴」只是「對港英進行文鬥和言文批判」。但他和劉千石都沒有想到這場運動後來演變為暴力抗爭，損害了大多數市民的利益。兩人回首當年，都對事件變質感到可惜。

香港總督府當年也發出「為甚麼？」的呼聲。姬達（Jack Cater）當時擔任港府副布政司（特別事務）兼港督私人助理，專責對付左派暴動。自稱港府「溫和派」的姬達向筆者披露了一些鮮為人知的史料：一些左派社團領袖要求港府容許他們進行和平示威，並保證「不會帶來麻煩」，港英當局因此默許左派群眾在港督府門前抗議。姬達對示威演變為騷亂感到「傷感」，認為事態發展「實在很不幸」。他更對部分警員濫用私刑，甚至將示威者毆打致死感到「不安」。

位於北京中南海西花廳的周恩來辦公室，也對形勢失控感到大惑不解。香港左派發動反英鬥爭初期，周恩來多次約見中共中央外事辦公室及港澳工委官員，強調對英國的鬥爭必須「有理、有利、有節」，「不能照抄內地紅衛兵的做法」，也反對在香港動武。他指出：「我們現在既不是馬上收回香港，也不想同英國打仗。」周恩來私下對香港左派的極端做法很有保留，但礙於政治現實，不便公開制止香港左派的行動，加上北京領導層對如何處理香港局勢缺乏共識，遂令事件逐漸升級。

許多經歷六七左派暴動的香港人，當年腦海裏都曾泛起連串問號：香港還有前途嗎？中國打算提早收回香港嗎？對三、四十歲以上的香港人來說，一九六七年夏季可能是當地歷來最悠長、最難熬的夏天。當時神州大地正進行翻天覆地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鬥

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香港這顆巨龍口裏的明珠也感受到灼熱的革命鬥爭烈焰。六七年五月，香港左派陣營乘着文化大革命的「東風」，在香港發動號稱「反英抗暴」的抗爭行動，「打倒港英」、「結束港英法西斯暴政」、「港英不低頭就走頭」的口號響徹雲霄，香港各大公共屋村外牆寫滿了「黃皮狗」、「白皮豬」的字句；港英政府面臨百多年來最嚴峻的挑戰，市民對前景的信心異常脆弱。

那是理性向激情讓路的時代，是政治口號掩蓋理性思考的歲月。是年七、八月開始，香港各地硝煙瀰漫，「菠蘿」（土製炸彈）遍地，整個社會籠罩着一片恐怖氣氛。香港資金大量外流，外國遊客裹足不前，更一度出現北京有意提早收回香港、紅衛兵企圖衝擊中港邊境的傳聞，當時「香港前途」成爲人們談論的熱門話題。

一九六七年由香港左派陣營發動的暴亂，相信是香港百多年歷史上最富爭議性的事件。持不同政見的人對這次事件作出截然不同的評價，單從怎樣表述這次事件，已反映了不同的政治立場。香港主流社會普遍稱這場騷亂爲「六七暴動」或「左派暴動」，帶有負面的含意。左派陣營卻稱爲「反英抗暴」，一度（最少暴亂期間及往後一段時間）是值得謳歌、大書特書的「偉大愛國行動」。筆者曾考慮採用較爲中性的「左派騷亂」，但六七事件影響社會秩序的程度，顯然超越了「騷亂」的定義。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編訂的《現代漢語詞典》，「暴動」的定義是「階級或集團爲了破壞當時的政治制度、社會秩序而採取的武裝行動」。在中共的詞彙裏，「暴動」往往是「革命」、「起義」的同義詞。¹從左派群眾後期採用擺放炸彈、焚燒車輛等暴力手段，並聲言要推翻港英「反動統治」來看，六七事件相當切合「暴動」的定義，筆者決定採用「六七暴動」的稱謂。

六七暴動告一段落後，北京對這次事件持否定態度，北京官方和香港左派陣營都不願重提這次事件，反映對北京來說，這是「不提也罷」的事件，甚至是一筆「糊塗賬」。這種情況直至香港回歸中國前

夕都沒有改變，即使香港回歸倒數前一年中國大陸出現「香港熱」，介紹香港歷史的報刊和電視特輯不絕如縷，卻沒有觸及六七暴動。例如北京中央電視台在香港回歸前攝製的紀錄片《香港滄桑》和《香港百年》，回顧香港百多年歷史時迴避了六七事件，大陸早期香港史著作也沒有提及這次事件。

在香港聯合出版集團九七回歸前夕出版的《香港》紀念畫集中，六七暴動和八九民運都不見踪影。而北京新華社九七年開設的「香港一九九七」網頁，也對包括六七暴動在內的五、六十年代香港歷史隻字不提。據筆者了解，這是因為當時的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周南要「全盤否定」六七事件，認為這是當年左派群眾的錯誤鬥爭。

這場三十三年前席捲香港的政治風暴，早已凝結成爲歷史。現在爲甚麼還要寫這段歷史？六七暴動是香港戰後歷史的分水嶺，改寫了以後的香港歷史。香港電台與有線電視合辦的「香港十大歷史事件選舉」去年十月揭曉，六七暴動排名第十一位。評審委員、中文大學歷史系教授吳倫霓霞認爲，六七暴動暴露了存在已久的社會問題和官民關係的疏離；七十年代港府的政制改革源於這次事件，可見六七暴動對香港影響極爲深遠。²

令人遺憾的是，截至目前爲止，記述六七左派暴動的專著如鳳毛麟角，英文著作只有七零年由英國記者 John Cooper 撰寫的 *Colony in Conflict* 一書³，但該書立場難免偏向港英當局。至於中文著作方面，三十三年來仍然沒有一本記載六七暴動的專書。而香港官方、主流社會和左派陣營對這次事件的記述和評價各走極端，不是全面抹殺，就是一片歌頌溢美之辭，缺乏從中立角度敘述和評價事件始末的作品。

在港英當局的論述裏，六七暴動是左派陣營「搞亂社會」的破壞行動，當局的鎮壓行動「獲得絕大多數市民支持」（港督戴麟趾更聲稱得到百分之九十八市民支持）。左派陣營則堅持這是群眾反抗「民族壓迫」的「愛國抗爭」，並從「壞事變好事」的角度，辯稱事件「推動了香港社會進步」。歷史真的這麼簡單，非黑即白嗎？

一九九六年五月，筆者參與《亞洲週刊》「文革三十周年」專題的採訪工作，負責採寫六七年香港左派暴動始末，期間訪問了廖一原、蕭滋、羅孚等曾參與這場運動的老左派人士，他們對三十三年前的往事娓娓道來，燃起筆者對這重大歷史事件的興趣，決心撰寫一本關於六七暴動的專著，在二十世紀結束前總結這香港本世紀的重大事件。作為土生土長、無黨無派的香港人，筆者既不是要為港英當局辯護，也無意為左派陣營翻案，只是試圖在被簡化的歷史陳述中，挖掘六七暴動複雜的歷史真象，為讀者提供多角度的思考空間。

六七暴動是極為敏感的歷史事件，現存關於六七暴動的資料因此相當匱乏。雖然事件距今逾三十年，超過了歐美國家公佈機密資料的年期，但香港政府歷史檔案處內關於六七暴動的檔案，絕大部分仍未解密，甚至無限期封存。筆者除了倚靠當年的報章報道，唯有四出走訪六七暴動的當事人。但不少當年參與事件的左派人士礙於北京已否定這場運動，不願重提舊事，即使願意接受訪問的也不想在香港回歸前以具名的形式公開談論往事，以免影響「平穩過渡」。

香港回歸為本書的撰寫帶來契機，部分左派人士較樂意坦率地談論六七暴動。自九八年初開始，筆者先後採訪了十多位曾參與六七暴動的左派人士，紀錄他們對事件的回憶和評價。筆者又訪問了負責鎮壓行動的港英高層官員姬達，了解港英方面對事件的看法，同時整理六七事件前後的歷史資料，希望填補這段香港歷史的空白，試圖還這香港歷史重要一頁的本來面目。撰寫六七暴動的歷史，也頗有「搶救歷史」的用意。許多參與當年事件的左派人士已年逾古稀，部分更已相繼辭世。六七暴動期間擔任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的梁上苑，曾向筆者提供不少寶貴資料，可惜他已於去年七月二十二日因病去世。盡快紀錄參與者對事件的回憶和看法，着實刻不容緩。

專欄作家石琪最近指出，現在有些回顧香港歷史的出版物已顧及北京立場，對六七左派暴動只提及反剝削反英反帝，而不提放炸彈和暗殺，亦少提中立派的角度。他擔心新世代想知道香港往事的話，再

難找到不同意見的資料，更可能「集體失憶」。

沒有國內的文化大革命，香港六七年就不會出現規模如此龐大的左派暴動。六六年天星小輪加價觸發騷亂，但左派袖手旁觀，因此沒有演變為大規模的騷動，反證了文革對香港六七暴動的直接影響。筆者認為，雖然文革期間中共極左當權派要對香港左派暴動負主要責任，但新華社香港分社顯然對煽動左派群眾、擴大事態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回顧六七暴動這段歷史，不能忽略釀成這次事件的社會土壤。六七暴動前夕，香港社會躁動不安，處於社會動亂的火山口。當時社會正面對經濟衰退，令原有社會矛盾進一步激化，勞資糾紛此起彼落。港英當局唯恐文革的火焰燒到香港，市面稍有風吹草動，立即如臨大敵。源於香港人造花廠的勞資糾紛後來升級為大規模騷動，顯然是港英處理不當、激化矛盾的結果。六七暴動結束後，港英當局從中吸取教訓，逐漸改變統治策略，推行社會改革，以紓緩社會矛盾。當年負責對付左派暴動的副布政司姬達坦言，如果沒有發生六七暴動，「我不認為港府會推行任何改革」。

雖然港英當局成功鎮壓六七暴動，但當時終究有數以萬計的市民公開表明不認同港英統治，間接催化一般市民與港英抗爭的意識。人們發現港英的統治權威也可以受到挑戰，逐漸敢於表達對各種社會箇疾的不滿。廉政公署二十五週年紀念特刊指出：「六六至六七年間發生的暴動，挑戰了政府的威信。自此以後，香港市民漸漸敢於公開譴責貪污行爲和政府對此視若無睹的態度。」

六七暴動對香港歷史的影響

六七暴動同時喚起了香港新一代的本土意識，並催生學生運動和社會運動。具有社會良知的青年一方面抗拒香港左派的極左行徑，另一方面卻難以認同港英當局的粗暴鎮壓行動。劉迺強六七年秋天入讀香港大學，當時他與港大學生會刊物《學苑》骨幹，和支持左派的港

大學生針鋒相對。他表示：「左派犯了錯誤，不等於港英一定對，稍有利知的大學生都難以容忍殖民政治。我們還要在香港生活，左派暴動令我們思考和批判香港社會現狀。」

暴動期間擔任《學苑》編輯的馮可強也反對左派採用暴力手段，不滿左派破壞社會秩序。但暴動結束後，他開始發現香港社會充滿不平等，激發他關心社會、追求公義的意識。他表示：「我原本愛看關於中國的書籍，不太注意香港社會現況，左派暴動使我產生『香港是我家』的感覺。」《學苑》原本純粹報道港大校園消息，馮可強六八年出任總編輯後，顯著加強報道社會疾苦的篇幅。

現任中國全國政協香港區委員的劉迺強指出，六七暴動是香港學生運動和社會運動的起點，支持暴動的港大「暴動派」七十年代初期蛻變為「國粹派」，後來與國粹派分庭抗禮的「社會派」則與「學苑派」一脈相承。劉表示：「一切事情從六七暴動開始。」意大利哲學家克羅齊說過：「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六七暴動的歷史，絕不是與香港社會發展毫無關連的「死的歷史」。

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本質上是「難民社會」，只是暫時躲避中國大陸戰亂的棲身之所。六七暴動過後，香港人終於發現相比動盪不安的大陸，香港這塊彈丸之地是應當珍惜的樂土。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教授周永新指出：「我當時的感受是，香港人對政府的態度是冷淡的，但左派的行為更使人憎恨，香港人要自保，便必須團結起來，支持政府的行動。從那時起，香港人似乎開始珍惜這地方，最低限度香港是他們的避難所，讓他們免去文化大革命帶來的浩劫。」

時至今日，六七暴動仍然對香港現實政治有一定影響。九五年立法局選舉期間，左派工聯會候選人陳婉嫻與代表民主黨的麥海華在九龍東北選區狹路相逢。麥海華在競選集會上翻工聯會在六七暴動中的舊賬，認為陳婉嫻須為暴動負上責任。工聯會則以「社會矛盾論」進

行辯護，認為六七事件對香港社會進步產生一定正面作用。

董橋先生說過，新聞是歷史的初稿。歷史往往成為現實的註腳，現實往往是歷史的折射。六七暴動期間，港英祭起維持社會秩序的大旗，高調宣傳「繁榮安定」論，左派傳媒則對這種論調口誅筆伐。中英兩國八四年簽署《聯合聲明》後，中方繼承了港英當年的歷史話語，經常在香港問題上將「繁榮安定」掛在咀邊，形成了強烈的歷史反諷。與此同時，六七暴動已成為香港社會集體記憶的一部分，香港九八年掀起裁員、減薪風潮，一些勞工界領袖不忘提醒行政長官董建華六七暴動的歷史教訓。

左派發動「翻案風」？

香港回歸中國後，一些六七年被捕入獄的左派人士醞釀發動「翻案風」，希望九七後獲特區政府「公平對待」。據筆者了解，左派人士中「有相當意見」要求特區政府處理六七年的歷史問題，甚至通過正式程序推翻當年的罪名。九八年八月，曾於六七暴動期間被捕入獄的曾德成獲聘為中央政策組顧問，提出要「正確看待歷史遺留的問題」。他表示：「在殖民管治時期，有些機構、團體以及個人，都曾受過一些不公平對待，所以一些老愛國人士希望特區政府能盡快對過去這些不公平對待，作出一個公正對待。這些愛國人士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而他們的要求也十分合理，不過由於特區政府目前尚在成立初期，百業待興，因此大家暫時應向前看，待特區政府妥善解決當前的急切事務後，才着手整理這些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

據筆者了解，九七年九月中秋節，特區行政長官董建華邀請一批「曾對香港作出貢獻的人士」，出席在前港督府（現已更名為禮賓府）舉行的中秋酒會。部分六七事件參與者和抗日戰爭期間保衛香港的東江縱隊隊員也接到請柬，胡棟周、楊光、廖一原等六七暴動參與者都獲邀出席。港府律政司司長梁愛詩在酒會期間主動對胡棟周表示：「這件事其實很不公平，這不只是你個人的問題，曾德成也受到

不公平的待遇，這件事特區政府要慢慢來。」梁愛詩曾任香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舅父黃祖芬六七暴動期間擔任左派中華中學校長，曾被港英當局拘禁於摩星嶺集中營，嘴邊經常掛着「國家好，香港好」的董建華，少年時代曾在中華中學就讀。梁愛詩這番話，是否意味特區政府有意重新處理六七暴動的「歷史問題」？

去年七月，董建華宣佈向工聯會會長李澤添頒授大紫荊勳章，表揚李對香港社會的貢獻。而前左派漢華中學校長黃建立，也獲頒金紫荊星章，多名左派學校畢業生也獲封為太平紳士。黃建立在六七暴動期間擔任各界鬥委會副主任委員，當時擔任左派鞋業工會理事長的李澤添則是鬥委會委員。以兩人的背景，港英時代是不可能獲得這種榮耀的。值得注意的是，特區政府向這兩位六七暴動參與者頒發勳章，是否調整對六七暴動立場的訊號？

董建華去年三月二十六日任命曾德成為太平紳士，重新觸發社會人士有關如何看待六七暴動的爭論。民主黨成員、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主席涂謹申表示，他「不清楚」曾德成當年犯了哪些罪行而留下刑事罪行紀錄，但無論當年他為何入獄，始終是經過司法程序而定罪，如果政府考慮委任一名有案底的人士出任太平紳士，要考慮這項任命是否令人信服及受人尊重。他又表示，當局委任一個有案底的人為太平紳士，肯定會引起部分社會人士的爭議。曾德成不認同有刑事案底者不能擔任太平紳士的說法：「我當年被判刑完全是政治迫害，如果派發傳單也構成刑事罪行，這些年來香港很多人會被捕入獄。」

一些六七暴動期間「光榮入獄」的左派基層群眾，則對北京和香港新華社不肯承擔六七暴動的責任深深不忿。當年被捕入獄的漢華中學學生張普璇對筆者表示，北京否定六七暴動，似乎連帶否定所有參與者，對當年不惜犧牲青春、前途的左派參與者極不公平。張指出：「許多左派群眾當年滿腔熱血，不顧自身安危投入這場運動，為國家民族出力，結果卻成為被共產黨利用的棋子。北京當局可以否定當年

的決策，但應肯定群眾的愛國熱情。」她表示，中共最不好的地方就是不承認事實。張普璇說，北京和特區政府應「有所表示」，還當年參與者一個公道。她現已脫離左派陣營，向女兒推介的讀物是民運人士王丹的回憶錄和書信集。

六七暴動距今三十三年了，許多香港人已對這次事件不太了解，就連一些處理香港問題的中方官員也不甚了了。中國外交部駐港簽證處副處長范振水，年前曾向一些六十年代派駐香港的退休幹部討教：「當年港英政府為甚麼有如此膽量，鎮壓香港左派群眾？」從這位現職官員對六七暴動經過認識不深，卻有濃厚興趣來看，不少北京官員仍然頗為關心這段歷史。如果這本書能增進中港兩地人士對六七暴動的了解，我這一年多的筆耕還是值得的。筆者也希望此書能為日後有志研究六七暴動的人士，提供一個起點和輪廓。

筆者在此感謝曾德成先生、曾鈺成先生、姬達先生、黃建立先生、胡棣周先生、翟暖暉先生、廖一原先生、蔡渭衡先生、葉國謙先生、羅孚先生、張雲先生、李連生先生、蕭滋先生、劉千石先生、劉迺强先生和張普璇女士，抽空接受筆者訪問。

筆者曾致函六七暴動期間擔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的梁威林先生及副社長祈烽先生，希望了解他們對事件的看法。遺憾的是，兩人未有回覆，令本書缺乏這兩位重要當事人的口述資料。

筆者並非專業寫作者，兩年多以來利用工餘的有限時間和假期，從事資料搜集和寫作，度過了不知多少個獨對電腦寫作的深宵。我要深深感謝妻子劉曉麗，沒有她的支持、鼓勵和諒解，這本經濟效益甚低的書是不可能完成的。

各方人士對本書有何意見，歡迎與我聯絡（garycheung @ hongkong.com）

第一章 六七左派暴動的前奏

一、六六年天星小輪騷亂

一九六六年四月四日上午十一時，港島中環天星碼頭行人熙來攘往。在碼頭入口的行人走廊，一位二十多歲的青年突然展示背面分別用中英文寫上「絕飲食，反加價」的外套，左手衣袖用中文寫著「支持葉錫恩」的字句，右衣袖則以英文寫上「支持葉議員」。這位名叫蘇守忠的青年表明，他打算絕食至天星小輪公司取消加價決定為止。這種罕見的絕食請願場面，吸引了不少途人駐足觀看。他和圍觀的途人沒有料到，絕食行動後來觸發騷亂。

六五年十月一日，香港天星小輪公司董事會向港府提出增加頭等船費，由香港往九龍船票加價一角，九龍至香港票價維持不變，月票則由八元增至十元。天星小輪提出加價申請後，香港大部分團體和報章社論紛紛表示反對。當時香港中下層市民生活困苦，小輪加價無疑雪上加霜。左派新聯電影公司董事長廖一原說：「不要小看加價五分錢，當時許多市民每天收入只能掙到一兩元。」當時每份報章售價一角，五仙可買一條油條。許多社會人士擔心小輪加價，將引起其他企業效法，觸發加價潮。

六六年三月十七日，公共交通諮詢委員會向港府建議，天星小輪頭等票價增加五分，月票增至十二元，基本上贊同天星小輪公司的加價申請。港府不久又宣佈，增加寄往中國大陸等地郵件的郵費，同時提高部分公共屋邨租金百分之十。香港市民對港府同意小輪加價普遍感到不滿，當時有報章以大字標題「民意不值斗零」（「斗零」即五分錢硬幣），指責政府漠視民意。

市政局議員、大律師胡鴻烈指責委員會受港府「幕後操縱」，它

的「意見」其實就是政府的意見，他促請當局立即「將加價之門關閉」。原籍英國的市政局議員葉錫恩更發動反天星加價簽名運動，迅即獲得二十萬名市民簽名響應。當地各工商團體、街坊福利會等團體也通過集會、請願等方式反對加價。香港公民協會認為港府通過加價建議，違反公眾利益，將使大多數市民覺得政府只聽大公司的話，而不太理會受票價提高影響的中等收入階層的困難。

蘇守忠登高一呼後，得到不少市民的同情，盧麒等十一名青年男女翌日加入絕食行列。四月五日下午，兩名警察要求蘇守忠離開現場，但蘇拒絕，結果被警方拘捕，解往中央警署，警方其後控告時年二十三歲的蘇守忠「阻街」

蘇被捕後，十多名支持他的青年前往港督府請願。晚上九時開始，十餘名青年在尖沙咀天星碼頭舉行示威遊行，沿途高舉反對加價的標語及高呼口號，沿廣東道步行往佐敦道碼頭。示威者吸引了數名群眾尾隨，沿彌敦道由尖沙咀遊行往旺角，再步行往石硤尾⁴。四月六日凌晨，警方拘捕了四名示威者。抗議行動於四月六日晚上演變為騷動事件，晚上十時許，油麻地及旺角一帶聚集了四千名群眾，防暴隊與群眾衝突，混亂中有人向防暴隊及在場警員投擲石塊，防暴隊向群眾發射催淚彈，群眾四散奔逃，沿途將垃圾箱、交通標誌、巴士站牌、商店招牌搗毀，彌敦道交通陷入癱瘓狀態。

踏入凌晨時分，警民衝突不斷升級，部分行走彌敦道的巴士和警車遭滋事者襲擊，並在九龍數處地點以石塊、玻璃瓶攻擊警員，警察及防暴隊則不停施放催淚彈。九龍各處共有數十輛巴士遭嚴重破壞，部分更被縱火焚燒，九輛在旺角匯豐銀行旁停泊的私家車被推翻焚燒。多處巴士站被搗毀，角子老虎機（路邊停車收費咪表）也受到破壞，旺角瑞興公司櫥窗玻璃被滋事者擊碎。騷動爆發後，港督戴麟趾頒佈宵禁令，由四月六日至八日全面實施宵禁。港府特別調動嘍兵參與鎮壓，並發射近百發子彈。港督發表聲明，對「暴行」深感遺憾，並認為這次騷亂動並非表達意見的適當方法。根據《一九六六年

九龍騷動調查委員會報告書》，騷動時共有一千四百六十五人被捕，其中九百零五人被控破壞宵禁及其他罪名。騷動期間一人死亡，二十六人受傷。事件中三十輛政府車輛損毀，消防局、市政事務署、郵政局等政府機構也受到騷亂群眾破壞。⁵

盧麒後來據稱曾遭警察毒打，六七年一月被發現在牛頭角廉租屋單位內上吊自殺，但蘇守忠對「自殺」之說並不相信。六七年四月，蘇守忠與數名青年在旺角高舉「盧麒追悼大會」的白布，迅即被警察拘捕。法官判蘇守忠進青山醫院觀察十四天，由醫生決定他精神是否有問題。港英政府對騷動的處理手法，受到一些市民的質疑。香港大學一位學生在港大學生會刊物《學苑》撰文指出：「政府由始至終準備硬幹，由逮捕蘇守忠開始都是準備用武力鎮壓的，並未全力嘗試用政治手段解決因示威可能引起的暴動。」⁶

騷動調查委員會的報告書

騷動結束後，港英當局於五月六日宣佈成立由四名成員組成的九龍騷動調查委員會，調查引致騷動的事態和成因。港督戴麟趾委任按察司何謹為委員會主席，其他成員為香港童軍總監羅激勤、前香港大學副校長賴廉士、律師黃秉乾。委員會於六六年十二月發表調查報告書，認為警方採取了「持重的措施」，有效地遏止暴動。委員會的結論傾向政府的立場，不相信政治、經濟及社會方面的不滿情緒是騷亂的直接原因。報告書認為，由於經濟不斷增長的緣故，香港大部分市民生活質素不斷改善。但委員會承認，「有理由假定」有些示威者參與騷亂的動機，是由於他們在經濟上遭受挫折和香港社會貧富懸殊而引起的。

委員會「不認為在政治、經濟及社會方面的困阻是一九六六年暴動的直接原因」，又批評輿論抨擊天星小輪加價「流於偏激」，並認為報章的報道和葉錫恩的反加價行動助長了騷亂。但委員會也對港英政府的管治缺陷提出了含蓄的批評，認為政府職權「過於集中」，經

常造成對普通市民的真正問題漠不關心的印象。委員會同意必須在經濟及社會方面注意若干因素，「以免將來演變為足以釀成騷亂的原因」。報告書指出：「政府與民衆間的隔閡，對於任何行政體制，都是一項持續性的危險和使之憂慮的事。一個殖民地政府即使能夠提供最有效的行政和經濟及社會進展的最佳機會，也比較難引起和獲得人民的支持。」⁷委員會又承認，騷動造成的情緒高漲的氣氛，潛伏的種族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情緒藉以發洩，「在大眾情緒激昂的時候，它仍然有可能造成極大損害的因素。」⁸

委員會同意如果香港不是隱藏對社會和經濟情況的不滿情緒，示威不可能得到民衆那麼大的支持，「潛在和實在造成不滿情緒的原因，可能再在將來促成騷動，故亟需加以分析」。報告書指出：「有證據顯示，香港青年對本港事務漸感興趣，而且逐漸對他們的父母可能默然接受的情勢提出抗議。」⁹

委員會呼籲「為民衆利益起見，政府與人民應設法開闢及發展任何途徑，廣闊政府與民衆之間的傳達路線，使上情下達或下情上達暢通無阻，一方面可傳遞消息，另一方面可傳遞有意義的批評和建議。」委員會認為政府「應更清楚顯示它對輿論的反應，建立更完善的下情上達、上情下達的途徑，增進公務員與民衆之間更多的個人接觸」。

天星小輪騷動暴露了香港長期潛伏的社會矛盾，以及民衆對港英殖民政府的不滿情緒。二次大戰後香港一般市民生活艱困，但直至六零年以前，港府幾乎沒有提供任何社會福利，由志願機構負起這方面的責任。六十年代以前，除了涉及工業安全的勞工法例以外，香港的勞工法例可說絕無僅有，勞工權益幾乎完全不受法例保障。香港大學政治學者 Ian Scott 相信，工商界擔心勞工成本上漲，導致香港競爭力下降，港英政府因此沒有積極制訂勞工法例。

香港社會民主黨六六年發表的《九龍騷亂事件調查報告》認為，天星小輪事件不過是這次騷動的導火線，「追源溯始，實在源遠流

長。近者是近年政府一連串的加價、加租、加費的措施，影響民衆生活；遠者是對殖民地制度的保留，使民衆有香港不是自己地方的感覺。民衆與港府之間有了一道鴻溝，甚至存在敵視的態度」。報告又認爲：「騷動主要是民衆對港府不滿情緒的發洩，其中也摻雜了一些窮人對貧富生活懸殊不滿情緒的發洩，同時也摻雜了一些民族主義的情緒。群眾攻擊和破壞對象主要是警方人員、警車、停車收費錶、交通燈、消防局等，其次是從港府取得專利權而服務態度惡劣的九龍巴士公司的車輛，再其次是匯豐銀行和其他私家車輛。」

社會民主黨的報告又指出：「香港居民到現在還沒有公民權，連工黨議員中較開明的威廉絲夫人在本黨的記者招待會上也表示如香港的殖民地制度不改變，香港居民是不可能獲得公民權的。所以警察隨便拉人、打人，小販管理隊對待小販如狼似虎；消防人員非得當事人饋贈不願救火；工務局和公用事業則打建築公司和飲食店的主意；一句話：官威十足，民賤如蟻。流風所及，公用事業人員視顧客如奴隸，叱喝謾罵，已經習以爲常。在這種情形下，試問港府和大多數老百姓怎能不處於對立的狀態？」¹⁰香港大學學生會刊物《學苑》的《編者隨筆》更批評政府在天星小輪事件中「漠視輿論，不顧民意，我行我素」，呼籲政府採納民意。作者更揭露港英政府假民主的把戲：「我們從去年市政局選舉時選民登記的冷淡態度，便知很多人都不願客串這種把戲。他們不是對香港切身問題不關心，而是關心無門。」¹¹

一些輿論也注意到，天星小輪事件反映港人對港英的不滿情緒。總部設於香港的英文時事雜誌《遠東經濟評論》認爲：「大多數香港人相信英國從香港謀取利益，並認爲香港政府是爲倫敦賺錢的。不只苦力和小販抱有這種看法，就連相當高級的華人公務員也這樣想。重要的是這種看法爲何會這樣普遍。」¹²蘇守忠九七年四月接受《明報》訪問時說：「我没有把反殖民的字眼喊出來，心底裏想的卻正是這回事。」¹³已落髮爲僧的蘇守忠，在九七年一個研討會上表示：

「當時民意不值斗零（五分錢），（六六年）示威是勢在必行的。」¹⁴

社會民主黨報告又批評當局對天星事件的處理，導致和平的遊行示威活動演變為騷亂。「以絕食抗議天星加價者，被警方無理拘捕，對於民衆有切身關係的事情，民衆用語言，用文字和用絕食的方式抗議既不生效，遊行示威顯然成為很自然的趨勢。在遊行示威的第一日，參加者只是舉標語，呼叫口號，沒有破壞行動。然而民衆的和平示威卻受到警方干涉和限制，有些示威者遭警方拘捕，這才激起民衆的憤怒，於是群眾與警方對壘。」

不過，港府鎮壓騷動的決定得到一些團體和傳媒的支持。六六年四月八日下午，香港大學學生會發表聲明，譴責天星小輪加價而觸發的騷動。聲明指出：「暴行決非解決問題之方法，只會危害社會安寧及招致不必要之損傷。任何抗議必須循正途發表。吾等呼籲學界及社會人士鎮靜從事，同心協力，維護社會安寧。」《明報》也在社論中，認為「在民主社會中，人民有權以正當途徑表達自己的意見。但我們希望本港市民必須通過合法的手段來表達，既不可破壞秩序法律，以免發生不愉快的後果。反對加價是合法的事，但必須避免用觸犯法律的行動。反對加價的目的是為了維持本港社會的安定，但如果因示威的行動而破壞了社會的安定，這就與原意大大不符。」¹⁵

香港左派對天星小輪騷亂保持中立

值得注意的是，香港左派報章在六六年天星小輪騷亂中保持中立，不但沒有用六七年的「民族大壓迫」的角度來處理這宗新聞，更在評論中站在支持港英政府的立場，強調維持社會秩序的重要性。《文匯報》當時發表題為《反加價不應騷亂》短評，強調全港居民都希望社會秩序能迅速恢復，好讓大家能過正常生活。《文匯報》更希望有關當局「重視居民的這一願望，採取合理措施，迅速消除一切有損於居民利益和騷亂的因素，滿足居民的合理要求」¹⁶。

《大公報》也認為：「從廣大居民的切身利益出發，大家都應冷靜看清事態的變化，並有效地合力促使局勢迅速恢復平靜。」時任《大公報》副總編輯的羅孚表示，天星小輪事件是香港居民的自發行動，與左派無關，「左派甚至可能懷疑有托派插手，所以保持中立」。曾於六七暴動期間被捕入獄的出版界人士翟暖暉對筆者表示，當時有消息顯示，部分騷亂份子曾尋求工聯會支持，但不得要領，「不然五月風暴就要提前一年了」。而從表面跡象來看，香港左派陣營沒有介入天星小輪騷動，事件完全是示威群眾的自發行動。

港府委任的調查委員會報告其實頗多真知灼見，港英當局卻似乎沒有認真吸取天星小輪騷動的教訓，設法解決官民之間的隔閡和疏導市民的不滿情緒。港府反而在騷亂結束後，迅即批准天星小輪加價，四月二十六日宣佈來往中環至尖沙咀及紅磡的頭等票價每程均增加五分錢，一如交通諮詢委員會的建議。港府堅持批准小輪公司加價，無疑加深了政府與民衆之間的鴻溝。當局又懷疑葉錫恩煽動騷動，調查委員會一度傳召她作證。不吸收歷史的教訓，終究會受到歷史的懲罰。《九龍騷動調查委員會報告書》墨瀋未乾，香港社會已要迎接一場更大規模的騷亂。

二、澳門「一二三事件」和文化大革命的衝擊

如果說天星小輪騷動突顯了香港長期存在的社會矛盾，澳門「一二三」事件則為香港左派陣營提供了精神鼓舞，以及六七年反英鬥爭的「練兵」機會。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五日，澳門氹仔市政人員阻止興建坊眾學校工程，觸發警民衝突。當時澳葡政府已撥出那幅土地興建學校，但工務局遲遲未批准動工。學校方面遂自行動工，卻遭有關人員干涉，警方與示威師生及民衆發生衝突。

根據葡萄牙秘密警察六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完成的機密報告，澳門當局免費送出氹仔一幅土地建校，部分官員卻因沒油水可撈而拖延辦理，激起衆怒，給予澳共份子發動事端的藉口。¹⁷報告又指出，當時

澳門警方貪污無能，當地六百名警員士氣低落。氹仔建校事件風潮不斷擴大，而澳門左派群眾由於受到文化大革命的極左思潮影響，發起大規模示威，警民衝突和流血事件越演越烈。十一月三十日，大批左派工會及社團成員、工人、學生到澳督府門外示威，朗讀毛語錄。左派群眾要求氹仔行政官員與鎮壓示威的警方人員下台。十二月二日，北京電台廣播指責澳葡政府以「法西斯手段」製造事端，使澳門左派陣營以為北京支持他們的行動。十二月六日和十五日，國務院周恩來先後與外交部長陳毅、主持港澳工作的廖承志及外交部官員，討論澳門問題。¹⁸

十二月三日，澳葡政府派遣軍隊鎮壓左派群眾，並於當晚黃昏開始頒佈宵禁令。十一名華人在事件中遭射殺，逾一百人受傷。澳門左派社團隨即發動罷市，群眾衝擊治安警察廳總部等政府部門。澳葡當局無法控制局面，六七年一月廣東當局更關閉與澳門接壤的關閘、禁止內地糧食及食水輸往澳門，迫使澳門政府屈服，接受左派提出的道歉賠償、驅逐國民黨在澳門機構人員、澳門各地不准再懸掛青天白日旗等要求，國民黨勢力全面撤出澳門。而涉及氹仔建校事件的護督、行政官員及鎮壓師生的官員先後離開澳門。澳門社會自此被左派控制，甚至有「半個解放區」之稱。

澳門左派陣營取得壓倒性勝利後，對香港左派領導人產生了激勵作用。當時香港左派報章大幅報道「一二三」事件，新華社官員更聲稱澳門鬥爭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兩條半毛語錄就鬥垮了澳葡」，大大鼓舞了他們日後與港府的鬥爭情緒。新華社及左派社團、學校更組織群眾前往澳門，「學習」澳門左派的「勝利經驗」，為日後在香港發動反英鬥爭作好「思想準備」。當時擔任《大公報》副總編輯的羅孚指出，新華社社長梁威林和副社長祈烽到深圳開會，總結了澳門的勝利，決定要在香港「大幹一場」。

文革和澳門事件的衝擊，令長期備受港英打擊的香港左派陣營開始沉不住氣。澳門「一二三事件」結束後，《大公報》社長費彝民、

《文匯報》社長李子誦等左派領袖到澳門「學習」，返港時遭香港海關人員搜查行李，而且是逐件物品詳細檢查。費彝民一向是性情溫和的謙謙君子，這時候也按捺不住，拍桌大罵：「你們算甚麼東西？」他的激烈反應，嚇得在場的海關人員不知如何是好，不敢繼續留難他們。

一位曾經前往澳門「學習」的新華社官員表示表示：「我們返港後不由自主地躁動起來，已感到香港形勢出現了變化。」雖然周恩來五十年代訂下「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針，文革爆發後也指示香港不搞文革，但那位新華社官員表示當時新華社官員「頭腦發熱」，早已把方針政策拋諸腦後。他指出：「在情緒高漲的形勢下，我們（新華社官員）根本沒有任何質疑的空間。」他形容在極左思潮籠罩下，所有人都是無可奈何的。自此以後，香港左派陣營積極捕捉發動鬥爭的口實，而六七年頻繁的勞資糾紛就成了千載難逢的契機。

事實上，六六年八月文化大革命在中國大陸爆發以來，香港左派早已磨拳擦掌。六六年八月五日，毛澤東公開發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指責「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的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六六年九、十月間，《人民日報》社論呼籲打倒國內的走資派和反對國外的「帝修反」。當時的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梁上苑表示：「六六年文革爆發後，香港左派基層幹部和群眾原想仿照國內紅衛兵大搞一場，例如貼大字報、『破四舊』、強迫領導靠邊站、奪權等」

八月八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根據毛澤東意見制訂的《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簡稱《十六條》），表明這次運動的目的「是鬥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批判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而十六條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黨的領導要善於發現左

派，發展和壯大左派，堅決依靠左派」。八月十八日，林彪在首都百萬群眾「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群眾大會」上發表講話，聲言「我們要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要打倒資階級反動權威，要打倒一切資產階級保皇派」。

中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消息，對中共駐港機構幹部和左派社團帶來巨大衝擊。新華社香港分社一位官員對筆者表示，文革爆發後極左思潮無遠弗屆，英國、美國、法國、意大利等歐美國家也受到影響，美國「黑豹黨」成員手持毛語錄在法庭進行鬥爭。他指出：「香港左派受到英國人長期壓抑，文革開始就萌生打倒港英的激進情緒，要港英不低頭就走頭。」

當時負責中共在港宣傳工作的《文匯報》總編輯金堯如憶述說，新華社社長（即中共港澳工作委員會書記）梁威林在一次會議上提出，全黨要好好學習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堅決擁護，堅決執行，更要好好檢查自己身在香港，有沒有自覺或不自覺地走資本主義道路。梁強調：「要深挖自己的資產階級和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要把自己轉變為繼續革命的左派；否則就只有變成污泥濁水、牛鬼蛇神，被歷史的潮流所沖刷。」¹⁹

但八月下旬，北京傳來國務院外事辦公室（中央外辦）副主任廖承志的指示：這場文化大革命只是在國內進行，香港在海外，現在還是資本主義社會。廖承志說：「周總理指示，香港不能照搬國內，內外有別，香港不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宣傳上千萬不要使香港同胞以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也將席捲香港。至於我們黨政企業組織內部，不搞大字報，不搞群眾集會，不搞揭發批判。請同志們注意，要記得總理最後一句話，務必避免我們在香港的黨組織和各企業機構自己內部大門，發生大亂子，毀掉香港長期工作的深厚基礎和戰略部署。」²⁰

一九六六年「十·一」國慶前夕，北京邀請一批香港左派社團負責人赴京觀禮，周恩來在天安門城樓接見他們。當時周恩來說：「香

港同胞要認清國家形勢，中國長期以來是封建社會，文革是對封建文化的清理，國內破四舊是要破除舊風俗、舊文化。」不到一年，香港左派發動反英鬥爭。身為觀禮團成員的香港左派新聯電影公司董事長廖一原細味周恩來的談話，以為「反英抗暴」只是「對港英進行文鬥和言文批判，令香港同胞的愛國情緒更昂揚」。但他怎樣也想不到「反英抗暴」後來演變為翻天覆地的極左鬥爭，他本人也成為港英的階下囚。

踏入九、十月間，紅衛兵運動席捲全國，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社論呼籲文革從打倒國內走資派發展到反對國外的帝、修、反，「毛澤東思想的靈魂就是造反」，要「把地球上還有三分之二的人口從帝修反腳底下解放出來」。金堯如指出，新華社幹部開始受到文革極左思潮和紅衛兵情緒感染，一些中下層幹部開始躍躍欲試，開始以小字報責問新華社領導：黨在香港的組織裏有沒有走資派？社會主義的國內有，資本主義的香港反而沒有？這符合事實的邏輯嗎？在香港我們要不要反對走資派、反對帝修反？現在為甚麼不許我們造帝修反的反？組織裏有沒有帝修反的代理人？羅孚也表示，新華社內已有人貼出大字報，要在內部展開文革，作為革命的表率；結果要周恩來把一些人召到北京，勸說了六、七個小時，總算把香港可能爆發的星星之火撲滅。

九月下旬，梁威林在新華社會議中指出：「在香港和澳門我們不能自亂陣腳，要上下團結，一致對外。我們要抓反帝的問題，要看準時機，抓住時機，發動群眾，開展運動。這樣我們就和國內的文化大革命聯繫在一起了。」新華社領導層有意將鬥爭矛盾指向港英當局，以轉移群眾視線，藉此保住烏紗帽，新華社發動騷亂顯然是領導層爭取「革命表現」，向中央文革當權派表忠的舉措。羅孚相信：「香港左派奉旨不在香港搞文革，不搞自己鬥自己。但左派總是要革命的，在國門旁邊被『全國山河一片紅』的文革之火烘烤得不免面紅心熱，熱血沸騰，就不能不採取一些革命行動，表現革命積極。既然不

能自己革自己的命，自己鬥自己，那就只有去鬥港英，革港英之命了。」

六七年一月，中共中央外事辦公室被「造反派」奪權，廖承志靠邊站。造反派成立中央外辦革命領導小組，並通知港澳工委，日後接受小組的領導。金堯如認為，事件表明由林彪、江青等極左派控制的中央文革領導小組已奪去周恩來在中央外辦的權力，港澳工委今後改由中央文革領導小組領導，港澳工作已融入國內的文革之中。梁威林傳達中央外辦革命領導小組的命令後表示，要肅清自己頭腦裏的右傾遺毒，立即糾正工作中的錯誤，重新走上革命的道路，「要重新研究香港工作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任務，把港澳工作推上新的歷史階段」。²¹

香港左派陣營自四九年以來一直遭港英當局壓抑，四九年港英解散香港三十八個左派團體，五、六十年代不少左派人士遭遞解出境，文革在國內開展後，部分左派人士可能覺得是吐氣揚眉的時候了。出版界人士翟暖暉五十年代初期在香港一家書店工作，老闆司馬文森是當時香港文學家，卻於五二年被港府遞解出境。翟相信，左派陣營不滿長期受港英壓抑，是左派六七年採取激烈行動的深層原因。

三、六七暴動前的工潮

一九六七年是香港頗不平靜的一年，是年二、三月開始，香港渣華郵船公司、南豐紗廠、風行的士、中央、上海、半島的士公司先後發生勞資糾紛。六六年十二月初，渣華郵船公司旗下輪船「士他馬士加」號華籍海員在船上騷動，外籍船長與船員槍傷四名華籍船員。左派初期僅作有限度抗議，直至六七年初澳門左派陣營取得「勝利」後，香港左派逐漸將事件升級。六七年二月五日，左派工聯會向渣華公司提出嚴重抗議，渣華迅即向海員道歉，並將那名外籍船長調往沒有華籍海員工作的郵船。雖然渣華作出讓步，但左派工會繼續發動群眾，召開聲討大會，向渣華公司提出進一步的要求。二月二十二日，

左派海員工會退回渣華公司的道歉書。三月二十一日，渣華公司接受了左派的要求。港府相信，左派在渣華郵船公司事件中取得「勝利」，令他們以為可以重演澳門事件。

二月十四日，新界荃灣南豐紗廠領班黃劍雄與左派工人發生打鬥事件，廠方報警，後來開除兩名參與打鬥的左派工人。左派陣營將這宗打架事件政治化，渲染為「美蔣特務有計劃、有預謀的政治壓迫」。《大公報》這樣報道左派工人的抗議行動：「荃灣各紗廠、布廠和染廠的工友，最近在港九紡織染業職工總會荃灣支會舉行集會，揭露美蔣份子在荃灣有預謀、有計劃的製造兇案，毆打愛國工人的一連串暴行。工友們指出，美蔣份子這段期間氣焰囂張，是與港英當局的縱容包庇有關。」²²三月下旬，左派港九紡織染業職工總會派出十多名代表，手持毛語錄操進廠長室。眾人背誦毛語錄後，要求廠長開除他們口中的「美蔣份子」黃劍雄，並抗議「美蔣特務和港英警察勾結」。

四月三日，香港中央及上海的士公司部分司機怠工，影響公司收入。中央的士公司董事長胡應湘（現任香港合和集團主席）與勞方四度談判後達成協議，雙方同意公司結束營業，將車輛售予司機。勞方當時其中一項要求，是要公司開除車務主任梁啓彬。左派指梁為「蔣幫份子」，顯示工潮已沾上政治色彩。《明報》四月二十一日社論呼籲勞資雙方的出發點都不要牽涉政治，否則可能各走極端，造成不幸的後果。

踏入五月，當地相繼出現九龍城寨警民衝突及青洲英坭勞資糾紛。五月四日，港府察仔部人員與警方人員開往九龍城寨，清拆龍城路和龍津路一些民居的違例建築物，其間發生警民衝突，兩人受輕傷，警方拘捕兩名男女。下午一時許，近百名胸懸毛澤東襟章的群眾在九龍城警署聚集，要求警方釋放兩名被捕者，其間有人朗讀毛語錄。²³《大公報》五月六日發表短評，指事件「清楚表明是港英當局蓄意製造的一次橫蠻無理的事件」，是「令人憤慨的暴行」。

六七年四月二十九日，紅磡馬頭圍道青洲英坭公司兩名澳洲籍工程師涉嫌打傷工人²⁴，觸發工人強烈抗議，並發動怠工。青洲英坭工人向資方提出六點要求，其中一項為保證毆打工人事件不再發生。總經理布祿架（Brooker）要求工人到中環總辦事處商談，但工人方面認為事件在廠內發生，堅持資方派員到英坭廠商討，結果雙方無法打開談判大門。五月四日，青洲英坭公司董事會發表聲明，表示由於生產受到阻撓，「無繼續經營的必要」，英坭廠於四日午夜起關閉。廠內所有工人被趕出工廠，廠方更關閉大門。憤怒的工人集結廠外抗議，八名胸前別上毛像章和手持毛語錄的學生到場聲援，並帶同茶點慰問工人。²⁵左派團體更在勞資雙方對峙時組織慰問團，左派電影公司也發動員工前往慰問，多位著名左派明星更特別到場表演。

山雨欲來風滿樓

這些工潮和官民衝突表明，香港社會在六七左派騷亂前夕，早已處於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境地。香港經濟自五十年代末期開始起飛，市民生活逐步改善。可是踏入六十年代中期以來，香港開始面對經濟危機。六五年當地發生銀行擠提風潮，一些銀行倒閉，許多小市民一生積蓄化為烏有。一些行業陷入衰退，許多中小型企業由於資金緊絀，已陷於苦苦掙扎的境地，房地產業更迅速衰退。

與此同時，香港不少日用品價格輪番上漲。港府自六五年開始更實施多項加價措施，例如水費增加一倍，房屋協會提高屬下的新建廉租屋租金，舊式徙置大廈同樣加租，又提高汽車保險收費、煙草稅、汽車牌照費、政府多層停車場收費，郵政局又大幅提高寄往中國大陸、台灣及澳門的郵費。種種加價、加費措施，無疑令中下層市民雪上加霜，不滿現狀的情緒日益強烈。美國政治學者 Ted Robert Gurr 認為，一段時期的經濟情況改善後出現的短暫惡化局面，伴隨民眾期望不斷上升，將令「相對剝削」感（Relative Deprivation）加劇。²⁶隨着增長期間出現的短暫衰退，爆發騷動的可能性相應增加。

香港社會民主黨一份報告認為：「經濟不景氣已籠罩香港，市民不免對生活前景感到憂慮，只要有點風吹草動，即能觸發嚴重事件及引起嚴重後果。可是政府所走的道路卻與香港人民所期望的背道而馳，排斥民意，結果必然造成政府與人民之間的裂痕更深。」²⁷當時香港一些社會學家認為，香港青年人已越來越認識當地的社會及經濟情況，對於他們發展機會有限，以及難以實現願望，漸漸感到苦悶。²⁸而六七暴動的參與者，主要來自對現狀不滿的香港中下層市民。

第二章 六七暴動的導火線

——新蒲崗香港人造花廠事件

六十年代香港經濟起飛，塑膠花業也成為增長可觀的新興工業，其中塑膠花的出口幾乎囊括國際市場。截至一九六二年底，香港共有塑膠工廠九百九十七家，僱用工人三萬多人，每年製品輸出高達三億元。一九六七年出口總值達八億二千三百萬元，位整體工業出口總值的百分之十二。²⁹

香港人造花廠是當時著名的塑膠花廠，總廠位於香港島西區，並在九龍新蒲崗開設分廠，合共僱用近千名工人。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三日，香港人造花廠公佈十項規例，內容包括取消三班制的加二津貼；將歷來工人每期(半個月)工資達到一百二十元，即給予加一獎金的標準提高至一百六十元；兩期工資不到一百六十元者將被開除；工人操作的機器一旦損壞，資方不發工資，非正常壞機須待機件修好後，工人才可復工；如非正常壞機作有意破壞處分。資方稍後又貼出佈告，列明不准工人請假，廠方不會為請假工人保留職位。

人造花廠工人對這些新規定相當不滿，認為影響他們的收入和就業，取消加二津貼將令工人每月收入減少六十元。而一旦壞機不安排工人使用其他機器，要待修理妥當後才復工，但修理機器往往需時半個月，可能導致兩期工資不到一百六十元；不准工人請假也不合情理。時事評論員岑逸飛當時在中文大學新亞書院就讀，他認為人造花廠提出的新例不合理的地方實在很多，不少工人原本倚靠每期糧的加二津貼，取消了這佔工資百分之二十的收入；而不准工人請假，壞機不給工資的規例，也使工人缺乏職業保障。

他又認為，在任何勞資糾紛中，對勞方的合法要求應表同情；人造花廠所頒佈的苛例，「說明了資方只顧賺錢，而不了解工友的困

難，至於青洲英坭廠的停業，也不是解決工潮的正常辦法」³⁰港英政府六七年發表的《社會保障問題報告書》坦言，香港工人都是「可以隨時解僱的散工」。署名「龍戰」的香港大學學生在學生會刊物《學苑》撰文，表明同情人造花廠工人。他認為：「事實擺得很清楚，資方的手段跡近剝削，而且絕對無理。這種剝削情形的存在，實在是香港的一個大污點。世界上所有文明國家，對於『剝削』這種情形差不多已經鏟除淨盡，對於勞工福利是逐步改善。」³¹

但人造花廠一位老職工指出，六七年三、四月間，人造花廠發現有啤工故意損壞機件及怠工的現象，廠方於四月中旬貼出一張佈告。這位職工認為：「這佈告其實並不是有意為難工人的，甚至是改善工人待遇的。」例如修模由過去每小時補回四角增至八角，「廠工」十



六七年四月中旬開始，九龍新蒲崗大有街香港人造花廠爆發工潮，圖為部分左傾工人在勞資糾紛期間朗讀《毛語錄》。

一元增至十二元；如果員工收入不如意者可向公司反映，但不得故意損壞機器。³²

部分工人商議後，決定派出代表與資方交涉。工人代表提出五項要求，分別為：

- (1) 取消四月十三日的佈告；
- (2) 壞模每小時補薪一元五角；
- (3) 平均分配工模；
- (4) 低價模及時調整加價；
- (5) 不能無理變相開除工人

但上述那位員工表示，大多數工人不為所動，認為帶頭鬧事的工人的要求「小題大做」，遂採取「你叫開會我開工，你叫簽名支持我杯葛的態度」。人造花廠香港總廠啤機機一名高姓工人也表示：「左派冤枉了好人，在香港的塑膠工廠中，我們老闆是頂好的了，工資頂高、福利頂多。」他指出，廠方提出連續兩星期糧都不到一百六十元者將被開除的規定，是用來對付那些「懶做貪玩的飛型工友」他說：「我們廠規定凡機器損壞或換啤機，工人可以每天支底薪十二元。在事件前兩個月來，廠方發現很多機器損壞，而那些損壞的地方，本來並不容易損壞，證明受人蓄意破壞。」這位工人又指全廠工友約四百多人，真正的左派份子不過數十人而已，其中受利用的工人大多是那些缺德、懶惰的工友。³³

廠方對工人的要求不予答覆，又於四月二十八日以「生意收縮」為理由解僱九十二名工人，其中包括多位員工代表，並關閉九龍新蒲崗分廠啤機部。廠方貼出的佈告指出，「按勞工處條例」，每名被開除的工人可獲發「津貼工資一天」。

踏入五月，香港開始了漫長的夏季，五月最高溫度為攝氏三十四點四度³⁴，似乎預示了後來左派陣營和港英政府白熱化的政治鬥爭。五月四日，警方勸喻工人離開現場。當天下午二時，三十名工人強行入廠，要求與資方談判，廠方報警求助，大批警員到場戒備。工人又

在工廠門外張貼六十張大字報及毛語錄，氣氛漸趨緊張。五月五日上午，百多名荷槍實彈的防暴隊開進大有街人造花廠門前，將工廠重重包圍，並封鎖附近道路。下午五時許，人造花廠一輛大貨車將一批製成品運返工廠，預備包裝寄運予貨主，在場工人見狀向廠方提出抗議，認為既然廠方決定關閉啤機部，生產理應全部停止，廠方顯然將貨物外發加工，堅持廠方將該批貨品搬回車上，廠方同意了工人的要求。³⁵而《大公報》五月五日報道，「人造花廠勞資糾紛引起了塑膠業工人的注視，昨天有幾間塑膠廠工人攜同慰問品，前往該廠向堅持正義鬥爭的工人慰問。」

歷史看來存在不少偶然性。在五月六日大有街事件爆發前，勞資雙方曾錯過談判解決糾紛的機會。人造花廠工人指出，他們曾於五月五日三度派代表到人造花廠辦公室，尋求與資方談判，但職員均以負責人外出作推搪。港府勞工處官員則於五月二日及三日分別致電塑膠花業工會，詢問是否需要協助。但一名工人表示懷疑勞工處的態度是否公平，因為「根據過往經驗，(勞工處)皆是偏向資方的」。工人或許以陰謀論看待勞工處，但當年勞工處確實予人調解勞資態度不積極，甚至偏袒資方的負面印象。

英國作家 John Cooper 認為，人造花廠和青洲英坭事工潮反映香港工人「沉睡的躁動不安」(dormant restlessness)，勞工處事前是否察覺這種現象不得而知，但《遠東經濟評論》五月十日號已批評勞工處在勞資糾紛中表現消極，僅作出「紳士式的鼓勵」(gentleman's encouragement)。勞工處官員徐天福在大有街事件發生後，才表示「嚴密注意」，並願意盡可能促成勞資雙方談判。³⁶徐五月八日表示，人造花廠曾表明有意與勞方在勞工處會面，但工人方面一直沒有反應。³⁷在資方有意採取拖延策略，勞方又懷疑勞工處調停能力的情況下，事態惡化似屬無可避免。

港督戴麟趾則指勞資雙方都對勞工處官員採取迴避態度：「勞工處官員連續數星期嘗試在勞資雙方中間扮演調解者的角色，但人造花

廠經理躲在一家酒店內，沒有人知道他身在何處。勞工處尋找工會總部時也遇到不少困難，工會遷離原來的會址，卻沒有通知別人。我們終於找到他們，勞工處負責調解的官員致電工會，表示願意提供協助。但接電話的女孩隔着話筒高叫毛語錄，每次官員打電話到工會，只能聽到毛語錄。」戴麟趾認為，後來出現的騷亂事件與勞資糾紛無關。

五月六日(星期六)，約一百五十名人造花廠工人在新蒲崗大有街廠房外集結，抗議資方「無理」解僱工人，並要求與資方談判，但廠方負責人避不見面。據左派報章報道，當時工人一直維持良好秩序，並「受到港九塑膠業工人的熱情慰問和讚揚」。³⁸下午二時許，工人聽聞資方以「銀彈政策」收買一些工人進廠開工，企圖分化工人。這項傳聞出現不久，人造花廠附近出現數輛滿載警員的警車佈防，逗留約半小時後離去，但現場仍有不少便衣探員。

下午四時許，新蒲崗人造花廠資方拉開工廠後門，企圖將廠內貨物搬走，示威工人以事件尚未解決為由趨前阻止。工人強調，勞資糾紛未解決前，資方不應出貨。工人又猜測這是廠方「假結束，真除人」的花招。二十分鐘後，資方派出一輛貨車到廠房後門，啤機部管工孔彪指揮廠內工人將盒裝塑膠製品搬出，準備搬上貨車運走。廠外工人趨前交涉，雙方互相推撞，據稱孔彪在混亂中毆打示威工人蕭劍輝。示威工人馬上鼓噪，在場觀察的警員立即通知上峰。

下午四時五十分，四輛警車開往現場，九龍東區高級警司谷巴及黃大仙警署副警司摩士率領二十二名警員到場了解情況。工人代表與谷巴商談，工人要求警方用手銬扣押涉案管工，並不准廠方出貨。谷巴提出將管工帶返警署訊問，而傷者須驗傷。警方又認為按法例規定，廠方有權繼續一切合法經營活動，工友阻止出貨於例不合。雙方未能達成協議，局面僵持。³⁹但左派報章《大公報》則報道，警方對毆打工人事件採取「包庇縱容」的態度，雖然工人再三要求嚴懲孔彪，警方依然「漠視工人的合理要求」，沒有將孔彪當場處理。

谷巴離開現場後，工廠後門再度發生混亂，工人堅持不讓廠方出貨，又說「我們不會去驗傷」，因為擔心廠方在工人驗傷期間乘機出貨。孔彪被廠外工人圍困，二十二名警員介入調解，混亂中有人將附近茶水檔的鐵摺椅擲入人群當中，局面更形混亂。下午五時四十分，高級督察根寧咸率領一隊防暴隊趕赴現場，首先將大有街附近的爵祿街、三祝街、七寶街、雙喜街等街道封閉，隨即開往人造花廠後門，與在場工人發生衝突。

據左派報章報道，防暴隊「兇神惡煞，一見人造花廠工人就打。他們揮動警棍，致多名工人受傷，有的被打至頭破血流，有的工人被防暴隊連拖帶拉推上警車」。根據《明報》的報道，警察因受包圍，「曾出動警棍」，一名工人被拖行橫過馬路。防暴隊拘捕二十一名工人，同時混亂中打傷多名工人。對於受傷工人數目，存在不同說法，左派報章報稱「近百名工人」被打傷，《明報》則指一名工人被警棍擊中受傷。一些工人則聲稱被防暴隊用警靴踢傷。當工人被押上警車時，仍然高舉毛語錄及高呼「毛主席萬歲」、「打倒港英」等口號。據《明報》估計，衝突為時約十分鐘。

數百名小童及成年人在防線以外列陣鼓噪，有人從大有街一帶的工廠大廈擲下秤碼、玻璃瓶、鐵罐等物件，防暴隊立即以槍咀向上，以擴音器勸喻有關人等停止擲物行動。防暴隊轉身撤退之際，部分集結爵祿街的群眾向防暴隊投擲石塊及拖鞋，防暴隊遂採取行動驅散群眾。直至晚上八時二十分，防暴隊始撤離現場，大批警員留守現場。大有街事件發生後，港九樹膠塑膠業總工會主席馮金水及兩名工會成員馮陽進強、吳炳明前往黃大仙警署交涉，並抗議警方鎮壓工人，遭當局扣押。三人後來與其他被捕工人一樣，被控「在大有街與其他不知名人等，作非法集會」。

大有街事件成為翌日香港各大報章的頭條新聞，明報以「大有街突起騷動」為新聞標題，《英文虎報》的標題則為「九龍的暴力」(Violence in Kowloon)。左派報章斷定大有街事件是「有計劃、有預

謀」的行動，是港英當局「與廠方勾結在一起，經過精心策劃和佈置的」。據《大公報》報道，五月六日中午時分，新界鄉民目睹防暴隊乘車從粉嶺開出，直駛往黃大仙警署。大公報《短評》認為，工人提出的要求是無可非議的，而工人只要求談判解決問題，他們集合在工廠門前抗議，也是很守秩序的。該報指責港英對勞資糾紛「橫加插手」，而較早時出動警察清拆九龍城寨民居建築物，又在大有街進行「血腥鎮壓」，顯見事非偶然。

耐人尋味的是，香港左派報章在六六年天星小輪騷亂中保持中立，更在評論中站在支持港英政府的立場，強調維持社會秩序的重要性。《文匯報》當時發表題為〈反加價不應騷亂〉短評，強調全港居民都希望社會秩序能迅速恢復，好讓大家能過正常生活。《文匯報》更希望有關當局「重視居民的這一願望，採取合理措施，迅速消除一



六七年五月新蒲崗人造花廠工潮期間，港府出動二百多名防暴隊到場鎮壓。

切有損於居民利益和騷亂的因素，滿足居民的合理要求」⁴⁰。《大公報》也認為：「從廣大居民的切身利益出發，大家都應冷靜看清事態的變化，並有效地合力促使局勢迅速恢復平靜。」⁴¹

人造花廠事件原本只是一宗普通的勞資糾紛，引起社會關注的程度反而不及同年四月發生的青洲英坭事件。左派在人造花廠工潮初期沒有派慰問團到場聲援，只有一小群女學生向工人送茶點。⁴²諷刺的是，港府新聞處四月十九日針對中央的士公司工潮時指出，有關勞資雙方談判的事，與警方無關，除非有人違反法紀，警方是不會介入的。人造花廠事件爆發後，港府勞工處長強調當局不會歧視任何人士。港督戴麟趾於五月十五日發表聲明，反駁港府插手勞資糾紛的指控。他強調：「警察絕不捲入勞資糾紛，並且只在法律受破壞時執行它的規定，政府在勞資糾紛中不偏袒任何一方的政策也沒有改變。」

對於當局為何介入人造花廠事件，社會上眾說紛紜。當時有未經證實的傳言指總華探長呂樂在工潮爆發後曾在工廠附近巡視，而人造花廠東主與呂樂份屬潮州同鄉，猜測呂樂可能因「鄉里」關係而運用影響力，促使警方動武。《香港夜報》社長胡棣周則曾聽聞警隊內有人收受賄賂。市政局議員葉錫恩則表示：「當年資方請警察來幫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⁴³

幾乎同時發生的青洲英坭工潮，發生澳洲籍工程師涉嫌毆打工人的事件，理應更有文章可做，左派更組織慰問團到場聲援，數名電影明星表演助興，受社會關注的程度甚至蓋過人造花廠事件。但九龍新蒲崗大有街香港人造花廠勞資糾紛，卻因港英警方的介入而觸發左派騷亂，也為當時躍躍欲試的香港左派領導層提供了發動鬥爭的契機。暴動期間因「三報事件」被判入獄的出派界人士翟暖暉慨嘆，香港警察濫權的結果，使人造花廠事件搶了閘，上了頭條。

有計劃、有組織的陰謀？

大有街事件爆發後，事件迅速升級，開始摻雜政治色彩。五月

七日晚上，左派港九樹膠塑膠業總工會就大有街事件舉行「控訴大會」，大會主席指出人造花廠事件本來是勞資糾紛，是資方「貪得無厭剝削工人而起的」，港英當局卻借此進行「血腥鎮壓」。膠業總工會又發表聲明，指出工人的要求只是反對資方大批開除員工，要求勞資談判，取消損害工人職業保障的苛例，但資方一直拒絕接見工人代表。工會指責港英警察當局對工人進行「法西斯瘋狂鎮壓」，這是香港警方「有計劃、有組織、有預謀的對我愛國工人和愛國同胞進行瘋狂的迫害」。

聲明指出：「在今天偉大的毛澤東時代，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中國工人是不容人欺侮的，你們的血腥鎮壓是絕不能絲毫動搖我們的堅強意志，我們將更堅決地站起來，繼續堅強進行鬥爭。我們要嚴重警告港英當局，你們這樣張牙舞爪，只有赤裸裸的暴露你們的法西斯面目，你們幹下這一筆血債，我們一定要追償。」⁴⁴膠業總工會又向當局提出四項要求，分別為：

- (1) 立即釋放前往警署交涉的工會主席(馮金水)、工會代表及所有被捕的愛國工人和愛國同胞；
- (2) 嚴懲兇手及賠償我們工人一切損失；
- (3) 切實保障工人人身安全，保證今後不得發生同樣的鎮壓迫害工人事件；
- (4) 尊重工人的基本權益，保證今後不得干預勞資糾紛；

儘管膠業總工會聲明帶有不少「文革語言」，但該會初期向港英當局提出的訴求基本上仍然停留在勞資糾紛的層次。五月七日下午四時，左派港九工會聯合會(工聯會)派出楊光、郭添海、陳謙、胡九、路明及黃燕芳六名代表，前往警務處要求會見警務處長，就人造花廠事件提出「嚴重抗議」。但警方代表以案件已交由法庭處理為理由，不願作出評論。

《大公報》五月七日社論，開始將事件政治化。社論認為，人造花廠事件「不但不是甚麼『法律』問題，而且已經不是勞資糾紛



左派社團發動群眾「慰問」人造花廠工人，並在工廠外牆張貼大字報。

了」。《大公報》認為：「從九龍城寨跟着在新蒲崗出動武裝警察大打出手以後，港英向着香港中國居民挑釁的架勢顯然擺出來了。」該報提醒那些「揮動警棒毆打中國同胞的警員」，中國人恃勢打中國人絕不是甚麼光彩的事情，若不迅速回頭是不會有好下場的。五月八日，工聯會發表聲明，將五月六日大有街事件提升至「英美勾結反華」的高度。聲明指出：「新蒲崗血腥鎮壓事件絕不是偶然的。這次事件是在香港已成為美帝加緊利用的侵越軍事基地，帝、修、反各種各樣的反華活動接連不斷的形勢下發生的，顯然港英當局有組織、有計劃、有預謀一手炮製出來。」⁴⁵

工聯會指責港英「一貫縱容包庇美蔣份子，製造事端」，並將中央、上海的士、青洲英坭等工潮與大有街事件聯繫起來，斷定是港英的「陰謀」。而左派各界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鬥委會）六八年一月出版的《香港風暴》，也將港英鎮壓行動定性為「民族大迫害」，是一「有準備、有組織、有計劃的行動」，是英國政府「勾結美帝國

主義反對中國的陰謀的一部分」。左派陣營顯然賦予人造花廠事件「政治意義」，抗爭行動開始溢出勞資糾紛的範疇。

工聯會的聲明又指出：「我們是偉大的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工人，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人是不怕任何鎮壓的，帝國主義對於革命人民所進行的種種迫害，是絕對動搖不了我們堅強的鬥爭意志的。」工聯會五月八日同時召開全體理事會議，要求各業工人要開會聲討港英當局的「暴行」，大力捐款、寫慰問信支持人造花廠工人，標誌工聯會全面介入這次勞資糾紛，一場更大的政治風暴一觸即發。

五月七日開始，左派報章開始大量刊登「群眾來信」，大多署名「一群愛國公務員」、「一群小學生」等。一位渣華公司職員在來信中表示：「港英當局不要翻錯皇曆，現在毛澤東時代，中國人民已揚眉吐氣，你們不要以為中國人民可欺的。你們(港英)必須老老實實接受工人兄弟的正義要求，希望你們不要學澳葡不見棺材不流眼淚。」⁴⁶五月十日，左派音樂、戲劇藝術工作者舉行「聲討港英暴行支援愛國同胞反迫害鬥爭座談會」，一些出席的學生以文革語氣的口腔說：「你們(港英)對工人叔伯施以血腥罪行，我們要與工人叔伯團結在一起，戰鬥在一起。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要與迫害愛國同胞的港英當局鬥爭。」⁴⁷

五月十日，人造花廠工人再次返回工廠，在工廠正門和橫門張貼「抗議港英插手勞資糾紛」、「警方武裝鎮壓造成的血債我們一定要償還」、「港九工人大團結萬歲」、「偉大的中國人民是不可侮的」等標語，又貼上毛語錄和大字報。從人造花廠工人新近張貼的標語來看，他們的訴求已開始超出原來勞資糾紛的範圍，少提工資福利等問題，反而逐漸趨於政治化，將矛頭指向港英當局。與此同時，左派工人、學生紛紛到場慰問，眾人並高唱「革命歌曲」。到場聲援的左派機構包括銀行、國貨公司、學校等，分別送來慰問信、汽水、水果等。

大有街事件於五月十一日再度升級。當天下午大批左派工人和學

生到人造花廠門外慰問工人，六百二十多名防暴隊下午三時半開往大有街，用警棍、槍托毆打在場的左派學生、工人，甚至開槍射擊，一些年僅十多歲的中小學生遭木彈命中受傷。據左派報章報道，防暴隊「見人就打，連小孩都不能倖免」，在新蒲崗爵祿街一條後巷中，六名防暴隊員圍毆一名小童。⁴⁸左派陣營稱這次事件為「五·一一血案」。

左派背景的清水灣電影製片廠攝影師黃阿林和蔣仕在大有街拍攝騷動過程時，被警方拘捕及短暫拘留。防暴隊在黃大仙徙置區搜捕騷動者時，十三歲少年陳廣生在衝突事件中喪生，左派報章指陳被防暴隊「毒打致死」，左派稍後成立的各界鬥委會向陳母致送五百元。但非左派報章指陳是被騷動者投擲的石塊擊中致死，陳母更向鬥委會退還慰問金。

而新華社香港分社記者司徒強當天在人造花廠附近採訪時，也聲稱遭到警察毆打，新華社翌日前往港督府提出抗議。司徒強是香港現任立法會議員、民主黨黨鞭司徒華的胞弟。騷動直至午夜才告一段落。五月十三日，《文匯報》、《新晚報》、清水灣電影製片廠、新華銀行及中南銀行職工代表為此前往港督府抗議。英國作家 John Cooper 則有不同說法，「警方傍晚到場恢復秩序時，遇到群眾從高處擲石塊及玻璃瓶，有人甚至潑尿液，警方唯有採取更強硬的措施」。⁴⁹

警務處長晚上七時三十分宣佈動員後備警察，所有警員取消休假。港府晚上九時半開始在東頭邨、老虎岩（現在的樂富）、黃大仙、九龍城、新蒲崗、鑽石山、彩虹邨、牛池灣等九龍東部及中部地區實施宵禁。根據港府新聞處資料，警方當天逮捕一百二十七人，十一人受傷；警方先後發射七十發木彈及五十發催淚彈。據報道，防暴隊使用的木彈長達七吋，直徑近一寸，重約七至八安士。

左派報章猛烈指責警方的鎮壓行動，《大公報》社評指「這是港英對香港中國同胞進行迫害的升級，新的暴行進一步暴露港英存心向香港中國居民挑釁，抱着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不惜自行撕毀紳士的

外衣，赤裸裸地把法西斯的面目露出來了。工人赤手空拳站在工廠門前，沒有妨礙到任何人的安全：有些人是到場向工人表示慰問支持的，試問又犯了甚麼「法」，為甚麼英警可以對他們這樣窮追猛打，棍打彈射？」社評又以強硬語氣強調「對於迫害，只能反抗，迫害越大，反抗越烈。你要把迫害升級就升吧，中國同胞的反抗一定立即追上，升到甚麼水平就甚麼水平，一切後果當然也由你們完全負責」。⁵⁰

雖然左派電影界人士廖一原同情人造花廠工人，也不滿港英當局鎮壓工人學生，但他對左派大規模發動群眾到場聲援頗有保留。廖一原指出，左派陣營發動左派工會、學校、中資機構職工、左派社團，川流不息到現場慰問工人，而且手持毛語錄，給人很不尋常的感覺。他認為：「新華社在幕後發動左派社團、學生慰問、支援，無疑給予港英鎮壓的口實。」

第三章 「你升級，我也升級」 ——左派將勞資糾紛政治化

港英當局十一日採取鎮壓行動，激起左派陣營更強硬的反應。五月十二日下午六時半，工聯會召開緊急理事會議，據左派報章報道全體理事「胸佩毛主席像章，意氣風發，鬥志昂揚」。主持會議的工聯會理事長楊光指責港英當局把一場勞資糾紛擴大為「反華事件」，矛頭直指中國同胞。楊表示：「帝國主義是不見棺材不流淚的，我們已經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敵人要升級，我們也要升級。」他更警告港英當局「蓄意要玩火，那就來吧」，總有一天他們會發現自己處於「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中，遭到沒頂」。⁵¹

工聯會宣佈成立「港九各業工人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並建議香港各界組成反迫害鬥爭委員會。工聯會號召各左派工會立即加緊組織起來，廣泛捐款，並召開聲討大會。會議同時通過四項要求：

- (1) 立即停止血腥鎮壓，保證今後不再發生同樣鎮壓事件；
- (2) 立即釋放被捕的中國工人、學生和同胞；
- (3) 嚴懲兇手，賠償一切損失；
- (4) 港英當局必須賠禮認罪

五月十二日騷動持續，中午十二時五十分，東頭邨第十二座一些群眾向警察投擲石塊，警方稍後發射多枚催淚彈驅散群眾。東頭邨數處地方起火，一些違反宵禁令的群眾被捕。在九龍尖沙咀天星碼頭巴士總站，五十名九龍巴士公司司機及稽查員高呼毛語錄口號，又在巴士車身貼上「反對帝國主義」的口號。負責平息騷動的警方指揮官伊寧禾夫(M. C. Illingworth)表示，雖然參與騷動的青少年行為令人討厭，但警方「不太情願向他們使用真正武力」。與此同時，澳門左派陣營聲援香港左派的行動，千多名澳門左派群眾當天前往英國駐澳門領事

處，抗議港英當局「鎮壓」香港左派群眾。據左派報章報道，「澳同胞怒審英領事，這位英國殖民主義者在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理屈詞窮，被審得狼狽萬分」。

五月十三日，騷動進一步擴大。中午時份，十數名學生打扮的少年在新蒲崗爵祿街焚燒一輛木頭車，又向警員投擲石塊，玻璃瓶石塊、鐵塊從附近住宅樓宇和工廠大廈如雨擲下。下午三時許，群將一輛途經東頭邨的市政事務處垃圾車截停，隨即打開盛載垃圾的廂，潑上火水縱火焚燒。而大成街徙置事務處宿舍也被縱火焚燒。方整天出動防暴隊、衝鋒隊、水警、後備警察甚至學警，進入住宅宇拘捕參與騷動者，九龍土瓜灣馬頭圍道同樣火光衝天。⁵²

港府發言人於五月十二日發表聲明，反駁左派陣營的陰謀論「當局執行法律而被某些方面說成是政府和上述這些人作對的有計劃行動，實在是最不幸的事。尤其不幸的是，政府在工業糾紛中執行法律，被人把它和其他不相關的事件，像拆除非建築物連在一起，認為這是政府反對香港左翼團體的有計劃行動：這種說法是不確的，政府的政策是不偏不倚和大公無私地維持法律。」《大公報》則在社評中反指責港英當局「根本不是執行甚麼法律，而是借題發揮，完全出於某種政治企圖，要對付中國居民了」。⁵³



六七暴動期間擔任港督的戴麟趾。

非左派報章則傾向港府的立場，呼籲群眾不要擴大事端。《明報》五月十四日社論批評騷動已開始超越勞資糾紛的範圍，社論指出：「這次騷動的起因是若干勞資糾紛，本來都可經過各種正常途徑取得合理解決。但事情發展下去，越出了正常的範圍，令香港市民受到極大損失。從現場攝得的照片與電視片段可以看到，目前參與騷動的群眾，極大多數已不是發生工潮工廠的工人，而是外來的毫不相干的人群。這些人燒巴士、搗毀徙置事務處，種種行動與原來的工潮早已相距十萬八千里。這些外來者的行動，對於真正的工人是不利的。」社論又強調，任何促使騷動擴大，使火頭燒得更旺的行動，「決不會得到廣大居民的歡迎」。

五月十四日，局勢逐漸恢復平靜。北京官方新華社當天首次報道五月六日以來香港左派騷動。新華社的報道指出，港英當局「為配合美帝行動，有計劃有預謀有組織地製造暴行，與全港中國同胞和七億中國人為敵」，口徑與香港左派報章如出一轍。「港九各業工人反對港英迫害鬥委會」發言人當天又以嚴厲語氣表示，指責港英當局「為了進一步追隨追隨美帝戰爭政策和侵略政策，最近有計劃、有預謀、有組織對香港愛國工人同胞進行一場滅絕人性的血腥暴行，掀起一場嚴重的反華事件」。

發言人說：「你們的軍警出操雖然懂得換腳，打起仗來武器卻會易手。你們的集中營一共有多少平方公呎？能容得下整個港九的『一不怕死，二不怕苦』的愛國同胞嗎？你們敢把迫害升級，我們也敢在任何地方跟你們鬥，可以在廠內鬥，也可以在街上鬥，可以在法庭監獄中鬥，也可以在港督府之內鬥，文鬥武鬥，隨你的便，長鬥短鬥，任你選擇。我們是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工人，我們是有抗暴鬥爭的光榮傳統，我們早已下定決心，一定要把反迫害鬥爭進行到底。如果港英當局膽敢勾結美帝蔣幫再升級，那就來吧！我們一定奉陪到底！」發言人更號召「全港九愛國同胞」作一切準備，「有組織地、有計劃地迎接新的戰鬥」。他要求港英當局接納鬥委會的四項要求，「不達日

的，決不罷休」。⁵⁴各業工人鬥委會這種言論，頗有發動「城市武裝鬥爭」的味道。

港府「高級權威人士」則於五月十三日發表談話，表明無法接受左派各業工人鬥委會的四項要求。他表示，由於人造花廠勞資糾紛未提交勞工處處理，當局未能掌握充分資料，「真相未明，無法判斷」，政府將盡力維持法律與秩序，對左右兩派都無偏無倚。他又呼籲市民挺身支持港府的行動：「目前局勢如何發展下去，便要看香港居民的要求來決定。如果大部分居民要求安定，政府便給予安定，現在是本港的善良居民起來表示意見的時候了。這位權威官員又警告：「警方的抑制是有限度的，如果騷亂份子做得過分，危及市民生命財產，警方勢不能不有進一步行動。目前本港駐軍已採取初步準備狀態了。」⁵⁵

北京首次表態聲援香港左派

從五月十三日開始，左派工會及單位開始響應工聯會的號召，成立「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北京當局終於在五月十五日首次就香港左派反英鬥爭表態，中國外交部副部長羅貴波當天清晨召見英國駐華代辦霍普森(Donald Hopson)，當面遞交外交部的聲明，就港英當局對香港居民的「法西斯暴行」提出「最緊急、最強烈」的抗議。外交部聲明指出：「香港英國當局製造這次大規模的血腥暴行，是經過長期準備的，是英國政府勾結美帝國主義反對中國的陰謀的一部分。在我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展以來，香港英國當局曾多次舉行多次敵視中國的軍警演習，旨在對香港中國居民進行血腥鎮壓。這次港英當局利用人造花廠勞資糾紛，對中國居民和工人進行迫害，就是這種血腥鎮壓的罪惡計劃的一次大暴露。」

聲明又指出：「中國政府莊嚴宣告，中國政府和七億中國人民堅決支持香港中國同胞的英勇、正義的鬥爭，並且堅決做他們的強大後盾。」中國外交部要求英國政府責成港英當局，接受五項條件：

- (1) 立即接受香港中國工人和居民的全部正當要求；
- (2) 立即停止一切法西斯措施；
- (3) 立即釋放全體被捕人員；
- (4) 懲辦這一血腥暴行的兇手，向受害者道歉，並賠償一切損失；
- (5) 保證不再發生類似事件

中國外交部又表明「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決心把這場鬥爭進行到底，如果英國政府和香港英國當局一意孤行，那麼一切後果必須由英國政府和港英當局承擔」。⁵⁶中國外交部和較早時香港左派陣營提出的要求，與澳門左派在「一二三事件」中的要求頗為接近。港督戴麟趾六月二十九日在英國聯邦事務部記者會表示：「左派的目的是把我們變成澳門那樣(Their aim is to macau us)。」⁵⁷對港英當局來說，如果接受中國外交部的所有要求，等於淪為另一個澳葡政府，港英當然不可能乖乖就範。

受中央文革小組控制的《人民日報》，也於五月十五日發表題為《香港英國當局必須懸崖勒馬》的評論員文章，讚揚香港左派「表現了中國人民的大無畏氣概，是毛澤東思想教導出來的祖國好兒女」《人民日報》又警告「如果英國政府和香港英國當局不懸崖勒馬，繼續倒行逆施，是決不會有好下場的」。

港英當局完全沒有絲毫退讓的跡象，戴麟趾五月十五日發表聲明，重申必須「維持和平與秩序」，又強調「政府政策和向來一樣，是爲了全體的利益，盡量公正，不偏不倚的方式維護法律。我確信維持和平與秩序，是香港絕大多數市民最懇切的願望」。英國政府五月十八日發表文告，「全力支持香港政府履行維持法律及秩序的責任」。英國政府強調，香港警方執行任務期間已盡量保持「克制」，香港政府在維持法律和秩序方面有「不可逃避的責任」。戴麟趾又於五月十八日發表聲明，強調會「繼續盡力促使本港恢復寧靜和平」。他又表示：「實行法治的目的是要盡可能使所有人都能得到同等的保

障和福祉。法治是本港社會的基礎，也是全體居民能夠安居樂業的保障，使我們不致遭受專橫的脅迫和兇狂的暴行。」

騷亂事態不斷升級，看來和港英與左派的行動在互相猜疑對方動機的前提下各走極端，形成惡性循環有關。英文時事雜誌《遠東經濟評論》認為，左派陣營和港英當局都懷疑對方背後有着重大陰謀，左派支持者從大有街事件聯想到港府加強檢查出口貨品的產地來源證問題、清拆九龍城寨違例建築物等事件，覺得港英當局正向他們發動「民族壓迫」。而港英當局則認為左派在工潮中日趨活躍，旨在像澳門左派般蔑視法紀，挑戰當局的管治權威。⁵⁸

除了北京官方發表聲明，大陸各地紅衛兵也開始發起聲援香港左派陣營的行動，與香港左派遙相呼應。中國外交部發表抗議聲明的同一天，北京紅衛兵和工人到英國駐華代辦處門前遊行示威，聲言「堅決支援香港中國同胞的英勇正義鬥爭」。群眾遊行期間高舉毛澤東畫像和毛語錄，揮舞旗幟大呼「向英勇鬥爭的香港愛國同胞致敬！」、「打倒美帝國主義幫兇英帝國主義！」。據北京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報道，遊行群眾表示：「中國人民是不好惹的，如果英國政府和港英當局一意孤行，只會得到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的結果！」

示威群眾又提出三項要求：英國必須停止將香港作為其海軍基地、決不寬恕在香港的國民黨特務迫害擁護社會主義祖國人士的罪行；決不允許干擾在香港傳播毛澤東思想的神聖工作。廣州紅衛兵獲悉外交部的聲明後，也於當天晚上舉行四萬人大示威。廣州工聯、廣州市紅旗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廣州市大專院校紅衛兵「誓死保衛毛主席總司令部」等「革命派」並發表支持香港左派的電文，「誓作香港同胞的堅強後盾」。⁵⁹

當時中國外交部已被造反派奪權，外交部長陳毅早已靠邊站。據一位曾參與北京關於六七事件決策過程的知情人士指出，中國國務院外事辦公室港澳組會同外交部，討論香港事件。主持會議的中央外辦副主任廖承志沒有發表肯定或否定的意見，但參與會議的一般幹部認

為，當前形勢的特點是「帝、修、反聯合反華，香港當局迫害華人，不是局部性問題，而是帝、修、反聯合反華運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支持香港左派鬥爭不但是中國政府義不容辭的責任，而且是「粉碎帝、修、反聯合反華陰謀所必需」。會議最後取得共識，一定要粉碎港英當局的反華陰謀，堅決把這場鬥爭搞到底。⁶⁰

外交部的聲明令香港左派陣營如獲至寶，大受鼓舞，以為鬥爭得到北京全力支持。各左派報章均以頭版報道外交部的聲明，《大公報》更以「來自祖國的最強有力的聲音」形容中國外交部的聲明，「消息傳來，全香港愛國同胞人人感到祖國支持，大大鼓舞了同胞的鬥志」。自此以後，每逢北京當局或內地群眾擺出聲援香港左派的姿態，香港左派報章都以顯著篇幅報道。《人民日報》每次刊登關於香港的文章後，左派三聯書店都組織員工趕印小冊子，分發予左派人士。

左派成立鬥委會

五月十六日，左派陣營在九龍土瓜灣工聯會工人俱樂部舉行會議，宣佈成立「港九各界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簡稱鬥委會），成員共一百零四人（見附錄三）。左派報章形容這是「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的會議」和「充滿戰鬥性的會議」，出席會議的委員都「意氣風發、鬥志昂揚」。⁶¹會場上懸掛着「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代表會議，堅決擁護我外交部聲明大會」，與會者胸前都別上毛像章和語錄章，手持毛語錄，不時高呼革命口號。會議開始時，各人一起朗讀毛語錄：「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

工聯會理事長楊光在會上發言時，將港英的行動定性為「民族壓迫」。他以激昂的語調表示：「對於港英當局的法西斯暴行，一定要揭發，一定要聲討，一定要鬥爭，一定要把他打垮。港英當局對中國同胞還在進行瘋狂的民族壓迫，這場反迫害鬥爭就是一場民族鬥爭。」

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各業工人和各界同胞一定要把反迫害鬥爭升級，一定要粉碎港英的迫害陰謀，不獲全勝，誓不收兵。」各界代表發言後，與會者選出十七名鬥委會代表，包括楊光、《大公報》社長費彝民、德信行總經理謝鴻惠、漢華中學校長黃建立、紡織染業職工會主席黃燕芳、洋務工會副主席胡九、摩托車業職工總會九巴分會主席劉謙、煤氣公司華員職工總會主席伍宜、摩托車業職工總會主席郭添海、鄧全、新聯電影公司董事長廖一原、中國銀行經理陳紘、導演任意之、新華社總編輯潘德聲、中華總商會副會長王寬誠、中總司庫湯秉達、香島中學學生黃富榮，楊光出任鬥委會負責人。

鬥委會首次會議通過反對港英當局「法西斯迫害」的抗議書，並向港英當局提出四項要求，分別為(一)立即停止一切非法的逮捕、審



五月十六日，左派陣營成立各界鬥委會。



左派各界鬥委會主任委員、工聯會理事長楊光在鬥委會成立大會上發言。

訊、判罪、毒打刑罰等「法西斯的血腥鎮壓行動」；(二)立即宣佈無罪釋放所有被捕的愛國同胞；(三)嚴懲這一血腥暴行的兇手，向受害者道歉，並賠償一切損失；(四)保證不再發生類似事件。鬥委會又決定派出以楊光為首的十七名鬥委會代表，翌日前往港督府遞交抗議書。鬥委會要求港英政府必須立即無條件接受四項要求，否則一切後果由港英當局全部承擔。抗議書指港英「妄想使用暴力鎮壓來遏制光焰無際的毛澤東思想，遏制香港同胞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眾運動」，又聲稱「港英當局必敗，中國同胞必勝」。

多位出席鬥委會會議的委員憶述說，鬥委會首次會議通過一項決議，對港英的鬥爭應根據「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進行。但筆者翻查當年的左派報章關於鬥委會首次會議的報道，都沒有提到這項原則。當時擔任《大公報》副總編輯的資深左派報人羅孚指出：「有理、有利、有節是一般鬥爭的原則，左派甚麼時候都會提到它。但在鬥委會發表的聲明中不會使它見諸文字，因為這是在港英統治下對敵鬥爭，不會在敵人面前說鬥爭是有節制的，所以左報不會登。」

從鬥委會的組成來看，左派工會佔主導，十七名代表中工會負責人佔八人，顯示當時香港左派陣營仍然以「工人階級」掛帥。鬥委會

成立後，左派陣營一直以鬥委會名義發表聲明及行動指示。但鬥委會其實並非左派「反英抗暴」的指揮機構，真正的決策、指揮機構其實是新華社香港分社（即中共港澳工作委員會）。一些鬥委會委員指出，鬥委會只是「統戰機構」和台前掛牌機構，向外界顯示反英鬥爭得到各階層人士的支持。但「反英 抗暴」大部分行動和策略，都沒有經過鬥爭會充分討論。

鬥委會成立當天，南九龍裁判署開庭審訊二十名人造花廠工人，三百多名左派工人到裁判署抗議港英當局「無理審訊」，要求當局立即釋放被捕的工人。前來抗議的工人更在法庭內朗讀毛語錄及中國外交部五月十五日的聲明，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⁶²

北京四十多萬群眾也在這天遊行至英國駐華代辦處，聲言「暫作香港同胞的强大後盾」。首都工代會負責人徐鎧說：「當我們從廣播裏聽到港英當局血腥鎮壓我香港愛國同胞的消息，我們的肺都快氣炸了。我們北京市的工人階級、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對英帝國主義的法西斯暴行表示極大的憤慨。英帝國主義如果一意孤行下去，只能是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加速自己的滅亡。據北京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報道，在英國代辦處工作的九十多名中國職工，也「懷着無比憤怒的心情」走出代辦處，加入示威行列，高呼「打倒英帝國主義！」

周恩來在遊行舉行前指示外交部制訂數條規定，遊行隊伍可以向英國駐北京代辦處提交抗議書，但對代辦處「不衝、不進、不砸」，不阻攔英代辦處人員進出，不掀鬥，不打人。⁶³

時任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的梁上苑告訴筆者，鬥委會成立後，新華社香港分社派副社長朱曼平赴京請示，爭取中央的支持，以便擴大香港的「反英抗暴」。據說北京對香港事件存在分歧，周恩來態度消極，而且說了「逼中央上馬」這句話。由於北京沒有明確指示，朱曼平回港後進行的內部傳達含糊不清，只強調中央今後將有指示。

五月十七日早上十一時，以楊光為首的十七名鬥委會代表，分別乘坐四輛汽車前往港督府，抗議港英鎮壓工人，並要求進內向港督戴



月十七日，鬥委會十七名代表前往港督府遞交抗議書，並要求與港戴麟趾會面。圖為《大公報》社長費彝民(前排中戴眼鏡者)、漢華學校長黃建立(第二排穿西裝者)在場高叫口號。

趾遞交「反對港英西斯暴行抗議書」，但被港督副官哈里遜拒諸門外。十七名代表求見戴麟趾不遂，於是在港督府門外揮舞毛語錄，高朗讀毛語錄：「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帝國主義如此欺負我，這是要認真對付的。」⁶⁴最後各人高呼反英口號：「抗議港英當法西斯暴行」、「堅持把反對港英迫害鬥爭進行到底！」、「戰無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代表指責港英當局「心虛膽怯，對中國同的抗議怕得要死」。鬥委會發言人批評戴麟趾「沒有解決問題的誠」，警告他不要「自討苦吃」。發言人又說：「帝國主義者如此冥不靈，那就有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了。我們再一次提出警告：文武鬥，隨你的便，長鬥短鬥，任你選擇。你咎由自取，與人無。」

還只是四年前，來自北京的訪客曾經是港督府的座上客。六三年，中國著名京劇演員馬連良⁶⁵、趙燕俠、張君秋等到香港訪問演出，周恩來在他們離開北京前，請他們到家裏閒談。馬連良等人在香港大受歡迎，港督柏立基特意邀請這些周恩來派來的「文化使者」到港督府作客，賓主談笑甚歡。⁶⁶事實上，六十年代初期以來中港關係逐漸緩和，六三年開始，大陸更向香港供應東江水，大大紓緩香港的水荒。但文革狂焱令兩地關係徹底逆轉。

五月十七日，中華全國總工會「革命造反聯合委員會」向香港左派工人發出電文，強調「誓作你們的堅強後盾」，「最堅決地支持你們把這場英勇正義鬥爭進行到底」。全國總工會聲言「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是我國人民進行鬥爭的強大的武器，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是你們最堅強的靠山。讓我們在光焰無際的毛澤東思想指引下，攜起手來，奮勇前進」。

五月十八日，北京舉行十萬人集會，國務院總理周恩來、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外交部長陳毅、北京市革命委員會主任委員兼中共政治局委員謝富治、郭沫若、粟裕、外交部副部長羅貴波、王力、關鋒、聶元梓、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傅崇碧等中共領導人出席。謝富治在大會上發表講話，指責「港英這次製造的大規模暴行是蓄謀已久的，這是英帝國主義勾結美帝、蔣匪，反對中國人民的陰謀的一部分。」謝富治並譴責港英「爲了支持美帝國主義侵略越南的戰爭，不顧中國政府的多次嚴正警告，一直把香港提供給美國，作爲它侵越海軍和空軍的活動基地。英國政府還積極追隨美國進行軍事包圍中國的陰謀活動，而且妄圖同美國和蘇聯現代修正主義，結成一個反華的新神聖同盟」。

他強調：「經歷了一年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中國人民是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加堅強了。我們要正告愚蠢透頂的英國政府和香港英國當局：你們必須放聰明些，你們既然對香港中國居民犯下了嚴重罪行，你們就必須老老實實的同全體香港中國居民承擔罪責，作出交

代，否則你們就必須承擔一切嚴重的後果。」但除了在中共政治局排名最後(第二十五位)的謝富治外，其他在場的中共高層領導人都沒有發言，香港一些評論家因此認為，北京似無意在政治上給予英國政府太大壓力，以免使中英關係過分惡化。⁶⁷

自五月中旬開始，大陸各城市紛紛舉行聲援香港左派的群眾集會。五月十七日下午二時，深圳近萬名群眾舉行集會，聲援香港左派。廣州大專院校紅衛兵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紅一司)向香港左派拍發電文稱，如果港英當局敢與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中國人民為敵，那麼一定會碰得頭破血流。司令部更聲言「早已嚴陣以待，只要祖國一聲令下，我們便開往前線消滅一切敵人」。五月十九日，廣州、上海、貴州省會貴陽、哈爾濱、西藏首府拉薩等大城市均舉行群眾集會，聲援香港左派。廣東省軍區代表在廣州群眾大會發言時表示：「我們廣東省四千萬人民和駐廣州陸海空三軍指戰員堅決和全國人民一道，誓作香港愛國同胞的強大後盾，堅決支持他們把這場反迫害的正義鬥爭進行到底。如果英國政府和港英當局不懸崖勒馬，繼續倒行逆施，是決不會有好下場的。」⁶⁸五月二十二日，深圳紅衛兵、學生、民兵舉行集會，逾萬人出席。紅衛兵代表說：「如果港英繼續無視我國人民，繼續一意孤行，只要我們紅司令毛主席一聲令下，我們立即行動起來，造你們的反。」

在中國外交部聲明和國內各種聲援行動的鼓舞下，新華社社長梁威林下令發動左派工會、學校、電影、新聞和各中資機構幹部群眾，到港督府遊行示威，張貼大字報，聲討戴麟趾的殖民統治「迫害香港同胞」。⁶⁹從五月十九日開始，數千名左派學生、工人和左派機構職員輪流前往位於中環花園道的港督府抗議。他們胸前別上毛澤東像章和毛語錄章，手持毛語錄，以三、五十人至一百人為一組，分組前往港督府，每組均由一至兩人擔任領隊。由於人數眾多，依次排列長龍。示威人數最高多達三千人，人龍由上亞厘畢道港督府繞往下亞厘畢道，形成包圍港督府的態勢，但秩序相當良好。⁷⁰

當時左派群眾在港督府門前振臂高呼反英口號，「抗議戴麟趾不接見各界代表」、「港英必須賠禮道歉」、「我們必勝，港英必敗」、「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等口號響徹雲霄。左派報章形容這些口號「像一發發重炮，震撼了港英的統治心臟」。示威群眾更在港督府周圍張貼數以百計充滿文革語言的大字報，港督府的鐵閘、門樓、崗樓和圍牆貼滿了大字報，左派群眾甚至在港督府對開馬路用油漆寫上「打倒戴麟趾」的標語。左派報章形容大字報「像一道道宣判書，圍着港英進行血腥鎮壓的策源地」，「每一張大字報，每一張抗議書，都是一張審判書，都是中國人民決心把這場反迫害鬥爭進行到底的決心書」，更嘲笑港督府已變成「紙府」⁷¹。與此同時，中國銀行在中環德輔道中總行頂樓安裝擴音器，播放反英口號。

鬥委會代表要求與戴麟趾會面，但戴麟趾拒絕露面，代表在港督府外牆貼上抗議書，以向澳門左派道歉的澳督嘉樂庇的遭遇警告戴麟趾：「戴麟趾：你兩次拒絕接見我們的代表了，你以為不露面就能夠推掉責任麼？嘉樂庇的下場夠可恥了，嘉樂庇所不能為的，你還敢試麼？」五月二十一日，鬥委會召開全體會議，號召港九同胞團結一致為反對港英鎮壓「鬥爭到底」，並決定將鬥委會委員數目擴大兩倍，同時發動左派群眾捐款。鬥委會又呼籲曾遭港英當局逮捕、毆打及「非法審訊」而遭受損失的左派群眾，向鬥委會登記。鬥委會負責人楊光在會議上說：「既然港英要把迫害升級，我們也決定把反迫害鬥爭升級，不獲全勝，誓不罷休。」

鬥委會並發表《告全港九同胞書》，指責港英當局「一百多年來一直在香港對我同胞施加壓迫，辱我領土，侵我主權，奴役我同胞，吮吸我脂膏。工人、農民慘遭重重剝削，難以為生；小販小檔受驅趕勒索，苦不堪言；木屋居民有被拆遷流離失所之恨；工商各業人士也備受歧視限制。港英帝國主義對中國同胞的種種迫害，真是罪證如山，仇深似海。」《告同胞書》又譴責港英自文革以來「妄圖以高壓

手段來阻遏偉大的毛澤東思想在港九傳播和抵制我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影響」

左派陣營對港英口誅筆伐的同時，也大力鼓吹民族思想，要求市民在反英鬥爭中作出「正確的抉擇」。《告同胞書》「正告」港英華籍警察：「中國人不打中國人！你們如果還有中國人的良心，就應該知所悔悟，不再助港英為惡。否則敵人崩潰之日，民族紀律是不會寬容你們的。」⁷²《大公報》五月二十一日社論又「提醒」支持港英當局的人士：「你們除非存心助紂為虐，與全體同胞為敵，就應該看清是非，及早覺悟，還不失為一個中國人，否則民族紀律是不會寬容你們的。」

左派外圍報章《香港夜報》在專欄《夜話》中指出：「愛國的同胞們，做慣了順民的香港人們，現在不是逃避的時候了。你們同情如狼似虎的軍警呢？還是同情我們中國人自己的兒女？你愛大英帝國呢？還是願意做炎黃子孫？我們作了抉擇，一切思想上問題便迎刃而解。」⁷³

《香港夜報》更淡化中國從香港賺取外匯對中國的重要性，暗示北京可能不惜收回香港。該報五月十九日社論認為：「列位讀者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中共的拳頭伸了出來，這一仗怎能敗陣？倘若敗了，如何向亞非拉人民交代，如何有面目見越南南方解放戰線的戰士？有人說香港是中共的谷倉，說中共一年可在香港賺六億美元的外匯。六億美元在香港政府看來是一個大數字，但在中國大陸每人一年省一塊錢，就可以視這筆外匯如糞土。」《香港夜報》提出連串問題：「對於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來說，國威重要呢？還是六億美元重要？亞非拉的民心重要呢？還是保存香港的現狀重要？我相信中共的巨頭們是心中有數的。」

中國外交部向英國政府提出抗議後，更對英國駐華官員採取了一些違反外交常規的行動，例如限制英國駐華代辦霍普森的活動範圍。五月十六日，上海大批示威群眾衝進英國駐滬代表侯衛德(Peter He-

witt)的寓所，搗毀屋內傢俱。侯衛德被四名群眾按着四肢抬行，又迫令他朗誦毛語錄，他的妻兒更被群眾恐嚇。

英國政府對橫跨中港兩地的反英示威漸漸感到不耐煩。五月十九日，英國外相布朗傳召中國駐英國代辦沈平，就中國政府未能保護英國在華財產提出「嚴重抗議」，並對英國駐華官員受到粗暴待遇表示不滿。英方指責沈平拒絕將英國的抗議照會轉交中國政府，以及中國外交部一名官員將英國的抗議照會拋擲在辦公室門外。布朗要求中方保證在華英國公民的安全，並保留追討英國在華財物受損的賠償。布朗又表示，不希望再聽到「法西斯暴行」的指責。霍普森也前往中國外交部，對英國駐華人員的外交權利被侵犯表示關注。

中國外交部也與英國針鋒相對，中國外交部副部長羅貴波五月二十二日下午召見英國駐華代辦霍普森，就布朗「污蔑我國革命群眾示威的正義行爲是『騷亂』、誹謗我國革命群眾爲『流氓』」，並對布朗對中國駐英代辦的「粗暴態度」提出「最強烈的抗議」。羅貴波說：「布朗接見沈平的時候，採取了極端蠻橫無理的粗暴態度，使用了可恥的帝國主義的語言，大肆污蔑中國革命群眾。」他又向英方表示，自五月十五日中國外交部發表抗議聲明以來，港英當局繼續出動軍警對付「赤手空拳的中國居民」，這是「不折不扣的法西斯暴行，我們絕對不能容忍。英國政府必須立即停止對香港中國居民的迫害，並對中國外交部聲明中的五點要迅速作出答覆」。羅貴波同時知會英方，「由於英國政府採取敵視中國人民的態度，特別是由於香港英國當局對中國居民採取的血腥暴行」，中國政府決定取消英國駐華代辦處向上海派駐辦理僑務人員的安排，並限令英國駐滬代表侯衛德於四十八小時內離開上海。⁷⁴

第四章 花園道事件：誰在撒謊？

左派群眾連續數天衝擊港督府，港英當局態度相對克制，僅派軍警在場戒備。當時擔任港督私人助理兼副布政司的姬達透露，港府曾與部分左派領導人達成共識，容許左派示威者到港督府門前和平抗議。曾到港督府門前兩三次的左派三聯書店副經理蕭滋憶述說：「我們頭一、兩次如入無人之境，港英未予理會。」

但支持左派對港英發動抗議的《香港夜報》社長胡棣周對形勢發展感到不安：「我當時不贊成左派每天衝擊港督府，港督始終是英國統治的象徵。左派利用工人、學生衝擊港督府，港英一旦動手，就會造成很大犧牲。」五月十九日下午，胡棣周到文匯報社找總編輯金堯如，告訴他駕車途經港督府之所見所聞：花園道的山邊樹林已佈滿武裝軍警、防暴隊和便衣探員，港督府正門內外兩側也增強了軍警力量。

胡表示：「金老總，我看戴麟趾要動手了，他已經忍受了四、五天，恐怕已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了。我希望你考慮一下，這樣的群眾示威是不是應該停一停。這個行動可以說已經勝利了。港府到今天不敢動，可算是我們的勝利，是不是可以考慮鳴金收兵了。你們要不就打倒港英，但打倒港英毋須採取這種手法。」金堯如連連點頭，表示同意胡的憂慮，答應稍後到新華社開會時反映他的看法，並請新華社社長梁威林和副社長祈烽考慮。但金堯如向梁威林和祈烽轉述胡棣周的意見後，兩人批評胡的觀點為「不敢鬥爭、不敢勝利」的「右傾主義」。

港英曾與左派達成默許示威的協議？

副布政司姬達透露，他和部分港府官員曾與左派社團領導人接

觸，對方提出到港督府示威。姬達表示如果示威和平進行，當局可予容忍（詳見姬達專訪）。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梁上苑表示，此事無法斷定真偽，但當時在文化大革命的影響下，即使雙方有過這樣的協議也無法執行。

英國作家 John Cooper 指出，左派包圍港督府期間，一些社會人士曾試圖從中斡旋，安排港督與左派陣營會面，化解這次危機。香港一些歐籍商人和本地商人也認為港府應改變對左派陣營的強硬和僵化態度，但港府堅持強硬立場，最終沒有與左派接觸。港英當局立場強硬，相信是因為英國認定中共不會收回香港。英國《每日電訊報》五月十八日社評認為：「由於香港對中共非常有用，中共不會把局勢弄至不可收拾的地步。北京（外交部）所提五項要求是幾乎令人興奮的，這些要求只是要我們卑躬屈節和悔過，而不是要我們立即滾出香港。」《明報》五月十九日社論也持類似看法：「英國決計不會為了香港而與中共打仗，也不會為保持香港而像葡萄牙那樣答應對方的任



左派示威者包圍港督府，並在門外高舉毛語錄及張貼大字報。

何條件。它的態度是很明顯的：你來，我走；你不來，我在這裏。打仗？不打！叩頭？不叩！」

五月二十二日，數千名左派群眾輪流到港督府抗議，終於與警方發生流血衝突。當天早上九時許，左派三聯書店二十多名職工在中環威靈頓街二十八號書店門外集合，經皇后大道中、最高法院（即現在的立法會大樓），朝花園道港督府進發，中南銀行、鹽業銀行、工會等左派機構職工尾隨其後。三聯書店副經理蕭滋當時一馬當先，率領書店職工向港督府進發。他接受筆者訪問時說：「隨着港英不斷鎮壓，我的情緒越來越激昂。我出發前已察覺形勢緊張，估計當日可能出事，但我覺得義不容辭，於是抱着『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心態帶隊出發。」

上午十時十五分，由百多人組成的隊伍行經花園道口希爾頓酒店和美國銀行時，被早在那裏佈防的數百名防暴隊阻截，禁止他們繼續前進，並命令他們折返。當時蕭滋走在隊伍最前列，與防暴隊正面對峙，號召眾人高舉毛語錄和高叫口號。蕭滋等人等候了近一個小時，仍然與防暴隊僵持不下。左派與港英尖銳對立的政治環境，令他們在「鬥爭前線」能進不能退。他表示：「在當時的環境下，我們不能後退，因為無法向領導交代，唯有率領隊伍硬着頭皮衝上去。」防暴隊當然不予放行，並揮舞警棍毆打示威群眾，蕭滋首當其衝，被如雨下的警棍打得頭破血流，不少人也受傷倒地，《經濟導報》記者許雲程也被警棍擊傷。美國銀行門前及花園上血跡斑斑，滿地都是眼鏡、皮鞋、大字報、毛語錄和警棍。⁷⁵蕭滋的手表和毛語錄散落地上，更被當場拘捕，許雲程也被警方逮捕。

英國作家 John Cooper 則指出，左派群眾拒絕照警方要求分成每十二人一組，分批前往港督府，警方因此不准他們繼續前進。群眾開始鼓躁，並且襲擊一名警員，警方向左派群眾發出警告後，揮動警棍對付群眾。⁷⁶港府新聞處指左派群眾在「五二二事件」中「演戲」，並直言左派示威者「毆打」警察。新聞處這樣描寫警方與示威者衝突的

情形：「整個隊伍熟練地立即倒作一團，被安排在隊內中之女子開始表演用血塗他們的臉孔。當『傷者』從他們袋內取出他們為此目的一直帶着的綑帶時，這齣假劇達到最高潮。」左派報章則反駁稱：「當野獸撲來噬你時，你願得用血塗面嗎？」

港府在《香港年報一九六七》中，指左派示威者事前佈置警方「血腥鎮壓」的劇本。年報對衝突過程有以下的描述：「(在現場戒備的)警員展示了高度紀律性，對口頭挑釁和威嚇動作不予理會。但共黨份子刻意挑起暴力，一名警員被踢傷，其他警員也被襲擊。警



員趨前拘捕襲擊者，在混亂中抽出警棍。許多示威者立即倒在上，不管他們是否遭警棍擊中。他們掏出綑帶(部分更沾有人造『跡』)包紮，一些真正受傷的示威者則將血跡塗抹在其他人身上。黨報章拍下這些幼稚的行徑，並作為警方暴行的證據，但在鄰近希頓酒店的目擊者對這些行徑看得一清二楚。」⁷⁷

副布政司姬達憶述說，示威者離開港督府後在中環街頭發動亂，不斷擲石，砸毀不少商店窗戶。姬達強調：「你不能容忍人們起騷亂，你必須採取行動，制止動亂。示威演變為騷亂，事態發展在很不幸」他估計，左派陣營接到北京的指示，遂將抗議行動

級。

站在衝突「第一線」的蕭滋否認他們當時襲擊警員，並強烈否認當時示威隊伍「演戲」。他說：「我看不到有人帶綑帶和紅汞，何必那麼低劣？以我所知，上級沒有這樣佈置。」市政局議員葉錫恩則以第三者的角度表示：「政府指群眾攜帶裝有紅墨水的袋子，他們故意把紅墨水潑在臉上，假裝受傷的樣子。住在希爾頓酒店裏面的一些朋友卻說，酒店剛好位於發生事故的地方；政府新聞處發表的報告，和他們親眼見到的事完全是兩回事，簡直是面目全非。我不知道哪一個人的報告是對的。」她立即寫信給政府部門，要求他們提供紅墨水袋子照片，因為整件事情的經過理應給拍攝下來。但政府官員告訴她「這是辦不到的事」，因為影片上紅墨水袋子「拍得不太清楚」。⁷⁸

究竟港英有沒有在「五二二」事件中鎮壓左派群眾？左派有沒有「弄虛作假」？一位當時在左派招商局工作的職工告訴筆者，他和同事當時被公司指示排隊前往港督府抗議，他們都帶備了紅汞。上級事前指示他們一旦與警察衝突，立即將紅汞淋在身上。他說：「這樣做是要製造港英鎮壓的『證據』。」但部分左派群眾被警方揮動警棍打傷，卻是不爭的事實。左派和港英都沒有說出全面事實，而選擇性突出對自己有利的情節，掩蓋了對己方不利的事實部分。

蕭滋等人被捕後送往中環中央警署，警方勒令他們蹲在地上接受盤問。他發現部分被捕的左派職工士氣低落，他遂在警署內高呼口號，以激勵士氣，迅即被探員毆打致胸口瘀傷，未幾遭押送到中環荷李活道域多利羈留所。六七年六月，他被當局以「擾亂治安」罪名起訴，但他和其他被檢控的左派人士堅決不聘請律師辯護，以示不承認港英的統治，「他愛怎樣判就怎樣判」。他們深信「抗暴有理」，蔑視法庭的「非法審判」。他在法庭上自辯，退庭後立即被警察在內庭「修理」。法官最後判處蕭滋入獄十四個月。蕭滋出獄後返回三聯書店工作，七五年升任三聯總經理。

衝突發生後，左派群眾繼續在中環抗議。中午十二時四十五分，

一輛警車在中央街市被群眾投擲石塊，中區秩序開始混亂，巴士、電車停駛，商店在門前加封木板，酒樓餐廳關門，仿如進入戰時狀態。下午一時許，大批防暴隊開進中環，全面戒備。當天下午，多輛滿載英軍的卡車在中區鬧市巡邏。左派群眾當天先後在中環高等法院、中國銀行、銅鑼灣裁判署、南九龍裁判署等地，與警方發生流血衝突。防暴隊與左派群眾衝突期間，曾施放催淚彈及木彈。警方當天拘捕一百六十七名左派群眾，左派報章聲稱數百名群眾受傷，重傷或昏迷者逾百人，左派陣營形容五月二十二日流血衝突為「花園道血案」、「五·二二血案」。

早在左派群眾包圍港督府期間，中區中國銀行總行已在頂樓安裝擴音器，播放反英口號。五月二十二日流血衝突後，港府也還以顏



防暴隊企圖驅散左派示威者，示威者手挽手組成人牆。

色，在位於拱北行的政府新聞處安裝六個擴音器，播放披頭四流行曲、粵曲及爵士樂，遠在千呎以外亦清晰可聞，整個中區吵個不停。港府晚上宣佈在港島北部實行宵禁，這是香港島自二次大戰被日軍佔領以來，首次實施宵禁。當局同時宣佈未取得警務處長准許前，任何遊行集會均被禁止，任何人未得警務處長批准前參加遊行集會，均可能被捕及起訴。港府又宣佈：「個別人士如希望向港督請願，可用郵遞方式進行。」

《文匯報》在翌日社論形容港英當局的行動為「大屠殺」、「血腥大鎮壓」，並強調「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武器武裝起來的戰士，絕對不屈服於你們(港英)的武力之下，絕對不屈服於你們的血腥鎮壓之下。我們天不怕，地不怕，神不怕，鬼不怕，死也不怕，我們堅決反抗你們，堅決同你們鬥爭，堅決把你們鬥倒、鬥垮、鬥臭！」。左派傳媒更形容港英為「法西斯當局」，並辱罵港府及警方的洋官和華警為「白皮豬」和「黃皮狗」。

港英當局也毫不退讓，根據《緊急情況條例》(Emergency Regulations Ordinance)頒佈了一連串《緊急法令》。港府五月二十四日頒佈的《緊急法令》禁止「非法廣播」，違者罰款五萬元及監禁十年，顯然是衝着中國銀行的擴音器而來。港府又於六月一日頒佈緊急法令，嚴禁張貼「煽動性傳單」，賦予警方沒收或銷毀「煽動暴力、破壞警方或公務人員忠誠」的傳單。任何人印製及散發有關傳單，將被罰款五千元及監禁兩年，即使張貼這些傳單的大廈業主或住客也可被控類似控罪。

五月二十三日，鬥委會召開擴大會議，通過成立常務委員會，專責討論、制訂鬥爭對策。現有十七名鬥委會代表改任常委會常務委員，主任委員由楊光出任，費彝民、謝鴻惠、黃建立及王寬誠出任副主任委員。而鬥委會成員也由原來的一百零四人增至三百多人。⁷⁹

周恩來早在六七年五月已相當關注香港左派發動的鬥爭，並反對在香港採取過激行動。周恩來先後於六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和二十七

日，約國務院外事辦公室（中央外辦）、外交部和港澳工委負責人談香港問題。周恩來當時強調：「在香港問題上同港英當局的鬥爭要嚴格遵循中央規定的方針政策，堅持有理、有利、有節。」他又批評有關部門在香港問題上提出的過左口號和採取的極左做法。⁸⁰對於香港左派上街遊行、到港督府貼大字報等做法，據一位曾參與北京關於六七事件決策過程的人士憶述說，周恩來批評說，在香港這樣的地方進行鬥爭，不能照搬國內文化大革命的一套，尤其是把大喇叭安在中國銀行大樓上，「簡直是滑稽」。周指出：「那裏又不是我們內地，那樣做不是故意向人家挑釁嗎？人家又怎麼能容忍呢？」⁸¹

不過，中國官方在公開場合仍然擺出支持香港左派的姿態。五月二十七日，中國外交部長兼副總理陳毅出席阿富汗駐華大使館舉行的國慶酒會時，重申港英當局必須接受中國外交部提出的各項要求。他強調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支持「香港愛國同胞的正義鬥爭」。陳毅批評港英政府漠視香港同胞的抗議，並繼續進行「血腥鎮壓」，中國政府對港英的行動「絕對不能坐視不管」。陳毅發言期間，同時獲邀出席酒會的英國駐華代辦霍普森中途離場。

五月二十六日，英國航空母艦「堡壘號」駛進香港海面，與駐港英軍舉行軍事演習。《人民日報》五月二十九日發表題為《炮艦政策早被扔進了垃圾堆！》的評論員文章，指責英國派遣「堡壘號」開往香港的行動。文章認為，「這是英帝國主義者對我港九愛國同胞的無恥威脅和恫嚇，妄圖重演十九世紀英帝國主義『炮艦政策』的故技」，又「老實告訴英帝國主義」：「你們那幾艘破軍艦，根本不在我英勇的香港同胞的眼裏，根本不在偉大的中國人民的話下。美帝國主義是紙老虎，英帝國主義還不也是一隻紙老虎。你們有多大能耐，人們難道還不清楚嗎？美帝國主義已經在越南被打得焦頭爛額，狼狽不堪，你們這個專門依靠美帝國主義苟延殘喘的腐朽透頂的老牌帝國主義，還要向七億中國人民挑釁，這不是以卵擊石，太不自量了嗎？」

文章又指英國重拾「炮艦政策」，「除了給自己壯壯膽子以外，只能是自討苦吃，落得個可悲的結局」。這篇評論員文章「再一次警告英帝國主義，在毛澤東思想指引下的港九愛國同胞，一定要徹底清算你們在香港犯下的滔天罪行，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取得了偉大勝利的中國人民，一定要給你們應有的懲罰。讓帝國主義的『炮艦政策』見鬼去吧！英帝國主義如果一意孤行，必將自食其果！」

北京外交部更曾經為「堡壘號」事件起草抗議照會，要求「英國政府必須立即停止在中國大門的挑釁性軍事演習。否則，中國政府將採取必要的措施，由此產生的一切後果由英國政府承擔。」六月六日，周恩來向有關部門負責人討論香港問題時，就抗議照會草稿中提到「中國政府將採取必要的措施」的措辭提出批評：「我們採取必要的措施是甚麼？你們和(解放軍)總參商量了沒有？外交不和國防聯繫，照會上寫上就是放空炮，這不符合毛澤東思想。一九五零年我們對美國侵略朝鮮發表聲明說，中國不能置之不理，當時加這一句時我國在東北已經調部隊了。」⁸²

左派發動罷工車輪戰

從五月二十三日開始，巴士、電車、中華煤氣、中華電力、九龍倉、天星小輪、油麻地小輪、黃埔船塢、太古船塢、太古糖廠、郵政署、海事處、牛奶公司等機構工人分別展開間歇性停工抗議。左派初期發動的罷工大多僅為時數小時至一天，而且規模有限，旨在向港英當局展示力量。五月二十五日傍晚，左派工會發動天星小輪工人罷工一小時，油麻地小輪部分員工也於五月二十九日上午六時至九時發動停工抗議，約一萬名趕着上班市民受到影響。據《盤古》雜誌報道，油麻地小輪停工行動其實是左派工人脅迫的結果；二十九日凌晨，數名不速之客衝上油麻地公司停泊在碼頭的小輪，要求船長將渡輪駛往指定地點，並聲言任何人如不聽從指示，將被拋進大海。⁸³五月二十

六日，近千名郵政署工人發動停工一天的抗議行動，導致港府宣佈停止派發郵件一天。黃埔船塢工人進行了兩小時罷工，中華煤氣工人停工四小時，中華電力的停工行動則為時三個小時，均沒有構成太大影響。

五月二十九日，荃灣南豐紗廠、中央紗廠的左派工人自上午七時起，早、中、夜三班分別停工四小時，工人停工期間在廠內舉行「抗議港英當局血腥暴行大會」。工人又高聲朗讀毛語錄，並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等「革命歌曲」和語錄歌。當天早上，九龍土瓜灣偉倫紗廠大門也貼上該廠門委會的佈告，宣佈發動工人停工兩小時，約二百名工人參與這次行動（左派報章則指逾千名工人響應）。紡織業當時是香港賺取最多外匯的行業，而且僱用了百分之四十一的勞動人口，任何影響這個行業正常運作的行動，都會嚴重打擊香港經濟。右派背景的棉紡職工總會主席彭震海認為，大部分停工抗議的紡織工人，都是在武力威嚇下參與行動的，例如在南豐紗廠，左派工人手持菜刀、鐵枝及木方，威迫工人回廠報到後回家。彭震海向三家紡織廠的工人保證，會向港府尋求保護，呼籲他們照常上班工作。三家工廠翌日大致上回復正常運作。

六月一日，九龍油麻地政府船塢大批維修工人、木匠不滿港府撕去船塢內的反英標語，發動停工抗議，令船塢運作幾近癱瘓。六月六日，香港電燈公司、筲箕灣太古船塢及九龍倉的左派工人，也以資方撕去反英標語為理由，發起停工抗議。天星小輪四百名員工，也於當天起發動罷工，該公司來往港九兩地的渡輪服務全面癱瘓。六月八日，四百五十名港府工務局工人也加入停工抗議的行列。六月十日位於港島薄扶林的牛奶公司養牛場工人停工，導致香港大部分地區的牛奶供應受到影響。

港府和受停工影響的企業對參與停工的工人採取紀律處分，工務局解僱了七十二名僱員，郵政署也開除一百一十二名職員（相當於該

部門僱員總數的百分之六)，海事處一些員工也受到停職處分。天星小輪管理層宣佈自六月七日開始，所有參與罷工的職工將被停職，公司將考慮讓重新登記的員工復職。天星小輪服務十一日開始逐漸恢復正常。港府布政司祈濟時更於五月三十一日在立法局表示：「近日發生的騷動和停工事件，是因一群佔全港市民少數的人，使用卑鄙的恐嚇和暴力威脅手段所致。我們期望的是和平地生活，完全不受干擾。」他又強調，港府正竭盡全力，「徹底遏制這種恐嚇和暴力」。

香港右派積極支持港英當局「平亂」

台灣當局和香港右派社團則大力支持港英政府對香港左派採取強硬措施。五月十四日，台灣外交部發言人呼籲香港親台勢力與港英當局「合作」鎮壓左派暴動。台灣中央社五月十七日報道，香港一百多個自由工會（即親台工會）領袖舉行會議，同意組織「保護勞工安全委員會」，協助港英當局「維持法律與秩序」。右派工會試圖為這個新成立的委員會徵集五十萬名會員，以「對抗各左翼團體」。報道又指出，這些「右翼工人決定，如有必要將不惜以武力對付武力」。

五月十八日，台北行政院舉行會議，討論香港局勢發展。魏道明、葉公超等國民黨要員在會議上表示，必須命令香港親台人士協助香港政府。⁸⁴台灣《新生報》則報道，監察院僑政委員會召集人劉永濟呼籲香港親台社團「應設法與香港政府合作」，並請求港英當局給予他們「適當的指導」。左派報章則猛烈批評右派「企圖製造事端，幫助港英當局對中國同胞進行更為殘酷的血腥鎮壓」，「只會使中國同胞對於美蔣特務更為痛恨」。

第五章 《人民日報》「六·三」社論： 北京打算收回香港？

六月二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向英勇的港九愛國同胞致敬》的評論員文章，認為「有了毛澤東思想，香港愛國同胞就無往而不勝。有了毛澤東思想，香港愛國同胞就變得無比強大。儘管英帝國主義依靠軍警特務、槍炮、刺刀，依靠法西斯法令，甚至出動航空母艦，但是所有這些東西都不過是些小小的玩藝兒，英帝國主義本身也不過是一隻紙老虎。它必將被香港同胞的偉大革命風暴所粉碎！」文章又強調：「英帝國主義越是瘋狂鎮壓我愛國同胞，它在香港的末日也就越是臨近。我香港愛國同胞在七億祖國人民的支持下，一定要向英帝國主義索還血債。一定要判處英帝國主義的死刑！這個歷史性的日子，是一定要到來的。」

在《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的鼓舞下，鬥委會發言人翌日發表談話，認為「偉大的革命風暴正在港九和新界同胞全面興起，港英當局已處在全香港中國同胞抗暴鬥爭的包圍中。這個特點說明了當前的大好形勢。」發言人「感謝強大祖國的大力支持」的同時，表明「一定堅決執行最高指示，一定要把不自量力，仍在張牙舞爪的港英戴麟趾一伙鬥到低頭認錯」。

鬥委會發言人又指出，「抗暴烈火正在熊熊燃燒，抗暴形勢大好」。他並強調，港英當局針對左派頒佈的緊急法令，對他們是「無效」的，「你有你的緊急法令，我有我的抗暴行動。一場更大規模的迫害和反迫害鬥爭，已是山雨欲來，一觸即發」。發言人因此向「全港愛國同胞」發出「立即行動、準備戰鬥」的緊急號召。

港九各業工人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也於同一天發表聲明，指「一支浩浩蕩蕩的反迫害大軍，正在迅速地發動起來。港英法西斯當

局完全陷在港九愛國同胞的汪洋大海中」。工人鬥委會號召全港工人立即行動起來，「把反迫害鬥爭再升一級，從城市到農村，有集中有分散，勇敢頑強，機動靈活，緊緊地、狠狠地、準確地給予港英當局以有力的反擊」。鬥委會又認為：「香港的革命風暴正在興起，到頭來不是你們（港英當局）來收拾我們，而是我們來收拾你們」。⁸⁵

六月三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堅決反擊英帝國主義的挑釁》的社論，將聲援香港左派的文宣攻勢推上高峰。社論認為：「我港九同胞既然已經展開了反擊，就一定要堅持鬥爭，抗頑敵，追窮寇，把英帝國主義鬥垮、鬥臭！英帝國主義是一個反面教員，他們用法西斯暴行，迫使港九同胞展開一場仇視、鄙視和蔑視英帝國主義的運動，從政治上、經濟上和文化上採取一切可能的行動，英帝國主義的殖民統治發動強大的反擊。」社論強調「一定要大張旗鼓地、千軍萬馬地揭發和宣傳英帝國主義一百多年來在香港犯下的滔天罪行，發動群眾進行血淚的控訴，讓香港的同胞家喻戶曉，使我們徹底地認清侵略成性的英帝國主義的反動腐朽的本質。」

社論呼籲香港左派動員群眾，向港英當局發動鬥爭：「港九愛國同胞們，進一步動員起來，組織起來，勇猛地向着萬惡的英帝國主義展開鬥爭吧！隨時準備響應偉大祖國的號召，粉碎英帝國主義的反動統治！港九愛國同胞們，英勇地戰鬥吧！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取得了偉大勝利的祖國千百萬紅衛兵支持着你們，億萬革命群眾支持着你們。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七億中國人民，誓作香港愛國同胞的強大後盾。」

這篇社論又為香港左派的鬥爭策略提出指引：「這一場鬥爭，主要地應依靠香港的工人階級，他們是革命的主力軍。還應當充分地發動廣大的青年學生，使青年學生運動同工人運動結合起來。以香港的工人階級為核心，發動香港廣泛階層的愛國同胞，把鬥爭的矛頭集中地指向美英帝國主義，首先是指向直接統治香港的英帝國主義。」社論明確提出發動工人和學生，作為反英鬥爭的骨幹。

這篇社論就是著名的「六·三」社論，香港左派陣營據此認為北京支持他們，甚至作好隨時收回香港的準備，因而士氣大振。《大公報》翌日社評指出：「在大搏鬥的暴風雨前夕，祖國傳來了無限振奮人心的聲音。」《大公報》進一步將「六·三」社論解讀為「不僅是對港九同胞反迫害鬥爭的支持，也是對港九同胞反迫害鬥爭的行動的指示」，「也是對垂死掙扎的英帝的最後判決書」，並且「預告了百餘年來未有的嶄新的局面快將誕生」。該報社評認為：「現在港九同胞和中國人民把牌都攤出來了：一定要向英帝索還血債，一定要判英帝的死刑。如果港英還不接受我方的要求，低頭認罪，他們將來想做（澳督）嘉樂庇而不可得。」

當時許多左派人士都以為，中國政府打算收回香港。鬥委會副主任委員、漢華中學校長黃建立表示，「六·三」社論發表後，許多左派人士情緒高漲，以為國家很快收回香港。當時正在獄中服刑的三聯書店副經理蕭滋對筆者表示：「大家以為國家快要解放港、澳、台，甚至全世界也快要一片紅，『只爭朝夕』，已沒有必要保持香港現狀了。」他早在文革前也聽聞北京「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對港政策，但「六·三」社論發表後，他也以為中央政策有變。他說：「可能我的政策水平較低吧，但當時左派內部清楚看到問題的人極少。」

許多左派社團都進入亢奮狀態，例如左派電影界鬥委會舉行誓師大會，聲言「要以毛澤東思想進一步武裝頭腦，高舉着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按照人民日報社論的指示，大張旗鼓地展開仇視、鄙視、蔑視英帝運動」。電影界鬥委會又發出「決心書」，「決心要做一個刀山敢上，火海敢闖的堂堂正正的中國人」。漢華中學師生也於六月六日舉行誓師大會，「決心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與港九各界同胞戰鬥在一起，勇猛地向着萬惡英帝國主義展開鬥爭」。

《人民日報》發表「六·三」社論後，中國大陸繼續傳來令香港左派振奮的消息。六月六日，亞非國家常設局在北京舉行紀念毛澤東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二十五周年討論會，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戚本禹在

會上發表講話，「正告」英帝國主義者，帝國主義「海盜的炮艦政策」的時代早已過時了。他表示：「我們要警告英帝國主義，你們過去利用清朝的腐敗，發動了骯髒的鴉片戰爭，強佔香港，這筆老賬至今還沒有清算！今天，你們又在香港施行法西斯暴行，這是對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嚴重挑釁，七億中國人民決不答應。英帝國主義分子，你們還不低頭認罪，就要請你們嘗嘗中國人民的鐵拳滋味！」

廣東省支援香港左派的行動

自中共建政以來，廣東省一直是中共駐港機構和香港左派陣營的後勤基地，六七暴動期間也順理成章成為大陸支援香港左派鬥爭的前沿陣地。早在六七年二月，中共廣東省委被「革命造反派」聯合奪權，廣東自此處於無政府狀態。五月十六日，廣州大中院校紅衛兵、工人群眾已舉行集會遊行，抗議港英政府的鎮壓行動。廣東一些紅衛兵和群眾組織更在報章發表聲明，或向香港發出「通電」、「慰問電」等方式，以示聲援香港左派的鬥爭。

廣州工農、學生於六月六日舉行十萬人大會，聲援香港左派。大會發言人表示：「英帝國主義不投降，就叫他滅亡！我們堅決和香港同胞一起，新仇舊恨一齊算，堅決踏平香港的舊世界，徹底解除你們這些老牌吸血鬼在香港的統治基礎！」一些與會工人，則重提二十年代省港大罷工的歷史：「我們中國工人有同自己敵人血戰到底的氣概。四十多年前，香港工人在自己的政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曾經同英帝國主義鬥爭一年零四個月，給英帝在政治上、經濟上以極為沉重的打擊，使香港變成死港、臭港、餓港。英帝終以失敗而告終。」

當時大陸當局在羅湖邊境安裝了一個揚聲器，不停播放反英口號，並在羅湖橋頭掛上「絞死英帝」的巨型漫畫及反英大字報。大陸開往香港的火車卡也塗滿了反英標語，甚至在輪往香港的牛隻身上漆上標語。廣州至深圳的列車更寫有「解放香港」的標語，廣州街頭也

出現「香港必須大亂」的大字報。

六七年七、八月間，紅衛兵組織策劃衝過中港邊境，「聲援」香港左派的傳聞甚囂塵上。十月二十八日，廣東省人民支持港九愛國同胞反英抗暴鬥爭委員會（簡稱支港委員會）成立，廣東省革委會籌備小組委員、前廣東省長陳郁出任委員會主任，副主任是解放軍廣州部隊負責人晏福生。它實際上是統籌全省支援香港左派行動的官方機構，日常運作由廣東第八辦公室（簡稱「八辦」，即新華社香港分社的後勤機構）負責。支港委員會對於防止一些自發性和偏激行動產生一定作用，過去紅衛兵組織隨便向香港發表「聲明」、「電文」的做法，逐漸受到控制。⁸⁶

廣東省支港委員會會址位於廣州吉祥路中山公園旁，文革前是廣東省文化廳招待所。委員會除了偶爾發出抗議港英當局的聲明，又曾舉辦「港九愛國同胞反英抗暴鬥爭圖片展覽」，並接待和安置香港騷亂期間被港英驅逐出境的左派人士。

雖然左派陣營展開一浪高於一浪的文宣攻勢，但港英當局絕不手軟。港府繼六月一日頒佈禁止張貼「煽動性」傳單後，又於六月三日派遣警察到左派書店、銀行、國貨公司和戲院，要求拆除展示描述港英「血腥鎮壓」的報章剪報的櫥窗。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梁威林當天晚上向港督戴麟趾提出「最嚴重、最強烈」的抗議，指責港英對左派機構進行「恐嚇」，是「敵視港九愛國同胞和中國人民的又一次嚴重政治挑釁」，並警告由此而產生的一切嚴重後果，完全由港英當局負責。

六月八日，九龍土瓜灣工務局電機部九龍分廠、土瓜灣中華煤氣廠、水務局九龍分廠、香港電燈公司等廠房的左派工人阻止港英警察撕去大字報，防暴隊與左派工人發生衝突，「戰況」以工務局電機廠和中華煤氣廠最為激烈。防暴隊向左派工人施放催淚彈、木彈，工人則持木棍還擊。中華煤氣工人黎松和曾明在事件中喪生，數十名工人受傷，五百多人被捕。而在工務局電機部衝突中，四十四歲的打銅部

工人徐田波被警察毆打致死。左派陣營指港英發動「瘋狂鎮壓」，並奉徐田波、黎松、曾明三人為「烈士」，聲言「血債必須血償」。

港英當局又於六月九日搜查左派電影公司經營的觀塘銀都戲院。晚上十一時三十分，銀都戲院放映最後的九點半場後，戲院職員正準備下班，並將大門鐵閘徐徐放下。此時一批港英手持衝鋒槍的防暴隊衝進戲院，撕去戲院內張貼的大字報、標語和照片，並進入三樓放映機房，將封條貼在三部放映機上，同時將懸掛着的戲院牌照取去。警方又拘捕銀都戲院經理及四十多名員工，部分職工報稱遭防暴隊毆打。警方聲稱在銀都戲院內搜獲武器及煽動宣傳物品，後來更吊銷該戲院的營業牌照。香港民俗史研究者吳昊指出，六七暴動期間，一些左派戲院成為「作戰基地」和「政治講習所」，港府當時以「非法集會」的罪名，吊銷銀都戲院的營業執照。⁸⁷

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梁威林翌日電告戴麟趾，就港英攻擊銀都戲院、土瓜灣工務局分廠及煤氣公司提出「最嚴重、最強烈、最緊急的抗議」。梁威林警告港英「如果不低頭認罪，堅持與中國人民為敵，除了被港九愛國同胞和中國人民打得粉身碎骨之外，絕不會有別的下場」。

六月十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針鋒相對，堅決鬥爭〉的評論員文章，指港英當局「妄想把港九愛國同胞這一場偉大的反英抗暴鬥爭壓下去，妄想中國人民會容忍他們在香港胡作非為」，「這是絕對辦不到的」，並警告港英若「堅持與中國人民為敵，只能是飛蛾撲火，自取滅亡」。文章強調：「英帝國主義向我港九愛國同胞和中國人民進行瘋狂挑釁，我們就一定要給予敵人每一個進攻以堅決的回擊，直至把它徹底粉碎！敵人壓迫，我們就反抗，而且要一反到底。敵人搞非法審訊，我們就要把敵人的法庭變為揭露英帝國主義的講壇，對英帝國主義進行人民的正義的審判。敵人搞政治欺騙，我們就堅決揭露，堅決發動群眾控訴英帝國主義的血腥罪行，普遍地、深入地開展仇視、鄙視、蔑視英帝國主義的群眾運動，做到家喻戶曉。」

這篇評論員文章指出：「敵人在磨刀，我們也要磨刀。我們一定要對英帝國主義一百多年來侵略中國的滔天罪行，霸佔香港的滔天罪行，進行徹底的清算。我港九愛國同胞要做好一切準備，向敵人展開更強大的反擊。」文章更呼籲「全國工人、農民、人民解放軍戰士和一切革命群眾，都要做好充分的準備，用實際行動來支援香港同胞的鬥爭」，與「香港愛國同胞」團結起來，「一定要把英帝國主義這隻紙老虎戮它個稀巴爛！」這篇文章令香港左派陣營的情緒更為激昂。

為了抗議港英當局的「突襲」行動，左派政軍醫工會、海事處工會、郵務工會及水務工會和牛奶公司、天星小輪等英資企業鬥委會自六月十日起，發動聯合大罷工。各工會鬥委會在《告政府職工書》中強調：「我們有千百萬紅衛兵的支持，有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的解放軍做後盾，有七億偉大中國人民做靠山，有偉大領袖毛澤東撐腰。我們反迫害抗暴鬥爭一定勝利。」一些左派摩托車工人代表更以激昂語氣表示：「我們保證要車有車，要人有人，要血有血，要錢有錢。只要鬥委會一聲令下，摩托工人就立即投入戰鬥。」

六月十二日，來自天星小輪、九龍倉等英資企業的左派工人，在土瓜灣工人俱樂部舉行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鬥委會主任楊光發言時表示，萬人大罷工已打響了反迫害鬥爭升級的第一炮，第二炮、第三炮即將來臨。他強調：「英帝國主義在香港的百年罪惡，我們一定要來個總清算。我們一定要響應祖國的號召，把鬥爭矛頭直指英帝國主義統治者。」

他更躊躇滿志地表示：「現在主動權完全操在我們手中，要打就打，要停就停。香港的命運，完全由香港四百萬中國同胞和七億中國人民來決定。鬥爭的道路雖然是曲折的，但前途是光明的。敵人的瘋狂，是一種懦弱的表現。我們要進一步團結起來，加緊準備，聽候命令，隨時投入更大的戰鬥。」六月十三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表示：「香港中國同胞已經進一步行動起來了，一個波瀾壯闊的革命群眾運動正席捲港九，革命群眾鬥爭的怒潮猛烈衝擊着英帝國主義在香港的

反動統治。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香港愛國同胞，同仇敵愾，表現出了革命人民一往無前，壓倒一切的英雄氣概。外交部發言人表示：「他們隨時準備響應祖國的號召，向英帝國主義發起更大規模的反擊，把英帝國主義的反動統治打個落花流水，扔進歷史的垃圾堆。」

左派陣營聲稱將發動萬多名工人參與這次罷工，但這次罷工反應不甚理想，部分政府部門員工依時上班，九成郵政署職員準時報到。這次行動顯然未能對港英造成太大打擊，無法「打響反迫害鬥爭升級的第一炮」。

六月二十三日，警方在九龍旺角清理大字報時，遭一批持玻璃瓶和鐵枝的左派群眾襲擊，警員鳴槍驅趕左派示威者，一名中槍者及同行的示威者逃進港九樹膠業總工會。數百名防暴隊圍攻膠業工會會所，經過七小時激烈搏鬥，防暴隊終於攻進工會，拘捕膠業工會主席馮金水和五十三名工人。一名外籍警員在衝突中被斧頭砍傷，十多名警員被鐵枝和硫酸所傷。左派報章則形容工人「浴血奮戰七小時」，洋警員受到「懲罰」，並指三名工人被捕後被「被毒打致死」。



六月二十三日，防暴隊圍攻港九樹膠業總工會，歷時七小時。

第六章 左派發動聯合大罷工和罷市

雖然政府機構和英資企業職工罷工行動未如理想，但左派陣營於六月下旬發起罷工、罷市、罷課的「三罷」行動。一位當年擔任新華社香港分社官員的人士告訴筆者，部分左派人士認為二十年代「省港大罷工」成功逼使港英讓步，遂提出發動罷工、罷市，希望歷史重演。左派六月二十四日開始發動全港規模的「聯合大罷工」，海運、水陸交通、公共事業、船塢、倉庫、紡織等二十多個行業參與了這次罷工。左派報章聲稱「二十六路大軍開上了聯合大罷工的主要戰場」，「進一步把反英抗暴鬥爭推上了一個新高潮」。

各界鬥委會在聯合大罷工的聲明中指出：「要用各種各樣的鬥爭方式來配合這次聯合大罷工，聯合起來一齊向英帝國主義進行猛烈的衝擊。」左派糧油、百貨、食品、土產山貨、南北藥材、建築材料、出版印刷等六十三個單位爲了配合罷工，六月二十九日起發動爲期四天的聯合大罷市（由六月二十九日至七月二日）。左派陣營在罷市聲明中強調：「我們聯合罷市的目的是爲了維護中華民族的尊嚴，是爲了加倍反擊英帝國主義殘酷的民族壓迫。參加聯合罷市，固然會造成我們業務上的一些損失，但是民族大義當前，頭可斷，血可流，身家財產更不足恃。我們鬥爭的矛頭直接指向統治者，在這次聯合罷市中，同胞們所遭受的一切不便和損失，只能唯港英是問。」左派報章宣稱，逾二十萬名小販、職工和工商業者投入大罷市行動。《大公報》認爲：「聯合大罷市是爲了配合抗暴主力軍工人的大罷工，實行雙管齊下，痛擊萬惡的港英帝國主義者。」。

周恩來自香港爆發「五月風暴」以來一直沒有公開表態，也因政治需要而表態支持香港左派的反英鬥爭。周恩來六月二十四日會見贊比亞總統卡翁達時，表示「堅決支持」香港左派發動大罷工。他指

出：「在震撼世界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取得了偉大勝利的革命人民，絕對不能容許英帝國主義對香港愛國同胞的殘酷迫害。中國人民決心根據形勢的需要，給予香港愛國同胞以一切支援，直到取得最後勝利。」周恩來又警告「如果英國政府和香港英國當局執迷不悟，不顧中國人民和中國政府的警告，繼續對香港愛國同胞進行殘暴鎮壓，硬要與中國人民為敵到底，他們就必然要受到懲罰，他們應當承擔由此而產生的一切嚴重後果。」

左派三十二所學校的兩萬多名學生也於六月二十七日停課一天，以示支持工人聯合大罷工。左派報章形容工人為「抗暴主力軍」，左派學校學生則是「抗暴先鋒隊」。早在六月一日，左派學校學生成立學生界鬥委會，並在《告全港同學書》中警告港英當局如果「膽敢繼續與港九四百萬同胞為敵，膽敢繼續鎮壓香港青少年學生的抗暴運動，那就必將受到迎頭痛擊，必將碰得頭破血流」，「讓我們全港九同學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手扣手，肩並肩，勇敢戰鬥，闖出一個紅彤彤的新天地！」。

《人民日報》六月三日和七月五日社論先後號召香港青年學生「與工農運動相結合」，在反英抗暴中「發揮先鋒的作用」。七月五日下午，左派學校學生前往港府教育司署（後易名為教育署）抗議，在門外張貼大字報及高叫口號。左派報章形容「革命歌聲和反英抗暴的怒吼，震撼了這個奴化教育的黑指揮部，把港英嚇得喪魂落魄」。左派學校經常發動學生上街遊行，並組織「數以百計的鬥爭小組和戰鬥隊」，以及數十支「文化輕騎隊」，舉行街頭演出，宣傳毛澤東思想及表演「反英抗暴」節目，「形成波瀾壯闊的學生反迫害鬥爭的局面」。

八月十八日，港府教育司簡乃傑向左派學校頒佈十三項法令，認為左派學校曾被用作「散播煽動性宣傳，及從事煽動性教學」，下令左派學校「不得製造、陳列或傳播煽動性的物件或資料」。左派認為這些法令「歸根結底就是不許愛國，不許反英抗暴，不許學習和傳播

毛澤東思想，否則就封校抓人」，聲言「蔑視教育司的臭法令」，又發動學生到教育司署抗議。一些認同左派的非左派中學生在校內成立鬥委會，英皇書院、聖保羅書院、真光書院、培道書院、伊利沙白中學、喇沙書院、培正書院等中學部分學生在左報刊登成立鬥委會啓事，最高峰曾出現一百多個鬥委會。皇仁書院、聖保羅書院、金文泰中學等官方色彩濃厚的英文學校，也出現反英大字報和傳單。六七年九月二十八日，聖保羅書院中六學生曾德成在校內派發傳單，校長報警，曾德成被捕，後來被判入獄兩年。他出獄後加入《大公報》工作，年前升任總編輯，目前擔任中國全國人大代表，九八年八月受聘為港府中央政策組顧問。

當時不少左派學校學生被捕入獄，其中漢華中學學生張普璇被左派傳媒捧為「反英抗暴鬥爭中的小闖將」。張普璇時年十七歲，父親是工聯會屬會百貨僱員總會書記（現任工聯會副理事長譚耀宗與陳婉嫻是他的後輩）。張在漢華完成中五課程後，與兩名同學獲校方「分配」往港島薄扶林村牛奶公司職工會康樂中心。六七年七月十七日，港英防暴隊搜查康樂中心，張普璇被捕後目睹防暴隊撕毀工會內的毛澤東肖像和毛語錄，張高叫「毛主席萬歲」，警方因此控告她「發表煽動性演說」。張普璇被審訊期間，質問法官「煽動」的含意，並表示：「有法西斯的『法律』，就沒有人民的法律！」她結果被判入獄一年。

新華社香港分社記者形容張普璇「把港英當局的法庭變成講壇，無情地揭露敵人的法西斯醜惡面目」，又歌頌她為「毛澤東時代的小英雄」、「革命熔爐中紅色的烈火」。⁸⁸張普璇被判刑時覺得「為國家民族和正義入獄」相當值得，但她現在回首當年，慨嘆自己只是因緣際會下成為「被用作政治宣傳的棋子」，但她對當年的遭遇無怨無悔，當年的經歷令她「看清左派陣營的面目」。

中學和大學校園的異動

當時貴為香港最高學府的香港大學，也有少數學生支持左派的行

動。一些港大學生打出「港大學生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的旗幟，發表反對港英當局的聲明，並秘密印發《新港大》，與港大學生會刊物《學苑》打對台。六七年十月開始，所有在港大宿舍寄宿的學生都收到以小報形式印製的《新港大》，內容主要是抨擊港英鎮壓群眾，並批評港英推行「奴化教育」。

當時在港大就讀的劉迺强指出，當時校園出現了一些「職業學生」，通過替同學補習功課、組織興趣班等活動招攬學生，一些人甚至故意考試不及格，或畢業後轉系再讀，以延長在校園活動的時間。他表示，當年同情左派陣營的港大學生主要集中於理工科。他說：「左派很會保護他們，不會讓他們拋頭露面，例如不會要求他們上街遊行。」劉迺强指出，暴動結束後，港大校內的左派學生有組織地在學生會屬會「奪權」，七十年代初期蛻變為「國粹派」。六、七十年代參與左派學界活動的牛虻（現已移居加拿大）指出，六七暴動結束後，左派在港大、中文大學、浸會書院、理工學院積極發展黨員，「這些人已深入港府、傳媒、電影、文康體以至區議會等機構」。⁸⁹

聯合大罷工和大罷市是左派企圖鬥垮港英，逼使英國接受北京要求的重要部署。《大公報》形容罷工、罷市如「雙龍出海，猛揍港英」，聲稱罷工、罷市和各式各樣的「鐵拳」，都擊在港英的要害，「到了一定時日，這頭紙老虎必會被擊至奄奄一息，爬不起來」。該報強調：「香港工人階級和工商業者在這場反英抗暴中所採取的大罷工和大罷市行動，就是要從政治上、經濟上狠狠地加倍還擊港英法西斯當局，就是要對香港當局的重重剝削加以抵制，把它的吸血機構打個稀巴爛。」⁹⁰

當時擔任《文匯報》總編輯的金堯如表示，港澳工委指揮總部在發動「三罷」的決定中指出，要把香港不但變成一九二五年省港大罷工時期的「臭港」，現在更要把它完完全全變成「死港」，「使香港工業停擺，把港英殖民主義的剝削來源塞死，把港英殖民主義的統治基礎推倒。它投降就罷，它不投降，將來我們從頭來過，敢教香港換

新天！」

「三罷」行動一度對香港民生帶來衝擊。左派工會中以摩托車職工總會實力最為雄厚，不少巴士司機響應左派陣營的號召，公共交通服務因此受到較大影響。六月二十四日，九龍巴士公司和中華巴士公司僅能維持一半巴士服務，計程車服務也大幅削減，油麻地小輪僅能維持有限度服務。六月二十五日，公共交通服務開始逐漸恢復正常，兩家巴士公司宣稱不少員工返回工作崗位，但九龍區巴士服務須於晚上八時結束，港島巴士服務也僅能維持至晚上十一時。由於公共交通服務幾乎癱瘓，港府要安排大卡車接載公務員上班。現任政府華員會副會長的黃河當時在政府醫院任職護士，左派罷工期間每天乘坐政府



左派六月底發動大罷工，對民生構成一定衝擊。部分巴士公司職工參與罷工，導致尖沙咀巴士總站不見任何巴士蹤影。

特別安排的大卡車上班。他憶述說：「當時實在心驚膽戰，不上班不行，上班又怕被左派罵我是『黃皮狗』。」

當時香港正值水荒，左派水務職工會號召罷工，令水務署人手非常緊張，一度要實行每四天供水一小時。去年退休的水務署署長許文韶，當年任職水務署工程師。他憶述說：「我下班後還要與職員四處聽市民投訴，例如指定時間還沒有食水供應。暴動期間有人故意開動水喉及街喉，讓食水流進溝渠，浪費水源。」⁹¹

左派陣營初期對「三罷」的效果非常滿意。六月二十九日，鬥委會主任委員楊光在一個左派工會集會上表示，聯合大罷工是對港英的有力回擊，打得港英「蒙頭轉向」。他說：「我們後面還有許多兵種，隨時出動。我們還有很多力量，喜歡怎樣鬥就怎樣鬥。」

當年香港四分之一的進口貨物來自中國大陸，六成食品更由中國進口。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梁上苑相信：「大罷市看來不是北京中央政府的全面部署，但有各省當局和運輸部門的配合。」左派宣佈罷市後，大陸一些豬牛原已運抵香港火車站，但來貨機構決定將這些牲口運返內地。左派發動大罷市後，鮮蛋、蔬菜、豬肉等食品一度短缺，價格也顯著上升。左派報章這樣報道罷市期間的市面情況：「港九各區街市，在小販和肉商的同仇敵愾的抗暴罷市行動下，水靜河飛。百分之九十的肉檔、肉食公司無肉食供應，淡水魚幾乎絕跡。市面上的果菜供應不及一成。有些經營台灣水果的批發商也參加罷市，一家批發商存倉的台灣香蕉有四十噸之多，但他們不出貨，商號負責人說：『寧可爛掉也不賣出街！』」⁹²豬肉價格由平日每斤三元四角，增至每斤六元多，雞蛋由一元六隻漲價至一元三隻。左派報章更嘲笑港英當局「力謀粉飾市場，出高價到外界收買蔬菜，連剛出葉的菜仔也搜刮。港英爲了湊數，四天來屠宰一批不足兩斤的豬隻」。⁹³

左派報章炮製了不少罷市期間的「動人故事」，例如「一位豆腐批發商在大罷工開始前向他訂購了數十斤芽菜，罷市開始後他堅持不賣，『芽菜寧願爛掉也不開市』」「一位小販罷市前夕身上只有四元

四角，但爲了中國人民的尊嚴，堅決支持大罷市，一於不開檔」。⁹⁴ 港英當局則竭力製造大罷市影響輕微的假象，宣稱蔬菜、肉類、魚類等食品「供應正常」。雖然港府努力維持食物正常供應，但罷市期間市面供應確實受嚴重影響，連部分英國傳媒也對港府極力掩飾看不過眼。英國《衛報》七月十四日《不安的中國邊城》一文指出：「香港政府和英文報章有意將事情盡量說得輕微些，英文大報中有兩個例子正足以說明新聞是如何極端相反得可笑。《南華早報》大字標題說：『停運食物：左派又一次失敗』，但內文報道蔬菜價格漲了一倍，雞蛋和豬肉幾乎買不到，其他物價漲了百分之二十。」

七月二日晚上，左派宣佈大罷市「勝利結束」，市面食品供應翌日逐漸恢復正常。但金堯如認爲大罷市「不成氣候」，「中資公司有的貨品，港資、外資公司都有，罷市徒然幫了港資、外資公司的忙。所以中資公司兩三天後便把城門打開，向顧客投降了。」他又憶述說：「中資五豐行通知菜市場小販罷市，小販勉強應承了一兩天，也怨聲四起。他們有句警言：『咁樣罷市，唔賣嘢，餓得死白皮豬、黃皮狗？鬥得倒港英？自食砒霜去毒老虎係真！佢唔死，我地先死。』」⁹⁵

不少鬥委會成員都不同意左派發動罷工、罷市的做法。鬥委會副主任委員、漢華中學校長黃建立認爲，左派發動的罷工不太成功，規模也未如理想，不能造成很大聲勢。他又承認，罷工對市民生活帶來困擾，許多市民怨聲載道。黃建立當年也懷疑這種做法是否違背國家五十年代以來提出的『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針。鬥委會常委、新聯影業公司董事長廖一原也直言，左派當年發動罷工、罷市的抗爭手法不智，因爲首先損害了中下層市民和小商販的利益。他指出：「罷市期間商人損失慘重，國家的損失更爲嚴重。內地運往香港的牲口和蔬菜原本已付運，運輸人員中途接到香港罷市的指示，唯有把火車停在車站。那時正值炎夏，許多豬隻就在車廂內餓死、渴死。香港的零售批發商也沒有生意可做，社會秩序也因而大亂，人心惶惶。」

而巴士、渡輪罷駛也影響市民上班。廖又指出，左派大罷工未能迫使港英就範，被開除的左派工人轉業困難，左派陣營付出這麼大的代價實在不值得。

左派聲言五萬工人參與聯合大罷工，但左派以「銀彈政策」發動罷工的消息甚囂塵上，據說罷工工人獲發「慰勞金」，每人每月四、五百元。⁹⁶右派中華巴士自由職工會指左派給予司機和稽查員每月五百元和三百八十元，作為參與罷工的「報酬」。⁹⁷英文《中國郵報》(China Mail)估計，左派陣營共耗資一千萬元，支付罷工「慰勞金」。七月十七日，左派海員工會發動罷工，呼籲海員拒絕運輸貨物進出香港。海員工會形容罷工行動是「一場光榮的捍衛毛澤東思想的聖戰」和「打破職業生活鬥爭枷鎖的生死鬥爭」。海員工會又表示，對於海員們在罷工期間的生活，港九各界鬥委會將給予「適當照顧」。九龍巴士工人鬥委會更在《告工友書》中信心十足地表示：「無論罷工多久，鬥委會都負責我們的生活費，直至勝利。公司關廠，我們照出糧；公司開除，我們支持生活費至復工；交通部如取消牌照，我們支持生活費到取回牌照開工為止。這是說，我們一定勝利，勝利之日還有誰敢取消我們的牌照或開除呢？」⁹⁸

雖然北京以中國全國總工會的名義撥款兩千萬港元予鬥委會，但鬥委會「包」下了大量罷工工人的生活開支，終究是一項異常沉重的負擔。當時一些依從指示參與罷工的九巴稽查員告訴筆者，他們領了幾個月罷工津貼後，再也收不到錢，生活頓時陷入困難。

左派「欲罷不能」？

楊光於七月一日左派罷工工人「會師大會」上聲言，大罷工和大罷市打得港英「暈頭轉向，有如發了高燒」，「罷市鬥爭已使港英更加頭昏腦脹，大滅敵人的威風」。港英當局則以強硬手段對付參與罷工的公務員，除非參與者能證明是在被威嚇的情況下參與罷工行動，否則一律停職甚至開除。據當局統計，一千六百五十一名公務員因此

被解僱，約佔全體公務員總數的百分之二點三五。⁹⁹其他私營機構紛紛效法港英當局的強硬措施，規定曠工的員工須於指定期限內回公司「重新登記」，否則就會被公司革職。九龍巴士公司辭退了四千九百七十名僱員，佔公司七千一百十四名員工的三分之二。原本聘用二千三百六十名員工的中華巴士公司，也開除了一千二百七十三人。香港電車公司解僱了六百七十九名員工，天星小輪和油麻地小輪公司合共開除了七百名僱員。

港府和私營機構罷工六月底開始逐漸平息，大罷工和大罷市沒有出現左派期望的全港癱瘓局面，一些非左派報章更揶揄左派「欲罷不能」，商業電台播音員林彬更將自己的節目定名為「欲罷不能」。

新蒲崗大有街事件發生後，一些非左派民眾對左派的抗議行動抱同情態度。但大罷工和大罷市為廣大市民帶來極大不便，左派不但未能鬥垮港英，更賠上了民眾的支持，市民逐漸對左派感到反感。儘管左派成功動員六萬名工人參與罷工，但相對於當時香港的一百五十萬勞動人口，左派大罷工不足以令香港社會徹底癱瘓，未能像左派預期那樣致港英「死命」。

時任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的梁上苑認為：「新華社領導官員頭腦裏充滿極左思想，不去考慮全局的形勢和雙方力量的對比，幻想二十年代省港大罷工的雄風重新出現，盲目地動員一切力量，舉行約六萬人參與的聯合罷工，其中不少是港英政府或英資財團企業，如電車公司、太古船塢、海事處和貨倉工人。」但他認為，所謂聯合大罷工僅限於左派，不能發揮很大的威力，反而很多人因此丟了工作，丟了工作陣地，一直要由港澳工委維持他們的生活，變成沉重的經濟包袱。梁上苑也指出：「大罷市不能致港英死命，某些市場卻被人奪去，可說傷痕纍纍，長期無法恢復。發動這樣大規模的罷工和罷市，不能說是新華社領導層推波助瀾，而是帶領左派群敗走麥城。」

左派大罷工也衍生了一些「新生事物」。由於兩家巴士公司服務接近癱瘓，大批私家車和小型客貨車(俗稱「白牌」)趁機「填補真

空」，到街上兜攬乘客。警方在當時的非常時期，也對這些原屬非法載客的車輛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默許它們在巴士站和電車站上落乘客。六七暴動結束後，港府吸取陸上公共交通過分倚賴巴士的教訓，於六九年七月宣佈小巴服務合法化，作為巴士服務的補充。

第七章 港英的民意戰和宣傳戰

港英當局除了以強硬手段對付左派，也積極動員民意支持。早在五月中旬，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發表聲明，呼籲停止暴力行動：「我們相信大部分市民明白和平和穩定是必須的，只有社會穩定才能保持繁榮，任何不穩定會導致經濟衰退和失業，令市民受損。」

香港大學學生會是最早表態支持港府的團體之一，港大學生會刊物《學苑》五月十七日發表題為《我們要求安定》的社論，強調「痛恨任何顛覆社會的行動，反對那些企圖煽動居民參加騷動，企圖以口號及主義麻醉我們的理智，企圖造成社會動亂的勢力」。五月十八日，九十八個社團表態支持港英政府，這些團體包括香港工業總會、香港印度商會、北角街坊福利會、佛教協會、牙醫學會、東華醫院、香港聯合國協會、西區婦女福利會、東區小販商會等。

五月二十二日，香港三百多個社團在《工商日報》、《華僑日報》等各大報章聯名刊登「支持香港政府維持治安」的廣告，據說這次行動是由港府署理華民政務司徐家祥在幕後策動的。這些支持港府的團體包括保良局、東華醫院、香港公民協會、香港革新會、香港足球總會、香港大學學生會、香港專上學生聯會、香港出口商會、九龍總商會、中醫師公會、香港教師會、香港製衣業同業公會、社會服務聯會及多個街坊福利會和同鄉會。

五月二十六日，港督戴麟趾宣稱：「政府的態度和行動，已獲得並正獲得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香港居民的無限支持。」港府布政司祈濟時在立法局會議上表示：「維持和恢復治安，是絕大部分香港人的願望，我們很高興看到大批市民和團體支持政府維持和平的政策。」¹⁰⁰左派報章則反指「百分之九十五在我們這邊」，並指責港英「百分之九十五的謊言」是「百分之百的法西斯技倆」。¹⁰¹

戴麟趾在六月二十九日倫敦記者會上表示，「百分之九十八的香港市民」支持港府，五百九十二個團體公開表態支持政府。他說：「他們願意站出來是令人驚奇的，對中國人來說這樣做更是罕見的。」港府聲稱，單是佛教協會和各街坊福利會代表了超過一百萬市民。但港府宣稱獲得「百分之九十八市民支持」，原來缺乏堅實的根據。戴麟趾在倫敦記者會被英國記者追問：「你怎樣得到百分之九十八支持的數據？」戴麟趾答說：「這只是個數字……」記者問：「只是你個人的估計？」戴麟趾說：「這是與我見面的中國人跟我說的，他們說我們支持政府，百分之九十八的人支持你。我想這不會錯得太厲害吧(I do not think it is far wrong)。」港英當局指出，支持政府的團體數目後來增至六百二十個。¹⁰²

代表新界原居民的新界鄉議局也於五月二十五日發表聲明，支持港英鎮壓左派騷亂。¹⁰³新界原居民曾於一八九八年武裝反抗英國接管新界，死傷枕藉，六七事件期間卻基於社會穩定的考慮支持港英當局。鄉議局主席彭富華更發起組織「民安促進會」，負責鄉村地區的巡邏，協助「恢復鄉郊地區的治安繁榮」。新界元朗一些鄉紳更發起「捉左仔」行動，事後獲港府委任為太平紳士。港英當局在鄉議局協助下，穩住了新界地區的局勢，當地除了零星的抗議活動外，局面遠較市區平靜。六七暴動期間，署理布政司何禮文讚揚鄉議局與政府衷誠合作：「新界居民在貴局賢明領導下，對一切強暴勢力明確反對，並決心選擇有規律的政府，使每個人都能夠安居樂業，不受無理的限制。」¹⁰⁴

港督戴麟趾為了答謝鄉議局的支持，六八年七月親臨鄉議局第十八屆議員就職典禮。戴麟趾致詞時，高度表揚鄉議局在六七暴動期間的貢獻：「一九六七年的艱苦歲月中，彼等(以彭富華為首的上屆鄉議局議員)為鼓勵及鞏固新界居民堅毅立場，頗多建樹，彼等既不為威脅或非常事件所動，且因當時的彼等之堅定態度，在維持治安上裨益良多。」¹⁰⁵左派外圍報章《香港夜報》事後刊登了一幅數名鄉紳手

持狗骨的漫畫，諷刺鄉議局依附港英當局。

其他社會知名人士也表態支持政府。香港大學校長羅便臣及中文大學校長李卓敏都認為，市民只有支持港府的政策，才能締造談判的和平氣氛。立法局議員李福樹在立法局會議上呼籲左派停止「違法」的示威活動，並認為大部分香港市民都反對他們的行徑。李又警告左派「麻煩製造者」，「如果他們對香港現狀那麼不滿，大可離開香港」。他並強調，當局不會再容忍違法行動，如果「麻煩製造者」漠視警告，他們將要面對「嚴重後果」。¹⁰⁶

市政局議員沙理士不但促請市民支持政府，更要求政府檢討目前「克制的政策」，否則市民的財產以至生命將受到威脅。敢言的市政局議員葉錫恩也呼籲青年遠離騷亂。港督戴麟趾爲了答謝各團體的支持，先後在港督府舉行三次答謝酒會，邀請團體代表及各界知名人士出席。文藝青年陸離更發起「一元運動」，呼籲市民捐款慰勞罷工期間照常上班的渡輪、巴士等公共交通機構職工。



國貨公司外牆張貼的反英標語。

港英當局又運用銀彈政策，要求香港傳媒「歸邊」。港府五月下旬向所有報章送來一份題為「維持安定繁榮」的廣告，連《文匯報》和《大公報》也照樣收到。《香港夜報》社長胡棣周表示，願意刊登的報章等於表態支持港英政府，而且可收取廣告費；拒絕刊登則會被視為左派。胡認為，港英這樣做等於迫人家選擇不是親英就是親共。面對兩難抉擇，胡棣周決定「站在中國人的立場」，拒絕刊登。他說：「我當然不能登，難道要我打電話給金堯如說：『喂，老金，我準備登這份廣告。』這樣做太『衰仔』，太不像話了。」

港府於五月十九日成立警察子弟教育基金，以鼓舞警察的士氣，全力彈壓左派騷亂行動。港府工商處處長擔任基金信托人，不少社會名人都呼籲市民踴躍捐款，著名影星陳寶珠、蕭芳芳都曾參與基金的籌款活動，基金迅即籌得三百五十萬元。港府以社會各界對警察子弟教育基金反應熱烈，作為公眾支持港府鎮壓左派騷亂的證據。但港英政府和親英傳媒的宣傳有時虛假得可笑，例如《南華早報》談到政府得到民眾大力支持的文章中，只訪問了七位居民，其中只有一位是中國人，所有被訪者都是專家或商人。

港英當局除了動員民意支持，也積極發動宣傳戰。五月二十一日，港府新聞處發出新聞稿，揭露身為鬥委會副主任委員的《大公報》社長費彝民，原來早在六四年加入了香港鄉村俱樂部。港府此舉旨在暴露左派核心成員原來過着「資產階級生活」，企圖削弱左派陣營的公信力。港府又不時散播費彝民等左派人士向警方「尋求保護」的消息，以動搖左派陣營的軍心。此外，港英當局控制的香港廣播電台（後來改名為香港電台）製作特備節目《為你服務的人》，表揚暴動期間堅守崗位的警察、軍警、消防員等公職人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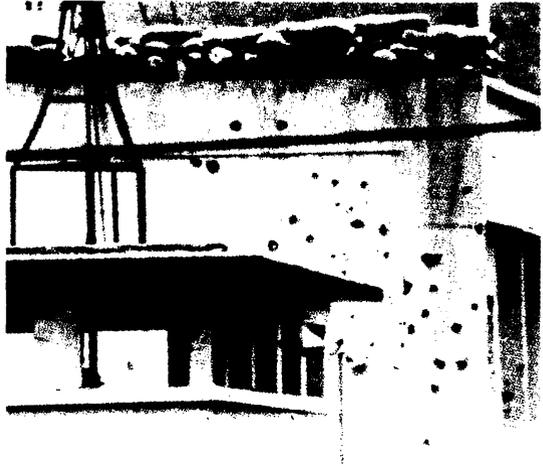
第八章 沙頭角事件與真假菠蘿陣

左派陣營與港英當局的角力，不久升級至中港邊境衝突，與大陸接壤的新界沙頭角更爆發百多年來的首次武裝衝突。七月八日早上十一時，三百名大陸群眾越過新界沙頭角邊界，吶喊遊行，並向當地的香港警崗投擲石塊、魚炮及玻璃瓶。駐守警崗的警員見狀即發射木彈及催淚彈，示威者暫時後撤。不久，警崗附近的鄉公所遭自動步槍射擊，一名警員當場中槍斃命，數名警員受傷，鄉公所內的警察被槍林彈雨包圍，無法撤退。港府緊急調動駐港啞喀兵來福槍兵團前往邊境，協助警員撤進現場，並於下午宣佈沙頭角地區實施宵禁。槍戰於當天傍晚平息。五名警察在沙頭角事件中身亡，三十多人受傷，左派報章指中方一人死亡，八人受傷。英軍及啞喀兵後來暫代警方巡邏邊境的工作。

中方對這次武裝衝突作出不同描述，指港英首先動武。廣州《南方日報》報道：「當天早上，沙頭角英方居民到我方境內參加集會，會後分路遊行。英方居民一路的隊伍經過沙頭角警署時，警察和防暴隊向群眾開槍和發射催淚彈，還向我方境內開槍掃射。我方邊防部隊鳴槍示警無效，於是我方邊防戰士和民兵被迫進行了自衛還擊。」¹⁰⁷曾參與編寫《周恩來年譜》的大陸學者陳揚勇則根據官方檔案，作出這樣的敘述：「一些群眾在九龍邊界地區舉行集會遊行，聞訊趕來的英方警察和遊行群眾發生衝突，打死中方工人一名，打傷幾名。駐守邊防的我一民兵小組衝出邊界前去支援，被英方警察包圍。不得已，我邊防部隊只好開槍掩護民兵和群眾撤退，打死了英方幾名警察。」¹⁰⁸這是大陸出版物首次承認當時大陸邊防部隊曾向港英警察開火。

沙頭角槍擊事件的消息迅即傳遍香港，市民當天大多不敢外出，留在家中扭開收音機，收聽電台消息。這次事件也引起外國關注，外

國傳媒紛紛作出報道。港府認為事件只是大陸邊境村民發起的行動，解放軍正規部隊沒有參與，因此並非中國武裝侵略香港的舉動。《香港年報一九六七》指出，「所有證據」都證明事件純屬中國邊境村民組織和發動的行動。香港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議員羅理基也相信，沙頭角事件並非中國政府



授意發動的。英國駐華代辦霍普森向中國外交部副部長羅貴波提出抗議，但羅反向英方抗議港英警察「鎮壓」內地群眾，造成一死八傷。北京要求英國就事件道歉，並嚴懲「元兇」，霍普森拒絕了北京的要求。

左派群眾對中國民兵向港英開火的消息，感到非常鼓舞。當時正在赤柱監獄服刑的三聯書店副經理蕭滋在獄中聽到中國民兵陳兵中港邊境的消息，「感到非常振奮」，並盼望解放軍「快點開進香港」。他坦言希望事態弄得越大越好，「那我就可以早點出獄」。

中港邊境其後出現數次小規模衝突。八月十日，新界文錦渡左派運輸工人指港英警方撕去大字報，向港英提出交涉。雙方發生衝突，運輸工人包圍警局，奪去數十枝槍械及一批手榴彈。《人民日報》事後發表《文錦渡工人幹得好》的評論員文章，新界大埔理民官鮑富達後來簽署「認罪保證書」，領回這批武器。八月十一日，港府更宣佈中港邊境全面封閉。

「人民戰爭」遍地開花

左派傳媒宣稱事件意味北京中央以實際行動支持左派對抗港英當局，沙頭角槍戰結束後，左派群眾的暴力抗爭行動接踵而來。港英爲了對付左派示威者，自七月初頒佈多項緊急法令。這些法例禁止遊行集會和示威抗議，也不准進行「煽動性廣播」和張貼「煽動性標語」，並授權警方進入屋宇搜查及拘捕可疑人物。任何行爲只要被認爲足以引起港英當局和市民「合理」的「恐懼和沮喪」，當局就有權逮捕有關人士。七月十九日，港府一口氣頒佈九項即時生效的緊急法例，規定（一）不論以口頭或文字散播虛假的聲明，而可能引起「公眾恐懼與沮喪」者，即屬違法；（二）法庭審訊刑事案件時，有權禁止公眾旁聽；（三）警方人員檢去武器的權力；（四）啓封或封閉屋宇命令；（五）市民與軍警合作的義務；（六）警方驅散集會的權力；（七）阻礙軍人執行職務的罪行；（八）禁止舉行私人及公開會議的權力；（九）干擾軍隊使用的車輛及裝備的罪行。

港英後來頒佈的緊急法令甚至規定，三個人以上聚集也可被控「非法集會」。七月二十八日，港府又頒佈另一條緊急法令，授權布政司可在無需任何理由的情況下，下令拘押犯人，拘押期限可長達一年，以「對付在幕後策劃陰謀和煽動騷亂的人」

左派報章則對緊急法令噁之以鼻，聲稱「你有你的緊急法令，我有我的抗暴行動」。鬥委會發言人表示：「港英帝國主義抓住這一大堆緊急法令，作爲救命的稻草，妄圖撲滅勢成燎原的抗暴烈火，但這是絕對辦不到的。」鬥委會強調：「不管你有幾條，或者幾十條，統統無效，我們就是蔑視它，就是不把它放在眼裏。香港愛國同胞只奉行一條：愛國無罪，抗暴有理。」¹⁰⁹

港英當局頒佈一系列緊急法令後，遊行集會受到嚴格限制，左派群眾轉而採取「飛行集會」的活動形式。飛行集會是中共領導人李立三在三十年代提出的鬥爭手法，指眾人約定時間在某地點會合，之前

裝作互不認識，到了預定時間迅速集合，演講、宣讀抗議聲明及散發傳單，然後在警察趕到前迅速散去。

七月的香港酷熱難當，衝突怒火越燒越旺。七月九日是個不平靜的星期天，一百五十多名左派群眾在港島西區派發左派報章出版的號外，警方到場驅趕群眾，雙方發生衝突，一名警員和搬運工人鄭浙波在事件中喪生。《文匯報》則指搬運工人鄭浙波爲了阻止警方拘捕一名左校學生，被警方開槍擊斃，「港英的法西斯暴行，燃起我西區同胞的抗暴怒火，群眾給予野獸們以堅決還擊。這一大群白皮豬、黃皮狗立即陷入群眾的汪洋大海，玻璃瓶、石塊紛紛從兩旁的樓上擲下。一位英勇的搬運工人帶着不共戴天的民族仇恨，衝上去抓住一條作惡多端的黃皮狗，用銳利的鐵鉤，朝它頸部、胸部、背部力刺下去，刺得這條黃皮狗連哼一聲都來不及，伏在那裏不能動彈。」¹¹⁰左派報章《晶報》更對左派群眾刺斃警察的行動叫好，以「生割黃皮狗」作爲報章的大字標題。

左派形容這次事件象徵「抗暴怒火開始燒向港九街頭」，「揭開了港九街頭的遊擊戰、麻雀戰、突擊戰的帷幕」，「我抗暴大軍到處開闢戰場，連續作戰。有文鬥，也有武鬥。此起彼伏，互相呼應」。¹¹¹七月九日下午五時許，三百多名左派群眾在北角英皇道電車總站集結，抗議警方較早時撕去車站的大字報，並重新張貼大字報和標語。七、八輛載滿防暴隊的警車開往現場，防暴隊在附近馬路列隊，並撕去部分大字報。左派群眾喝罵防暴隊爲「走狗」，又向警車投擲石頭及玻璃瓶，警車和防暴隊匆匆撤走。群眾指電車站站長長期充當「港英走狗」，屢次向警方「通風報訊」，遂將他從電車總站揪出來，將一桶紅油迎頭倒下。左派群眾將英皇道上的交通燈搗毀，又打破了電車總站所有玻璃窗，並襲擊一名仍然照常工作的電車司機。當時左派大罷工尚未結束，仍然繼續上班的巴士及計程車司機經常成爲左派滋事者的「打擊對象」，左派當時就曾提出「堅決嚴懲破壞罷工份子」。群眾燒毀了停在《天天日報》報社門前的該報採訪車，又縱火

焚燒一輛巴士。防暴隊施放催淚彈驅散示威者，騷亂直至凌晨才受到控制。由於左派滋事者常以國貨公司作掩護，警方數度掃蕩北角華豐國貨公司等左派據點。左派報章形容左派群眾發動了「威力無窮」的「人民戰爭」。

其後數天不斷出現左派群眾襲擊警察事件，警察通常遭石頭、硫酸襲擊，左派群眾更在香港市區多處向行駛中的巴士投石。當局於七月十一日宣佈港島北部實行宵禁。當天晚上，左派群眾與港英防暴隊在北角華豐國貨公司發生衝突，左派報章形容為第一場「陣地保衛戰」。當天下午四時，左派群眾在北角英皇道集友銀行附近一間空置的鋪位貼上大字報，要求華警「掉轉槍頭」：「華警兄弟們：我們都是同胞兄弟，目前是對外的民族鬥爭，你們在警局受洋人壓迫，你們的父母兄弟姊妹都是中國人，只要你們不殺害同胞，我們始終都以同胞兄弟看待你們，希望你們看清局勢。」警察迅即將大字報撕去。由於左派群眾以附近的華豐國貨公司作掩護，防暴隊晚上七時許向華豐施放二十多枚催淚彈及燃燒彈，並將該公司重重包圍。根據左派報章報道，華豐職員與防暴隊周旋十三個小時，「最終打退了敵人」，七名職員在衝突中受傷。

七月十二日，一批左派群眾在港島筲箕灣道一所郵局投擲魚炮。當晚八時許，一批左派示威者在九龍旺角彌敦道與山東街交界高呼口號，並用石灰在馬路塗寫反英標語。根據《明報》的報道，「彌敦道的交通全部受阻，車人爭路，加上看熱鬧的人越來越多，旺角頓成混亂，嚇得酒樓、商店及民房紛紛關門，地王所在迅成死市」。

鬥委會發言人讚揚左派群眾的行動，指「七月八日的沙頭角反擊戰，我國軍民和沙頭角愛國同胞痛殲頑敵；九、十日一連兩天，我愛國工人、學生和革命群眾紛紛上街，採用各種方式加倍反擊港英，反英抗暴烈火越燒越猛，港英法西斯當局無法抵擋來自四面八方的群眾反擊」。鬥委會發言人呼籲左派群眾「再接再厲，把刀鋒對準港英法西斯強盜及其走狗，窮追猛打，決不留情」。¹¹²

但非左派傳媒猛烈批評左派群眾的行動。《明報》社評形容香港淪為「恐怖世界」，「人人自危」，「到底本港廣大市民的生命和安全還有甚麼保障？」。《明報》呼籲左派領導人立即制止這些「與廣大市民為敵的恐怖行爲」，同時促請政府「立即採取有效的對策，恢復治安與和平」。該報認為：「這些恐怖行爲如果繼續下去，香港非垮不可。所有居住在香港的人，不論是港英當局，左派人士還是普通市民，人人都跟着一起垮。¹¹³」

七月十二日，署理布政司何禮文在立法局會議表示：「現在正有一小撮人決心破壞我們花了巨大心血建立的香港，這一小撮人不尊重法律，只致力於暴亂行爲。以上周末以來的事件判斷，我們似乎已進入一個暴動與恐怖的新階段，因為這些人已只求目的，不擇手段了。這種對抗無疑將持續多時，而拖延越久，公眾和商業的信心受影響越大，我們多年來持續不斷的社會經濟發展，將停滯不前。」他表明「爭取主動的時間已經來臨」，「我們深信我們將獲得絕大多數社會人士的支持，並對最後的結果充滿信心」。

港英當局大舉反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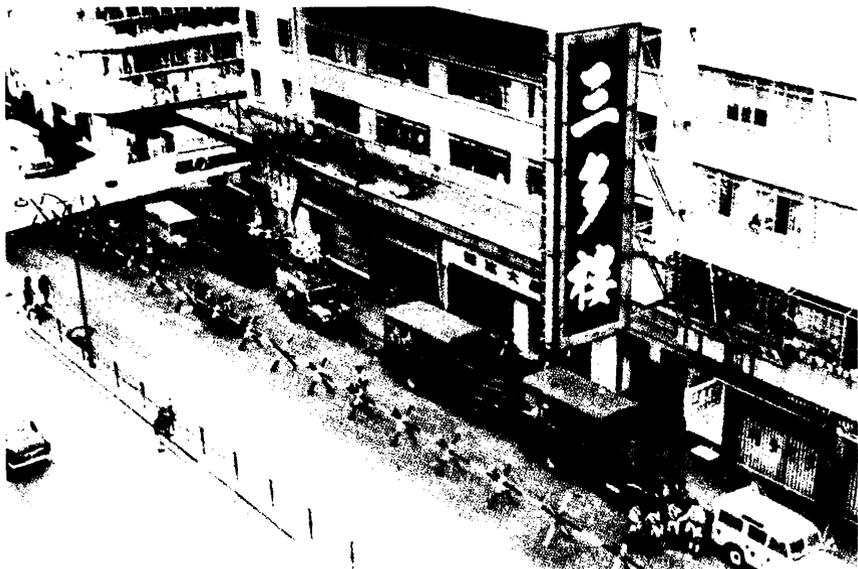
港府果真坐言起行，當天晚上在港島和九龍實施宵禁，並於晚上派防暴隊突襲左派港九摩托車業職工總會和香港巴士分會會址，並首次出動英軍配合警方的行動。七月十四日，港英軍警圍攻九龍船塢勞工聯合會會址和紅磡勞工子弟學校。六十名左派工人組成「戰鬥隊」，向軍警投擲玻璃瓶、硫酸液體、石塊，阻止軍警進攻。軍警花了三個小時才攻進工會會址，工會書記何楓在這場「陣地戰」中喪生，八十一名工人被捕。

七月十五日下午，左派學校師生前往港督府，抗議港英當局突襲紅磡勞校，警方拘捕了在現場採訪的新華社記者陳鳳英及陳德穆。陳鳳英後來被判處入獄，六七事件結束後一直在新華社香港分社任職，九十年代初期出任新華社社長助理及九龍地區辦事處主任，負責婦女

事務，是新華分社內少數受重用的本地幹部。陳九八年十月獲擢升為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

七月二十二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英帝強盜休想逃脫嚴厲的懲罰》的評論員文章，譴責港英拘捕陳鳳英、陳德穆兩人。文章指「來而不往非禮也，對於英帝國主義的挑釁，中國人民必須給予相應的回擊」。中國外交部新聞司宣佈，由於港英當局對新華社記者進行「無理迫害」，中國政府決定限制英國路透社駐京記者格雷的行動自由，「聽候處理」。

七月十六日，港英出動數百名軍警，搜查太古船塢華員職工會福利部、太古車糖工會福利部和五金業總工會香港支部，左派工人則以魚炮還以顏色，與軍警「血戰」兩小時。港英當局在當天的突擊行動



七月十六日，港英出動武裝軍警逾千人，圍攻港九會聯合會工人俱樂部，破門入內，並衝入樓下的三多茶樓等處，捕去左派群眾三百多人，並封鎖該區二十六小時之久。

中，合共拘捕八百四十多名左派人士。七月二十四日，警方夜搜位於九龍仔桃源街的香島中學，警方事後聲稱在現場檢獲數十萬張傳單，二十八個防毒面具和四十一對護目鏡。

港英攻佔左派據點後，均會向傳媒展示搜獲的「攻擊性武器」。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梁上苑表示：「港英當局在黑夜攻襲左派社團，其實含有試探用意，以證實左派是否藏有武器，以及北京當局是否向香港左派供應武器。但搜查結果只有演戲用的木槍、木劍之類，港英官員故意把這些道具搬到馬路上，叫記者拍照，聲稱這些就是『非法藏有的攻擊性武器』。港英拿這種虛言巧語來掩飾其殘暴的罪行，明明白白是在做秀。」

市政局議員葉錫恩相信當年確有警方陷害的事情：「有人把武器放在他們要消滅的人的家裏，然後跑去向警察報告，讓警察大搜房子。一位退役警察告訴我，有時候警察去搜那些所謂左派人士的房子，連需要的武器也帶去，然後就說武器是從房子裏面搜出來的。」¹¹⁴

當年港英警察幾近草木皆兵，執法期間時有寧枉毋縱的心態，一些無辜市民也成為警方濫權的犧牲品。五月十二日晚上，新亞書院物理系二年級學生周樹源與同學踱步至土瓜灣馬頭角道與譚公道交界，一隊手持警棍的防暴隊員趨前驅趕他們，周身上多處挨了警棍，直至鮮血從他頭上沿雙頰流下，防暴隊才住手。他憶述說：「我再三表示身分，但換來的是『五蚊鷄』（耳光）和『矮瓜』（警棍）。與我同時被捕的年約十五歲的燈泡工人也受到同樣對待。到了九龍城警署旁的空地上，我們被命令蹲下來，防暴隊員用皮鞋、手肘來毆打我。」周樹源當晚被控晚上九時四十五分在九龍城宋皇台道與某人「參與非法集會」，但那時他還在校內溫習功課。他其後被關押拘留所，錯過了中期考試，因而要留級一年。¹¹⁵

《學聯報》對警方在鎮壓騷亂期間的濫權行為，表示關注。該報社論批評部分警務人員對疑犯隨意拷打，有違自由原則。雖然《學聯報》贊同當局搜查左派工會和實施緊急法例，但希望這些行動僅屬維

持治安的不得已手段，「而並非是要以法西斯手段肅清那些持有某種政治信念的人」，又呼籲警方「不可對未經審判的疑犯濫用私刑」。

《香港年報一九六七》形容七月十二日為「轉捩點」，因為港府從此「反守為攻」。根據鬥委會出版的刊物統計，七月十一日至八月四日期間，港英當局合共突擊六十個左派單位，包括港九工人俱樂部、政軍醫華員職工會、工人醫療所、華人革新協會、裕華國貨公司等，五名左派群眾喪生，逾一千五百人被捕。鬥委會發言人則形容港英自七月十二日開始的突擊行動為「暴行巡迴表演」，並表示：「港英現在宣佈繼續執行和擴大高壓政策，結果必然敗得更慘。」鬥委會又號召「港九同胞進一步團結起來，全面投入戰鬥！堅決採取各種鬥爭方式放手地幹！放膽地幹！決定香港命運的是我們，敵人不投降，就叫它滅亡！」

左派各業工人鬥委會也發表聲明，指「敵人已經走投無路，我們必須加緊進行鬥爭，在每個地方，用各種方法，掀起更大的抗暴新高潮，致敵死命，絕不讓死期將近的港英法西斯當局有任何喘息的機會。」，鬥委會又誓言為在突擊行動中的左派死難者「報仇」和「討還血債」。聲明又指出：「今天的鬥爭，是香港同胞按照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所指示的『人民戰爭』的原則進行的。全港愛國同胞已經進一步組織起來，每條街道，每個地區，都是反英抗暴的戰場。我們就是汪洋大海，你們不投降，就要把你們浸死。」¹¹⁶

左派群眾在鬥委會號召下，不斷將行動升級。七月十四日，筲箕灣東大街口的警崗被遭魚炮炸毀，一輛警車也在九龍東頭邨被魚炮襲擊。七月十五日，左派群眾在新界荃灣眾安街、大河道集結，向防暴隊投擲魚炮及鎊水瓶。港英當局為了針對左派滋事者經常使用的鎊水和魚炮，於七月二十二日特別頒佈一項緊急法令，規定任何人藏有鎊水瓶或炸彈均屬違法，而經常出入藏有軍火、彈藥、攻擊性武器、爆竹或腐蝕性液體的場所，或在這些場所被發現的人士，即屬違法，最高可被判入獄兩年。法例又規定，任何人如自願與持有攻擊性武器而

有意用作非法用途的人士同行者，亦屬違法。

港英當局除了突擊左派社團據點，又開始拘捕左派陣營具影響力的人物。七月十五日凌晨四時許，港英警方前往左派影星傅奇、石慧夫婦位於九龍又一村的寓所，將兩人拘捕，並關押在港島西環摩星嶺集中營。七月十八日晚上，防暴隊搜查華人革新協會會所，並包圍該會秘書蔡渭衡寓所，將他押送往摩星嶺集中營。港英當局又於七月二十一日清晨拘捕鬥委會常委、中華總商會司庫湯秉達。八月四日清晨五時許，港英動員七連警員、七排英軍、大批便衣探員及三架直升機從陸空兩路進攻北角僑冠大廈，這是當局五月騷動以來對左派進行的最大規模的搜捕行動，軍警在行動中拘捕了漢華中學校長黃建立和華豐國貨公司經理吳麟華。這幢大廈是不少中資機構僱員的聚居地，地下至三樓由華豐國貨公司佔用，被視為左派大本營。

七月十五日，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梁威林發表語氣強硬的聲明：「目前香港同胞反英抗暴的形勢好得很，一個抗暴的新高潮已經到來！一場致你們於死命的偉大戰鬥正在開始，既然你們已經用種種陰謀毒辣的手段，把迫害中國同胞的暴行升級，我們港九愛國同胞就取得了採取各種各樣辦法反擊你們的權利。你們要打到甚麼水平，我們愛國同胞就打到甚麼水平，堅決奉陪到底，毫不吝嗇自己的力量。」鬥委會也於同一天發表聲明，呼籲左派群眾「武裝起來」。鬥委會指出：「港英的全面升級鎮壓，必然激起我愛國同胞的全面升級反抗。既然港英如此不計後果地對我愛國同胞實行軍事鎮壓，那麼我們就更加取得主動，更加有權武裝起來，拿起各種可以作戰的武器，給這些殘暴兇狠的野獸以狠狠的反擊，予以雙倍的懲罰。我們警告港英法西斯當局：你們不要以為採取軍事鎮壓行動就可以把我們的愛國機構逐個擊破，還是當心你們自己的腦袋吧，如不低頭認錯，我們是懂得如何來收拾你們的。」¹¹⁷

七月十六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香港愛國同胞再接再厲堅決鬥爭》的評論員文章，稱讚香港左派的抗爭行動「幹得好，幹得英

勇，幹得漂亮」。文章表示：「香港愛國同胞前期的反英抗暴鬥爭，已經給了英帝國主義以沉重打擊。但這只不過是初露鋒芒。應該更加放手發動群眾，更好地把群眾組織起來，再接再厲，堅決鬥爭。」這篇文章又指出：「七億中國人民正在密切注視港九愛國同胞的反英抗暴鬥爭，並且決心用一切必要的方式，給予港九同胞以全力的支援，直到取得最後的勝利。」

七月二十日，鬥委會發言人發表談話，提出「應當更加放手，更加深入地動員和組織群眾，痛打落水狗，不要讓它稍有喘息的機會。我們還要更多點燃幾個火頭，更多開闢幾個戰場，牽制和困擾疲

勞之敵，以配合工人聯合大罷工的主要戰場。」發言人聲言「港英帝國主義現在只是困獸猶鬥，它的壽命已經不長了」。¹¹⁸

踏入七月中旬，炸彈成為左派群眾的主要武器。七月十二日響起了第一道土製炸彈聲，當天下午五時許，新界大埔墟戲院街大埔鄉事委員會被一枚定時炸彈襲擊，無人受傷。黃大仙警署翌日也受到炸彈爆炸，但沒有造成嚴重損害。七月二十六日早上，一枚土製炸彈在上環屈地街電車總站爆



警方在警署門外加設鐵絲網及沙包，防範滋事者放置爆炸品。

炸，九名候車市民被炸傷。當晚旺角、觀塘、尖沙咀漆咸軍營、筲箕灣警署等八處地方出現炸彈爆炸事件，一輛駛經旺角彌敦道的警車遭擲土製炸彈，一名左派群眾被警員擊斃。

左派報章對這些爆炸事件拍手叫好，認為是左派群眾「多點火頭，多闖戰場」的表現，港英疲於奔命，「這八聲爆炸聲大長港九同胞的志氣，大滅港英法西斯的威風，贏得廣大同胞的齊聲讚好」，更形容土製炸彈為「懲港英炸彈」。¹¹⁹「港英軍警面對那些真真假假的『貨色』，戰戰兢兢，疲於奔命。群眾目擊港英醜態，樂得心花怒放，不住口稱讚抗暴戰士幹得好，幹得妙！」¹²⁰鬥委會發言人也持肯定態度，認為：「最近我抗暴英雄採用人民戰爭遍地開花的鬥爭方式對付港英，使它備受困擾，疲於奔命，狼狽不堪。我們還要再接再厲，更加放手發動群眾，發揮群眾的無窮智慧，在各方面採取更多的抗暴行動，對準港英和一小撮漢奸走狗狠狠地痛擊。」¹²¹各業工人鬥委會更「嚴正警告」港英當局：「全港愛國同胞已經進一步組織起來，每條街道，每個地區，都是反英抗暴的戰場。我們就是汪洋大海，你們不投降，就要把你們浸死。」¹²²

七月二十七日，兩枚土製炸彈在港島波斯富街電車廠爆炸，「火煙直衝，高達三樓」，兩輛電車被炸毀。七月二十八日晚上十時，警方發現北角國都戲院附近街燈懸掛着一鐵罐，內藏土製炸彈，警方軍火專家及時到場引爆。港府又在港島多處發現可疑物品，上面寫有「同胞勿近」、「生人勿近」等字樣，但這些假炸彈已令警方疲於奔命。由於土製炸彈真假難辨，香港市民形容為「真真假假菠蘿陣」，有時真假炸彈一天多達十多個。六七年八月，黃綺文、黃兆勳兩姊弟在北角清華街遭土製炸彈炸死，激起極大民憤。立法局非官守議員簡悅強建議政府對涉及投擲炸彈罪行者，處以死刑。八月二十八日，一名陸軍軍火專家在九龍獅子山引爆一枚炸彈時，被炸彈衝力拋下二百多呎山坡，重傷不治。九月三日，港島灣仔發生炸彈爆炸事件，灣仔消防局副區長簡文（英籍）被炸死。

「真假菠蘿陣」引起香港市面一片恐慌，警方一旦發現可疑物品，立即封鎖附近街道，並召軍火專家到場引爆。「真假炸彈」出現後，往往擾攘幾個小時，對市民上下班造成極大不便，市民對左派怨聲載道，無不破口大罵左派為「左仔」、「衰仔」，「真假菠蘿陣」顯然令左派徹底失去民心。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副所長劉兆佳認為，任何集體行動走向激進化，反映運動步向尾聲，更快失去民衆支持。

一些左派人士也批評放炸彈的極端手法，鬥委會常委廖一原認為：「菠蘿陣嚴重影響廣大市民的生計和生命安全，北角兩姊弟更被炸死，市民人心惶惶。抗爭的原意是保護同胞的合理權益，目的不是要推倒港英。擺菠蘿陣首先損害的不是英國，而是廣大群眾的利益。」他表示，隨着鬥爭升級，中間群眾越來越疏離，不支持左派甚至非常反感。他說：「我認識的一些非左派朋友跟我說，左派這樣搞影響他們上班和日常生活。在這種情況下，左派已逐漸失去廣大市民群眾的支持，鬥爭是註定失敗的。」三聯書店副經理蕭滋當時在赤柱監獄服刑，他聽到左派群眾放置土製炸彈的消息，反而希望「事態搞得越大越好」，盼望能早日出獄。他說：「當時即使左派採取過激行為，我也不覺得不妥。」

左派外圍報章《香港夜報》社長胡棣周認為，左派佈置炸彈陣是運動漸漸失控的表現，是左派明知必敗下的孤注一擲。當年左派無法動員一般市民上街，能發動起來的都是左派陣營中人，示威遊行來來去去只有兩萬人左右。香港左派得不到北京全力支持，也可能令左派領導人鋌而走險。他表示：「我不知道誰作出放炸彈的決策，但當時工人階級受港英不斷鎮壓後，情緒非常激動，而新華社領導層的心態是事情越鬧越大，形勢越亂越好。」

當時胡棣周對這種極端做法非常反感，菠蘿陣更令市民異常反感，也導致左派社會形象受損，迅速失去民心。他認為：「放炸彈令香港人覺得左派將事情政治化，而不是真正關心勞工利益。」《明

報》七月二十八日社評認為：「港共種種作為，都是以損害廣大群眾為目標。少數搗亂份子一開始便和廣大群眾為敵，失敗的命運早已註定了。」但一些左派人士相信，部分「真假炸彈」其實是港英「插槓嫁禍」的。胡棣周指出，當年一些炸彈放置在國貨公司門外，「如果我是左派，那會放炸彈害自己人？」

雖然左派領導層在暴動結束後否認「真假菠蘿陣」與他們有關，但鬥委會六八年初出版的《香港風暴》一書，對群眾使用土製炸彈等暴力手段頗為認同：「我各路抗暴大軍，各出奇謀，互相呼應，困擾疲敵。除了集會、遊行、街頭宣傳演出、發傳單、掛標語、插紅旗、放汽球等『文鬥』之外，港島西區、灣仔和九龍的深水埗、九龍城、荃灣等地區，群眾也紛紛出擊，繼續打『街頭游擊戰』，有時一夜就有六、七處『戰場』，燃燒着抗暴的烈火。」該書表示，「抗暴戰士」在「戰場」上開始使用魚炮、土製炸彈等武器，「這也是敵人迫出來的」，「港英法西斯既然用槍炮來鎮壓愛國同胞，『來而不往非禮也』，我抗暴戰士也只好按照敵人的方法，拿起武器，照樣辦理。『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該書又嘲諷港英「玩火自焚」，「它的暴力鎮壓機器屢挨炸彈，那是咎由自取，活該！各區到處出現的真真假假炸彈陣，搞得它坐臥不寧，草木皆兵，出盡洋相，吃盡苦頭，苦果自嚐，也活該！」。¹²³

港英當局為了針對左派佈下的「菠蘿陣」，先後於九月六日和八日頒佈兩項緊急法令，規定「任何物品如在公共地方發現時，可能引起合理的恐懼」，即可被視為「炸彈」，有關人等可被控「藏有假炸彈罪」。而爆竹及煙花也被列為「違法物品」，不准售賣和收藏，違者可被判刑。炸彈浪潮由七月底至十二月底持續不斷，直至十二月底才漸告平息。根據香港政府的統計，警方在六七暴動期間共處理八千零七十四個懷疑炸彈物體，其中一千一百六十七個屬「貨真價實」的炸彈。¹²⁴

港府指左派學校學生在教師教唆下參與炸彈襲擊，大批左派學生

因懷疑藏有爆炸品被捕。六七年十一月，左派中華中學實驗室發生爆炸，一名學生被炸傷，港府事後封閉中華中學。但鬥委會副主任委員、漢華中學校長黃建立否認校方教唆學生製造和放炸彈，但他不排除個別學生「受別人唆擺」而放炸彈。時任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的梁上苑則對筆者明確指出，當年一些左派學校學生確有研製炸彈，不能說是「受人唆擺」，但也許只是個別學校或個別學生在研製。

左派滋事者放置炸彈，究竟是左派群眾放任自流，還是新華社或個別激進幹部鼓動的結果？了解香港左派運作的梁上苑指出：「在反英抗暴的整個過程中，一切的鬥爭都是港澳工委所領導的有組織行動，真假菠蘿陣也不例外。不管是誰提出建議，是誰進行鼓動，應該說都是新華社領導的鬥爭。」他表示，港澳工委經過六、七月份熾熱的鬥爭，施展出罷工、罷市的殺手鐮，仍然對港英起不了致命打擊的作用，港澳工委領導人正無計可施之際，才想出這並不高明的一招。

他指出，港澳工委事前沒有向北京請示，就擅自主張發動炸彈攻勢，但國內始終不供應炸彈和火藥，導致大部分炸彈是假的，近乎胡鬧。梁上苑指出，「菠蘿陣」弄得港英警方疲於奔命，新華社副社長祈烽卻洋洋得意，認為這是「絕招」，可以「為城市鬥爭提供新的革命鬥爭方式」。一位前新華社官員也對筆者說：「中央不支持香港左派搞炸彈陣，否則炸彈會貨真價實，那會來假的？」他又表示，「反英抗暴」後期一些非左派也參與其中，「連新華社也控制不了」。

第九章 林彬事件與火燒英代辦處

踏入六七年八月，一些左派群眾編印的地下小報刊登暗殺名單，對象為一些支持港英當局的知名人士，其中包括三名行政局議員，以及香港工業總會主席鍾士元，《明報》社長查良鏞也曾成為左派的暗殺對象。這些人士一度受到警方的特別保護，結果均平安無事。商業電台播音員林彬，卻成為六七事件期間唯一被殺害的知名人士。

由於商業電台不少節目對左派冷嘲熱諷，左派對商台早已恨之入骨，更謔稱商業電台為「傷孽電台」。八月二日，《文匯報》刊登署名「屠狗輩」的「讀者來信」，指責商業電台「自甘墮落成爲民族敗類」，一些節目「對港英的暴行每次都歌功頌德，對我愛國同胞極盡詆毀污蔑之能事」。這封來信指「這所與人民爲敵的電台，已經可恥地淪爲港英喉舌，幹起反人民的勾當了」，警告商業電台「好好地爲自己的前途墊高枕頭想想吧」。而林彬主持商業電台節目《欲罷不能》和《大丈夫日記》，對左派騷動行徑極盡挖苦諷刺之能事，頗受聽眾歡迎。

六七年八月二十四日早上八時，林彬與宗兄弟林光海，駕車離開九龍窩打老道寓所，準備到商業電台上班。車輛途中被兩名暴徒投擲汽油彈，汽車前座着火焚燒，兩人送院後先後不治。一般相信，林彬遇襲與他在商業電台批評左派的言論有關。連同林彬在內，四名市民先後被左派放置的炸彈炸死。商業電台取消當天所有節目，改播哀樂，以示悼念。商業電台董事經理何佐芝發表聲明，譴責左派「暴徒」的「殘暴勾當」。他表示：「暴徒顯然對商業電台努力揭發他們的殘害市民及破壞本港安寧的醜惡活動，害怕得要死，因而採取這種滅絕人性的手段，以圖恐嚇本台及工作人員。但左派暴徒今日的殘忍手段，決不能動搖本台及各同寅反對暴力的正義立場，我們一定會更

加努力，在各方面協助當局救平騷亂。」¹²⁵

左派報章則形容林彬為「反華特務」，並指責「美蔣報刊」利用林彬之死，「公然揚言要為林彬報仇」。八月二十四日下午出版的《新晚報》，以套紅大標題刊登題為「鋤奸突擊隊司令部，懲林彬後發表公告」的文章，並宣佈林彬的「罪狀」。六七年九月八日開始，香港一些地區出現由「地下鋤奸突擊隊司令部」發出的通告，聲稱已「應港澳愛國同胞的要求」，對商業電台播音員林彬「執行民族紀律」，聲稱林彬遇害是其所為。通告內容如下：「民族敗類林彬，一貫仇視和反對我們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充當美、英帝國主義的走狗。在這次港九愛國同胞反英抗暴鬥爭中，林彬為英帝反華賣命，並在商業電台對英勇抗暴的愛國同胞極盡造謠誣蔑之能事。英、美、蔣反動派亦已供認林逆為反共反華的死心塌地分子，罪惡昭彰。雖經我愛國同胞多次警告，但林逆死不悔改，甘心認賊作父，自絕於我中華民族，為維護民族尊嚴，伸張正義，應港澳同胞的要求，由我司令部執行民族紀律，於八月二十四日晨將林逆正法。」

「司令部」表明「堅決打擊一小撮英帝國主義者和極少數死心塌地為英美帝國主義效勞的民族敗類」，對這些與「港九愛國同胞和祖國為敵到底的首惡分子」，定將「嚴懲不貸」。港九各業工人鬥委會發表聲明稱：「為了回擊港英法西斯的迫害，為了替死難同胞報仇，我們必須採取一切必要有效的手段進行自衛反擊，以暴抗暴，狠狠地懲罰港英帝國主義份子，以及一小撮死心塌地助英為惡的民族敗類。」¹²⁶

林彬遇害事件令市民對左派更添反感。《明報》社評認為：「港共以罷工、罷市等正當手段所無法達到的目標，絕對不能以擲炸彈、放火暗殺等卑鄙殘暴的手段來達到。殺害一個林彬，使得無數本來不理政治、不懂政治的普通市民產生對港共強烈的憎恨。」¹²⁷《香港夜報》社長胡棣周同意左派群眾燒死林彬是不對的，但他認為林彬在電台節目中的言論實在太尖酸刻薄了，達到人身攻擊的地步。

殺害林彬的兇徒逃之夭夭，警方至今仍未能將兇手緝拿歸案，這

宗案件仍屬懸案。一位接近左派陣營的人士表示，兇徒並非一般暴徒，極可能是左派中的「高幹子弟」。

三報事件觸發紅衛兵鬧事

八月九日凌晨，港英警方逮捕左派外圍報章《香港夜報》社長兼《新午報》董事長胡棣周、《商報》督印人兼南昌印務公司董事長李少雄、《田豐日報》社長潘懷偉及督印人陳艷娟、南昌印務公司經理翟暖暉，並勒令《香港夜報》、《新午報》及《田豐日報》停刊。《文匯報》社論批評港府拘捕胡棣周等人和勒令三家報章停刊，是「徹頭徹尾的法西斯暴行，徹頭徹尾的民族壓迫」，要求立即釋放胡棣周等人，並撤銷對三報的停刊令。

港府宣佈以「刊登煽動性文字」的罪名控告胡棣周等人，並指《香港夜報》六月報道香港鯉魚門海面出現中國軍艦為「發放虛假消息」。中國外交部西歐司負責人八月二十日晚傳召英國駐華代辦霍普森，轉交中國外交部的緊急照會，要求英國必須在四十八小時內撤銷對《香港夜報》、《新午報》及《田豐日報》的停刊令，並無罪釋放胡棣周、潘懷偉、陳鳳英等十九名左派報章記者，否則英國政府必須對此承擔「一切後果」。但霍普森即時拒絕了北京的要求。

《人民日報》也於同一天發表題為《香港是中國的領土》的評論員文章，表明「今天的時代已經不是當年英國殖民主義霸佔香港的舊時代了。香港同胞有了強大的社會主義祖國作為自己的靠山，怎麼能設想，香港將永遠是英帝國主義的天下呢？」文章又強調：「中國人民對英帝國主義野蠻鎮壓我香港同胞的法西斯暴行，絕對不能置之不理。今天香港的命運掌握在中國人民和香港同胞的手中，絕對不容許英帝國主義在香港橫行霸道！」《人民日報》八月二十一日再次發表評論員文章，題為《揭穿英帝的狡詐咀臉》，警告英國必須接受中國外交部的要求，否則英國要承擔「一切嚴重後果」。

北京要求英國四十八小時內釋放胡棣周等人，是中共四九年建政

以來發出的第二份具有「最後通牒」性質的外交照會。首個類似性質的照會是五八年周恩來要求美國在北京指定的限期內指派大使，恢復已中斷的中美華沙大使級會談。在外交層面提出「最後通牒」是非常嚴重的事情，下一步可能就是開戰。但據說北京的底牌只是將英國駐華代辦處負責新聞工作的二等秘書驅逐出境。

中國外交部向英國發出「最後通牒」式的照會，顯然與外交部被「造反派」奪權有關。八月七日晚上，中共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召見外交部「革命造反派」代表，表示「堅決支持」造反派。外交部造反派在王力「八·七講話」鼓動下，於八月十九日衝進外交部政治部，宣佈奪取外交部大權，又強行封閉了所有外交部副部長辦公室，副部長喬冠華、姬鵬飛白天均關進地下室寫「檢討」。整個外交部的工作一度陷入混亂，一直由周恩來掌握的外交大權落入造反派手中。¹²⁸

自稱參與北京對左派「反英抗暴」決策過程的余長更指出，中國外交部向英國提交的外交照會其實是周恩來親自批准的，當時周沒有充分考慮照會可能引發的後果。¹²⁹梁上苑則指出，最後通牒按慣例應由外交部長甚至更高級的領袖批准，因為下一步要開戰。他說：「但當時是文革混亂時期，最後通牒是否經周恩來批准，我不知道。但我估計沒有得到周批准。」羅孚也相信，周恩來富於外交經驗，不會如此冒失。

八月二十二日，北京外交部造反派、北京外國語學院紅衛兵及一些工廠造反派成立「首都無產階級革命派反帝反修聯絡站」，並決定當晚到英國駐華代辦處門前示威抗議。踏入黃昏時份，四十八小時限期屆滿，但英國仍然拒絕北京的要求，紅衛兵衝進代辦處，並焚毀了代辦處建築物。根據嚴家其《中國文革十年史》的記載，六七年八月二十二日晚，「首都無產階級革命派反帝反修聯絡站」牽頭組織了「香港英國當局迫害我駐港新聞工作者事件」，在英國代辦處門前召開了「首都無產階級革命派憤怒聲討英帝反華罪行大會」，發生了衝進英代辦處進行打、砸、抄活動和火燒了汽車及代辦處辦公樓的嚴重

外交事件。¹³⁰英國政府採取報復行動，限制中國駐英代辦處官員的行動。但英國外相布朗表明無意因這次事件而與北京斷絕外交關係。

這次事件是文革期間北京外交政策受到極左思潮干擾的突出例子，更是中共四九年建政以來最嚴重的一起涉外事件。文革開始一年多以來，與北京建交或半建交的四十多個國家中，北京與其中三十多國發生外交糾紛。¹³¹六七年六月底至七月初，周來來兩度勸阻造反派衝擊緬甸駐華大使館的行動，但由於八月十九日以後外交部被造反派奪權，外交工作處於無政府狀態，周恩來這次未能及時攔阻。根據中央電視台播映的電視紀錄片《周恩來》，周恩來爲了糾正造反派的過激行爲，當晚聯名廣播，反覆勸說，並派解放軍保護英代辦處。

八月二十三日凌晨三時，周恩來召集外事口各造反派組織的負責人到人民大會堂接見廳，嚴厲批評造反派火燒英代辦處的行徑。他表示：任何受過一點教育的人都懂得，外交使團辦公處是不可侵犯的，駐在國政府有責任保護外國外交人員的人身安全。他指出，在外交關係上還是要實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¹³²他又批評造反派的行動是「無政府主義」，造反派卻反駁說「對帝國主義不能絲毫退弱」。周恩來氣憤地站起來說：「你說不能絲毫退弱，你是不是打算今天就要收回香港？採取一個甚麼行動中央決定了還得請示毛主席，我都不能定，你們隨便一個甚麼戰鬥隊就定了？」

周恩來親自向英國政府道歉，並指示外交部負責修復英國駐華代辦處。由於火燒英代辦處事件是違反外交準則的嚴重事件，北京既不能肯定，也因時值文革而不便公開否定，結果在報道事件時使用了模稜兩可的說法。新華社這樣報道當天的事件：被英帝國主義瘋狂迫害我香港愛國同胞的法西斯暴行激怒了的首都紅衛兵和革命群眾一萬多人，今晚（八月二十二日）湧到英駐華代辦處舉行聲勢浩大的示威，在門前舉行了聲討英帝反華罪行大會，並且「激於義憤」，對英駐華代辦處採取了「強烈的行動」。¹³³

七〇年十二月，毛澤東提到外交部「造反派」奪權和火燒英代辦

處事件，表示：「六七年七月和八月兩個月不行了，天下大亂了」，「外交部就鬧得一塌糊塗，有一個半月失去了掌握，這個權掌握在反革命手裏。」毛澤東又於七二年六月批判「林彪集團」期間，批評「極左派」：「我們的『左派』是甚麼人呢？就是火燒英國代辦處那些人，今天要打倒總理，明天要打倒陳毅，後天要打倒葉劍英。」根據北京紅旗出版社出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通鑑》，毛澤東「後來明確指出，火燒英國代辦處是壞人指揮群眾搞的」。¹³⁴

一九七一年，周恩來與緬甸國家元首奈溫會面時，談到火燒英代辦處事件。他憶述說：「運動發展到八月份，外交部也受到了極左思潮的影響，壞份子鑽進去了。群眾包圍了英國駐華代辦處，（對群眾的衝、燒行爲）我們事先毫無所知，等我知道了時，已經來不及了，燒起來了。當時我們下命令要群眾離開，那些壞人不聽。一個有趣的事情是，我們廣播命令時，英國代辦聽到了，他相信這是我們政府的意見，他就找我們解放軍保護，結果他沒有受傷。」¹³⁵

七一年春，英國駐華代辦處修復工程竣工，英代辦處官員遷進新居。周恩來指示外交部負責官員在招待會上當面向英國駐華代辦說：「六七年火燒代辦處是一小撮壞人幹的，中國黨和政府都不贊成。現在我們給你們修復了，你們遷入新居，讓我們舉杯慶祝。」但這名官員因招待會有許多外國使節在場，沒有把周恩來吩咐的說話說出來。周恩來獲悉後批評他說：「你本人也是當時極左思潮的受害者嘛，這些話你爲甚麼不說？當着其他大使說有甚麼要緊？而且還應該大聲說！」周恩來又表示：「我們在外交上實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雙方是平等的。人家來到我國，我們用壓的辦法是不對的。英方在香港迫害我們的同胞，那是它不對，但不能因此而燒它的代辦處。你搞他，它可以報復，那只能破壞外交關係，甚至斷交。那是王（力）、關（鋒）、戚（本禹）他們的路線。」周恩來其後召見英國駐華代辦，親自說出上述那番話。¹³⁶

中國政府就火燒英代辦處事件向英國賠禮道歉，港英當局因此摸

清了中共不會貿然收回香港的底牌，《人民日報》連月來的言論原來僅屬虛張聲勢。港英也斷定北京不會對香港左派陣營提供實質支持，遂放手鎮壓左派，左派至此敗象已呈。

火燒英代辦處事件，改變不了胡棣周等人入獄的命運。九月四日，胡棣周、潘懷偉、翟暖暉等人被判入獄三年，《香港夜報》、《新午報》和《田豐日報》也相繼被法庭判處停刊半年。鬥委會發言人九月五日發表談話，指「英帝國主義現在在本國和香港都處在很不利的情況，他們正在採取以攻為守的策略，以加深鎮壓的辦法來維持自己的反動統治。但這種掙扎是無濟於事的」。發言人又表示：「港英可以迫令我三家愛國報紙停刊，但數以百倍計的抗暴小報殺了出來，而且這些小報越辦越好。港英妄圖以攻為守，不過是螳臂擋車，蚍蜉撼樹，到頭來只能得到上絞刑台的下場。」¹³⁷



左派電車工人與防暴隊爆發衝突。

第十章 左派暴動進入尾聲

左派自九月中旬即大張旗鼓慶祝「十·一」國慶十八週年，慶祝活動持續至十月八日，「在鬥爭中熱烈慶祝，在慶祝中進行鬥爭」。工聯會決定要「更熱烈更隆重更廣泛深入慶祝今年國慶」，「同時把反英抗暴鬥爭進行到底」。九月十八日，鬥委會主任委員楊光在鬥委會常委會擴大會議上發表題為《反英抗暴鬥爭的形勢和任務》的講話，指左派「反英抗暴」是一場「侵略與反侵略的鬥爭」，是「中華民族一百多年來反帝鬥爭的繼續」，是「國際反帝鬥爭的一部分」和「偉大的革命運動」。他表示，鬥爭已給予英帝國主義在香港的反動統治以「沉重的打擊」，「奪取了巨大勝利」，今後還要繼續「放手發動群眾」。

但楊光同時提醒左派群眾鬥爭的「複雜性」：「我們還要看到英帝國主義霸佔香港已有一百多年的歷史，它在香港保持了一定的反動統治基礎，還有其他反革命勢力在支持它。從目前港英的部署看來，敵人還要繼續採取鎮壓政策，同時進行威迫、利誘、造謠、誹謗，甚至還會派遣特務奸細鑽進我們的隊伍，進行分化和破壞活動。鎮壓與反鎮壓的鬥爭，將會經過反覆的較量。」他指出，這場鬥爭的勝利「時間可能會稍為長一些」，「它的發展也不會直線上升，而是波浪式的前進，有時起伏，有高有低」，「對此應有思想準備」。¹³⁸楊光的言論似反映左派領導層發現港英當局實力雄厚，對能否鬥垮港英缺乏信心。但他仍然不忘要求左派群眾「要表現出無所畏懼的英雄氣概，要有不怕拘捕，不怕坐牢，不怕嚴刑拷打，不怕死的精神，要刀山敢上，火海敢闖」，「為了鬥爭的勝利，個人生死置之度外」。他說：「敵人最怕的不是別的，就怕我們這種精神原子彈。」

左派又宣稱，「被非法囚禁的二千餘名愛國同胞，不怕敵人的種

種殘酷迫害、折磨，在完全失去自由的情況下，分別舉行了隆重莊嚴的慶祝國慶儀式，「二千多顆紅心翻越鐵窗高牆，飛到了北京，飛到了毛主席身邊」。¹³⁹左派指港英當局出動大量軍警，「悍然撕毀和劫掠我國國旗，綁架、毒打、恐嚇參加慶祝活動的港九同胞」。左派爲了「反擊」港英「破壞國慶活動的罪行」，組織「戰鬥隊」上街遊行、插紅旗、散傳單，並到處放置真假炸彈，據說炸彈數量某天多達二百個。

鬥委會《戰鬥通訊》於九月底發表題爲《我們必勝，港英必敗》的文章，嘲諷「英帝國主義」「朝不保夕」，港英當局「衰弱不堪」，「正爲自己掘下墳墓」。文章認爲：「我們同港英進行堅決鬥爭，已鬥到它出現了重重的政治危機，並促進了它的經濟危機。兩者互爲影響，正在迫使港英的反動統治走向不能維持的絕境」。雖然鬥委會聲稱「我們必勝，港英必敗」，但港英當局始終沒有被左派鬥垮，左派騷亂踏入十月中旬後無以爲繼，雖然還不時出現零星的暴亂，但騷亂總算逐漸平息。

知情人士指出，六七年十二月周恩來下令香港左派不要再搞真假炸彈陣，爲時逾半年的「反英抗暴」也就隨之悄悄收兵。自稱曾參與北京對左派騷亂決策過程的余長更指出，周恩來六七年底指示外交部港澳辦公室就香港左派鬥爭進行總結，結論是這場鬥爭在極左思潮干擾下倉促上馬，脫離實際，沒有達到預期的目標。「反英抗暴」也就不了了之地結束，會議也沒有追究任何人的責任。作爲左派暴動主帥的梁威林，暴動結束後仍然擔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七七年十二月才調返國內，出任廣東省革命委員會副書記。而副社長祈烽八十年代中期退休後返回內地，曾出任廣東省政協副主席。兩人至今仍然健在，定居廣州，並與香港一些「老左派」保持聯絡。

一九六八年一月初，周恩來接見港澳代表時談到香港問題和六七年的左派騷亂。他說：「六、七、八、九四個月國內報紙對香港的宣傳是有毛病的，對香港用的口號同國內的差不多，把國內紅衛兵的口

號也用到香港問題的報道上了。」¹⁴⁰前《文匯報》總編輯金堯如憶述說，周恩來早在六八年春已下令新華社香港分社停止騷亂。當時周剛擺平全國各地的紅衛兵奪權武鬥，隨即抽身通知新華社社長梁威林和副社長祈烽赴京匯報「反英抗暴」的情況。祈烽中途返港，向金堯如轉述周恩來的指示：「你們的反英抗暴搞錯了，搞壞了。當然北京有人誤導，要負主要責任，我那時忙，也顧不到。」

周恩來又說：「我最近請示過毛主席，香港的形勢有甚麼變化？香港的政治地位會不會有甚麼變化？主席答道：香港的形勢和地位，我看沒有甚麼要變，還是保持現狀嘛！主席的話使我完全明確，他根本沒有甚麼指示或想法要改變香港的地位，要收回或解放它。在此之

香港風暴



前，北京有人給你們的有關指示或傳達，包括公開發表在《人民日報》的社論，現在都按我傳達的毛主席指示精神，認識這一切都是根本違反毛主席和中央的一貫正確的香港政策和對英政策。」

周恩來下令祈烽等返港後立即停止「反英抗暴」這一「錯誤鬥爭」，「立即糾正你們的錯誤決策和措施，立即動員和團結各界力量，共同恢復香港社會的穩定和工商各業的繁榮，要設法同港英開展和平商談，做好恢復香港和平、安定、繁榮的工作」。周最後表示：「你們還應該向你們領導下的各社團和機構，說明主席和我的意見，並向他們道

歉。對於一般幹部執行你們的指示辦事，廣大香港同胞、工人、農民和學生群眾，他們純粹出於愛國主義和民族感情的鬥爭行動，要同你們的錯誤明確區別。錯誤的責任是你們的，他們的行動是無辜的，他們的精神是可貴的。這是對待這次參加『反英抗暴』鬥爭的廣大香港同胞最根本的一條。」

一場代價沉重的「戰役」

六七左派騷亂是二次世界大戰以來香港最嚴重的社會動亂，港英政府、左派陣營和香港市民都付出了血的代價。根據港英政府的統計，八百三十二人在暴動中受傷，五十一人喪生，其中十五人被炸彈炸死。十名警員、一名英籍軍火專家及一名外籍消防員殉職。而根據左派陣營的統計，六七年五至十二月間共有二十六名市民喪生，四千九百七十九人被捕。¹⁴¹

為時七個月的左派騷亂，對香港經濟造成沉重打擊。對於事件造成的經濟衝擊，左派陣營與港英當局作出了南轅北轍的評估，左派大事渲染港英面對的經濟危機，港英則刻意淡化。鬥委會編印的《香港風暴》指出，香港經濟「百病俱發，危在旦夕」：「房地產業早已垮下來，全業貶值三十億元；旅遊業一落千丈；進出口貿易江河日下；工業危機四伏，關廠；減產、他遷的日多；商場倒風尤其凌厲；物價漲破二十年來的紀錄；股票市場空前慘淡，僅五月至九月股票價格便已跌去了十億元以上；銀行存款也大幅下降（估計已減少十五億元左右）；資金外逃勢如決堤（估計已逾十四億元）；港英財政收支赤字更逐月增大（據港英自供，四至八月份赤字已達七千餘萬元）。」左派認為港英的政治危機和經濟危機都大大加深，「它的反華活動和民族迫害，已使它自己走入了死胡同，陷入絕境」。

港英當局則提供了不同版本，《香港年報一九六七》指出，香港社會的效率「意外地沒有明顯受損」，工業生產沒有受影響，出口總額增長較上年度更高。即使一些海外報章作出了「過敏的報道」，旅

遊業經營情況仍然令人滿意。當地工廠因左派罷工損失的工作天，不多於一天半。

實際情況如何？六七年首十個月建築工程數目較上年度同期銳減四成，鋼鐵、水泥銷售量顯著下降。業界原先預期是年將迎來建築業興旺期，足以抵銷六五年以來的衰退期，但六七事件的衝擊令這個良好願望宣告泡湯。¹⁴²六七騷亂造成香港銀行存款一度銳減，五月底當地銀行存額總額為八十四億七千多萬港元，較四月底減少五億零一百八十四萬元。六七年十二月底香港銀行存款總額為八十一億六千二百萬港元，較六六年底減少二億四千三百萬元，跌幅為百分之二點八，顯示騷亂期間確曾出現局部「逃資」的現象。雖然香港經濟受到暴動困擾，但六七年出口總額仍然增長百分之十七。

香港旅遊業也受到一定衝擊。聯合國將六七年訂為國際旅遊年，港府也期望旅遊業這一年取得可觀增長，當局估計遊客總數將較六六年上升百分之十五至二十。¹⁴³六七年一至八月訪港遊客數目較六六年上升，但九月和十月訪港旅客較六六年同期分別下降百分之九點九和十七點九，外國遊客顯然因香港爆發騷亂而卻步。而六七年全年旅客總數為五十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五人，較六六年微升百分之四點二八。旅遊業人士估計，如果沒有發生左派騷亂，遊客總數可望突破六十萬人。

正當香港社會一片混亂之際，鄰近國家企圖從中取利，紛紛制訂計劃吸引香港資金前來投資。菲律賓政府六七年七月宣佈，放寬香港人赴菲的規定，同時設立自由貿易區，以吸引香港資金。台灣當局也設立專門處理華僑投資的小組，便利香港人入境和投資。新加坡政府也宣佈凡在當地投資二十五萬元辦廠，全家即獲准長期定居當地。事實上，騷亂期間，不少醫生、工程師等專業人士移民歐美國家。

第十一章 北京支持香港左派發動騷亂嗎？

六七暴動的關鍵，在於中共官方是否全力支持香港左派發動騷亂。梁上苑指出，中央的對港政策本來明確，港澳工委也很清楚。他表示：「六六年文革爆發後，香港左派基層幹部和群眾原想仿照國內紅衛兵大搞一場，例如貼大字報、『破四舊』、強迫領導靠邊站、奪權等。可是周恩來掌握的國務院早已通令禁止駐外機構和大使館搞這一套。」

但文革期間林彪和四人幫的極左思潮卻對港澳工作常加干擾，他們還掌握了一些輿論陣地，例如陳伯達接管了《人民日報》。他表示：「香港新華社便鑽了這個漏洞，以中共黨內常見的『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方式應對，這就是先造成了既成事實，使中央不能不負起責任。據說五月二十二日港英軍警在花園道動武後，新華社曾派副社長朱曼亭赴京請示，回港後透露周恩來說『這是迫中央上馬』，顯然周恩來是不想發動鬥爭的。」

當年中共領導層對如何處理香港形勢缺乏共識，周恩來又窮於應付紅衛兵派系鬥爭，導致左派暴動不斷升級，並逐漸失控。梁上苑指出：「毛澤東和周恩來都不想收回香港，但毛澤東要擺出『盤馬彎弓故不發』的姿態嚇唬英國人。一九六七年是國內文化大革命最混亂的時期，周恩來要解決國內各方面的問題，不可能照顧對外關係的各種事項。」梁上苑認為，中共領導層不想收回香港，當然沒有必要搞「反英抗暴」，「可是運動已經搞起來，當然不能認輸，相信北京同意並支持香港左派罷工和罷市，後來的真假炸彈就不支持了」。

六七年五月至八月這四個月內，《人民日報》先後發表兩篇社論和八篇評論員文章，支持香港左派的反英鬥爭。而中國外交部數度向

港英提出抗議，也使香港左派一度以為得到北京全力支持。中國全國總工會六七年下半年兩度向香港左派匯款，合共撥出二千萬元作為香港左派的「鬥爭費」，對左派工會的罷工行動提供財政支援，同時警告港英停止鎮壓行動。全國總工會的撥款行動，是北京對左派最實質的支持。但梁上苑表示，反英抗暴期間，周恩來曾嚴令制止解放軍越過深圳邊界，國內也沒有提供任何武器軍火給香港左派使用，而且在輿論上也從不宣傳收回香港。「這些事實表明不是北京方面發動反英抗暴，而是新華社所發動的，新華社同時扮演了指揮的角色。」中華總商會會長、鬥委會委員高卓雄在左派騷亂期間到日本「暫避鋒頭」，他曾慨嘆：「大老細唔支持，冇得搞！」

據了解，當時港澳工委內部存在強硬派和溫和派，新華社社長梁威林、副社長祈烽、宣傳部長黃光宇等官員主張以一切手段鬥垮港英，副社長梁上苑和統戰部副部長、新華社副總編輯周宏明對採取過激手法頗有保留。梁上苑認為：「港澳工委領導層內部可能有不同看法，但僅限於積極性的表現方面，誰都不敢反對『反英抗暴』這個運動方向。」

一、中共五十年代以來的對港政策

中共官方由始至終沒有全心全意支持香港左派鬥爭，對左派的支持僅停留於言文層次，更沒有打算收回香港。中共態度模稜兩可的原因，得從中共對港方針政策說起。中共四九年建政後，宣佈不承認英國與清廷簽訂的三條不平等條約，主張在適當時機通過談判解決香港問題，未解決前暫時維持現狀。早在中共建政前夕，中共中央對香港問題已作出了「暫不收回，維持現狀」的決定。¹⁴⁴根據曾負責港澳工委新聞工作的前《文匯報》總編輯金堯如的回憶，一九五一年春天，當時的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黃作梅到北京請示對港英當局的政策方針，周恩來當時表示：「我們對香港的政策是東西方鬥爭全局的戰略部署的一部分，我們在解放全國之前已決定不去解放香港，在長期的

全球戰略上講，不是軟弱，不是妥協，而是一種更積極努力的進攻和鬥爭。美國和英國存在着矛盾和鬥爭，在對華政策上也有極大的分歧和矛盾。美國要蠶食英國在遠東的政治經濟勢力範圍，英國要力保大英帝國的餘暉。」

周恩來相信：「我們把香港留在英國人手上比收回來好，也比落入美國人的手上好。香港人留在英國人手上，我們反而主動。我們抓住了英國的一條辮子，就拉住了英國，使她不能也不敢對美國的對華政策和遠東戰略跟得太緊，靠得太攏。這樣我們就可以擴大和利用英美在遠東問題上對華政策的矛盾。」¹⁴⁵

一九五四年八月，周恩來爲了打開外交局面，提出「推進中英關係，爭取和平合作」的主張，並利用一些西方國家與美國的矛盾，與這些國家結成「統一戰線」。由此可見，中國政府基於外交策略考慮，將英國視爲「爭取對象」，而維持香港原有地位有利於與英國保持正常外交關係，而且有助打破西方陣營的嚴密封鎖。

中國本身經濟發展的客觀需要，也促使北京暫不收回香港。周恩來認爲「那個地方大有可爲」，「我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香港可以作爲我們同國外進行經濟聯繫的基地，可以通過它吸收外資，爭取外匯」。周恩來五一年指出：「香港是我們通向東南亞、亞非拉和西方世界的窗口。它將是我們的瞭望台、氣象台和橋頭堡，它將是我們突破以美國爲首的西方陣營對我國實行封鎖禁運的前沿陣地。」周更要求中共駐港幹部維護香港的現狀和地位，包括英國的殖民主義經濟和資本主義制度。

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八日，周恩來在上海工商界一次座談會上闡述對香港的政策。他表示：「我們不能把香港看成內地，對香港的政策同內地是不一樣的，如果照抄，一定搞不好。」他強調，香港現在還在英國統治之下，是純粹的資本主義市場，「不能社會主義化，也不應社會主義化」。

一九五九年，毛澤東針對中共黨內少數人的急躁情緒，強調從世

界戰略的全局出發，「香港還是暫時不收回來好，我們不急，目前對我還有好處」。一九六零年，中國政府針對港澳工作，提出了著名的「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針，即對香港的未來要作長期打算，在「可以預見的將來」不採取足以改變香港現狀的政策，同時要充分利用香港的特殊地位，為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和外交戰略服務。六十年代初期，已與中共交惡的蘇聯質疑北京為何不收回香港，美國共產黨也公開質詢中共為何不在台港澳問題上採取果斷行動，卻老向他人宣揚革命。儘管受到各方質疑，中國政府仍然在六三年發表的聲明中強調：「在香港、澳門這類問題，我們一貫主張在條件成熟的時候，經過談判和平解決，在未解決以前維持現狀。」聲明又指出：「中國人民不需要在香港、澳門問題上顯示武力，來證明自己反對帝國主義的勇氣和堅定性。」¹⁴⁶

周恩來五十年代也曾經強調：「不收回香港，維持其資本主義英國佔領不變，是不能用狹隘的領土主權原則來衡量、來作決定的。我們在全國解放以前已決定不去解放香港，在長期的全球戰略講，不是軟弱，不是妥協，而是一種積極主動的進攻和鬥爭。」香港左派六七年的過激舉措，顯然違背了中共對港的既定方針政策。

二、周恩來對「反英抗暴」的指示

周恩來早在六七年五月已相當關注香港左派發動的鬥爭，並反對在香港採取過激行動。香港人造花廠事件爆發後，周恩來認為，中國政府對港英鎮壓行動作出反應是必要的，但基於國家對香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針和政策，要注意掌握「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要文鬥，不要搞武鬥」。他指出：「武鬥會遭英方鎮壓，且容易被美國利用。」¹⁴⁷

周恩來又反對香港左派發動大罷工，左派後來的大罷工顯然違背了周的指示。周恩來對中共港澳工委指出：「香港工人可以搞一些臨時的突發性罷工，不要搞像一九二五年省港大罷工的形式，因為時代

不同了。一九二五年在香港的主要投資者主要是外商，搞總罷工可以使香港成爲死港，而六十年代在香港投資者是華商，香港百分之七十的日用品和百分之九十的副食品都是我國供應的，如果搞大罷工，日本商人就會去佔領這些市場。搞長期罷工，工人無工資收入，生活要靠國家救濟，這會增加國家財政負擔，對我不利。」

他先後於六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和二十七日，約中共中央外事辦公室、外交部和港澳工委負責人談香港問題，就有關部門在香港問題上越來越左的做法提出批評。周恩來當時強調：「在香港問題上同港英當局的鬥爭要嚴格遵循中央規定的方針政策，堅持有理、有利、有節。」¹⁴⁸

他又批評有關部門在香港問題上提出的過左口號和採取的極左做法，並對「要打死幾個警察，以收殺一儆百之效」的建議提出嚴厲批評。當時港澳工委建議中央批准在香港襲擊幾個警察站，殺「幾個最壞的警官」，以起「殺一儆百之效」。他批評「這是無政府主義思潮」，「雖然我們不承認香港是國外，但它還是在英國統治之下。我們現在既不是馬上收回香港，也不想同英國打仗，我們對英國的鬥爭還是要有理、有利、有節，不主動出擊。香港的工作照抄內地紅衛兵的做法，行不通。」他又表示，香港《大公報》和《文匯報》「調子不能太高」，應當同內地的報紙有所區別。¹⁴⁹

周恩來又批評新華社和《人民日報》報道香港問題時故意誇大的做法。六七年五月，新華社報道港英警方「打死打傷二三百人」，《人民日報》轉載新華社消息時又冠以「血腥大屠殺」的標題。周恩來指示新華社核實死傷數字，結果發現實際上只死了一人，數人受傷。他嚴厲批評說：「這是嚴重的失信，更加激起人民的義憤，使我國在政治上很被動。你們越搞越大的目的是甚麼？」

七月八日，大陸民兵與香港警察在新界邊境沙頭角發生槍戰。七月十日，周恩來談到香港問題時說：「香港不同於澳門，在香港動武不符合我們現在的方針。我們不拿澳門是保持一個口子在那裏，市場

是我們的。香港鬥爭是長期的，我們不能急，搞急了，對我們不利。」¹⁵⁰他又傳達了毛澤東對香港「不動武」的指示。周表示：「昨天，主席又講了，還是不動武。如果我們打了過去，那就是主動出擊了。香港問題現在是群眾運動，又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如果出動正規部隊，群眾一推動，就控制不住了，你打電話也來不及。」¹⁵¹七月下旬，周還派外交部一位副部長專程前往廣東，向負責港澳工作的有關部門傳達毛澤東的指示，試圖糾正左派陣營的極左做法。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周恩來會見英國外交大臣霍姆時，就六七年英國代辦處被焚燒事件表示歉意。他表示：「一個國家不會是永遠正確的，總會犯一些錯誤的，總要檢查嘛，錯了就承認。」周恩來又說：「我國政府對極左分子在六七年的活動和他們在香港採取的政策是不贊成的。但你們一鎮壓，這個問題就大了。」他明確告訴霍姆：「只要亞洲不發生大的戰爭，香港的現狀就可以維持。保持香港作為自由港，這對中英雙方都有好處。」¹⁵²從周恩來多次內部談話來看，他對香港左派暴動是很有保留的，只是礙於政治現實，不便公開質疑香港左派的行動。

據因「三報事件」入獄的瞿暖暉引述，前中共八路軍駐港辦事處要員的潘靜安表示，周恩來後來吩咐當時定居北京的潘靜安專程赴港，收拾殘局，勸服香港左派鳴金收兵。

左派暴動踏進中後期後，香港左派陣營看來對北京的支持程度心中有數。鬥委會六七年七月二日出版的《戰鬥通訊》，發表題為〈關於反英抗暴鬥爭的幾個問題〉。文章以自問自答的形式，闡明反英鬥爭是「一場比較持久的、艱巨的和反覆的鬥爭」，並解答左派群眾的「疑惑」。文章回答「怎樣認識來自祖國支援」的問題時，提到「所謂祖國沒有很好支援的問題，實際是要求祖國出兵的問題。這些人表現出速戰速決的急躁情緒，只單純地盼望解放軍開過來。」文章表示：「港英的法西斯暴行令人髮指，渴望解放軍來港懲辦英帝及其走狗的激憤情緒是很自然的。解放軍是否開過來，這要根據形勢的需

要。我們不要存有單一的依賴心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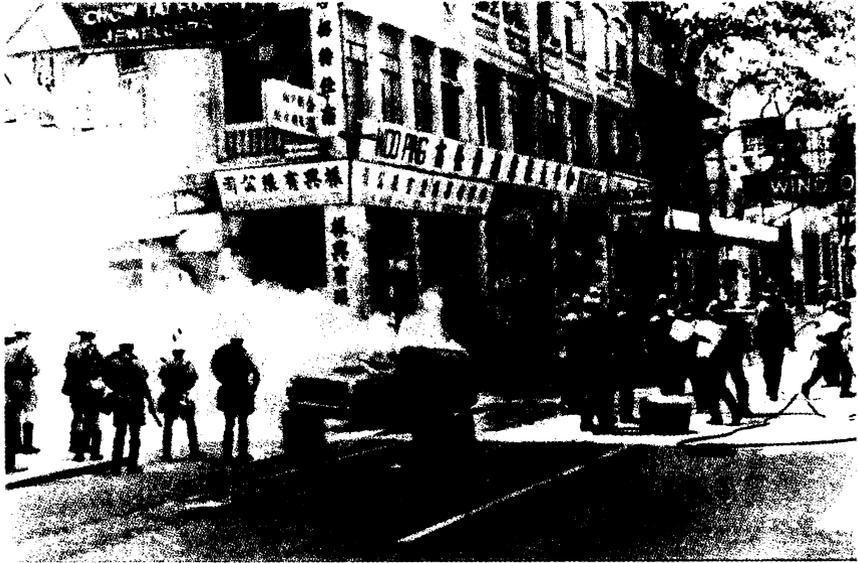
文章強調：「我們必須認識到祖國人民的大力支持，對這場反英抗暴鬥爭的勝利是極為重要的必不可少的條件，但是這個勝利，還必須經由自己的艱苦頑強的鬥爭來取得。來自偉大祖國的支援，使我們的鬥爭更加增加信心和力量，我們更要爭氣。」文章更指出：「祖國的一切支援，都不能代替香港廣大群眾的力量。必須依靠自己解放自己，不能單純地盼望解放軍開過來。我們要發揚艱苦奮鬥，自力更生的精神，為世界人民反帝鬥爭做出一個好榜樣。」¹⁵³鬥委會這篇文章顯然要為左派群眾降溫，提醒他們不要一廂情願地期望北京提早收回香港。

文革期間中共內鬥頻仍，自顧不暇，而且要全力應付蘇聯的軍事威脅，因此無意全力支持香港左派發動鬥爭。《明報》專欄作家丁望分析稱，當時中共四面受敵，不會為了香港一小撮「左傾盲動主義者」，向香港進行軍事冒險。他因此斷定中共沒有收回香港的意圖，也不存在北京派兵往香港的可能性。¹⁵⁴

港英當局也看準中共無意提早收回香港，遂於暴動期間如常就海底隧道工程招標。

而北京從香港獲取的巨大經濟利益，也是無意改變香港現狀的重要原因。據估計，北京六十年代每年從香港賺取逾六億美元外匯，佔中國整體外匯四成。港府副民政司黎敦義一九六九年六月在一個研討會上表示：「中共經常視香港為中國的一部分，但同時中共亦因香港目前在政治和經濟上非為中國一部分而獲得了相當的利益。中共所得的外匯，一半或超過一半是通過香港獲得的。從中共以火車通過邊境的成千萬隻豬隻，每一頭都能賺取外匯。此外，其他地區利用香港作為和中共貿易的中心。中共從香港賺取的外匯，主要是用來購買生產機械。」¹⁵⁵

第十二章 六七暴動的影響



暴動期間，停泊路旁的車輛被縱火焚毀。

一、左派徹底喪失民心，軍心動搖

六七左派騷亂對香港經濟和社會秩序帶來嚴重衝擊，大部分香港人尋求社會安定，對左派陣營的過激行為感到不滿。新蒲崗人造花廠事件爆發，部分市民同情左派的行動，但左派報章抓住新蒲崗大有人造花廠事件，將勞資糾紛提升為政治事件。但隨着事件不斷升級，左派報章後來卻沒有繼續突出勞工待遇和勞資矛盾，反而將事件定性為「民族大壓迫」。《遠東經濟評論》總編輯戴維思認為，左派很快放棄了勞工議題，反英行動迅速轉化為純政治層次的鬥爭。他表示：

「當運動具有意義的基礎被放棄後，運動隨即變得沒有根基和目標。」¹⁵⁶

左派後來發動罷工、罷市，以至放置真假炸彈，引起市民不便，生命安全更受到威脅。《明報》九月二日社評認為，毛澤東思想的要旨是「組織群眾，依靠群眾」，「港共卻燒巴士、燒醫院、炸殺兒童、炸清道夫、暗殺文化人，拚命『仇視群眾、蔑視群眾，鄙視群眾』，口頭上『三視港英』，實則是『三視群眾』」。《明報》認為，左派「三視群眾，焉能勝利？」

部分左派人士對當年的極左行徑也心痛惡絕。因「三報事件」被捕入獄的《香港夜報》社長胡棣周認為，一般市民對「菠蘿陣」非常反感，也導致左派社會形象受損，迅速失去民心。他認為：「放炸彈令香港人覺得左派將事情政治化，而不是真正關心勞工利益。」梁上苑也指出：「總的來看，支持左派的佔少數，因為大多數居民要求生活安定，他們不理解香港左派為甚麼要進行騷亂。他們對擺放假炸彈所引起的不便，更是怨聲載道。」

六七暴動結束後，左派陣營在一般市民心目中的形象嚴重受損，令五、六十年代已取得一定成績的北京對港工作大受挫折。許家屯八三年出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初期，也感受到六七暴動的後遺症。他憶述說：「六七年『反英抗暴』後，香港有些人對新華分社，對中資機構還產生恐懼心理，本地幹部形容：『一個時期，國貨公司香港市民都不敢進去買東西，有些甚至繞道而行，避免接近。』『我們與外界接觸也不敢公開身份，社會上對中資機構工作的人另眼看待，有鄙視心理，背後稱呼為『左仔』。』¹⁵⁷

六七暴動期間，不僅一般市民感到惶恐，少數左派人士更與左派劃清界線。中華總商會會長高卓雄六七事件期間到日本暫避，據說文革結束後廖承志與高會面時說：「你當時走得對。」六九年九月底，高卓雄再次到日本「度假」，他承認當時臨近「十一」國慶，「留在香港會有麻煩」。¹⁵⁸中華書店董事長、鬥委會委員吳叔同也投奔台

灣，而大批左派原來支持者也在騷亂過後紛紛脫離左派陣營。就連五十年代韓戰期間，冒險偷運物資到中國的親中富商霍英東，當時也與左派陣營保持距離。據筆者了解，霍英東早在六七暴動爆發前往英國暫避，並暫時將公司業務交由員工處理，也沒有加入鬥委會。

左派陣營經過六七事件打擊後，採取自我孤立的政策，工聯會工作轉以內務為主，不參與社會事務，杯葛勞工顧問委員會等港英勞工諮詢架構，並拒絕參與八二年舉行的區議會選舉。這種與香港主流社會隔絕的局面，直至八十年代中期才逐漸改變。左派工會放棄參與勞工事務，令獨立工會得到茁壯發展的機會。七十年代開始擔任基督教工業委員會主任的劉千石表示：「工聯會直到八十年代初期才重新影響勞工立法，否則當時我們不會有活動空間。」

而左派罷工也導致不少工人失去工作，需由左派機構暫時承擔他們的生活費用，構成沉重的財政負擔。六八年上半年，左派工會發動「復工鬥爭」，暴動期間被解僱的工人要求原工作機構重新聘用他們。各界鬥委會四月二十六日的聲明指出：「罷工工人根據鬥爭出現的新形勢、新特點，已一致決定回廠復工，以這種新的形式，加強團結，堅持鬥爭。工人們認為，當罷工鬥爭達到打擊敵人的目的之後，在更有利於進行反英抗暴鬥爭的前提下，採取回廠復工的鬥爭方式，既照顧到廣大居民正常生活的需要，也可以維持資方的營業和生產，就能夠更好地團結各階層居民，進行長期鬥爭。」但港府和各大企業都拒絕了左派工人的復工要求，不少工人因此失業。

二、迫使港英推行社會改革

港英當局取得勝利，不等於港人真心擁護港英殖民統治，港英成功鎮壓左派也不代表「萬事大吉」，長期存在的社會矛盾不會就此消弭於無形。雖然大部分市民不支持左派的行動，卻沒有熱烈擁護港英政府，一般抱觀望態度。香港史學者冼玉儀指出：「最初市民對勞資糾紛大都模稜兩可，甚至有些人認為港英政府多年來作威作福，給一

點顏色給它看，也是大快人心的。」¹⁵⁹

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副所長劉兆佳暴動期間就讀於聖保羅書院，當年目睹洋警官鎮壓左派示威者，對他們頗為同情。他又表示：「六七年五月中國外交部傳召英國駐華代辦，就港英鎮壓行動提出抗議，我當時覺得中國國際地位提升，不再隨意受列強魚肉，因而對中共存有好感。」直至左派抗議引起混亂局面，他開始覺得這場運動不對勁，熱情開始冷卻。劉兆佳指出，當時香港社會存在不少矛盾，港英當局又實行強權專制統治，對白種人和華人區別對待，左派訴諸反英反殖的口號，在當時社會有一定市場。他說：「雖然騷亂參與者主要是左派中人，但不少市民受反英口號感染，並從左派衝擊殖民政府和高等華人的行動中獲得快感，覺得左派替他們出了一口氣。」

當年香港民意調查並不盛行，我們無從獲得市民對騷亂看法的客觀數據。香港大學學生會曾於六七年七月進行校內民意調查，了解同學對騷亂的看法。學生會合共發出一千九百八十六份問卷，最後收回五百二十四份，調查結果在《學苑》刊登，二十九人同情騷亂者，五人「完全支持暴動」，四百三十七人「憎惡暴動」，五十三人表示對騷亂不感興趣。¹⁶⁰六七年港大學生總數為二千四百六十六人。

左派暴動初期得到部分非左派民衆同情，部分人甚至捲入了這場運動。中文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呂大樂及趙永佳認為：「假如我們只從本地左派的政治動員的角度來看暴動，分析會有所偏差。至少在暴動初期，一些與左派沒有直接聯繫的香港市民，也參與了這次政治動員。與此同時，不少市民也不是一開始便支持殖民地政府對付暴動。」¹⁶¹

隨着騷亂蔓延，市民對共產統治的恐懼，促使他們選擇保持沉默，最多只是被動地支持 (passive support) 港英當局。劉兆佳指出，左派群眾後來放置炸彈，許多市民擔心中共收回香港，遂轉而站到港英政府那邊。呂大樂認為：「直到後來左派的行動走向恐怖主義，民意才全面分為兩大陣營，而殖民地政府爭取到市民支持，以穩定局面之

名，將左派徹底邊緣化。」《星島日報》總編輯、作家鄭郁郎在《在香港看香港》中的一段話，頗能反映六七騷亂期間一般香港市民的微妙心態：「人民對港英並無好感，但是在目前形勢之下，不支持港英，支持誰？這有如坐上汽車，一定要支持司機，港英就是司機，港人只好支持他。」¹⁶²

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教授周永新認為，六七左派暴動結束後，「香港人似乎開始珍惜這地方。最低限度，香港是他們的避難所，讓他們免去文化大革命帶來的浩劫」。¹⁶³副民政司黎敦義指出，雖然香港民衆大多數是華人，因此跟中國少不免有情感上的聯繫，但於大陸或台灣的政權「似乎都沒有表示很歡喜的」；一九六七年騷動時，「最令人驚喜的事實」是民衆顯示他們不想香港現行政制有所改變。

打着「反殖」旗幟的六七左派暴動，最後卻驅使香港人支持港英政府，不啻是歷史的諷刺。香港大學政治系學者 Ian Scott 在 *Political Change and the Crisis of Legitimacy in Hong Kong* 一書中認為：「諷刺的是，考慮到共產主義者原來的目標，暴動的後果卻是強化了現存制度的支持程度及認受性。要在文化大革命的共產主義與當時仍未改革的殖民地資本主義國家機器之間作出選擇，大部分人選擇了站在他們熟悉但可厭的一方。」¹⁶⁴呂大樂指出，六十年代中期香港社會結構開放程度有限，加上當年僱傭條件、工作環境和殖民統治等因素，當時香港社會潛伏種種引發動亂的種子。他認為，非左派人士袖手旁觀，可見當時殖民地政府及其社會制度，並未完全為市民接受。¹⁶⁵

當時的香港大學生李烈以平民角度，對一般香港人選擇港英政府的心態作出了客觀中肯的分析。他認為：「香港的中國人沒有強烈的政治理想，他們無所偏愛於任何一方，在香港所求的只是和平、安定而已。所以他們在目下的事件轉而支持及鼓勵他們一向不甚恭維的警察。有關方面若能明瞭此情況，應知道民衆這種稱譽及支持是能收能放，是有條件的。」

除了國內文革極左思潮的影響，香港社會長期存在的社會矛盾，

也構成左派騷亂的社會土壤。根據六七年《香港年鑑》，當時香港工人薪金與物價水平相去甚遠，熟練工人每天工資只有九元，一些較「生手」（半熟練）的工人更只有四元四角，月薪不足一百元的工人比比皆是，連一部價值三百元的黑白電視機也買不起。港府六七年發表的《社會保障問題報告書》承認，「工人都是可隨時解僱的散工」。

由於勞工法例不完善，香港工人長時間工作，每星期工作七天，每天平均工作十一小時以上。工人沒有有薪假期，被解僱時往往拿不到遣散費，一些西方傳媒甚至形容香港為「血汗工廠」。香港工運領袖劉千石六三年從廣州偷渡往香港，在新界葵涌石蔭邨寶星紗廠任職化驗工，後來轉往一家毛紗廠工作。他記得當時工人日薪一般為四至五元，「但老闆看我是大陸來的，每天只給我四元」，其他工人工作時間為早上七時至下午三時，他卻要傍晚六時半才能下班。他表示：「當時一頓午飯要花八角至一元，由於我收入低，每三天就有一天中午要吃麵包。」他又指出，當時僱主一般不會替員工購買勞工保險。

六七年四月人造花廠工潮爆發後，劉千石頗有「工人出了一口氣」的感覺。五月六日防暴隊與工人發生衝突，劉對防暴隊的鎮壓行動很反感，當時持類似看法的市民並不罕見。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編印的《學聯報》社論也批評港府最初處理勞工問題時「未夠誠摯」，應負上這次不幸事件的部分責任。

專門研究香港史的香港大學歷史系高級講師冼玉儀指出，五十年代末期開始香港經濟起飛，可是這時期創造的財富沒有得到公平分配，真正受益的只是小部分人。經濟發展給大部分人帶來的只是通脹，很多人生活質素下降了。她表示：「勞工法例是有的，但作用有限。連最基本的問題例如解僱、欠薪等，都沒有有一套妥善的解決方法，遇到勞資糾紛，往往是工人吃虧。」¹⁶⁶

被譽為香港「民主之母」的市政局議員葉錫恩指出，當時香港工人一般以日薪形式受僱，她碰到一位在公司任職十年的僱員，突然被老闆解僱，沒有獲任何補償。她說：「工人對勞工處完全沒有信心，

因為它根本不做任何事，這正合部分僱主的心意。」¹⁶⁷當時勞工處的資源少得可憐，香港六七年共有一萬一千家註冊工廠，勞工處竟然只有二十二名工廠督察。

港府也不甚重視教育投資，六六年教育經費僅佔政府整體開支百分之四點五（九八至九九年度為百分之二十一），對不少適齡學童來說，教育屬於奢侈品。根據六六年的人口統計，介乎十至十四歲的適齡學童中，只有百分之十三能接受中學教育，只有百分之三十九的青少年有機會接受教育。開創大陸「香港學」研究的《香港概論》指出：「六十年代以後整體經濟增長迅速的同時，社會財富分配不均，貧富懸殊的現象越趨嚴重，低收入階層的不滿情緒增長，一九六六、一九六七年出現震動香港的動亂事件。這些事件的導火線儘管各有不同，但與市民對福利設施，生活環境的強烈不滿不無關係。」

《遠東經濟評論》當年屢次批評港府忽視社會不公現象，記者顧汝德（九十年代初期擔任港府中央政策組組長）批評港府長期漠視勞資矛盾。該刊總編輯戴維思指出，暴動期間向警察擲石的青少年，大多是衣衫整齊的徒置區青年。他們由於缺乏繼續接受教育機會，也因勞工法例禁止僱主聘用十六歲以下的青少年而處於失業狀態，對前景感到沮喪，對社會現狀感到不滿。戴維思認為，這些情緒構成「期望上升革命」（Revolution of Rising Expectations）的溫床。¹⁶⁸六七年的香港，顯然位處社會動盪的火山口。港督戴麟趾六七年五月底接受《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時表示：「任何小事都足以帶來麻煩，哪怕是一場足球賽。假裝、掩飾是愚蠢的。」¹⁶⁹

部分英國傳媒和國會議員也關注香港的社會矛盾，認為這是觸發騷亂的重要原因。英國親工黨報章《衛報》（Guardian）六七年七月一篇報道指出：「最近（香港）的騷動顯示搗亂份子的主力是年輕人，由於人口過分擠迫，勞工生活不如意，以及對政府和警察素有的敵視，遂使暴徒人數能迅速擴大。十六至二十歲的青年往往有許多對現實的不滿，這些不滿完全是由情感衝動所衍生出來，成為憎恨和憤懣。」

¹⁷⁰英國工黨國會議員 John Rankin 在六七年十一月國會辯論時認為，香港大部分市民在「可怕環境」下生活，是當地勞資關係緊張的主要原因。他又表示，解決問題的唯一途徑是政治手段，而不是軍事手段。

早在六七年四月，一些英國工黨國會議員已批評香港的政制「完全難以辯護」，權力操縱在少數人手上，引致濫權及貪污。工黨議員羅德斯勳爵 (Lord Rhodes) 六七年八月訪問香港，他返國後認為港府部門對待市民的態度必須作出「重大改變」，港府應成立強大而又獲市民信任的勞工處。¹⁷¹羅德斯在國會辯論中表示，香港今後面對的最大危險是港府過時的作風，呼籲港府加強與市民溝通，修訂勞工法例也刻不容緩。六七年八月赴香港出席學術會議的美國學者喬格冰 (Robert Kilpatrick)，對香港這個高度工業化和商業化的社會，竟然缺乏完善的社會保障系統、勞工保險和退休保障感到驚訝。他認為，香港工人的不利處境是六七暴動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¹⁷²

香港大學生李烈指出，當時社會問題叢生，官民芥蒂日益嚴重，日積月累因缺乏溝通而產生的憤懣、總有爆發的一天，六六年的天星小輪加價事件就成為導火線。但他說：「這件事情很快便平息了，有關方面卻似乎沒有吸取教訓，不思改進官民關係，騷亂的根源仍然潛伏。」他呼籲港英當局為了趕快結束這場騷亂，以及杜絕以後出現同類事情發生，應有所作為和有所表示。¹⁷³《學聯報》社論也認為：「香港不是天堂，香港仍有很多缺點有待改進。」¹⁷⁴一位香港大學生表示：「如果我們的社會不是存在各種問題，港共根本沒有機會擴大事端。」¹⁷⁵

一位向《明報》投書的市民認為，「勞資糾紛只是引致這次事件的導火線而已，埋藏在原本對政治沒有成見的騷動參與者內心的抑鬱與積悶，才是政治份子所利用、煽動和擴大事件的主因。」他認為：「香港這個社會對富人給予多方面的優待或方便，貧苦大眾身受的的限制太多。在這種情況下，富人的氣勢，貧民的屈辱，使後者產生不平之感。」¹⁷⁶時任《盤古》雜誌編輯的新亞書院學生岑逸飛也認為，不

少參與騷亂的滋事者是出於對政府的不滿情緒，而街上流浪失學的兒童隨處可見，也成為培養暴徒的溫床。

《遠東經濟評論》總編輯戴維思更提醒港英當局「不要以為公眾支持政府維持秩序，意味社會認同政府過往的政策」。他指出：「任何掌握民意的官員，都會明白不是這回事。市民面對兩個魔鬼，現在只是兩害相權取其輕而已。政府有責任檢討現行政策，紓緩社會不滿情緒，這樣日後不管左派或右派都不能利用這些不滿，製造社會不安。」《英文虎報》社論也呼籲港府制訂社會發展藍圖，這樣社會不滿情緒才不致繼續困擾市民生活。¹⁷⁷《南華早報》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社論展望來年時，也建議政府改善官民關係，解決勞工問題和改善教育。署名「龍戰」的港大學生也在《學苑》指出：「這次香港從血與混亂之中得到的教訓是最重要，也是最簡單的：改革資本家的剝削手段，全力推行勞工福利的運動。」

儘管當年香港社會存在一些社會矛盾，但如果將六七暴動的主要原因歸結為社會矛盾，似乎不夠客觀。左派陣營對六六年天星小輪事件和六七騷亂，態度截然不同，可見六六年下半年爆發的文革才是六七騷亂的催化劑。而新華社和左派社團領導人在文革極左思潮下影響下，發動群眾進行鬥爭，也要對事態不斷擴大負上頗大責任。時任三聯書店副經理的蕭滋認為：「如果當時沒有文革，左派領導人就不會這樣處理。如果將所有責任推到社會矛盾上，實在說不過去。」

資深左派報人羅孚認為：「當年香港勞資糾紛可說天天存在，為甚麼新蒲崗勞資糾紛會演變為激烈的反英抗爭？主要就是新華社領導官員為了爭取表現，藉機發動鬥爭。」香港大學學生龍戰雖然同情人造花廠工人，但他認為單就這次勞資糾紛來看，「說甚麼也談不到民族迫害」。他表示：「我們總無法明白：人造花廠的勞資糾紛怎會和民族迫害混在一起，又為甚麼大叫大喊，彷彿如喪孝妣似的。香港是個殖民地，裏面自然有種種不平等的事情，我們要鏟除這種不平等，但手段決不是恐嚇、威脅和流血。」¹⁷⁸《新亞學生報》社論也認

為：「香港很多社會問題都應作更完善的改良，然而改良之道應循着理性與和平，絕非倚賴暴力和騷亂。」¹⁷⁹

左派暴動喚醒了港英政府的危機意識，當局認識到必須調整統治策略，以爭取民衆支持。學者冼玉儀說：「政府現在才發現和草根階層之間存在着那麼深的鴻溝，市民不信任政府，對政府所做的一切，都抱着懷疑態度。他們不認為政府照顧他們的利益，對香港缺乏歸屬感。」港英政府吸取了六七暴動的教訓，推行社會改革。一九六八年二月，勞工處長邨亮宣佈三十三項改善勞工立法的建議。同年九月，立法局通過新制訂的《僱傭條例》，推行勞工分期遞減工時計劃。七一年十二月，香港終於實現每天八小時、每周四十八小時工作制，女工享有產假。

港府同時加快興建公共房屋，接替戴麟趾出任港督的麥里浩七二年宣佈推行「十年建屋計劃」。港府於一九七一年承諾為所有適齡學童提供免費小學教育，並於七八年開始推行九年免費教育，所有學童均可免費升學至中學三年級。

港府為了縮窄政府與市民之間的鴻溝，在市區及新界設立民政署，了解市民對政府政策的反應，並向市民解釋政策，希望爭取市民支持。踏入七十年代中期，不少市民覺得港府殖民統治的本質不變，但港府統治變得相對合理，成為相比亞洲大部分國家廉潔和高效率的政府。而過去編採工作由政府新聞處包辦的香港電台，也於一九七一年成立自己的新聞部，當局容許香港電台新聞保持一定的獨立性。

當時擔任副民政司的鍾逸傑接受筆者訪問時，堅持六七暴動純屬大陸文革的產物，左派滋事者只是利用貧富懸殊及其他社會問題，分散公衆的注意力。但他表示：「港府從六六和六七年騷動中吸取教訓，決定縮窄政府與民衆的隔膜，例如成立民政署、互助委員會和街坊福利會。」香港大學學者 Ian Scott 認為七十年代初期以後，「政府仍然是家長式的，間中表現得權威性及依然與一般市民有些脫離，但它諮詢公衆的態度的改變和改良社會政策的承擔，引發了對未來的信

心和賦予它新的認受性基礎。」¹⁸⁰

而暴動結束後，港英政府斥資舉辦「新潮舞會」，旨在消耗青少年的多餘精力，「引導青少年走上正途」，其中以中環卜公碼頭(現已拆卸)的規模最為龐大。當時社會普遍流傳「寧要飛仔，不要左仔」的說法。政府又斥資舉辦青少年課外活動，例如游泳、野餐、露營等，並開辦社區中心和青少年中心。

六七暴動也成為香港人深刻的集體記憶，一些社會領袖常以這次事件告誡港府注意社會不穩定因素，正確處理社會矛盾。九八年九月，香港電訊要求一萬三千多名員工減薪一成。當時社會掀起裁員、減薪風潮，一些社會人士擔心企業在沒有諮詢員工的情況下採取這些行動，可能觸發動亂。港九勞工社團聯會主席兼立法會議員李啓明與行政長官董建華會面時，提醒他香港繁榮有賴良好的勞資關係，如果處理不善，可能爆發社會動亂，帶來經濟損失，六七暴動就是明顯例子。

三、造就政經新貴

六七騷亂也導致香港政經力量重組。當時一些顯赫世家對香港失去信心，並從香港撤資。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副所長劉兆佳認為，一些長期被港英拉攏的華人領袖沒有積極表態聲援港英，部分立法局議員更在騷亂期間銷聲匿跡。他指出：「暴動結束後，港英積極拉攏更多華人領袖，擴闊政治支持基礎，例如新界原居民就成為港英可靠的政治盟友。」

騷亂期間香港商界人心惶惶，出現撤資情況，造就了新興富豪李嘉誠、郭德勝、馮景禧等乘勢崛起的時機。當時李嘉誠決定繼續在香港投資，他對香港的信心令他賺取巨額利潤。一名外國商人以二十二萬美元(時值一百多萬港元)向他出售一幢工業大廈，僅為建築費的六分之一。兩三年後，他以三千六百萬港元將大廈轉手。他同時大量吸納住宅單位和地皮，奠定了他的超級富豪地位。

第十三章 左派陣營在內部承認鬥爭失敗

暴動結束後，香港左派陣營從未公開承認鬥爭錯誤和失敗。六九至七零年間左派機構員工到廣州出席廣東支港委員會舉辦的學習班，解放軍廣州軍區政委到場傳達周恩來「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對港方針政策，並承認「反英抗暴」鬥爭手法錯誤，但強調鬥爭以勝利結束，迫使港英不得不作出讓步，改採懷柔改良政策。支港委員會負責人又提醒眾人「不要上當受騙」，不要看香港電視和聽香港電台節目，「不要被銅板遮蔽眼睛」，並要求香港左派多到國內上學習班。

出獄不久的三聯書店副經理蕭滋，卻在香港左派內部學習會上質疑左派取得鬥爭勝利的說法：「我們其實在反英抗暴中失敗了，我們不再鬥下去，實際上是英國人勝利了，怎能說我們勝利呢？」他的發言令在座者極為詫異，左派出版界最高負責人唐澤霖和學習會其他負責人質疑蕭滋「你怎能這樣說」，與他展開辯論。幾天後，唐澤霖主動跟蕭滋說：「你的看法是正確的。」蕭滋估計，唐後來可能向上級請示，他本人的發言也沒有受到批評。但他表示，左派陣營從來不會公開承認「反英抗暴」鬥爭失敗。唐澤霖時任商務印書館總稽核，實際是左派三家書店（三聯、商務、中華）的最高負責人。唐屬外派幹部，思想作風極左，六七暴動期間投奔台灣的中華書店董事長吳叔同，據說因不滿唐的極左作風而作出出走的決定。

一九七八年八月三十日，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祈烽在左派慶祝國慶二十九周年籌委會第一次會議上，首次對「反英抗暴」進行「檢討」，承認六七暴動違反中央對港政策。根據《明報》報道，祈烽在講話中明確指出，六七年「反英抗暴」是錯誤的，主要是受了「林彪集團」的利用。他表示：「當時林彪知道港澳工作是由周總理管的，

所以乘着毛主席正集中精力於文化大革命的時機，搞出這個事件，企圖與周總理為難。當時將事件步步擴大，不斷升級，甚至提出了『解放香港』口號，當時的政策本來是反美為主，但在香港的做法變成了反英為主，違反了毛主席世界戰略的基本方針。今天我們是以反蘇修社會帝國主義為主，更加不能這樣做。」

當年負責指揮「反英抗暴」的祈烽接着說：「六七年新蒲崗人造花廠事件初起時，本來有談判解決可能的，香港政府又曾主動來要求和我們談判協商，希望和平解決，結果受到拒絕。現在來檢討當時的處理決定，可以說當時是犯了錯誤，這是歷史經驗教訓，值得我們記取。當時受迫害的群眾起來鬥爭，群眾沒有錯，錯的是領導。當時各階層有鬥爭委員會，然而領導上出了問題，當時的效果就不好，以後更有不少後遺症，壞的影響長期遺留下來。應當看到，中英之間有一致的地方，也有矛盾的地方。如何處理矛盾，要具體分析，要根據整個大方針來辦，無論如何不能再用一九六七年反英抗暴的手段來處理。當時勞資之間有矛盾，警民之間有矛盾，然而這些矛盾經過適當鬥爭之後是可以合理解決的。只因為受了林彪的利用，以致發展為十分不利的情況。」

他又指出：「今後要看清大勢，要接受過去的經驗教訓。要看到香港不是孤立的，受到國際上各種因素影響。香港對我們固然有壞的一面，但也有好的一面，今後要充分發揮它有用的一面，以利於我們的四個現代化。鬥爭是會有的，但要正確處理。更不能動不動就要國內出頭。」¹⁸¹時任《新晚報》總編輯的羅孚當時在場，他表示祈烽講話內容基本屬實，但他把所有責任推在林彪身上，觀點並不正確。梁上苑也指出，雖然祈烽提到應由領導來負責任，卻沒有指明是哪方面的領導。他又批評祈烽講話把全部責任推到已死的林彪身上，香港工委毫無責任，「毫無自我檢討精神」。部分與會的左派人士對這篇講話不甚滿意，對新華社就騷亂認錯感到詫異，一時接受不過來。

祈烽這番話屬左派陣營內部講話，左派報章報道時避重就輕，沒

有提及關於六七暴動「搞錯了」的部分。羅孚表示，左派報章對祈烽講話側重「正面報道」，強調「國內形勢一片大好」，完全不提「反英抗暴」的錯誤。

一位與祈烽相熟的香港左派人士向筆者透露，多年來對六七暴動保持緘默的祈烽年前私下指出：「北京對這場運動已有定論，廖承志七十年代末復出後說過『領導有錯，但群眾的愛國熱情應予肯定。』」據報道，七七至七八年間，廖承志在北京主持港澳工作會議，為六



七年左派騷亂作出結論：《明報》關於祈烽承認「反英抗暴搞錯了」的報道(1978年9月5日)。

「一九六七年在香港發生的所謂『反英抗暴鬥爭』以及隨之而來一系列做法，企圖迫使中央出兵收回香港，是與中央的方針不符合的，後果也是極其嚴重的。」¹⁸²祈烽於八四年退休返回國內，曾任廣東省政協副主席。祈烽年前曾對國內一位學者表示，六七年中國外交部遭「造反派」奪權，當時周恩來有時也控制不了。祈烽又表示，造反派更曾向他發出一些「極左」的指示，但他覺得不對頭，最後給他頂住了。

一九七三年北京當局邀請《香港夜報》社長胡棣周等人參觀亞非拉兵乓球錦標賽，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接見他們時提到六七事件，認為「你們沒有做錯，群眾愛國熱情要肯定，但當時中央某些領導同志要負責任。」

第十四章 對六七暴動的不同詮釋

一、左派社團負責人如何為六七暴動辯解

儘管左派內部承認在六七暴動犯錯，但左派社團負責人至今仍然不願公開承認錯誤。騷亂結束後，左派陣營多年來一直不欲重提舊事。近年左派工會以「社會矛盾說」和六七暴動後來「壞事變好事」的觀點，為這極具爭議的事件辯護。一九九五年九月立法會九龍東北選區直選論壇上，民主黨候選人麥海華質問工聯會候選人陳婉嫻：「六七年的暴動是誰發起的？擺菠蘿的是誰？工聯會、左派機構應該認錯，向公眾道歉。」身兼工聯會副理事長的陳婉嫻回應說，任何社會運動「都要有社會基礎」，人們對社會現象不滿，才能挑起運動。

六七暴動期間擔任鬥委會主任委員和工聯會理事長的楊光，現為工聯會顧問。九六年一月，楊光接受無線電視「星期二檔案」訪問時，首次公開談論六七暴動。他仍肯定當年的反英鬥爭，表示「不同意那是暴動」，「那時是反英抗暴，是反對港英當局使用暴力」。他又表示，當年香港左派「甚麼都說國內對，甚麼都說祖國萬歲」，「這是那個年代對我們的要求，所謂祖國的呼喚」。楊光認為：「在香港工作，首先要考慮香港的問題，不要脫離實際。國內有國內的，香港有香港的。」現已移居加拿大的前《商報》總編輯張初則認為：「不能說楊光他們的觀點完全錯誤，但社會矛盾是長期存在的，如果有人故意挑起矛盾，又怎會出現當時的局面？」

現任工聯會會長李澤添，當時以港九鞋業職工會理事長的身份，出任各界鬥委會會員。他認為「不能抽離歷史看這次運動」，堅持「反英抗暴」的基本方向是正確的。他表示：「反英抗暴是港英政府長期施行高壓手段，工人全無保障，導致民衆不滿情緒不斷累積的結

果」。他認為，六七騷亂也有積極作用，「港府在七十年代制訂大量勞工法例，確立有薪假期和遣散費等安排。港英政府明白不能單靠高壓手段進行統治，要適當保障工人的權益，這是反英抗暴的積極意義」。¹⁸³

工聯會理事長鄭耀棠六七年前已加入工聯會屬會洋務工會，當年正值少年時代的他也「激於義憤」，曾到港督府門前示威。他在九五年參與立法局勞工界功能組別選舉的宣傳單張中，提到對六七騷亂的看法：「回顧六十年代的香港，工人被資方無理剝削，民生被政府漠視；不公平、不公義之事隨處可見。各種社會矛盾的累積導致六七年的連串抗爭。無疑期間出現了不少過激的行為，不過我們不可否定的是，經過這次運動，香港政府改變了殖民地統治政策：由高壓至懷柔，由完全不理民間疾苦到作出一些讓步。我們看到公屋的大規模興建，社會福利的改善，勞工法例的制訂等。」

身兼香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的鄭耀棠接受筆者訪問時表示，左派群眾六七騷亂期間當然有些過激行為，左派當年的行為也不是完全正確。他表示：「一些群眾的暴力行為是不應該的，這場運動當然不能說沒有負面的地方，但群眾運動往往難於控制。」鄭耀棠指出，左派工會後來對事件作出檢討，認為社會矛盾是「反英抗暴」的主要原因。職工會聯盟主席、立法會議員劉千石同意六七騷亂確實有促進社會改革的正面作用，但「功勞不是左派的，他們不能將壞事說成好事」。他認為：「左派不能說這是正義的事業。」

六七暴動期間任職《文匯報》總編輯的金堯如則與左派社團負責人持不同看法。他認為，六七年反英抗暴鬥爭，「實質上是大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香港的延伸和翻版，是極左路線在香港的肆虐，是徹底破壞香港繁榮安定的自殺行為。」前中國國務院港澳辦公室副主任李後也在《回歸的歷程》一書中認為，「反英抗暴」是對中央對港方針和政策「最嚴重的一次衝擊和干擾」¹⁸⁴。

二、大陸學術界和傳媒對六七暴動的詮釋

六七暴動結束後，北京官方不願重提這次事件，大陸研究香港的學者大多對這段歷史採取迴避態度。即使少數學者提及六七騷亂，也沒有作出明確評價。廣州中山大學港澳研究中心主任許錫揮等人於八五年撰寫的《香港跨世紀的滄桑》，以中性立場向國內讀者概括介紹對香港六七左派騷亂的不同評價：「對於這次香港歷史上少有的社會動盪，人們有不同的評論。有人認為，它雖然是在中國內地文化大革命的影響下發生的，但根源在香港內部，是六十年代社會矛盾的一個總爆發，是市民對社會不公平強烈不滿的一種表現。另一種意見則認為，這是一次完全由『外來影響』而造成的動亂，它既破壞了香港社會的安定，又損害了香港與內地的關係，應當受到嚴厲譴責。」¹⁸⁵

這種情況直至香港回歸中國前夕都沒有改變，即使香港回歸倒數前一年中國大陸出現「香港熱」，介紹香港歷史的報刊和電視特輯不絕如縷，卻沒有觸及六七事件。例如北京中央電視台在香港回歸前攝製的紀錄片《香港滄桑》，回顧香港百多年歷史時迴避了六七事件。在香港聯合出版集團九七年出版的《香港》紀念畫集中，六七暴動和八九民運都不見踪影。研究香港史的王宏志認為，由於六七暴動與中國當代政治扯上關係，它在香港歷史的位置變得複雜，「一方面是英勇的反英抗暴的反殖反帝運動，但另一方面卻受到批判的文革極左思想有着千絲萬縷的關係，這便構成了論述上的困難，究竟是反殖還是極左？」¹⁸⁶

香港回歸後，這種現象出現微妙轉變，九八年在國內放映的紀念周恩來誕生一百週年的電視紀錄片《周恩來》，第八集婉轉地提及香港六七暴動：「在文化大革命中，港澳工作受到極左思想影響，發生了圍攻港督府和火燒英國代辦處的事件。」影片沒有直接提及「反英抗暴」，也沒有使用香港左派陣營常用的「反英抗暴」一詞，並傾向否定當年的事件。而香港中華書局出版的《香港全紀錄》，也提及六

七年騷亂，並對事件持否定態度。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香港史學者劉蜀永主編的《簡明香港史》(九八年四月出版)，也提及六七暴動。作者對事件作出這樣的評價：「雖然六七年事件擁有廣泛的社會基礎，但越出界限形成天下大亂之勢以來，多數市民憂心忡忡。尤其是不分青紅皂白的炸彈陣，擾亂民衆日常生活，使得左派的攻擊行動日漸失去民心」。¹⁸⁷

前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余繩武，曾編寫介紹香港歷史的《十九世紀的香港》。他從民族主義和「社會矛盾論」的角度分析六七左派騷亂，他對筆者指出：「殖民統治的存在，使香港炎黃子孫深感屈辱。五、六十年代香港民衆生活相當困難，住房嚴重短缺，工資僅能勉強餬口。一九六八年以前，港英實際上對社會福利和保障工人權益漠不關心，廣大勞工和平民百姓對現狀十分不滿，社會衝突一觸即發。」

余繩武認為，六七事件的導火線是勞資糾紛，如果港英採取明智態度，支持工人的合理要求，事態本不致擴大。「但他們竟對工人大肆鎮壓，致使衝突升級。」但他認為，香港工人和左派組織在「反英抗暴」中受文化大革命「極左」思潮的影響，採取了一些極左的鬥爭方式，擾亂了市民的日常生活，日漸脫離群眾，這種鬥爭方式顯然是不正確的。但他強調：「香港六七年的事件是香港工人和居民爭取公正待遇，反對港英暴力鎮壓的鬥爭，其合理性、正義性不容置疑。」

主編《粵港關係史》的大陸學者鄧開頌和陸曉敏，則突出文化大革命對香港左派的影響。他們認為：「毋庸諱言，中國正在進行的文化大革命對於香港這次群眾運動的發展，有着重大的影響。由於極左思潮的影響，群眾鬥爭未能得到正確的引導，而是毫無節制地一味鬥下去，致使事態迅速擴大。而中央文革控制的人民日報過激社論的發表、香港左翼新聞界某些過激宣傳，都促使了事態的惡化。」

第十五章 左派陣營在暴動期間的極左表現

文化大革命爆發後，香港左派陣營紛紛在各領域仿效大陸，「五月風暴」期間更變本加厲，更在各方面照搬大陸文革的一套，宛如「港式文革」。三聯書店、中華書局及商務印書館三家左派書店當時在店內懸掛毛澤東像和語錄牌，大部分國內書籍停售，巴金等著名作家的作品和文史書籍都因政治理由不准擺賣。左派書店只售賣毛像章、毛澤東著作、馬列著作、《人民畫報》、《人民日報》、《紅旗》、上海雜誌《學習與批判》等書刊。時任左派三聯書店副經理的蕭滋說：「那時候國內的書刊在香港非常暢銷，《人民畫報》每期銷量高達十萬冊，《紅旗》每期賣出近一萬份，《人民日報》每天銷量也高達五千份，左派群眾經常排隊購買毛著和毛像章。」當時左派工會、學校均大量訂購國內書刊，令左派書店生意滔滔。

除了國內政治報刊，政治小冊子也是左派書店的銷售重點。左派書店爲了配合反英鬥爭，經常趕印結集毛語錄、《人民日報》社論、外交部聲明及「來自祖國的指示」的政治小冊子和「反迫害語錄」，作爲左派群眾的「理論指導」。來自左派出版界的蕭滋憶述說，當年左派書店職工革命情緒高漲，熱火朝天，經常不眠不休趕印《毛語錄》和「抗暴刊物」。他說：「我們常常通宵達旦在印刷廠校對、趕印小冊子，大家情緒高漲，加班加點也毫無怨言。有時我們比左報還要快，北京今天發表聲明，我們第二天早上就拿到門市部發售。」當時影響較廣的政治小冊子包括《同學們，團結起來，投入反迫害鬥爭行列》、《黑獄雄心》等。蕭滋說：「當年這些書刊非常暢銷，剛放上書架就有很多人來搶購，銷量通常數以萬計。左派群眾更是人手一冊，買來作『學習』之用。」

左派書店員工每天要向毛澤東像「早請示，晚匯報」，並進行「政治學習」，職工吃飯前要唸毛語錄。蕭滋說：「左派書店訂下了許多清規戒律，要求職工不能聽香港電台和電視節目，一定要聽大陸電台新聞。家裏裝有電話的員工，會被批評為『資產階級作風』。」左派機構員工更被迫「六親不認」，與左派圈子以外的朋友中斷往來。由於《明報》社長查良鏞支持港英鎮壓左派，與左派勢不兩立，羅孚當時不得不與這位相識二十多年的老朋友斷絕來往。羅孚又指出，許多報社同事都把收藏多年的字畫交給機關，甚至扔掉。

當時數家香港左派報章的新聞版基本上只有兩條消息，分別是「反英抗暴」的報道和北京新華社拍發的文革進展。《文匯報》和《大公報》每天在頭版摘引毛語錄，作為左派反英鬥爭的行動指引和「最高指示」，最常用的是「帝國主義者如此欺負我們，這是需要認真對待的」、「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等語錄。兩報每天連篇累牘地刊登充滿文革語言的反英報道和評論，並刊出大量聲援左派陣營的「讀者來信」。當時任職《大公報》副總編輯的羅孚說：「那些讀者來信當然也有來自讀者的，但基本上是『編者寫信』，自寫自編，否則哪會有一天幾個整版的來信？」

兩份主要左派報章又開闢學習毛澤東思想的專版。羅孚憶述說，祈烽認為報紙不需要副刊，左派部分副刊專欄因被批判為封、資、修而一度撤銷，並停掉小說欄。由澳門左派控制的綠村電台也配合香港的鬥爭，每天播放「特種狗經」，嘲諷香港警察為「黃皮狗」，又諷刺支持港英當局的《華僑日報》社長岑維休為「狗」。而《新晚報》、《晶報》和《商報》原本以「側面報紙」姿態，走普羅市民路線，新華社卻下令三報取消一向受讀者歡迎的馬經和狗經版，三報因而流失了大量讀者。當時《商報》以中間溫和的姿態出現，反映小市民心聲，六十年代銷量一度高達十萬份，僅次於成報。但當時擔任商報編輯主任的張初表示，新華社在「反英抗暴」開始後下令《商報》取消「封資修」內容，撤掉較輕鬆的專欄和小說，換上了嚴肅甚至

「左」的文章，嚇跑了許多讀者。

六七暴動期間，由「愛國商人」開辦的國貨公司也踏上了政治化的道路。當時許多國貨公司成爲左派人士的大本營，他們經常在店內開會，左派群眾一旦遇到警察施放催淚彈，都會跑進國貨公司暫避。國貨公司職工都別上毛澤東像章，門前張貼「毛主席萬歲」的橫幅。羅孚表示，國貨公司主要從事商業經營，政治角色僅屬次要。但他指出：「六七騷動期間，國貨公司往往成爲左派的據點，在一些偏遠地方更成爲當地左派的堡壘。」

由於國貨公司「政治掛帥」，連帶業務經營也受到影響。羅孚表示，當時一些國貨公司職工受「左風」感染，對顧客擺起左的臉孔，心裏老大不願意爲「資產階級」服務。六七暴動結束後，許多香港市民都怕到國貨公司，導致國貨公司生意從此一蹶不振。

左派暴動期間，左派陣營將一切問題政治化，連體育活動也不能倖免。八月三十一日，左派背景的愉園體育會宣佈，由於不滿香港足球總會在主席李福樹「控制」下，通過支持港英當局鎮壓左派的決議，決定暫不派足球隊參加一九六七至六八年度球賽。愉園體育會指責身兼立法局議員的李福樹利用足總作爲工具，「大搞反華和迫害香港中國同胞的政治活動」，「在民族敗類李福樹控制足總，倒行逆施，死心塌地爲英帝國主義效勞的情況下，參加球賽已失去意義」。

六七暴動期間，左派群眾以油印方式出版了大量「抗暴小報」。據左派章報道，港英八月勒令《香港夜報》等三報停刊不到一星期，左派群眾共出版了一百五十多種抗暴小型報，「如雨後春筍，繁花競放」，「每天都有新的抗暴小型報誕生」，十月下旬更增至五百多份。這些小報計有《烽火》（烽火戰鬥隊編印）、《新青戰報》（紅色宣傳造反兵團新青文社）、《熔爐》（雷鋒武工隊宣傳部）、《游擊戰報》（紅衛戰鬥隊）、《抗英報》（紅色戰鬥隊）、《前哨兵》（反英印務公司）、《新香港夜報》（抗暴宣傳輕騎隊）、《熱血》（六二三戰鬥隊）、《掃英》（打狗滅豬先鋒隊）、《小鬼報》（反帝小鬼隊）、《造

反戰報》(紅色青年)、《怒吼》(風雷戰鬥兵團宣傳組)、《紅岩戰報》、《抗英戰報》(紅色工人造反兵團)、《平英戰報》、《人民之聲報》、《燎原》、《鬥到底》、《風雷激》、《換新天》等。左派認為這些小型報「是插向敵人要害的尖刀」，「白的進去紅的出來，刀刀見血，在新聞戰線上打出了一場犀利無比的人民戰爭」，是「港九同胞在反英抗暴鬥爭中的一項偉大創舉」。

第十六章 壁壘分明：中英官員與六七暴動參與者的回憶與反思

一、姬達的難過與不安

——港英當局的版本

姬達簡歷：

一九二二年出生，四五年赴港工作，歷任港府漁農處處長、防衛司、工商署署長等要職。六七年左派暴動期間擔任港督私人助理，後調任副布政司（特別事務），專責處理騷亂事宜。七四年港府成立廉政公署，獲委任為首任廉政專員。七八年升任布政司，八二年調任港府駐倫敦專員，八四年正式退休。曾任香港中華電力有限公司董事，參與籌建廣東大亞灣核電廠，現任荷蘭證券亞洲有限公司董事。



姬達近照（劉瑜——《亞洲週刊》）。

六七左派騷亂期間，姬達（Jack Cater）擔任港督私人助理兼副布政司，是港英當局處理左派騷亂的主要決策官員。港督戴麟趾六月返回英國療養，姬達更直接負責鎮壓騷亂。現任荷蘭證券亞洲有限公司董

事的姬達接受筆者訪問時，堅持港英政府當年的鎮壓行動是正確和有必要的，但承認警方當年出現個別濫權情況，令他深感不安。

姬達回首前塵時，深深陷進歷史的沉思中，雙手不時輕捏眉心。六七年五月中旬開始，香港左派領導層發動群眾前往港督府輪番示威，港英當局最初持容忍態度。姬達指出：「我們認為應該容許左派示威者前往港督府抗議，幹他們想幹的事，並讓他們和平散去。如果他們的行動僅止於抗議和叫口號，我們會接受。」他透露，他曾與左派社團負責人接觸，就示威問題達成默契。姬達說：「騷亂爆發前，我已認識（《大公報》社長）費彝民等左派領導人。他們跟我說：『讓我們示威抗議，我們會和平離開，保證不會帶來麻煩。』我說：『好吧，如果你們的行動純屬和平抗議，沒有問題。但你們必須保持示威秩序良好，不能在街上搗亂。』」他又表示，「一位在香港共產黨很高層的人士」曾經安排與他會面，但後來形勢漸趨緊張，兩人始終沒有在騷亂期間會面。

左派陣營的抗議初期秩序大致良好，示威者只是在港督府門外張貼大字報和朗讀毛語錄。姬達更表示：「我們甚至容許他們搖動港督府正門鐵閘，並將抗議信留在大門外。我們指示警方保持克制，雖然不少示威者指罵他們，並將手指插向他們的眼睛，我們向警察派發防護眼罩，保護他們的眼睛。」當時位於中環德輔道中的中國銀行大廈，一位「吳先生」每天都利用大廈五樓的擴音器播放反英口號，港府也在拱北行政府新聞處播放中國音樂和歐西流行曲。每當姬達和港府政治顧問 Tony Elliott 等人行經皇后像廣場，這位吳先生都會向他們大聲吼叫：「殺死你們這些英國人」。

五月二十二日，警方與示威者在港督府附近發生衝突，左派稱為「花園道血案」。姬達指出，左派陣營利用「無知的左派學生」上街示威，學校教師事前指示他們倒在地上，並拿出塗上紅汞的綑帶紮在頭上，「製造警察血腥鎮壓的場面」。但他表示：「幸好在現場採訪的外國電視台拍下了左派示威者『製造流血場面』的過程，運氣實在

太好了(Great good fortune!)。」他憶述說，示威者離開港督府後在中環街頭發動騷亂，不斷擲石，砸毀不少商店窗戶。姬達強調：「你不能容忍人們發起騷亂，你必須採取行動，制止動亂。示威演變為騷亂，事態發展實在很不幸。」他估計，左派陣營接到北京的指示，遂將抗議行動升級。

姬達指左派首先發難，左派陣營則強調事件源於警方毆打左派群眾。三聯書店副經理蕭滋率領左派示威者前往港督府途中，在希爾頓酒店被防暴隊截停毆打。姬達說：「我没有聽說過有人在等候前往港督府途中，被警方以警棍毆打。但我得到的消息是，警方執行職務時確曾毆打一些滋事者。」

警方將被捕的左派示威者帶返中央警署，確曾發生一些警方濫用私刑的情況。五月二十二日騷亂當天，監獄署長前往中央警署視察，傍晚時分姬達接到監獄署長的電話：「這裏發生的事情很可怕，被捕的示威者乘坐卡車來到警署，每五、六人分為一排，當值警員用粗大警棍毆打他們。」姬達認為，必須制止這些粗暴行為，當晚立即下令調走那些「有問題」警員。他說：「我承認一些左派示威者確遭警方毆打，我聽到消息後很難受，我們當晚採取行動。大致上制止了警員濫權施暴的情況」

自稱港府「溫和派」官員的姬達表示，六七騷亂期間最令他感到難受的，是兩名參與騷亂的左派工人被警方拘留期間，遭警員用警棍毆打致死。當時副警務處長打電話給姬達，要求與他立即會面，告訴他這件事。姬達認為事態嚴重，下令必須制止這類事情發生，警方更扣押涉案警員。他說：「我當時向公眾表明，警方謀殺疑犯是絕對錯誤的。」左派騷亂結束後，港府對事件展開調查，當局認為死者屬「意外死亡」，首席大法官決定不起訴兩名涉案警察，並且宣佈釋放兩人。姬達對當局的決定很不安，認為這是「香港政府的污點」。

作為港督私人顧問，姬達與戴麟趾關係非常密切，他的辦公室就在戴麟趾旁邊。左派發動騷亂後，兩人每天早上八時定期會面，姬達

向戴麟趾匯報當前局勢。左派示威者包圍港督府期間，不斷高呼「打倒戴麟趾」的口號，姬達留意到戴麟趾備受困擾，甚至感到恐懼。姬達憶述說：「示威開始一兩個星期後，他開始出現異樣，身體開始消瘦。」他跟戴麟趾打趣說：「你有甚麼不妥？你別聽那些可惡的醫生的話停止吸煙，你應該恢復抽煙。」他表示，戴麟趾後來表現不錯，六七年六月底飛返英國，九月重返香港。布政司祈濟時(Michael Gass)在這段期間署理港督職位，但警務處長也返回英國老家暫避，姬達調任副布政司(特別任務)，在應付左派騷亂的角色更為吃重。

踏入六七年七月，部分左派群眾發動「炸彈攻勢」，在鬧市放置土製炸彈，造成十六人喪生。姬達對一宗在港島北角發生的爆炸案印象最為深刻：「一位男子帶著兩名孩子，在一輛貨車車底下放炸彈，炸彈突然爆炸，炸死了他的孩子，這是一宗悲劇。」對於一些左派人士懷疑部分炸彈是港英政府放置的說法，姬達斬釘截鐵地說：「這是完全荒謬的說法。」

港府當局爲了對付左派滋事者，制訂了一系列嚴苛的緊急法例，一些社會人士質疑這些法例剝奪公民權利，而當局一些拘捕行動也引起爭議。姬達不同意這些看法，並特別加重語氣說：「左派滋事者在街上胡亂殺人，我們不得不採取行動。你不是基督徒，只會說：『噢，我的天，多可憐啊，今天死了五十一人，明天又有二十人喪生。』不能這樣下去。」自七月開始，港府利用緊急法例賦予的權力，在未經審訊的情況下將一些左派社團負責人關進摩星嶺集中營。姬達爲此辯解說：「警方政治部拘捕他們，是因為他們製造麻煩，如果他們沒有被關進度假營(holiday home)，局勢可能進一步惡化。」他每星期前往摩星嶺集中營巡視，確保營內的左派人士得到良好待遇，沒有被毆打。他說：「當然營內生活不會很愉快，但他們不是囚犯。」

姬達強調，港府針對左派的行動得到行政立法兩局議員和市民的全力支持。李柱銘(現任民主黨主席)、蘇澤光(現任地下鐵路公司主席)、詹德隆(時爲香港大學學生會兼專上學生聯會會長)等年輕專業

人士和大學生，都主動向姬達表示支持港府的行動，並向港府致敬。他又表示，美國「幫了我們很大忙」，例如提供行動所需的器材。

《人民日報》六月三日社論呼籲香港左派「隨時響應祖國號召，粉碎港英統治」，許多香港人擔心中共提前收回香港。七月八日，中港邊境爆發沙頭角事件，懷疑是大陸民兵的武裝人員越過華界，包圍沙頭角香港警崗，與警察發生槍戰。姬達當天接到緊急電話，通知他一名解放軍將領到沙頭角邊境與民兵談話，中午一時一些武裝人員與大陸民眾在邊境集結。港府高層獲悉槍戰爆發後，迅即舉行緊急會議，決定調派啞喀兵團趕赴沙頭角邊境增援。姬達回憶說：「這是香港最困難的時刻。」當時流言四起，他還記得英國《星期日快報》竟然報道，二千名解放軍越過中港邊境。

當時港府是否擔心北京以武力收回香港？姬達指出，當時港府高層就此反覆討論，他們後來獲得來自北京的消息：周恩來表明文化大革命不應延伸往香港，香港左派的行動必須停止。港府因此不太擔心中共使用武力收回香港。

姬達的親身經驗告訴他，北京沒有打算提前收回香港。一九六六年，他前往英國帝國防衛學院(Imperial Defence College，後改名為皇家防衛學院)進修，直至翌年一月才返回香港，出任港府防衛司(Defence Secretary)。六七年初，他偕同妻子到澳門了解「一二三事件」後的局勢，獲安排與葡萄牙特使見面。

他啓程前聽到一些傳聞，指這位葡國特使較早時奉命到北京，要求北京作出抉擇：制止澳門左派發動的暴亂，或收回澳門主權。葡萄牙特使告訴姬達，六六年十二月他在葡萄牙駐北京大使陪同下，向中國外交部官員交涉。當時造反派已奪了中國外交部的權，兩名十五至十七歲的紅衛兵向他們高叫口號，一小時後特使詢問可否上廁所，紅衛兵「小將」不客氣地說：「不可以，你給我坐在這裏。」再過了一會，一位二十五、六歲的外交部中下級官員出來表示：「我們不想要回澳門，我們希望你們留在澳門。你們立即回澳門吧。」這是姬達首

次發現中國政府其實相當理性，沒有計劃在香港製造麻煩。他表示：「當我們遇到六七年的問題時，我們相信問題不會太嚴重。」

雖然姬達有信心北京不會全力支持香港左派，但六七年八月港府接到來自北京的消息，指「我們幫不了甚麼忙(We are unable to be helpful)。」姬達認為，香港左派的行動違背了北京的指示，他們都希望北京提早收回香港。六七年十月，香港局勢漸趨平靜。當時一位接近北京領導人的香港知名人士告訴他：「周恩來等中國領導人認為香港左派的行動是錯誤的，必須制止。」姬達曾與一些左派社團負責人來往，左派騷亂結束後，港府官員與左派負責人恢復往來的酒會，他碰到一些當時勢不兩立的新華社官員和左派領導人。姬達表示：「他們說六七年的做法是錯誤的，並向我們道歉。」

香港不少學者認為，香港六十年代的社會矛盾是導致六七騷亂的其中一個原因。姬達承認，港府和不少工廠僱主並非「慷慨的僱主」。他說：「當我發現許多人每天辛勤工作，每天工資僅得寥寥數元，我感到很難過。這些人的生活確實相當困難，他們的僱主也沒有善待他們，這是我們社會的嚴重問題。」

姬達認為，六七暴動是香港二次大戰後影響最深遠的事件，更是香港社會發展的分水嶺。他表示，這次事件令港府關注市民的需要，並成為七十年代政策變革的催化劑。他指出，港府吸取了六七騷亂的教訓，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他說：「我們設立民政署，加強政府與市民的溝通。六七年以前，香港沒有任何真正官民溝通的渠道。」姬達指出，港府於七十年代初期實行每星期一天有薪假期，「幾乎所有商界人士」都反對，認為「不，中國人喜歡工作嘛」。他坦言，如果沒有發生六七騷亂，「我不認為港府會推行任何改革」。

但最令姬達遺憾的是，港府沒有在六七事件後推行政制民主化。他早在五、六十年代已提出為香港引進民主制度。他說：「我不明白為何我們在民主發展方面那麼緩慢，只要香港人得到實行民主的機會，他們可以做得很好。」

二、曾德成對青春無悔

曾德成簡歷：

一九四九年出生，六七事件期間在聖保羅書院就讀中六，因同情左派群眾，在學校派發反英傳單，被校長報警拘捕，被判入獄兩年。六九年出獄後加入左派《新晚報》，後任《大公報》總編輯及副社長，並於九五年當選香港新聞行政人員協會主席。曾九三年當選第八屆中國全國人大香港區代表，九七年底連任第九屆人大代表。九八年八月獲特區政府招聘為中央政策組顧問。兄長曾鈺成是香港左派陣營重量級人馬，目前擔任民建聯主席及特區立法會議員。

三十二年前從隔壁囚室傳來的淒厲聲音，至今仍不時在曾德成耳際縈繞。曾德成當時正在赤柱監獄服刑，常在夜闌人靜的時候聽到拳頭撞擊肌肉、拖鞋飛脫的雜音，那是當年赤柱監獄獄警毆打左派囚犯時發出的聲音。如果一九六七年沒有爆發左派騷亂，曾德成不是進入了港英建制，就是遠赴歐美國家升學，「大好前途」唾手可得。但曾德成因不滿港英統治而捲進政治漩渦，後來更度過了一年半的鐵窗生涯，六七暴動顯然改變了曾德成的命運。

自從曾德成六九年離開赤柱監獄後，三十多年來絕少公開憶述往事，因為「不想給人翻舊賬的感覺」。許多記者希望採訪他，他都推掉了。他對筆者說：「我就跟你談，以後也不會再談了。」

六七暴動爆發之際，曾德成時年十八歲，是香港聖保羅書院中六理科班學生，與左派陣營沾不上邊。聖保羅書院是當地首屈一指的名校，是英國聖公會開辦的學校。在那個精英教育的年代，聖保羅更是典型的社會精英訓練場。能夠考進這所中學的學生，一隻腳已跨進了香港最高學府—香港大學的門檻。曾德成在六七年中學會考取得一優六良的優異成績，成績位居校內前列，升讀香港大學指日可待。他同時是學校領袖生，並負責一些學會的工作。他的長兄曾鈺成也是聖保

羅書院畢業生，當時正在香港大學就讀數學系三年級。他的父親曾照勤當時是香港中華總商會文員，相信是曾德成與左派陣營的唯一聯繫，但曾家並非「根正苗紅」的左派群眾。

儘管曾德成是精英教育下的幸運兒，但他一直對香港殖民地教育制度很不滿意。曾自幼喜歡閱讀，原本愛看占士邦、馬克吐溫的英語小說，但他逐漸對當時的教育制度產生懷疑。他憶述說，當年教師的教學方法很簡單和「直觀」，「校內老師以英語授課，但許多教師英語不太靈光，不能流利講



曾德成近照。

課，更唸錯一些英語語音。」不少教師不能以流暢英語授課，打從上課開始即在黑板上抄筆記，直至下課為止。曾德成一向喜歡挑戰權威，曾當面挑戰一些教師的教學方法。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副所長劉兆佳，是曾德成初中階段的同班同學。他憶述說，曾德成當年成績相當優異，但性格較倔強，常在課堂上提出異議，甚至與教師爭論。劉表示：「當年社會風氣較保守，部分教師對權威受挑戰不太高興。」

但劉兆佳表示，曾德成當時並非「政治上活躍」的學生，甚少與

同學討論政治問題及公開發表政見。他說：「當我和其他同學後來知道他在校內散傳單，我們都很詫異。」根據《文匯報》記者張雲楓（現任《文匯報》總編輯）撰寫的報道，曾德成原先「沒有設想過自己長大了應該怎樣為祖國為人民服務，卻計劃讀完聖保羅後，怎樣去考香港大學，然後再去美國或者其他國家留學，撈個甚麼『博士』之類的頭銜……」「未轉變前的曾德成」不關心自己祖國的國家大事，也不關心自己的親人，「有時母親要他上街買些豉油之類的東西，他必然堅決拒絕，因為在他的心目中，勞動是不光彩的，工農是『卑下』的，『高尚』的就只有像他那樣讀洋書、不勞動的人」。¹⁸⁸

六七年五月六日新蒲崗大有街事件後，原本不太關心政治的曾德成逐漸同情左派示威者。他回憶說：「反抗抗暴爆發後，我在報紙看到一幀令我印象深刻的照片：一群學生前往慰問人造花廠工人，港英防暴隊向他們施放催淚彈，但這群學生依然手拉着手。我看到這幀照片後，開始同情左派。」

六七年暑假期間，曾德成與數名同情左派的同班同學碰頭，各人出於「少年意氣」，計劃有所行動。九月開課後，曾德成等人在學校面向堅道的馬路，懸掛寫上「反對奴化教育」的布條。九月底，他們在一位同學家中油印傳單，方法是以硬鋼筆在鋼板刻寫字樣。曾憶述說，傳單內容大意是「譴責奴化教育」、「殖民教育不合理」等。

六七年九月，曾德成升讀中七，還有不到一年就可以考進香港大學。九月二十八日是改變他一生命運的一天。中午午飯時間，曾德成與數名同學在學校課室派發傳單。他當天照常結上領袖生領帶，並佩帶「學長章」，因為他覺得這是「光明正大的行動，沒有想過要掩飾」。他說：「我從來沒想過搞秘密行動，也沒有考慮行動的後果。」

校方聞訊後報警，校長召集師生，展開辨認派發傳單者的行動。由於曾德成行動時結上領袖生領帶，而且他負責一些學會工作，屬於校內的風頭人物，一些低班學生很容易就認出他。回首往事，曾德成

沒有特別怨恨那位英國人校長。他表示：「在當時的社會氣候下，如果不報警，就要承擔很大風險，我不怪他。況且港英政府頒佈了多項緊急法令，形勢非常緊張。當然，如果他持諒解和寬容的態度，可以把事情大事化小。」當年與曾德成一起行動的同學都沒有被認出，部分人後來到外國升學，他們之間仍時有聯絡。

曾德成被警察帶走後，在警署「雜差房」遭便衣警探毆打，導致胸口瘀傷。他表示：「當時一位教師在現場目擊事發經過，但他裝作看不見，沒有向警方投訴，很沒有正義感。」曾稍後被當局以「派發煽動性傳單」的罪名起訴。他指出，當時左派培僑中學一些被捕學生在法庭上擺出蔑視態度，左派學生界中更有「三不」原則：「不上證人台、不聘請律師、不答辯」。由於當時曾德成沒有左派背景，左派社團沒有給予支援，他家人又沒有錢替他請律師辯護，他唯有在庭上自辯。

他在法庭上自辯說：「我說的都是事實，不構成煽動。」他的辯解當然不起任何作用，法官判處他人獄兩年。他對判決感到深深不忿，強調自己的行動只是「出於正義」，「沒有人指使我」。他說：「不管別人是否認同我的觀點，但現在的角度來看，我當年的行動從只是行使言論自由的權利而已。」法官宣判前詢問曾父曾照勤有甚麼話要說，曾父不但沒有求情，反而說：「我對兒子的作為感到驕傲。」

兩年刑期意味曾德成失去了升讀大學的機會，賠上了唾手可得的「大好前途」。曾德成表示：「父母對我被判入獄，最是傷心。」他的父母當年千方百計安排他升讀聖保羅書院，他還清楚記得母親特地在學校門外輪候了好幾天，替他申請入學。他指出：「父母希望送我進英文書院，日後出人頭地。在那個年頭，不懂英語連住宅電話也申請不了，因為不懂寫英文信，根本沒有人睬你。」

聖保羅新生名單公佈當天，曾德成雙親發現兒子的名字，非常高興。曾德成「前途盡毀」後，他的父母傷心欲絕實在不難想像。曾德

成入獄後，在庇利羅士書院就讀的妹妹曾勵予不久也因參與左派反英活動而被捕入獄。曾鈺成憶述說：「弟妹相繼入獄後，母親整個人垮了，幾乎天天在家裏痛哭流淚。」他也因弟弟被捕，在香港大學受到不少壓力。

曾德成被判刑後關進赤柱監獄，這位養尊處優的書院學生開始面對艱苦的牢獄生涯。他被編進「YP倉」（青年犯人監倉），與三十多名左派年輕犯人一同囚禁。他說：「當年廉政公署還未成立，監獄署非常黑暗腐敗，坐牢可說全無人權可言，囚犯被獄警毆打是家常便飯。當時部分囚犯非常仇視『左仔』，經常毆打左派背景的囚犯。」他曾經在囚室中聽到一些左派囚犯被獄警毆打，「拳頭撞擊肌肉、拖鞋飛脫的聲音清晰可聞，但他們依然一聲不吭」。他表示：「這些聲音至今仍然在我耳際徘徊。為甚麼我要重述這些往事？就是為了說明很多左派人士當年確實受到港英迫害。他們完全喪失人權，我對西方國家的人權觀念感到很諷刺。」

但他本人入獄期間沒有被人毆打，「可能是因為我的書生模樣吧」。而最驚險的一次是一位以「辣手」著稱的獄警領他到監獄一偏僻角落，徘徊一會兒後卻帶他返回囚室。曾德成後來想起這件事，不禁冷汗直冒，驚覺逃過大難。

當年監獄生活條件相當惡劣，囚犯膳食很差，他形容服刑期間「長期處於饑餓狀態」。他說：「雖然獄方表面上制訂了膳食應含多少卡路里的標準，但我們根本吃不飽。」午飯一般是紅豆和眉豆熬成的稀粥，晚飯只有少量白飯及蕃薯、芋頭等雜糧，一條鹹魚和一塊像紙巾般薄的豬肉片，飯菜更經常夾雜頭髮絲和老鼠糞便。他說：「我活了這麼多年，首次明白甚麼是挨餓。由於食物不夠，我們連鹹魚頭部和魚骨也吃掉。」

他和數名來自左派學校的年輕囚犯一度抱有「浪漫主義」的想法，以為自己不吃飯，其他人就可以吃得飽一點。他們決定部分人在監獄職員分派飯菜時躲起來，五個人吃三個人的飯。這種「毫不利

己，專門利人」的做法只堅持了兩、三天，他們就捱不住了

曾德成當時不但吃不飽，也穿不暖。赤柱監獄位於海濱，冬天寒風砭骨，但囚犯身上僅有線內衣和粗布製成的外衣，他們唯有將日用毛巾纏在頸上，聊作禦寒之用。一天，兩名英籍太平紳士在監獄職員陪同下巡視監獄，事前一些老犯人吩咐眾人「拖水落樓」，即將圍在頸項的毛巾除下來，以免被太平紳士看見。兩名太平紳士身穿過膝的呢絨大衣。數名老犯人負責鳴鑼開道，大叫：「紳士到，有甚麼投訴？」曾德成等人冷得瑟縮在地上呆坐，沒有吭聲。他對此情此景感到很憤怒：「如果那兩名英國人稍為有點人道主義精神，應會注意到我們冷得牙關打戰。但他們一句話也沒說，太平紳士從此令我留下非常虛偽的印象。」

六七年十一月，赤柱監獄部分成年犯人發起抗議行動，曾德成率領 YP 倉犯人罷工，拒絕從事獄方安排的工作。眾人結果被罰「上天山」半個月，即單獨囚禁。曾德成說：「職員白天將所有毛氈和竹蓆拿走，我們睡不了覺，只能呆坐地上。」他指出，單獨囚禁的滋味非常難受，幸而有囚犯曾學習航海技術，遂向一牆之隔的同伴傳授航海用的摩士密碼，各人於是在「上天山」期間利用密碼互相「打電報」，聊解單獨囚禁的苦悶。但他指出：「摩士密碼必須諳英語才能弄懂，當時被單獨囚禁的左派學校學生，年紀最少的只有十三歲，又不懂英語，他們無法與其他人溝通，這非常不人道。」

他表示，在 YP 倉犯人中，自己年紀較大，而且思想較成熟，當年在校內派傳單是有意識的行動，但許多年輕左派犯人都是無辜被捕，甚至胡裏胡塗被抓進監獄。一些左派學校學生被安排到左派工會慰問工人，剛巧港英防暴警察搜查左派工會，被警方一併抓去。曾德成說：「一位左派學校學生出獄後精神錯亂，生活非常悲慘。」一些獄警知道他們因政治原因入獄，不惜冒被處分的風險，帶報紙給他們看，他對此相當感激。

曾德成的舉動在左派陣營眼中屬「勇敢」和「正義」的行動，因

為這位出身名校的學生竟然「倒戈相向」，對左派來說極具宣傳價值。《文匯報》形容曾德成的「覺悟和成長過程」，「就是千千萬萬受港英蒙蔽的學生覺悟和成長的過程；他所走的道路就是廣大書院學生所要走的道路」。《文匯報》更讚揚他是「學生中的一面旗幟」，是「大專學官津補私學校同學的好榜樣」；「一個被蒙騙在奴化教育堡壘的書院生，一枝溫室裏的花朵，在偉大的毛澤東思想的陽光雨露哺育下，在大風大浪的鍛煉下，終於成長為一個具有高覺悟的抗暴戰士了。」這篇文章深信「烈火可以煉出真金，黑獄可以煉出英雄漢」，「我們年輕的曾德成戰士，正沿着這條道路邁進。我們完全可以預言：當勝利日子到來的那一天，一個更成熟、更加堅強的曾德成必將出現在我們的面前」。

六九年二月，經過「大風大浪鍛煉」的曾德成步出赤柱監獄。左派社團派員到監獄門外迎接這位「抗暴戰士」，專門負責聯絡青少年的「青年樂園」更舉辦歡迎會。當時左派培僑中學和《新晚報》分別向他招手，他首先到培僑面試，獲校長吳康民接見。吳與他談了幾句後，在他面前打電話給《新晚報》總編輯羅孚。羅孚希望曾德成到《新晚報》工作，曾就這樣加入左派新聞界，一幹二十九年。

曾德成自言願意加入左派報界，是因為受到作家魯迅的影響。他在獄中常看魯迅作品，非常佩服這位以辛辣筆觸批判社會積弊的作家 棄醫從文的魯迅在《示眾》中哀嘆中國人不是被當眾行刑，任人宰割，就是淪為看熱鬧的「看客」，曾德成對這篇雜文很有共鳴。他說：「我在出獄前覺得如果將來從事一些朝九晚五，替老闆賣命的工作沒有甚麼意思，希望能做一些有意義的工作，為人民服務。對我來說，記者是能夠喚醒民衆的工作。」

他加入《新晚報》後，迅即在左派新聞界嶄露頭角。他從港聞記者做起，後來升任副採訪主任、要聞課主任及編輯主任。曾任《新晚報》總編輯的羅孚指出，由於曾德成頗為能幹，在《新晚報》頗受重用，很快就晉升為要聞課主任。羅孚表示，隨着他年事漸高，曾德成

已被選定為他的接班人。八十年代初期，北京當局以「間諜」罪名將羅孚軟禁在北京，《大公報》副總編輯趙澤龍八四年調任《新晚報》總編輯，剛巧《大公報》急需填補趙的空缺，遂力邀曾德成轉往《大公報》工作。他八八年獲《大公報》擢升為總編輯，九十年代初更升任副社長。

曾德成因反英入獄的紀錄，是否導致他在左派新聞界屢獲擢升的重要「資產」？他對這種說法不以為然：「任何人如果只有入獄紀錄，卻沒有實際工作表現，我想不太可能獲上級重用吧。」曾同時出任多項中方公職，八八年當選第七屆中國全國人大香港區代表，九三及九八年均順利連任。九八年八月，曾獲聘為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顧問，合約為期兩年，暫時離開左派新聞界。

「我沒有絲毫悔意」

曾德成因派發傳單而喪失升讀大學的機會，他不少中學同學順利踏上青雲路，成為政府高官及知名學者。他坦言對當年「出於少年意氣」的行動「一點也不後悔」，「沒有絲毫悔意」。他強調：「雖然我因入獄而失去了一些機會和時間，但我在獄中得到的東西一生受用不盡：那兩年學到的東西在其他地方學不到，在書本上更不能學到。」他表示，他在監獄中重新認識人生目標，建立了新的人生觀，一般人重視的金錢、名譽和地位，他從此不太看重。

牢獄生涯的磨練，也令曾德成開始尊重勞苦大眾：他接受筆者訪問時承認，他當年備受精英教育薰陶，覺得自己「高人一等」，渴望他日成為社會上的「頂尖份子」。他憶述當年的精英心態時說：「那時候母親叫我上街買東西，我會覺得可恥。母親有時候在午飯時間跑到學校送飯給我，其他同學的女傭卻坐轎車到學校送飯，我覺得很羞恥。」在赤柱監獄左派犯人中，他的教育程度最高，但出身工人的左派犯人的優良素質令他「很感動」。他看到一位被警察打傷的工人，仍然在獄中照顧「難友」，使他體會「時窮節乃現」的真義。他說：

「兩年牢獄生涯使我的思想觀念產生根本變化，受一點苦是值得的。」

對於三十二年前席捲香港的反英騷亂，曾德成承認左派群眾一些行爲確實過激和「過火」：「左派放炸彈是非常愚蠢的行爲，你放炸彈，別人也可以放。」他曾聽一些左派朋友說，當年部分炸彈「其實是港英插賊嫁禍的」，例如北角清華街兩名姊弟被炸彈炸死，就可能是港英嫁禍的結果。他強調：「左派部分行爲確實過激，當時許多左派參與者都沒有經驗。」但他堅持當年左派行動基本上正確，「我不否定左派群眾部分行爲過火、愚蠢和不合理，但當年那麼多人參與，是英國殖民統治下民衆應有的抗爭行動」。他始終認爲：「六七事件是愛國抗爭，歷史應該作出這樣的評價。」

儘管曾德成挨了兩年「政治監」，但他仍能以理性態度看待六七事件。他同意文化大革命的影響導致香港左派群眾「失控」，違背了中國總理周恩來「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對港政策。曾批評當時一些左派人士着意推翻港英統治，是「很愚蠢的想法」。但他同時指出，當年香港的社會矛盾是導致六七騷亂的重要原因。「爲甚麼反英抗暴牽動那麼多市民參與？就是因爲當時社會矛盾非常尖銳，殖民統治非常高壓和赤裸，六六年已爆發了天星小輪騷亂。」根據他在赤柱監獄的觀察，六七騷亂期間被關進赤柱的犯人主要分三類，分別是有組織的左派群眾、胡裏胡塗被捕的一般市民和像他那樣不滿現狀而參與反英行動的人。他認爲，港英當局提出的「保持繁榮安定」口號很成功，當局得以平息騷亂，相反左派陣營採取的過激行動失去市民支持，策略嚴重錯誤。

六七暴動期間擔任《文匯報》總編輯的金堯如表示，八二年他和曾德成一同到北京，出席港澳辦討論香港回歸問題的會議，兩人談起「反英抗暴」的問題。他引述曾德成說：「當年我們每天早上先讀你在《文匯報》寫的社論提出的『行動任務』，然後每天照着去幹。誰知道……」

曾德成則指金堯如所說與事實不符。他當時在會議上指出，六七年前左派傳媒對群眾產生了煽風點火的作用，必須吸取當年的慘痛教訓。他對筆者表示：「金堯如當年在文匯報以筆名『管見子』撰寫評論，言詞激烈。他寫了一篇題為《拿起武器，奪取武器》的評論，有人看後真的向警察搶槍，這篇評論確實起了很壞的影響。」

像許多曾參與六七暴動的左派人士一樣，他深信這次事件推動了香港社會的轉變。他表示：「麥里浩(七一年)接任港督後，先後推行十年建屋計劃，並成立民政署和廉政公署。我認為這是港英政府對六七年前反英抗暴的回應，反英抗暴顯然推動了香港社會的變化。」

曾德成多年來不願重提往事。他說：「當年確有不少人遭受迫害，他們的遭遇值得同情。但他們在香港回歸前後採取寬容態度。即使他們至今仍然處於社會中下層，但他們對那段往事既往不咎。」

獲委太平紳士觸痛歷史傷口

去年三月二十六日，港府憲報刊登了一段簡短的公告：「特區行政長官董建華已依據《太平紳士條例》第三(1)(a)條所賦予的權力，委任三名中央政策組顧問在任職顧問期間為太平紳士，任命由三月二十六日起生效。」類似的公職任命消息，香港傳媒一般興趣不大，但這段公告卻引起一些報章注意，因為曾德成是其中一名獲委任的太平紳士。

這項任命重新觸發社會人士有關如何看待這段歷史的爭論。曾德成獲委任為太平紳士後，民主黨成員、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主席涂謹申接受《星島日報》訪問時表示，他「不清楚」曾德成當年犯了哪些罪行而留下刑事罪行紀錄，但無論當年他為何入獄，始終是經過司法程序而定罪，如果政府考慮委任一名有案底的人士出任太平紳士，要考慮這項任命是否令人信服及受人尊重。他又表示，當局委任一個有案底的人為太平紳士，肯定會引起部分社會人士的爭議。

四月十七日，香港《太陽報》大字標題「曾德成首當有底紳

士」，報道他出任太平紳士的消息。親中報章《大公報》則於三月二十九日發表題為《當年反抗殖民迫害者無罪》的評論文章，為曾德成護航。作者關昭認為曾德成當年沒有作奸犯科，也沒有危害社會，並指涂謹申不可以拿曾當年坐牢的「殖民迫害事實」，作為反對曾德成出任太平紳士的藉口，「嚴重傷害」當年的「被迫害者」，也是對同情這場鬥爭的愛國人士感情的「挑釁和侮辱」。他又質疑涂謹申「是否認為當年殖民統治者迫害香港中國同胞是一件正確、合理的事？被打被關被殺的同胞都是活該？」

曾德成看到這些報道後，感到無奈。他不認同有刑事案底者不能擔任太平紳士的說法：「我當年被判刑完全是政治迫害，如果派發傳單也構成刑事罪行，這些年來香港很多人會被捕入獄。假如我因為當年的事件而不能當太平紳士，那麼曾經因爭取民主而入獄的南非總統曼德拉和南韓總統金大中，也沒有資格當總統了。」他認為：「香港已踏進新歷史時期，不應再以殖民統治時期的標準看問題，像我這樣的罪名其實應予推翻。現在還有些人帶着歧視眼光，不能正確評價愛國人士，往往把好事看成壞事。」九八年八月，他獲委任為港府智囊機構中央政策組全職顧問，當時一些政界人士基於他的左派背景，質疑當局的決定。公務員叙用委員會通過他的任命前，警方保安處(原名政治部)對他進行「品格審查」，要求他填報是否有刑事罪行紀錄，他沒有隱瞞，如實填報。

他強調，全國人大代表在他眼中已是非常崇高的身份，他沒有必要追求甚麼太平紳士的名銜，但他樂意承擔與官職相應的義務。但三十二年前對太平紳士非常不屑的少年，因緣際會當上了太平紳士，需要承擔聽取囚犯申訴的義務，甚至可能重臨赤柱監獄舊地，不啻是歷史的反諷。他笑說：「我尊重太平紳士制度，我會努力履行職責。」

四月底，涂謹申特別向民主黨一些資深成員了解曾德成當年被判刑的來龍去脈，後來致函《大公報》作者關昭，指「正如你所說，曾德成先生當年的案底僅屬行使自由表達意見的權利，不應視作一般刑

事案底，這宗案件不應妨礙曾先生出任公職。正如王丹、魏京生當年爭取民主自由，因政治原因被判入獄，也不應妨礙他們日後出任公職。」他又認為，曾德成其實是良心犯，而朱鎔基五十年代被打成「右派」，後來也獲得平反，現在更當上中國國務院總理。涂更將函件副本寄交曾德成本人，清楚表達他的看法。

金堯如也認為，像曾德成這樣「抱着愛國熱情和民族情感參加反英抗暴鬥爭而遭港英加諸罪名者」，香港特區政府都應一律予以推翻，還他們一個清白。

老左派滿腹牢騷

部分六七年被捕入獄的左派人士，希望九七後獲特區政府「公平對待」。曾德成指出，香港回歸中國後，左派人士中「有相當意見」要求特區政府處理六七年的歷史問題，甚至通過正式程序推翻當年的罪名。他認識三數名左派人士當年因政治原因入獄，近年在擔任公職時遇到麻煩。另有人因留有案底而不獲當局發出移民外國必需的「良民證」，跑來向曾德成求助。

曾德成獲聘為中央政策組顧問後接受《大公報》訪問時，提出要「正確看待歷史遺留的問題」。他表示：「在殖民管治時期，有些機構、團體以及個人，都曾受過一些不公平對待，所以一些老愛國人士希望特區政府能盡快對過去這些不公平對待，作出一個公正對待。這些愛國人士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而他們的要求也十分合理，不過由於特區政府目前尚在成立初期，百業待興，因此大家暫時宜應向前看，待特區政府妥善解決當前的急切事務後，才着手整理這些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曾德成又認為，殖民管治時期的「有關事情」，「歷史自有公論」，希望這些老愛國人士能體諒特區政府目前的處境。¹⁸⁹

曾德成接受筆者訪問時承認，他這番說話是指六七事件。他認為，處理六七年的歷史問題存在頗大難度，「香港不像大陸，沒有為

某些事情平反的做法。而且六七事件相當敏感，如果政府要為六七反英抗暴翻案，必然引起輿論反彈。」他坦言：「我當太平紳士已經這麼多人議論，為反英抗暴翻案那還得了？」即使他出任中央政策組顧問，有機會接觸政府高層，但他從沒有要求高層官員為六七事件「翻案」。

他又表示，處理當年的歷史問題，是非常複雜的工作。他指出：「當年胡耀邦平反文革期間的冤假錯案，也要逐一審查個案，耗費了不少時間。」他認為，特區政府目前有很多迫切處理的工作，例如經濟危機、終審法院判決引發的爭議，當局目前毋須急於處理六七事件問題，他唯有盡量疏導那些老愛國人士的情緒。

附錄：《衝吧，勇猛的闖將！——記聖保羅愛國學生曾德成的成長》（節錄）

（《文匯報》六七年十月二十七日）

香港的學生運動進入了嶄新的一頁。一大批可敬可愛的英雄小將，正在反英抗暴的學生隊伍中陸續湧現。年僅十八歲的聖保羅學校大學預科生、現在被港英囚禁在黑獄中的曾德成，就是這批英雄小將中的一個傑出代表。他的覺悟和成長的過程，就是千千萬萬受港英蒙蔽的學生覺悟和成長的過程；他所走的道路就是廣大書院學生所要走的道路。他是學生中的一面旗幟，他是大專官津補私學校同學的一個好榜樣。

一個曾德成被抓去了，但是，有更多的曾德成站了出來。曾德成敢於鬥爭的英雄事跡，啓發和鼓舞了廣大的同學。就在他被綁架翌日，許多聖保羅同學紛紛投函報章，向反動校方提出抗議和控訴。在其他官津補私學校的同學中，曾德成的事跡也發生了深遠和巨大的影響，一大批一大批的同學，在港英的血腥鎮壓面前，紛紛覺醒過來，投入反英抗暴的行列。

從港英安排的奴才圈套裏衝出來

五月反英抗暴鬥爭的風暴是一個分水嶺，在這之前和在這之後，曾德成簡直就像換了一個人。他在學校聽的是反共反華的宣傳，受的是鼓吹人們當洋奴的教導。烏雲漫天，迷霧籠罩，長期聽不到真理聲音的曾德成，對祖國毫無認識。別人說「破私立公」是空話，他也以為這是做不到的。他沒有設想過自己長大了應該怎樣為祖國為人民服務，卻計劃讀完聖保羅後，怎樣去考香港大學，然後再去美國或者其他國家留學，撈個甚麼「博士」之類的頭銜。未轉變前的曾德成，一

步一步一步地按着港英布下的圈套滑下去。他不關心自己的親人，有時母親要他上街買些豉油之類的東西，他必然堅決拒絕，因為在他心目中，勞動是不光彩的，工農是「卑下」的，「高尚」的就只有像他那樣讀洋書，不勞動的人。

五月風暴像一聲霹靂春雷，震撼了曾德成的靈魂深處。新蒲崗事件一開始，他在報章上看到港英驅使鷹犬毒打工人、學生、小孩和新聞記者的圖片。當他看到稚齡學童被槍擊的情景，當他看到無辜小孩被打至鮮血披面的慘狀時，一股熱血迴盪全身，他既憤怒又不解地想：「為甚麼這些以紳士自居的英國佬會幹出這樣傷天害理的事情！」

血淋淋的事實，終於使他看穿了港英帝國主義的猙獰面目。他認識了甚麼叫做民族大義之後，就毅然決然地拋棄了他原來替自己安排的那一種「前途」，參加到了反英抗暴的行列。

為革命利益帶頭造反

用毛澤東思想武裝來的曾德成同學具有最大的勇敢，他天不怕，地不怕，處處都走在鬥爭的最前列。反動校方、港英特務的監視、恐嚇，他都不放在眼內。九月二十八日，聖保羅的愛國學生在學校內散發愛國反帝的傳單，曾德成認為像這樣的行動是光明磊落的，因此在行動時像平日一樣穿領袖生的服裝。事後，他就是為領袖生的服飾而被迫害。港英同反動校方朋比為奸，重判他入獄兩年，但是他並不因此而後悔。曾德成從覺悟到成長只不過是幾個月的事情，但是這幾個月對於他來說，是多麼不平常的日子啊！一個蒙騙在奴化教育堡壘裏的書院生，一枝溫室裏的花朵，在偉大的毛澤東思想的陽光雨露哺育下，在大風大浪的鍛煉下，終於成長為一個具有高度覺悟的抗暴戰士了。

三、曾鈺成由港大精英到親北京的曲折道路



曾鈺成九八年五月立法會選舉期間向選民拉票。

曾鈺成簡歷：

一九四七年出生於廣州，畢業於聖保羅書院。一九六五年考進香港大學數學系，六八年取得一級榮譽學位。翌年任教左派培僑中學，是當年少數加入左派陣營的港大畢業生，八十年代中期接任培僑校長。八五年獲委任為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委員，九二年創立親北京政團民主建港聯盟，並當選主席。曾任特區籌委會預備工作委員會及籌委會委員，九八年當選特區首屆立法會議員。

像弟弟曾德成一樣，六七暴動也改變了曾鈺成的命運。這位香港大學高材生曾經打算赴美國留學，但弟妹在六七暴動期間的不幸遭遇，使他打消了原先的念頭，並毅然加入左派陣營。

曾鈺成就讀於名校聖保羅書院，當年這所英國教會學校充滿「反共」氣味。該校不少教師是二次大戰前大陸大專院校的畢業生，四九年中共建政前後逃往香港躲避中共統治，大多持強烈的反共態度，經常在課堂上大談中共政權的「黑暗面」。而曾鈺成父親在中華總商會任職，每天下班都會帶一份《文匯報》回家，曾鈺成每天都仔細閱讀，開始認識「紅色中國」的國情。他從《文匯報》獲悉中國大陸的科技成就和各項大型工程，與學校老師的說法截然兩樣。他開始萌生愛國思想，非常崇拜五十年代從美國回國工作的著名科學家錢學森。

一九六五年，曾鈺成自名校聖保羅書院畢業後，順利考進香港大學數學系。六六年六月是曾鈺成思想發展的轉捩點，當時他與母親返回出生地廣州旅遊，當時港人返回大陸是政治上非常敏感的事情，兩人為此取道澳門往廣州，以免港府入境處發現他們曾前往中國。此行使曾鈺成對中國留下極佳印象，自此對「社會主義祖國」非常嚮往。他表示：「當年大陸民風淳樸，社會秩序良好，雖然民衆很窮困，但年輕人很有理想，對國家前途抱有希望。最少這不是我在中學和大學聽到的那一套。」

六七暴動爆發前夕，曾鈺成已以馬克思主義者自居，並與少數志同道合的同學一起研讀馬克思和毛澤東著作。當年絕大部分港大學生認同港英政府，並對中共政權持負面看法，曾鈺成因此「特別珍惜一些見解相近的同學」。

六七年四月新蒲崗人造花廠爆發勞資糾紛後，當時就讀港大二年級的曾鈺成對事件相當關心，對防暴隊五月六日對示威工人感到憤慨。他整天留意新聞報道，提不起勁唸書，甚少回校上課。他認為，人造花廠事件是「工人反抗資本家壓迫，香港愛國同胞反對港英暴政的正義行動」，又與數名大學同學透過《文匯報》捐款予左派工會。

五、六月份中環常有示威遊行，他經常到中環流連，並參加了兩次遊行。英文《星報》(Star)記者拍下了曾鈺成的照片，並在翌日頭版刊登。曾父曾照勤當天下班後在報攤赫然看到兒子上了報章頭條，連忙買回家，神色凝重地跟曾鈺成說：「糟糕，你給報紙拍到了！」

雖然曾鈺成當年對中國局勢和馬克思主義很感興趣，但他不覺得自己是左派一份子，當時只是同情左派的遭遇而已。他強調：「我的參與純屬自發，完全沒人領導，沒有人指揮，我當時也不認識新華社官員和工會成員。」他指出，他的父親早在四九年前獲朋友介紹到中華總商會工作，當時中總還未加入親北京陣營，幾年後才改掛五星旗。

由於曾鈺成對六七暴動的看法與大部分同學南轅北轍，他在同學中間極為孤立。當時港大學生會刊物《學苑》對左派暴動持批判立場，曾任《學苑》記者的曾鈺成和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學印製一份名為《新港大》的刊物，與《學苑》唱對台戲。他表示：「當年只有極少大學同學同情左派，基本上絕大部分同學站在港英那邊。」當時他在香港大學宿舍寄宿，同一舍堂的同學吃完晚飯後，都到休憩室看電視新聞。隨着港府與左派示威者的衝突日漸升級，電視螢光幕經常出現示威者遊行、擲石的鏡頭。曾鈺成常為此與同學吵個臉紅耳熱，一些同學說：「你為甚麼老是替左派說話？」後來他晚上經過宿舍休憩室的時候，原本正在那裏聊天的同學發現他走近，各人立即靜下來，並各散東西。此情此景令曾鈺成很沒趣。

六七暴動期間，他先後在港大學生會刊物《學苑》發表兩篇政治色彩較濃厚的文章，內容關於馬克思主義理論、社會主義、資本家剝削工人等問題。文章發表後，有同學跑來警告他，叫他今後「小心點」，「今後不要寫這些東西」。

曾鈺成認為上述事件只是同學之間不同觀點的爭論，問題不大。但他的弟弟曾德成因在學校派發傳單被捕後，曾鈺成開始感受到真正的壓力。他表示：「我弟弟出事後，其他同學都認定我是『危險份

子』，不願和我接觸，刻意疏遠我，老遠看到我就躲開。」但他堅稱弟弟受港英當局迫害，他們全家決定不請律師，以示「蔑視港英法庭」。曾鈺成在庇利羅士就讀的幼妹曾勵予，不久也被捕入獄，遭囚禁一個月，當時年僅十五歲。「十五歲的小女孩也被抓去坐牢，她沒有傷害任何人，你還跟我說甚麼人權？」他清楚記得母親在弟妹相繼繫獄後，每天以淚洗面的情景。

一九六八年夏天，曾鈺成以優異成績畢業，取得數學系一級榮譽學位。當年有意到海外升學的港大數學系畢業生，通常留校擔任一年助教，然後出國留學。曾與其他三名同樣取得一級榮譽學位的同學一起申請助教職位，三名同學很快獲聘用，並獲數學系編配辦公室。但曾鈺成遲遲未收到系方通知，他覺得很奇怪。後來數學系一位老教授特別與他長談一小時，語重深長地說：「年輕時候是做學問功夫的黃金年齡，有些事情在學有所成後再去做，還來得及。如果現在放下學問功夫，將來再做就很困難了。」曾鈺成明白這位教授的用意，但他坦白回答說：「我很明白你的道理，但當你覺得周遭事物不公平，心裏很不安，即使你想躲起來做學問功夫，心情也很難平靜。」

數學系最終取錄了曾鈺成，系內一位講師後來告訴他：「這位教授是絕頂好人，是他力保你過關的。」原來當時港大校長向數學系負責人提出警告，指曾鈺成是「搗亂份子」，那位教授與校長理論，認為沒有證據證實曾鈺成曾搞事，而且他成績優異，為人正直，沒有理由拒絕他的申請。數學系後來罕有地召開全體教職員會議，討論是否聘請曾鈺成，最後決定錄用。那位講師又指六七暴動期間，有傳聞指港大校園出現炸彈，旁邊有曾鈺成的照片。曾鈺成聽後哈哈大笑：「如果真的是我放炸彈，我怎可能放自己的照片在旁？難道像武松那樣殺掉西門慶後，寫下『殺人者，打虎武松也』？」

一年後，曾鈺成作出了人生的重大抉擇。當時四間美國著名大學取錄他，但他放棄了赴美深造的機會。除了「為國服務」的宏願外，促使他作此決定的原因是當年全球各地充滿革命氣氛，美國校園掀起



曾鈺成與六七暴動期間擔任培僑中學校長的吳康民(左二)。

反越戰運動，到處出現罷課、示威等抗議活動。曾鈺成在這種氛圍下情緒也相當躁動，不禁反問自己：「這時候到美國讀書？」曾鈺成求學期間對數學很有興趣，現在回想當年的抉擇不無遺憾：「正如那位老教授所說，年輕時放棄了升學機會，後來再想重拾書本不是那麼容易。當我後來看到一些同學在學術上取得成就，難免想到如果自己當年若繼續求學，說不定會取得一定成就。」

曾鈺成六九年離開香港大學，希望前往中國大陸工作。但當時中國正值文革的紛亂歲月，他四出打聽都沒有結果，港大學長程介明（現任港大副校長）勸他先到左派培僑中學任教，因為培僑與大陸素有聯繫，說不定日後能找到回大陸工作的門路。他就這樣加入了培僑中學，原本不打算長期任教，但他後來在這所左派學校度過了近三十年的教學生涯。

曾鈺成是歷來首位加入左派教育界的港大畢業生，加上此事發生於左派暴動後的敏感時刻，當時香港學界對此相當震驚。港大學生會刊物《學苑》報道了曾鈺成放棄高薪厚職，「投奔」左派陣營的消息，引起軒然大波，掀起港大有否「共黨潛伏份子」的爭議。¹⁹⁰ 港大數學系一些同僚更猜測他是否被左派「高價收買」，一位曾與他就時局激烈爭論的講師，卻直斥其他同事「胡說」，並堅信「曾鈺成不是這種人」。當年曾鈺成任港大助教的月薪為一千四百六十六元六角六分（女助教只有一千一百元，反映當年香港社會男女不平等），培僑最初發給他的月薪僅得六百元，他後來才知道原來比較長吳康民還要高。

六七年六、七月間，香港盛傳解放軍炮艦駛進香港水域，形勢相當緊張，曾鈺成坦言當時「希望祖國解放香港」。一九六八年初，左派騷亂逐漸平息。他也覺得勢頭不對，北京當局似乎「到此為止」，他坦言當年感到非常失望。他表示：「當時最沒勁的是要被迫回到學校考畢業試。我自六七年下半年開始沒心情唸書，幾乎完全沒上課和溫習功課，六八年初驀然發覺還有兩、三個月就要考畢業試，暗叫糟糕，許多課程內容都不懂，唯有連忙趕快讀書。」

回首三十二年前的往事，曾鈺成認為香港社會矛盾和文化大革命的影響都是導致六七騷亂的重要原因，而社會矛盾是主要原因。他指出，六七騷亂爆發後，勞資衝突變質為殖民統治與左派群眾之間的矛盾，香港社會出現嚴重分化，左派陣營與主流社會對事件的看法截然不同。他承認，當年只有左派陣營中人參與，甚少中間群眾同情左派。

他認為，左派群眾當時確實出現一些極左激進思潮和偏激行爲，這可能是受國內文革的極左思潮影響的結果。對於輿論指責左派發動罷工、罷市，影響香港社會穩定，曾鈺成認為：「當時除了罷工、罷市，左派工人實在沒有其他抗爭手法。」但他承認，部分左派群眾放置炸彈的做法「肯定不對」。他指出：「當年左派內部對此也加以抵制，例如培僑校長吳康民就曾反對這種過激做法。」但他不相信真正

同情左派的群眾，會因出現炸彈事件而對左派反感。

港英當局指左派在「五·二二」花園道事件中以事先準備的紅汞和綑帶，「製造血腥鎮壓的假象」。曾鈺成對這種說法嗤之以鼻。他強調「絕對不會相信港英的宣傳」，「即使左派群眾真的帶備紅汞和綑帶，也不過是作包紮傷口之用」。他指出，某天左派群眾在西環碼頭示威，一位就讀港大工程系的同學在旁圍觀，港英防暴隊到場驅散示威者，這位同學也被打得頭破血流。曾鈺成後來到培僑任教，發現一些年僅十多歲的學生當年也被抓進監獄，一位同事入獄數月後，出獄時眼睛被打得瘀黑。

對於六七騷亂的是非功過，曾鈺成認為，一場複雜的運動不能簡單歸結為誰對誰錯。他說：「你說我弟弟是對是錯？我不相信他受人唆擺，可能是他自己對港英的所作所為看不過眼，激於義憤下採取行動。」他接着為弟妹和其他參與者提出強烈控訴：「你不要忘記，許多人的親人在六七事件中犧牲，或因這次事件改變了一生命運。我弟妹兩人在學校成績優異，如果他們當年沒有出事，他們肯定能考進大學，我妹妹在庇利羅士的同屆同學目前已在政府身居高位。我們的遭遇只是小事，最少我們不致挨餓。但一些人在事件手臂折斷，有人在中學階段坐牢，出獄後在學業上追不上」

他又表示，一般市民在電視上看到土製炸彈造成市民傷亡，對「暴徒」很反感，但對左派參與者來說，他們被港英防暴隊粗暴毆打和拘捕的情景，至今仍然歷歷在目。他說：「這些人談起六七事件時不可能不摻雜感情因素，這絕對與說別人的故事是兩回事。我還記得母親當年每天哭成淚人的情況。」

七十年代初期，香港掀起保釣運動，香港大學和中文大學都出現愛國思潮，一些大學生分別加入左派報章、學校和銀行工作。港大一些學生畢業前已到左派漢華中學當義工，七二至七四年間陸續有近十名大學生步曾鈺成的後塵，到培僑中學任教。雖然曾鈺成認同北京，但他對文革期間一些極左做法很不習慣。當時香港左派學校在文革期

間大跳「忠字舞」，他不太熱烈參與，結果被校長吳康民批評「思想作風不好」、「仍然不改小資產階級作風」。七六年「四人幫」垮台後，這些滿懷理想的大學生面對理想幻滅的打擊，相繼離開左派陣營。曾鈺成說：「隨着鄧小平務實路線抬頭，大家講求實際，反英抗暴和文革期間左派陣營和主流社會對峙的心態隨之消失。大家不禁反問自己：為甚麼還留在左派機構？是不是應該到外面闖一闖？」

「四人幫」倒台後，曾鈺成也受到一定衝擊，開始質疑自己的意識形態信念。但他決定留在培僑工作，因為他為人隨遇而安，覺得與培僑同事相處不錯，遂樂得安於現狀。而且他當時已晉升為學校行政人員，培僑正面對財政、招生和提高教學素質的困難，他覺得當時一走了之是很不負責任的舉動。

四、黃建立：「反英抗暴」的路線出了問題？

黃建立簡歷：

一九二三年出生，中國廣州中山大學化學系畢業。一九四九年開始擔任左派漢華中學校長，六七年出任港九各界反英抗暴鬥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教育界鬥爭委會主任。歷任第四、五、六屆廣東省政協委員，及第八屆全國人大香港區代表(1993-98)，香港特區推選委員會委員，現任漢華中學校監、香港華人革新會名譽會長。去年七月，獲行政長官董建華頒授金紫荊星章。



對香港左派漢華中學校長黃建立來說，一九六七年五月六日黃建立於漢華中學門口。

本來是與平日沒兩樣的日子，結果卻成為對他本人和香港歷史極為重要的一天。那天下午，漢華中學在九龍油麻地普慶戲院演出話劇，紀念學習毛澤東著作典型的解放軍王杰。話劇快將落幕之際，數名教師趨前告訴黃建立：「新蒲崗出了事。」他跑到戲院門外，看到一輛輛滿載防暴隊的車輛沿彌敦道趕赴新蒲崗增援。黃知道自四月底開始，新蒲崗大有街香港人造花廠發生勞資糾紛，難道防暴隊的行動與此有關？

黃建立見狀立即吩咐教師，話劇結束後盡快送學生回家。他表示：「當時我覺得形勢不明朗，那裏敢發動學生到新蒲崗聲援？當時

實在想不到事情會鬧得那麼大。」黃建立晚上看電視新聞，才知道九龍新蒲崗人造花廠門外爆發流血衝突。當時港英防暴隊在大有街用警棍毆打人造花廠工人，並拘捕了一批工人。

人造花廠事件揭開了左派口中的「反英抗暴」的序幕。五月十一日，港英防暴隊在新蒲崗等地向左派工人和前來聲援的學生發射木彈和催淚彈，數百人被打傷，並拘捕了百餘人。黃建立表示，當時港英防暴隊成立不久，處理這次事件時過分緊張，沒有必要地發射催淚彈和木彈，打傷了不少工人。他估計：「他們可能『新鮮出爐』吧，想拿左派試刀。」五月十二日，左派成立「港九各業工人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並於十六日成立「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簡稱鬥委會），成員共一百零四人。五月十五日，左派教育界舉行集會，號召全港左派師生、家長起來參加反英鬥爭。

黃建立強調，左派陣營成立鬥委會是順理成章的事，絕不是由新華社動員成立的。他指出，當時左派中人對港英鎮壓「激於義憤」，覺得必須成立組織才能與港英鬥爭下去；新蒲崗大有街事件發生後，大家都有成立組織的心理準備。他表示，當時港九工會聯合會（後來改名為香港工會聯合會，簡稱工聯會）理事長楊光出面召集，大批左派人士迅即響應，他本人也在楊光邀請下加入鬥委會。黃表示，雖然新華社總編輯李冲等成為鬥委會委員，但他們都是以「個人身份」加入鬥委會，也沒有對鬥委會的工作指手劃腳。前新華社香港分社台灣事務部長黃文放曾指出，反英抗暴由新華社幕後指揮，連聲明也是由新華社起草。黃建立對此不以為然，認為工聯會在鬥委會扮演主導角色：「那裏，你以為工聯會沒人麼？他們秘書那麼多。」

六七年五月十六日，鬥委會在九龍土瓜灣馬頭涌道工聯會工人俱樂部舉行首次會議。左派報章形容這是「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的會議」和「充滿戰鬥性的會議」。¹⁹¹與會者胸前都別上毛像章和語錄章，手持毛語錄，不時高呼革命口號。各界代表輪流發言，黃建立以教育界代表身份發言時說：「港英當局血腥鎮壓我中國同胞，港英這

種法西斯暴行，我們是絕不能容忍的。」他表示堅決響應鬥委會的號召，組織教育界鬥委會，和香港同胞並肩作戰，要把港英帝國主義者的迫害徹底打敗。他激憤地說：「如果港英當局把迫害暴行升級，我們也要將反迫害鬥爭升級，我們一定要粉碎港英的迫害陰謀，一定要奪取勝利。」

與會者選出十七名鬥委會代表，黃建立成爲其中一名代表。鬥委會首次會議通過反對港英當局「法西斯迫害」的抗議書，並向港英當局提出四項要求，包括立即停止一切非法的逮捕、審訊、判罪、毒打刑罰等「法西斯的血腥鎮壓行動」。鬥委會又派楊光、費彝民、黃建立等十七名代表，前往港督府提交抗議書。五月二十三日，鬥委會宣佈成立常務委員會，選出楊光爲主任委員，黃建立當選副主任委員。鬥委會只有四名副主委，其他三名副主委分別爲《大公報》社長費彝民、德信行有限公司總經理謝鴻惠、中華總商會副會長王寬誠，可見黃建立當年是左派陣營的「重量級」人物。

鬥爭須「有理、有利、有節」

黃建立指出，與會者同時強調反對港英迫害的鬥爭須「有理、有利、有節」（註：當年左派報章沒有加以報道）。黃建立憶述說：「根據我的理解，有理、有利、有節的意思，理應包含採取非暴力手段的意思。」他相信，鬥委會委員大多認同「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但「各人如何具體掌握分寸時則很難說」，大家未必完全一致。

六七年六月二日，港九教育界鬥委會成立。由於黃建立擔任鬥委會副主任，加上早於四九年開始擔任漢華中學校長，在左派教育界中資歷較深，因此順理成章當上教育界鬥委會主任。根據左派報章報道，「一群愛國教育工作者在毛主席像前，莊嚴地宣佈教育界鬥委會成立」，並發表《告港九教育界人士書》，指責「港英正準備進一步迫害愛國學校，進一步控制各校員工思想，剝奪廣大員工愛國和學習毛主席著作的自由，加強奴化教育和法西斯教育」。教育界鬥委會號

召「一切不願做奴才的教師們」團結起來，共同奮鬥¹⁹²。黃建立指出，教育界鬥委會在成立儀式上，也通過了鬥爭須「有理、有利、有節」的決議。他表示，教育界鬥委會僅開了一次會議，後來無法開會，加上時近暑假，學生各散東西。

黃建立說：「本來鬥委會準備指揮，但港英頒佈《緊急法令》後，對集會作出嚴格限制，三個人聚頭開會也屬非法，鬥委會無法有效運作。我們連會也開不了，還談甚麼指揮？結果大家各自為政，事態發展端視各界負責人如何行事，這樣對港英也沒有好處。」他相信，如果鬥委會能繼續運作，最少可以對局面「稍加控制」。他指出，鬥委會先後召開了兩次會議，均在九龍土瓜灣工聯會工人俱樂部舉行。

他強調，左派教育界不主張採取暴力行動。他指出，當年工聯會最為積極，也是鬥委會的骨幹，左派教育界活動局限於文藝表演、宣傳「反英抗暴」和毛澤東思想以及發起示威抗議、張貼大字報、發動學生到街上派發「蚊報」（小型傳單）。但他表示，文革爆發以來，漢華中學如常上課，沒有像部份左派機構那樣搞「早請示，晚匯報」一類的形式主義活動，只是在校內演出《紅色娘子軍》、《智取威虎山》等文革樣板戲。

但根據左派的宣傳口徑，工人是「抗暴生力軍」，左派學校學生則是「抗暴先鋒隊」。六七年六月二十四日，左派陣營發動「聯合大罷工」，六月二十九日至七月二日又開始為期四天的「聯合大罷市」。六月二十七日，全港三十二所左派學校的兩萬多名學生罷課一天，聲援罷工的左派工人。

七月五日，左校學生到教育司署貼大字報，高唱革命歌曲，並企圖衝擊教育司署，並在門外張貼大字報，左派傳媒宣傳此舉震撼了「奴化教育的黑指揮部」，把港英「嚇得喪魂落魄」。左派學生又組織了數十支「文化輕騎隊」，向市民宣傳毛澤東思想和「反英抗暴」節目。¹⁹³當時一些左派學校學生更杯葛中學會考，「一群會考學生」

致函左派報章，聲言會考制度「是要青年學生不問政治，丟掉靈魂，做一輩子整日只懂得享受的糊塗蟲。你們（港英當局）所說的『前途』就是要青年學生成為反動階級的接班人，以充當殖民地統治的走卒」。這群學生說：「你們吹捧的會考我們堅決不考，你們說的『前途』我們堅決不要。」

「一群漢華中學畢業學生」也致函左派報章，指責「會考制度是港英改良主義者提倡的奴化教育，它是用來束縛青年學生，使青年學生只顧讀死書，中其奴化教育的毒，不聞不問國家大事和世界形勢。我們堅決反對會考制度，尤其是在這抗議港英法西斯暴行、港九同胞反迫害的鬥爭中，我們堅決拒絕參加會考。」¹⁹⁴香港廣播電台（現在的香港電台）則報道，左派學校不向學生發出中學會考准考證，以「阻礙學生的前途」。黃建立指香港廣播電台的報道毫無根據，並表示漢華中學六六、六七年仍然有學生報考會考，只是人數較少。他說：「四十年代末期，左派教育界反對中學會考，認為是港英奴化教育的一部分。但我們考慮到學生的出路，五一年開始讓學生報考會考。」

黃建立認為，「反英抗暴」受到國內文化大革命極左思潮影響，加上港英當局的高壓手段，導致左派鬥爭情緒不斷高漲。他說：「這個問題應歸結為我們對文革不理解。文革原來是過左的，但當時我們相信祖國、相信毛主席，沒有加以質疑。」他坦言，他在文革初期完全沒有懷疑，非常認同「破舊立新」的觀點，覺得「不破不立」言之成理。黃建立說，當時漢華學生大部分來自中下層勞工家庭，在成長過程中親身感到遭剝削的感受，許多學生受到文革思潮衝擊後「自己也熱起來」。他認為：「當時那麼多師生熱烈參與這運動，不可能單靠我們號召，就能發動起來。」

隨着左派鬥爭逐漸升級，知識份子出身的黃建立內心開始掙扎。六月三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堅決反擊英帝國主義的挑釁》的社論，揚言要「把英帝國主義鬥垮鬥臭」，並呼籲左派展開「仇視、鄙視和蔑視英帝國主義的運動」，令左派情緒高漲。黃建立說：「我

們許多人以為中央無限支持，因而鬥爭情緒高漲，當時許多左派人士以為國家會提早收回香港。」但他表示：「在抗暴進行期間，我經常存在形勢不對勁、鬥爭手段不正確的困擾。」他認為，六七年六月左派發動的罷工不太成功，規模也未如理想，不能造成很大聲勢，當時有一些輿論嘲諷左派「欲罷不能」。他又承認，罷工對市民生活帶來困擾，許多市民怨聲載道。黃建立當年也懷疑這種做法是否違背國家五十年代以來提出的『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對港政策方針。

他表示：「當年國家的總體戰略部署以反美為主，對英國則採取『又拉又打』、既鬥爭又合作的策略，服從反美的戰略利益。五十年代我們基於國家『長期打算』的方針，承認港英殖民統治的事實。」他指出，國家早已提出「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針，「當年許多香港愛國人士回國參觀，中央首長接見他們時已作出清楚交代，有關方針後來一直沒有改變，這點愛國社團負責人應該是很清楚的。」他認為，左派陣營四九年後與港英進行了多年鬥爭，大小鬥爭接連不斷，五十年代初期「三一事件」和羅素街事件也沒有導致六七事件那樣嚴重的後果。他指出，根據歷史經驗，左派與港英鬥爭其實可以採取很多手法；五七年五月一日，漢華中學在校內懸掛五星紅旗，教育司署事後向漢華發信，要求到教署作出解釋。黃建立原本打算回信反駁，後來決定將信件丟在一旁，不加理睬，教育司署也沒有採取行動。他說：「對港英不予理睬也是一種鬥爭方式。」

但六七年七月下旬開始，香港市區出現「真假菠蘿陣」，黃建立心裏暗叫不妙。黃認為：「我想來想去，國家應該沒有打算那麼快收回香港，當時國家經濟建設剛起步。但這樣搞下去必然迫使國家收回香港，究竟有甚麼好處？」但當時他只是對鬥爭方向和手段產生疑惑，覺得不太正確，但尚未形成明確判斷。而且他當時覺得與港英鬥爭是大方向，在你死我活的緊張形勢下「很難向群眾潑冷水」。事實上，當年左派暴動嚇跑了一些親北京商人。當年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高卓雄跑到日本暫避，形勢緩和後才返港。黃建立說：「我們沒有排

擠他，事實上那時鬥爭形勢那麼緊張，許多人都很害怕。」

像其他左派社團負責人一樣，黃建立也難逃成為階下囚的命運。六七年八月四日清晨五時許，好夢正酣的黃建立被直升機聲音吵醒，原來直升機在他所住的北角僑冠大廈天台降落。這幢大廈是不少中資機構僱員的聚居地，地下至二三樓由華豐國貨公司佔用，被視為左派大本營。港英當局曾多次嘗試攻破這個陣地，雙方曾爆發激烈攻防戰。港英這天動用七連警員、七排英



軍、大批便衣探員及三架直升機，從陸空兩路進攻北角僑冠大廈與華豐國貨公司：黃建立六七年在此被英軍逮捕。

僑冠大廈，是當局五月騷動以來對左派進行的最大規模的搜捕行動。

黃建立連忙起來，發現大批警察和便衣探員已包圍大廈。他推開大門，看到便衣探員在電梯站崗，並勒令他們返回所住單位。防暴隊則從底層開始，逐層進行地氈式搜查，來到黃建立所住那層前已抓了一批人。防暴隊員猛力敲打黃建立家門，叫他報上姓名及職業。黃建立如實道來，對方發現黃大有來頭，立即致電上級請示，稍後拘捕了他，立即押送往摩星嶺集中營。

左派教育界鬥委會翌日發表聲明，抗議港英「非法綁架」黃建

立，認為這是港英「垂死掙扎、章法大亂的極端虛弱的表現」。教育界門委會又「憤怒喝令」港英當局立即釋放黃建立，並賠禮道歉，保證以後不再發生同類事件，否則由此而引起的一切嚴重後果均由港英負全部責任。¹⁹⁵八月六日上午，漢華中學百多名師生在校內舉行控訴大會，要求當局立即釋放黃建立。與會的漢華師生表示：「香港同胞固然不會為港英的法西斯恐怖行動所嚇倒，漢華全體師生亦不會因而屈服，今後將更高地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把愛國教育事業辦得更好，堅決將反英抗暴鬥爭進行到底，不獲全勝不暫休。」¹⁹⁶

黃建立表示，摩星嶺獄方沒有拷打他，「可能他們認為要留下我這些級別的人作為談判籌碼，所以對我不算太差」。但他指出，獄方審問犯人時經常將空調調至最大，由於犯人只穿內衣褲，部分人因此關節出問題。黃建立從集中營內的警官口中得知，部分左派群眾繼續在街上放置炸彈。警官詢問他有没有指使學生這樣做，黃強調從來他沒有主張或暗示學生製造炸彈。一名洋警官在集中營質問黃建立：「你們為甚麼參加這些行動？」他對洋警官說：「你們打傷打死我們這麼多同胞，當然要與你們鬥爭。」洋警官同時軟硬兼施，對他表示：「我們給你護照，讓你到英國，跟我們合作吧。」但他堅決地說沒有興趣到英國。六七年八月二十三日，北京「造反派」紅衛兵火燒英國駐北京代辦處。集中營內負責審問工作的的洋警官質問他：「你們為甚麼這樣做？」黃建立沒有作聲，心裏卻嘀咕：「怎麼搞的？」。

六七年十一月，港英警察荷槍實彈，搜查漢華中學位於港島西環青蓮台的校址。警察撬開學校鐵閘，拘捕數名漢華教師和職工，並送往赤柱監獄。警察在校內搜出一批演出文革「樣板戲」時使用的道具長槍和紅纓槍，指該校藏有「攻擊性武器」。當年左派學校學生經常排練「樣板戲」，黃建立表示「那時我們整齣《紅色娘子軍》芭蕾舞劇也排出來」。

他強調，左派教育界從來不主張放炸彈等暴力手段，「我們對鬥

「(反英抗暴)會不會路線出了問題？」但他們堅稱這只是「策略問題」，他心裏仍然存在問號。

三十三年後的今天，年逾古稀的黃建立仍然覺得左派群眾起來反抗港英當局的正確的，只是採取了錯誤的鬥爭手法。他認為，左派當年的鬥爭方向錯誤，手法不正確，違背了當年國家反美為主，對英國既鬥爭又合作的外交戰略路線，到了運動後期更對香港經濟民生帶來打擊。但他補充說：「這是大氣候問題，當時我們整個國家都出了問題。」他同時強調：「這不是香港同胞的責任，當年香港同胞只是激於義憤，反抗港英殖民統治者的暴力鎮壓。但當時愛國群眾受國內文革極左思潮影響，特別受到林彪集團的煽動，難免作出了一些過激行動。」他認為，當年林彪集團企圖整垮總理周恩來，遂頻頻製造事端，例如發動紅衛兵火燒英國駐北京代辦處。

黃建立又認為，「反英抗暴」也有積極效果。「港英事後總結，認為單靠高壓不足以維持統治，因此開始推行社會福利政策，又在中環卜公碼頭舉辦舞會，利用文康活動化解青少年的不滿情緒。」但他表示，港英同時放鬆對黃賭毒的控制，藉此麻醉市民。儘管港英政府在六七暴動後改採懷柔政策，逐漸推行社會改革，黃建立對港英政府的看法沒有根



黃建立攝於六七暴動期間。



黃建立六九年獲釋時攝。

本改變，雖然港英賦予市民一定自由，但本質仍然是殖民統治。

他強調，踏上愛國道路「絕對沒有錯」，對當年參與「反英抗暴」絕不後悔。他說：「有些參與者現在感到迷惘，我一點也沒有迷惘，有甚麼要迷惘呢？難道愛國也有錯？難道教導學生愛國也有錯嗎？」但他承認當年「做得不夠」，許多方面「可以做得更好」。他認為：「愛國主義教育是必須的，但我們也應教導學生獨立思考，培養學生分辨

是非的能力。」

六七暴動結束後，大部分當年的參與者都不願重提當年歷史。黃建立也從沒就此事接受傳媒訪問。他表示，九七年香港回歸前夕，一些傳媒重提舊事，他擔心有人故意挑起爭論。他說：「我覺得回歸在即，平穩過渡要緊，這時候挑起舊事不太恰當。」他的想法正好反映不少左派人士的顧慮。

黃建立表示，漢華中學不但沒有在「反英抗暴」後受到挫折，反而取得「大發展」。一九六七年漢華西環總校學生總數達一千五百人，六八年更在港島香港仔及新界元朗開設分校，而且報讀人數踴躍，迅即滿額。香港仔分校學生人數約一千人，元朗分校更有二千名學生。黃建立說：「人們說我們這樣那樣，但我們辦學校，也要家長

願意送子女來啊！」但港英當局七八年開始推行九年免費教育，由於漢華中學需向學生收取學費，分校發展大受影響，遂於八二年停辦兩所分校。黃八七年自校長崗位退下來，改任校監。

五、胡棣周：觸發紅衛兵火燒英國代辦處的報人

胡棣周簡歷：

胡棣周，現年六十五歲，六七暴動期間任《香港夜報》社長和《新午報》董事長，並身兼各界鬥委會委員。六七年八月被港英當局拘捕，觸發北京紅衛兵火燒英國代辦處事件。



胡棣周(第三排左三)七十年代初與香港各界人士回國內觀光，背靠火車者為富商李嘉誠(右)及胡應湘。時任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的梁上苑(第二排右六)隨行。

在中環香港外國記者俱樂部昏黃的燈光中，西裝畢挺的胡棣周仔細翻閱筆者帶來的剪報，細味報章當年報道他在法庭受審的情況。「胡棣周：我是黑暗時代的囚徒」、「愛國報人無罪，港英才是罪

犯」等新聞標題，映進這位六十多歲老人的眼簾，如煙往事驟然湧上心頭。他邊看邊說：「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自己當年受審的報道。」這位一臉祥和、精神矍鑠的商人，就是間接觸發六七年北京紅衛兵火燒英國代辦處的左派報人胡棣周。他不僅是一位老報人，而且是一位參與「寫歷史」的人。

胡棣周五十年代在左派報章《晶報》擔任翻譯及編輯工作，幹了五年後與《新晚報》編輯麥煒明創辦《香港人報》，半年後因虧損結業。一九六一年，胡、麥兩人再接再厲，合辦《香港夜報》。雖然胡棣周在左派報章出身，但他強調自己「只是在左報打工」，辦報的目的純粹爲了賺錢。他表示：「我與金堯如、羅孚等左派報人素有來往，認同新中國，但我既不是左派報界的核心人物，也沒有接受新華社的津貼。」《香港夜報》創刊後銷量立即達到一萬份，逐漸站穩陣腳。這份下午三四時出版的報章，更因趕及報道轟動一時的「三狼案」（六十年代初富商黃應求遭三名綁匪綁架及殺害案）的審判結果，市民爭相搶購。

新蒲崗人造花廠勞資發生勞資糾紛後，胡棣周原本只是一位旁觀者，但當局出動防暴隊鎮壓工人，改變了他的看法。他指出，過去港府處理工潮時一般會派官員與勞資雙方開會，排解糾紛，不會動用防暴隊；港府顯然在人造花廠事件中偏幫資方。他指出：「當年勞工權益完全不受保障，政府長期偏幫資本家。」他認爲：「警方可以控告工人阻街，甚至抓他們進監獄，但絕不能動用武力，何況工人沒有衝擊警察。」他表示，雖然左派工會在五月六日衝突爆發前到現場慰問工人，也不能構成警方動武的藉口。胡表示：「我本來不傾向任何一方，但警方動武後我開始對港英反感。」六七年八月他被判入獄，在獄中聽說當時警隊中有人被人造花廠賄賂，才出動防暴隊介入工潮。鬥委會認定人造花廠事件是港英「有計劃、有組織的陰謀」，但胡棣周則相信警方動手打人，應該不會是港府高層的決定。

但他同意事件爲左派提供借題發揮的機會。從五月十六日開始，

每天都有幾千名左派學生、工人和左派機構職員前往位於中環花園道的港督府抗議，並在港督府外牆貼滿充滿文革語言的大字報，「打倒港英」等口號喧聲震天。胡棣周對形勢發展感到不安：「我當時不贊成左派每天衝擊港督府，港督始終是英國統治的象徵。左派利用工人、學生衝擊港督府，港英一旦動手，就會造成很大犧牲。」五月十九日下午，胡棣周到文匯報社找總編輯金堯如，告訴他駕車途經港督府的所見所聞：花園道的山邊樹林已佈滿武裝軍警、防暴隊和便衣探員，港督府正門內外兩側也增強了軍警力量。

胡表示：「金老總，我看戴麟趾要動手了，他已經忍受了四、五天，恐怕已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了。我希望你考慮一下，這樣的群眾示威是不是應該停一停。這個行動可以說已經勝利了。港府到今天不敢動，可算是我們的勝利，是不是可以考慮鳴金收兵了。你們要不就打倒港英，但打倒港英毋須採取這種手法。」金堯如連連點頭，表示同意胡的憂慮，答應稍後到新華社開會時反映他的看法，並請新華社社長梁威林和副社長祈烽考慮。

但當金堯如在新華社會議上講到胡棣周的意見後，卻被批評為「不敢鬥爭，不敢勝利」的右傾主義。¹⁹⁸結果不出胡棣周所料，五月二十二日港英出動數千名軍警和防暴隊，向示威群眾施放催淚彈，並揮動警棍包圍群眾，拘捕了三千人，港英當晚宣佈戒嚴。港府出版的《香港年報一九六七》指左派群眾當時攜備紅汞和綑帶，製造「流血」的假象。胡棣周認為這些純屬港英的無稽指控：「我認識不少在事件中被警察毆打的人，他們都是很善良、單純的人，怎會故意弄虛作假？」

經過「五·二二花園道血案」，港英當局與左派陣營都陷入了騎虎難下的形勢，全面鬥爭一觸即發。胡棣周當時充分體會「非敵即友」的滋味，他說：「政府向香港所有報章送來一份題為『維持安定繁榮』的廣告，連《文匯報》和《大公報》也照樣收到。願意刊登的報章等於表態支持港英政府，而且可收取廣告費；拒絕刊登被視為左

派。港英這樣等於迫人家選擇不是親英就是親共。」面對兩難抉擇，胡棣周決定「站在中國人的立場」，拒絕刊登：「我當然不能登，難道要我打電話給金堯如說：『喂，老金，我準備登這份廣告。』這樣做太『衰仔』，太不像話了。」他慨嘆當時雙方壁壘分明，根本不可能保持中立。他就在「非黑即白」的情況下與左派站在同一陣線，踏上了不歸路。

左派與港英當局的衝突不斷升級，胡棣周日睹同胞被毆打，無辜學生遭槍擊，令他怒火中燒。他的筆桿也越來越辛辣和不留餘地，屢次觸怒港英當局。六七年六月二十三日，《香港夜報》評論專欄《夜話》發表題為《向明報、邵氏職工致敬，欣看義旗處處飄》的文章：「《明報》老閩查良鏞做漢奸賣國，但明報的機房工人卻是頂天立地的男兒漢，是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他們敢於在敵人的心臟作反，成立了鬥委會，並且在明報的版面上發表轟轟烈烈的公報：『敬告同業，行動起來。』同胞們！這個世界有少數洋奴走狗賣國，但卻更有千萬真心真意擁護革命的群眾愛國。《明報》的機房工友豎起造反的義旗，只是一個開端，跟着有邵氏影城的職工罷工了。」《夜話》又重提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三日英國在廣州開槍鎮壓當地民衆的「沙基慘案」，「紀念『沙基慘案』再想起今天（疑遭港英警察打死的）徐田波、黎松與曾明三位烈士的英勇犧牲，舊恨更添新仇。同胞們！我們要拭去眼淚，齊心奮起，把那萬惡的英帝國主義打倒，把那腐化的反動統治埋葬。」

六月十五日，胡棣周擔任董事長的《新午報》報道九龍黃大仙左派群眾成立鬥委會的消息。報道指出：「抗暴怒火燃燒了港九新界每個角落，曾遭港英嚴重迫害的黃大仙同胞，昨天宣佈成立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坊眾們堅決表示投入戰鬥，把反迫害鬥爭進行到底，徹底粉碎帝國主義的罪惡統治。與會坊眾懷着民族仇、階級恨，對港英的血腥暴行提出了嚴重的抗議和控訴，只要祖國一聲令下，他們就立刻開赴前線，誓把港英鬥垮、鬥臭。」《新午報》同時發表《黃大

仙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告同胞書》，聲言「要跟戴麟趾這班英國鬼算總賬」，「血債要血償」。《告同胞書》指出：「我們受夠了英國鬼的欺凌、壓迫，今天再也不能忍受了。港英當局在香港幹盡了壞事，現在竟又瘋狂對我同胞、坊眾橫加迫害，舊恨新仇湧上心頭。」黃大仙門委會又警告「黃皮狗」、「白皮豬」若膽敢鎮壓，「必將斬斷你的鷹爪，砸破你的狗頭」。¹⁹⁹

六七年六、七月間，胡棣周在《香港夜報》發表致港督戴麟趾的公開信，勸他「留有餘地」，「不要幹得太過分」，香港同胞是不會害怕的；據說戴麟趾知道後很惱火。胡表示：「除了左派，香港從來沒有人敢公開挑戰港督。」但《香港夜報》六七年七月的一篇報道，才是觸發港英拘捕胡棣周的導火線。當時《香港夜報》記者收到港英水警輪大副傳來的消息，指鯉魚門對開海面出現數艘解放軍炮艇來回巡邏。胡棣周致電金堯如求證，金隨即向新華社副社長祈烽請示。祈烽在電話中說：「啊，這當然是個好消息。我們的南海艦隊有所戒備，執戈待命是不奇怪的。這當然是對我們香港同胞的一大鼓舞，對我們反英抗暴鬥爭的明顯支持。」他認為在現實條件下無法證實，而《香港夜報》與《文匯報》、《大公報》性質不同，可以有聞必錄。祈烽表示：「即使是個謠傳，他們傳一下我看也無所謂，多傳一下這類消息，鼓舞香港同胞嘛。」金堯如將這番話轉告胡棣周，胡笑着說：「老祈的話我明白了，我去發稿落版。」²⁰⁰

當天下午三時出版的《香港夜報》通欄橫題大書：「鯉魚門外突出現中國炮艇，駛向香港海域」，頓時洛陽紙貴，據說當天第一版賣了六、七萬份，再版五、六萬份也被搶購一空。《香港夜報》自此銷量直線上升，在暴動高峰期一度達十萬份，直迫最高銷量的《星島晚報》。胡棣周這次取得驕人成績，卻換來沉重的代價。

胡棣周被捕前夕已察覺到形勢緊張，《文匯報》總編輯金堯如建議他暫避風頭，但胡謝絕了金的好意，聲稱「要對民族承擔」。胡棣周說：「金老總，你不用替我操心了，我胡棣周參加反英抗暴，不是

聽你們共產黨的命令，我是中華男兒，我聽中華男兒的話，你叫我在火線退下？金老總，我老實不客氣的說，你共產黨根本無權叫我退下來。如果港英抓着我，我決不令中華男兒蒙羞。」

一九六七年八月九日凌晨四時三十五分，胡棣周好夢正酣，兩名英籍警官帶同六名便衣探員前往胡棣周寓所，猛力敲打他的家門。各人均頭戴鋼盔，配備長短槍和鐵筆。胡棣周父親來不及開門，便衣探員即動用鐵筆撬門。他們破門入屋後，舉槍指嚇屋內眾人，並催促胡棣周快點穿衣跟他們離去。胡表示：「何必急呢？我已等了你們很久了。」英籍警官勒令胡棣周在「做誠詞」上簽名，

他卻在紙上寫上「抗議！」的字樣。當天與他一起被捕的還有另一左派外圍報章《田豐日報》社長潘懷偉（已故馬評家，筆名田豐）及督印人陳艷娟、南昌印務公司董事長李少雄和經理翟暖暉。胡被押往灣仔警察總部，發現潘懷偉等人都在場，原來各人差不多同時被捕。

胡棣周這種被左派報章形容為「大義凜然」的舉動，並不能改變他的命運。八月十日，當局向胡棣周等人提出起訴。八月十七日，港英當局下令《香港夜報》和《新午



名畫家劉海粟為《香港夜報》創刊二十週年題辭。

報》，以及《田豐日報》停刊，這就是著名的「三報事件」。《大公報》社論質疑胡等人還未被審訊，報紙就先被勒令停刊，「這又是甚麼『法律』、『法治』？甚麼『新聞自由』？」「愛國報紙又怎會封得光的，愛國新聞工作者又怎會拉得完？」²⁰¹

北京和香港左派陣營對胡棣周等人被捕反應強烈，中華全國記者協會、《人民日報》與新華社聯合發表聲明，要求港英立即釋放胡棣周等人，否則負責一切嚴重後果，「終將嚐到中國人民鐵拳的味道」。廣州軍區發動十萬民兵上街巡遊，要求港英當局盡快放人。

連胡棣周本人也沒有想到，港英拘捕他的「嚴重後果」是北京紅衛兵火燒英國代辦處。八月二十日晚上，中國外交部西歐司負責人召見英國駐華代辦霍普森，提交外交部的照會，就港英當局拘捕胡棣周等人提出「最緊急、最強烈」的抗議。外交部照會要求英國必須在四十八小時內撤銷對《香港夜報》、《田豐日報》和《新午報》的停刊令，並無罪釋放三報的三十四名工作人員，否則英國政府必須對此承擔一切後果。八月二十三日，北京造反派紅衛兵在英國駐華代辦處門外抗議，並且發生了衝進英代辦處進行打、砸、抄活動和火燒代辦處辦公樓的嚴重外交事件。

胡被捕後轉送往港島域多利羈留所，案件於八月二十一日在中央裁判署開審，胡位居首被告。港英當局對胡棣周、翟暖暉等人的控罪包括「惡意刊出虛構新聞」、「刊登不真確消息」、「刊載煽動性文字」、「使公眾輿論受到影響」、「教唆及協助別人刊登煽動性文字」，各人控罪合共九十九項。法庭花去了三天半時間，才將各項控罪宣讀完畢。其中胡棣周的控罪多達二十一條，包括惡意在《香港夜報》刊登「有煽動性的文字」，並在《香港夜報》刊出「假新聞」而「影響公眾秩序」，又被控六七年七月二十五日協助及教唆《新午報》刊登假新聞，「意圖引發香港警察出現不滿情緒」。

胡棣周旗下報章究竟如何「煽動」、「影響公眾秩序」、「意圖引發警察出現不滿情緒」？答案得從有關報道中尋找。《新午報》六

月十五日報道黃大仙左派群眾成立鬥委會，以及刊登黃大仙鬥委會《告同胞書》，其實當時各份左報都有刊登，《新午報》的處理手法不見得比正統左報更具煽動性。《香港夜報》六月二十三日刊登「烈士治喪委員會通告」，主要內容為各界鬥委會「向港英當局提出嚴重警告：必須立即交出三位烈士（徐田波、黎松與曾明）的屍體」，也被指為「煽動性文字」，「使公眾輿論受到影響」。其他左派報章當時都刊登了鬥委會的有關聲明，《香港夜報》的做法也沒有甚麼特別。

《香港夜報》八月二日報道一群男子衝進慈雲山徙置區辦事處，也成為胡棣周的另一控罪。報道指當時十名男子將辦事處玻璃全部搗毀，並放下兩枚土製炸彈離去，其中一枚發生爆炸。報道指「十名大漢做得乾淨利落，全部安全撤退，慈雲山徙置區居民人心大快，到處傳誦。港英的鷹犬到爆炸發生後才慌忙到場增援，鷹犬生怕被白皮豬（英籍警官）責罰，竟然將一名在場看熱鬧十三歲男童強行非法拘捕，慈雲山群眾對此表示極大憤怒」。當局認為這段報道引起「恐懼與沮喪」，將之列為罪狀。

七月五日，《香港夜報》評論專欄《夜話》發表題為《白皮豬窮兇極惡》的文章，認為從七月四日荔枝角事件中，「可以批死英國的『白皮豬』，快將被群眾的汪洋大海所埋葬。那些洋人警官目前已達到神憎鬼厭，人人喝打的地步。他們一而再暴露了帝國主義的兇殘本質。不只是群眾，甚至一些華籍警察，漸漸也認清了那些洋警官的兇殘面目。」事緣七月四日九龍荔枝角匯豐銀行警鐘誤鳴，警車到場查看，引來一批市民圍觀，但警方立即調來一隊防暴隊。根據《香港夜報》的報道，幾名洋警官「不分青紅皂白，一下車就向匯豐銀行隔鄰的中孚國貨公司打幾槍，過路途人中槍倒地」。該報《夜話》認為：「同胞們！大是大非擺在前頭，英國鬼自維多利亞女王時代到今天，未有一天把我們中國同胞當作人看待。有槍在手，便亂射亂殺。」

《夜話》又引用《毛語錄》中「在野獸面對，不可以表示絲毫的怯懦。我們要學景陽崗上的武松。在武松看來，景陽崗上的老虎，刺

激它也是那樣，不刺激它也是那樣，總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認為「時至今日，有來犯者，便要狠狠的打退他，有組織的反擊他。」在港英政府眼中，這篇言詞激烈的評論文章當然屬於「煽動性文字」。胡棣周後來在庭上不服氣地說：「這明明是對我們愛國報人迫害，我們引用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語錄也犯了罪？」

《新午報》七月二十五日發表社論，呼籲香港華籍警察「掉轉槍頭」，被當局認為「企圖煽動警察人員情緒不滿」。社論指出：「至於華警同胞的切身問題，你們自己也可以看得很清楚。無論在大有街、在花園道、在沙頭角，都是你們去打頭陣。但戴磊華（警務處長）拿三華警來提控，來向左派送秋波，由此而引起你們的不滿。於是他們出動英軍搜劫摩總和工人俱樂部時，其實是監視你們的行動。港英就是不容許你們做中國人，不許你們有熱愛祖國、同情同胞的自由，要你們貼貼服服地做走卒，做替死鬼。」

社論又指出：「你們中間有些人做過一些壞事，是不要緊的。祖國和人民歡迎你們一切愛國行爲。（華籍警察）應當醒覺起來，看清大勢，站穩中國人立場，鼓勵更多同胞醒覺；要做到陽奉陰違，通風報訊，不打不捉：團結覺悟，收集資料，緊記仇恨，一有機會就掉轉槍頭。這樣做我們就歡迎你，這也是你們唯一的出路，唯一可以使妻兒不致蒙羞受辱的自新之路。」

八月三日，《香港夜報》刊登兩名據說是港府公務員的來信，標題是「兩位愛國公務員揭露，港英利用津貼，妄圖收買人心，主張以敵人之獎金回擊敵人」。兩人在信中指出：「我們是港英機構低薪公務員，長期受着港英法斯當局的剝削和壓迫，使我們生活處於貧困。這個腐朽腐敗的法西斯當局，爲了收買人心，在七月份發薪時每個公務員都多發五十元津貼，據說這是『獎金』，是獎給『行爲良好，忠於職守』的公務員。」兩人認為，港英當局企圖以「銀彈政策，以『關心』低薪公務員爲名收買民心，進行欺騙爲實，阻止我們參與這

場威武雄壯，氣壯山河的反英抗暴鬥爭。我們嚴正告訴港英當局，我倆雖窮，但決不為金錢迷惑，你們的糖衣炮彈絕對不能得逞。偉大的中國人民是有骨氣的，現在我倆已把這些『獎金』捐給各界鬥委會，作為支持反英抗暴鬥爭，以敵人之『獎金』回擊敵人。」兩人又希望所有港英機構華人職工，凡領取了獎金者應「不受敵人利誘」，「要用實際行動支持這場正義的反英抗暴鬥爭」。

對於港英政府指《香港夜報》和《新午報》「煽動」，胡棣周不以為然：「我們不是黨報，煽動程度絕對不及《文匯報》和《大公報》的十分之一。」他表示：「港英不敢碰《文匯報》、《大公報》等共產黨報紙，我們只是左派外圍報紙負責人，所以拿我們開刀。港英首先打擊我們這些同情共產黨的人，真正的共產黨員卻不敢碰，他們不敢抓金堯如、費彝民等人。」他又認為港英政府很聰明，當年一旦發現普通市民加入左派的示威行列，必定立即動手抓人，防止左派隊伍壯大，港英拿他開刀也是這種道理。胡指出，《新午報》當年銷量高達四萬多份，《香港夜報》更多達六、七萬份，擁有一定社會影響力。

至於港府指《香港夜報》報道鯉魚門海面出現中國軍艦，發放「虛假消息」，胡棣周否認這是假新聞：「如果說我們報道假新聞，與今天一些傳媒的做法相比還有一段距離。」他承認《夜報》記者「摸錯了方向」，英國軍艦「堡壘號」當時在新界西貢海面停泊，而不是在鯉魚門海面。但他表示，港英當局後來也承認當時派遣航空母艦「堡壘號」赴港撤僑，解放軍炮艇到香港海域附近監視「堡壘號」的動靜，證明他們並非無中生有。胡至今仍然不服氣的是，當時法庭根本沒有仔細研究《香港夜報》刊登的消息是否真確，也沒有傳召報道這條消息的記者作證，解釋採訪經過。他表示：「法庭應該允許我傳召那名記者出庭作證，指出消息來源。」他慨嘆「在亂世沒任何事情是公平的」。

胡棣周在審問過程中曾遭警察毆打，他相信警察是要「先給你點好看」，迫使他「在法庭自辯時不要對法官進行過分激烈的鬥爭」。

港府主控官韋覺士在案件審訊期間指出，胡棣周曾有兩次觸犯刊登「淫褻性文字」的案底，似有意抹黑胡的名聲。當時香港一些非左派報章更嘲笑《香港夜報》為「以黃色小說和黃色架步廣告掛帥的下流報紙」。胡棣周承認《香港夜報》確實曾經刊登色情小說，但相比當今香港一些報章的做法「實在毫不足道」。他認為，港英在庭上重提舊事，無非企圖醜化他的形象。

對胡棣周來說，當局翻他刊登黃色小說的舊賬只是小事，反而一名華籍督察的恐嚇言詞令他冷汗直冒。這名由英國人收養的督察在判案前跟他說：「胡棣周，你別那麼神氣，我知道你是左派中的『大枝嘢』（重要人物）。但我有膽量推你下車，然後在你背後開槍，再向其他人推說你逃獄。」胡棣周也知道對方只是出言恫嚇，卻令他感到莫名的恐懼，「因為難保他真的不敢下手，弄不好把我的腿打傷」。他說：「這個世界有時候不是人們想像那麼美好的。」

案件八月二十一日在中央裁判署開審後，胡棣周在庭上與法官賴特針鋒相對。《大公報》甚至形容胡棣周等把中央裁判署「當做控訴港英法西斯當局迫害愛國報人的講壇，揭開港英的『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的遮醜布」。胡棣周在自辯時表示，他不滿英國警官在荔枝角事件中開槍，而且是真槍實彈，「而且不喜歡他們文過飾非，幹了不認賬，推說是向天開槍」。他談到六月二十三日《香港夜報》《夜話》時表示，英國人一九二四年開槍殺死數十名中國人，至今沒有改變對中國人的態度。他又批評英帝國主義者百多年來從來沒有好好對待香港人。法官說他還是第一次聽到過去英國人對中國人的暴行，但法官認為《夜話》中「舊恨更添新仇……把那腐化的反動統治埋葬」這段文字屬「煽動性文字」。胡棣周則說：「在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兩方面，我絕對有自由這樣做。我相信全世界民主國家都有這樣的自由。」

胡又反駁《香港夜報》刊登兩名港府公務員來信有「煽動性」的說法：「這是一封讀者來函，英文報章也有讀者來函一欄，所有讀者

可自由發表意見，無論是對的還是錯的。同時香港很多官員去函駁斥那些讀者的意見。」他指出，那兩位讀者在信中說收到政府發放的五十元津貼，並捐給鬥委會；當時很多低薪公務員正參與罷工，公務員捐出五十元給鬥委會並不出奇。胡棣周說：「我覺得將這篇文章說是煽動，真是『莫須有』。」

他希望法官對他沒有偏見，但不管怎樣解釋，這宗案件確實是政治案件，「查封報館是很嚴重的事情，英國本土近兩百年來有沒有查封報館？控告報人的處理手法也是前所未有的」。他表示：「許多香港人不滿香港政府，他們覺得受到迫害，所以起來鬥爭。我們這些人由始至終都是愛國的，我們認為自己正從事一種正義的事業，勝利一定屬於我們的。」

九月四日下午三時，中央裁判署法官賴特「考慮證供及法律觀點」後，判處胡棣周、翟暖暉、潘懷偉等人入獄三年，同時勒令《香港夜報》、《新午報》和《田豐日報》停刊半年。法官詢問胡棣周等人有沒有任何求情說話，各人搖了搖頭，表示「愛國無罪」，無須求情。胡棣周表示：「判我有罪是錯誤的，我是無罪的。我強烈反對判我的報紙停刊，這樣的判決等於迫害。」他又說：「真理在我們這一邊，全世界有良心的新聞工作者都會支持我們，我們是無罪的。究竟誰有罪，歷史很快就會作出證明。」

對左派騷亂持反對立場的《明報》則作出截然不同的描述，形容胡棣周等人雖則「叫囂」，卻有「有氣無力」之慨；身處藍色囚衣的胡棣周被帶走時，「面色灰敗」，但仍向旁聽席上的人揮手，「強行作出英勇入獄的氣概」。²⁰²案件審結後，左派報章形容「港英帝國主義在面臨沒頂的時刻，已徹底撕下所謂『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的遮醜布，對我愛國新聞事業大舉進攻」。²⁰³

胡棣周說：「法官判我二十一項控罪成立，但礙於法例限制，裁判署最高僅能判刑三年，只能判我入獄三年。」他又指港英不敢將案件移交高等法院，因為通常高院只會審理謀殺等嚴重罪行。他相信，

港英其實不想他坐牢，只是希望他請律師上庭辯護，以示遵從英國法律，就會將他釋放。但胡棣周不肯跟從英國人的遊戲規則，他被押解往域多利羈留所時表明不會聘請律師。

雖然胡棣周並非六七騷亂的領導者，卻成為港英當局與左派角力的犧牲品，「替」左派坐了二十個月的大牢(扣除獄中假期)。胡棣周入獄期間，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梁上苑受周恩來委託，定期前往赤柱監獄探訪胡棣周。由於胡棣周、潘懷偉等人屬政治犯，遭單獨囚禁於特別囚室(Special Ward)。胡表示，獄吏對他們還算不錯，部分人更經常向身為馬評家的潘懷偉索取賽馬貼士。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八日，港英當局准許《香港夜報》、《新午報》、《田豐日報》三報復刊。

負責鎮壓左派暴動的港府高層官員姬達後來認為，《香港夜報》等三份報章「甚為惡毒」，當局無法容忍。但胡棣周想不到事隔多年後，會與這位當年痛恨他的港英高官交朋友。胡七十年代中期開始從事中國大陸電廠業務，主要負責代理外國電力公司的發電站設備。胡八十年代曾參與廣東大亞灣核電廠可行性研究計劃，而姬達退休後任職中華電力公司屬下的香港核電公司主席，二十年前敵我分明的對手因此攜手合作。他們也曾談起當年往事，兩人仍然各持己見。胡棣周說：「這個世界真的山水有相逢，但他當然不會承認港府當年處理手法錯誤。」

「整場運動是個笑話」

回首三十年前的往事，胡棣周以「笑話」形容當年這場席捲香江的政治風暴。他直言：「整場鬥爭都是權力鬥爭，只是一個笑話。」他當時也明白六七左派暴動是文革和六六年澳門「一二三」事件的延續，更認為「百分之七十至八十是由文革引起的」，「沒有文革根本就不會出現反英抗暴」。胡被捕前在廣州街頭看到「香港必須大亂」的大字報，更親眼目睹當時的解放軍總參謀長黃永勝，在廣州畔溪酒家與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梁威林吃飯。胡表示：「如果黃永勝向梁威

林下命令，梁能不聽嗎？」

但他仍然對參與這次事件無悔：「我很不幸捲進了這個漩渦，但我無論如何都要堅持中國人的立場；特別是我目睹同胞被毆打，無辜學生遭槍擊，令我義憤填膺。我沒有甚麼值得後悔，那個年代就是這樣的了。」六九年胡棣周出獄後，《文匯報》總編輯金堯如特別邀請著名書法家劉海粟，即席揮毫書寫「愛國心」的字幅，贈予胡棣周。胡相信：「老金可能想彌補我的損失，證明我是愛國的。但這又能彌補得了甚麼？不過他的心意，我是明白的。」

他認為「文武之道，一張一弛」，當年左派應更有技巧地進行鬥爭，鬥爭的目標應該是和解、平息風波，而不應是尋求全贏，左派六七年五月衝擊港督府就是觸發港英大規模鎮壓的不明智做法。他認為：「如果事態早日平息，打擊面就不會那麼大，當局就不會抓那麼多人，也不會激發那麼大的仇恨。」六七年七月底開始，部分左派群眾擺放「菠蘿陣」（炸彈）。胡認為這是運動漸漸失控的表現，是左派明知必敗下的孤注一擲，「沒辦法中的辦法」。當年左派無法動員一般市民上街，能發動起來的都是左派陣營中人，示威遊行來來去去只有兩萬人左右。香港左派得不到北京全力支持，也可能令左派領導人孤注一擲。一九六七年七月八日，深圳沙頭角邊防民兵與香港警方發生武裝衝突，民兵挾持一名香港洋督察，後來釋放了。胡棣周從這件事察覺到北京不會全力支持香港左派。他與金堯如吃午飯時說：「老金，我們這趟輸定了，中央不支持我們，我已準備坐牢了。」

他不知道當年誰作出放炸彈的決策，但當時工人階級受港英不斷鎮壓後，情緒非常激動，而新華社領導層的心態是事情越鬧越大，形勢越亂越好。當時胡棣周對這種極端做法非常反感，「我可以打賭，沒有一個左派報人贊成放置炸彈，即使《文匯報》、《大公報》都沒有人認同。」胡認為，菠蘿陣令市民反感，也導致左派社會形象受損，迅速失去民心。他認為：「放炸彈令香港人覺得左派將事情政治化，而不是真正關心勞工利益。」



胡棟周七十年代與體育界名人韋基舜(右一)合照，韋現任香港區政協委員。

但他指出，港英「也不是愚蠢的」，當年一些炸彈放置在國貨公司門外。他說：「如果我是左派，那會放炸彈害自己人？」胡又批評香港主流傳媒報道「菠蘿陣」時誇張、偏頗，在一定程度上誤導市民。胡棟周又認為左派在騷亂中出盡了「吃奶的力氣」，暴露了自己的底牌，港英毋須花力氣偵查，就輕易掌握左派陣營的虛實，知道誰是頭面人物。

在那個激情取代理性的年代，胡棟周也難免受激進思潮感染。《人民日報》在他被捕後，發表文章表揚他為「毛澤東思想的好學生」和「無產階級的好戰士」。他當時很受鼓舞，現在回想起來卻感到啼笑皆非：「我坐牢前何德何能？我當年可算是個花花公子，晚上常流連夜總會。《人民日報》這樣抬捧我，我實在慚愧。」他表示，

現在回想當年情緒太激烈，沒有冷靜思考，反而坐牢時有機會靜下來反思這場運動的得失。

胡棣周認為，六七騷亂的事態發展是由左派和港英促成的，雖然港英最終成功將騷亂鎮壓，但對港英也沒有好處。他相信，如果港英不是在鬥爭中取得勝利，以為香港人支持它，前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就不會在中英談判期間那麼囂張，提出的討價還價條件就會較合情理，這樣鄧小平可能給英國人更理想的條件。

儘管胡棣周在港英治下嘗到鐵窗滋味，但他對港英當局在騷亂平息後改採懷柔政策持肯定態度。他認為，沒有五月風暴（六七事件），港府就不會採取懷柔政策和推行社會改革。他表示，港英當局七十年代大力進行社會建設、改善房屋和醫療服務，並且成立廉政公署，下決心清除貪污，管治較六七年前有顯著進步。

北京欠香港左派群眾一個交代

像不少左派暴動參與者一樣，胡棣周認為自事件結束後，北京至今尚未明確交代責任誰屬，他覺得「很不公道」。他相信，北京不想重提文革，因此也不想重提六七事件。他說：「我對坐牢沒有後悔，因為我結識了左派人士，受左派思想影響。但當年被關進牢裏的不只我一個人，而是一千七百人。」他在赤柱監獄坐牢時發現，許多六七事件被捕者與左派一點關係都沒有，例如擦鞋匠、受警察壓迫的小販。胡指出，當年不少工人滿腔愛國熱情，在事件中被捕、受傷甚至犧牲；許多人響應左派罷工的號召，因而失去工作，左派工會也照顧不了那麼多。他強調：「如果中央一句交代說話也不說，怎能對得起他們？中央最少也應該說一句：『你們辛苦了，為了愛國付出了沉重代價。』只需派一名官員站出來說這樣一句話已經足夠，毋須甚麼賠償、甚麼名譽地位。」

六七年以來，一些中共官員也曾非正式地對六七事件作出評價。胡棣周七零年出獄後前往廣州學習，廣東省人民支持港九愛國同胞反

英抗暴鬥爭委員會(支港委員會)負責人對他表示：「中央領導層曾在一段時間內失控，這場鬥爭(左派騷亂)群眾沒有錯，但香港領導(新華社)的鬥爭手法有錯誤。」一九七七年，胡棣周獲邀觀看亞非拉乒乓球錦標賽，中國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接見胡棣周等人時說：「你們沒有做錯，香港群眾的愛國熱情要肯定，但中央某些領導同志要負責任。」據胡棣周的記憶，負責香港工作的廖承志也在八十年代初與他們閒談時，說過要「肯定群眾愛國熱情」之類的說話。但胡棣周認為北京領導人這些片言隻語並不足夠，北京起碼要「有點表示」，中央應請當年六七事件參與者吃頓飯。他認為：「愛國群眾幾年牢獄生涯，換一杯茶、一頓飯絕不為過。」

特區政府已經作出了「表示」。九七年九月中秋節，特區行政長官董建華邀請一批「曾對香港作出貢獻的人士」，出席在前港督府舉行的中秋酒會。部分六七事件參與者和抗日戰爭期間保衛香港的東江縱隊隊員也接到請柬，胡棣周、楊光、廖一原等六七事件參與者都獲邀出席。港府律政司司長梁愛詩在酒會期間主動對胡棣周表示：「這件事其實很不公平，這不只是你個人的問題，(前《大公報》總編輯、現任中央政策組顧問)曾德成也受到不公平的待遇，這件事情特區政府要慢慢來。」梁愛詩曾任香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繼父七六年開始在《香港夜報》任職經理，舅父黃祖芬六七騷亂期間擔任左派中華中學校長，曾被港英當局拘禁於摩星嶺集中營。董建華當年曾在中華中學就讀。胡棣周相當欣賞特區政府的做法，但他認為應該做得更多：「董建華還會請我喝杯酒，但有誰記得當年為愛國付出了沉重代價的工人？」

像其他六七事件參與者一樣，胡棣周九七前沒有公開評論六七事件的功過。他指出，他們這些六七事件參與者在九七回歸前不願多講這往事，「主要是怕刺激左派的情緒」。雖然現在香港已回歸中國，但他相信北京和特區政府都不會為六七事件平反，因為「香港輿論已將左派的臉孔塗污了」。

六、糊塗政治犯翟暖暉

翟暖暉簡歷：

現年八十歲，六七暴動期間擔任南昌印務公司經理，並應邀出任左派出版界鬥委會委員。因南昌印務承印《香港夜報》、《新午報》而捲進政治漩渦，被判入獄三年。現任親中政論雜誌《廣角鏡》督印人。



翟暖暉近照。

一九六九年九月六日，翟暖暉結束為期兩年的鐵窗生涯，踏出赤柱監獄大門。當他回到旗下的宏豐圖書公司，發現辦公室空無一人，職員早已各散東西。他本人的辦公桌上的日曆的日期是「一九六七年八月九日」，正是他被捕的日子。日曆兩年來紋風不動，他不但失去了兩年自由，也蒙受了嚴重的經濟損失。

對翟暖暉來說，六七年被打成政治犯可說是無妄之災。他當年完全沒有參與示威遊行，也沒有寫文章、貼大字報，卻因承印了幾份左派外圍報章而胡裏胡塗成為政治犯。他表示：「我從來不是左派核心人物，也不是左派騷亂的擁護者，只是因緣際會涉及這場運動而已。」

六七年五月新蒲崗香港人造花廠事件爆發後，左派陣營紛紛在各行各業成立鬥委會。左派出版界也在五月成立鬥委會，成員近一百人，三聯書店負責人藍真擔任主任，翟暖暉在藍真的邀請下出任鬥委會委員。但翟表示：「我不是左派陣營中人，但我崇拜共產黨，與左派出版界負責人素有來往。」左派當年成立的鬥委會如雨後春筍，但翟暖暉直言這些鬥委會往往僅屬虛張聲勢，例如出版界鬥委會當年除了發表聲明，並沒有實際行動。他說：「一些人胡裏胡塗，第二天看

報才知道自己當上門委會委員。」他指出，許多出版界人士都感到害怕，但不滿港英的情緒長期存在，「當大家聽到要鬥港英都表態同意」。

雖然翟暖暉當上了出版界門委會委員，但他絕對談不上六七暴動的參與者，反而為自己的業務操心。正當左派抗爭行動不斷升級，身為宏豐圖書公司董事長的翟暖暉，卻於五月十五日在中環大會堂舉辦教科書展覽會，推銷宏豐出版的小學自然科教科書。他表示，他原本對人造花廠事件沒有任何傾向，反而擔心事態擴大，影響宏豐的教科書銷量。

翟暖暉當時與左派報章《商報》董事長李少雄合資經營南昌印務公司，負責承印左派外圍報章《香港夜報》、《新午報》和《田豐日報》。翟、李兩人各佔南昌印務一半股份，李少雄出任董事長。翟暖暉則擔任經理，甚少過問南昌的業務運作，大部分精力放在宏豐圖書公司，他與胡棣周、潘懷偉等人也不太熟悉。翟怎樣也想不到甚少沾手的南昌印務公司，日後為他帶來牢獄之災。

翟被捕前毫無先兆，八月八日還與家人到港島南區深水灣暢泳。八月九日凌晨四時半，六、七名港英便衣探員前往翟暖暉位於中區半山西摩道的寓所，翟妻子聽到門鈴聲後開門察看，這些探員表露警察身份。從睡夢中驚醒的翟暖暉心知不妙，立即命妻子開門。探員進門後表示：「你是不是南昌印務公司經理？」由於翟暖暉平日甚少過問南昌印務的運作，一時之間忘記了自己是這家公司的經理，想了一會才記起來。

探員搜查他的寓所後，將他押往灣仔軍器廠街警察總部。他赫然發現胡棣周等人也在那裏集結，原來他們與他幾乎在同一時間被捕。警方接着將各人送往西區警署（俗稱七號差館），翌日轉送域多利羈留所。案件於八月二十一日在中央裁判署開庭審訊，翟暖暉控罪共二十一項，主要觸犯煽動條例、警察條例及出版管制條例。相比胡棣周，翟只是「協助與教唆他人犯罪」的從犯，其中一項控罪為「協助與教

唆」《新午報》於六月十五日刊登題為〈黃大仙坊眾成立鬥委會，誓師以牙還牙鬥港英〉的文章。由於他是承印三家報章的南昌印務經理，三報的控罪都有他的份兒。

翟暖暉、胡棣周等人被押解至域多利羈留所時，胡棣周表明「我們不請律師」，各人同聲附和。翟表示：「我們當時精神異常亢奮，大有香港法律由我們改寫的氣概。」他由始至終覺得這次審訊是一場鬧劇，反正這是「政治迫害」，辯與不辯也會敗訴。他認為，這些法律訂得苛刻、含混，等於沒有法律。

法官賴特叫他答辯時，他感到茫無頭緒，決定興之所至，想怎樣講就怎樣講。他說：「當時我胡言亂語，一點也不正經，東拉西扯，把一些互不相干的事情扯在一起。」他又引用毛澤東詞「天生一個仙人洞，無限風光在險峰」、「不管風吹浪打，勝似閒庭信步」等詞句，法庭傳譯員不知如何翻譯。他告訴傳譯員：「你就跟法官說我走來走去吧。」他又引述魯迅「俗人應避雅人」的說話，弄得法官賴特一頭霧水。

他反駁「教唆」、「顛覆」等控罪時表示：「我實在沒有教唆他人，如果真的教唆，我會感到光榮。」對於當局指他們的報道引起「公眾恐慌」，他表示：「那是怎樣的恐慌？（六六年吹襲香港的）颱風溫黛也曾引起一陣『公眾恐慌』，拿這個去控告市民，罪犯何處不在？」他回首三十年前的往事時，承認當年存有「爭取表現」的動機：「既然我被港英審判，就要做得似模似樣。而且我有一些親友在國內工作、生活，我爲了他們着想，必須在法庭上有所表現。」他相信英國不會亂來，至少不會把他「活埋」，「如果是國民黨就不敢說了」。他面對危難之際，仍然不脫商人本色，惦掛着公司業務會否因他捲進政治漩渦而受影響。他表示：「受審期間還擔心學校覺得我是『左仔』，以後不肯用我公司出版的教科書。」

九月四日，胡棣周被判入獄三年，法官賴特九月六日宣判翟暖暉罪名成立，同樣判處三年徒刑，南昌印務則被判罰款一萬二千元。翟

暖暉聞判後說：「反對！我是無罪的。」他認為：「自香港開埠以來，因新聞出版事業而被控，刑罰之重，刑期之長，恐怕前所未有。」

翟暖暉自此與胡棟周、潘懷偉、李少雄同在赤柱監獄度過兩載鐵窗生涯。他初期與李少雄及另一名囚犯同一囚室，一個月後被單獨囚禁。雖然翟暖暉等人屬政治犯，獄中待遇較其他左派群眾良好，但他坦言「從未捱過世界」，冬天只獲發一件棉外套和一塊毛氈，感到相當難受。而獄中膳食主要是糙米飯、爛菜、鹹魚仔等，經常吃不飽。他在獄中碰到一些曾放置炸彈的人，部分更因炸彈爆炸而肢體受傷。

六九年九月六日翟刑滿出獄，獄方將他送往域多利羈留所，許多左派人士到場歡迎，他以「人山人海」形容當時的情況。《商報》更組織歡迎會，邀請他報告「獄中的鬥爭情況」，出席的左派人士將他視作英雄。但他的經濟損失相當慘重，自他被捕後宏豐圖書公司大部分職員各散東西，業務完全停頓，花了幾年時間才逐漸恢復過來。但他對涉及左派暴動而入獄完全不後悔。

他認為，英國殖民政府的腐敗無能和深刻的社會矛盾，是左派暴動的社會根源。他指出，新蒲崗人造花廠勞資雙方僵持了二十多天，港府勞工處竟然一直沒有介入調停，令事態不斷擴大，一些傳媒因此以「無能」形容勞工處的表現。他表示，人造花廠可隨意解僱員工，也反映了當時工人不受勞工法例保障的狀況。他憶述說，六七年青洲英坭勞資糾紛其實更令人擔心，受關注程度甚至蓋過時間相若的人造花廠工潮。青洲英坭勞資雙方對峙期間，左派陣營組織慰問團聲援，更有著名電影明星到場表演助興。翟暖暉說：「青洲英坭工潮出現了歐籍工程師打傷工人的事件，其實更有文章可做，反而人造花廠沒有這種盛況。但警察的濫權使人造花廠事件搶了閘，上了頭條。」他認為，人造花廠工人希望事件和平解決，只是在工廠門外和平集會，結果卻因警察動武而觸發騷亂，現在回想當年往事不禁令人啼笑皆非。他說：「現在一年有上千次集會遊行，那會出現騷亂、宵禁？」

曾任香港左派報章負責人的羅孚和金堯如認為，香港社會矛盾長期存在，如果不是新華社推波助瀾，就不會出現後來的左派騷亂。翟暖暉不同意羅、金兩人的說法，認為他們以共產黨員的慣性思維看六七事件，「以為中共不搞就沒事」。他相信：「當年香港社會矛盾嚴重，即使左派不發動鬥爭，香港人本身也可能出現抗議行動，雖然不一定會像左派搞得那樣激烈。」他表示，六六年香港青年蘇守忠發起絕食抗議天星小輪加價，正是港人不滿港英政府的表現。港英當局在六六年騷動結束後發表的《一九六六年九龍騷動調查委員會報告書》承認，政府與民衆之間「多少有些意見不能溝通的情形」，「殖民地政府即使能夠提供最有效的行政和經濟發展的機會，也較難獲得人民支持」。報告書又指出，「假如香港社會不隱藏着對社會和經濟情況的不滿情緒，示威可能不會得到民衆這麼大的支持」；而造成不滿情緒的潛在原因，將來可能再次觸發騷動。²⁰⁴但翟認為，港英當局沒有吸取六六年騷動的教訓，報告書這些話成了讖語。

但翟暖暉承認，六六年在神州大地揭開序幕的文化大革命，成為推動六七騷亂的「大氣候」。他認為不能把六七事件的所有責任都推給殖民政府；「香港是小氣候，國內是大氣候。香港百多年歷史證明，小氣候往往為大氣候刺激和激化」。他表示，人造花廠事件爆發前，香港已處於「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局面。他憶述說：「文革爆發後，香港社會也出現異常氣氛，一些佩戴毛像章的工人跑去要求老闆加薪。南豐紗廠勞資糾紛期間，部分工人指名道姓指另一工人為『美蔣份子』。」

文革爆發後「打倒權威」在神州大地響徹雲霄，而對香港左派來說，「打倒權威」和「打倒港英」是順利理成章的概念轉換。翟暖暉指出，五、六十年代香港左派陣營備受港英當局壓制，不少左派人士遭遞解出境，前往廣州也要取道澳門。他相信，左派陣營不滿長期受港英壓抑，是左派六七年採取激烈行動的深層原因。

但翟暖暉對左派的表現很失望，認為他們當年嚴重脫離群眾。他

批評左派鬥爭策略錯誤，應該首先採取向群眾說理的手法，令市民充分了解人造花廠事件，從而爭取市民的同情。他認為，左派應逐漸暴露港英的面目，而不是倉卒成立鬥委會，甚至採取激烈抗爭行動。左派陣營行動的迅猛，出乎翟暖暉的意料。六七月五月人造花廠事件爆發後，翟一位朋友詢問形勢將如何發展。他對這位朋友說，局勢會拖一段時間，可能為時幾個月，建議他買點罐頭以備不時之需。左派六月下旬發動罷工、罷市，令翟暖暉「大跌眼鏡」，因為他原本估計左派不會發動大規模罷工，最多只會進行野貓式罷工。他表示：「我的腦筋還未轉過來，他們就搞大罷工了。一般群眾根本不明白左派為何發動罷工。」他相信，香港左派受文革和澳門事件影響，高估自己的實力，甚至存有跋扈和趾高氣揚的心態，因而採取盲動的處事手法。他直言當年左派表現差勁。

他指出，當時中間群眾甚少參與左派發起的活動，但不少市民不滿港英打人，傾向同情左派。他表示：「左派放菠蘿前，我對他們的行動基本上持體諒態度。」他在宏豐公司的職員雖然沒有參與左派的活動，但大多同情左派，有人更向左派捐款。但翟暖暉對左派放置炸彈的行動非常討厭，左派陣營也因此失去公眾支持。

他在獄中碰到一些曾放炸彈的人，當中以工人、小販居多，部分人更因意外遭炸斷手指，甚至失明。對於有人指責當年擺放炸彈的人為「暴徒」，翟暖暉認為擺放炸彈的人只是受到了「暴力鎮壓」，遂作出極端的、不顧後果的反應。他表示，他們的行動應受非議和譴責，但他們不是暴徒。但他認為：「任何社會運動發展至採取極端手段，已預示運動不可能成功；左派放炸彈顯然是沒有辦法下孤注一擲的舉措。」左派陣營多年來否認曾放置炸彈，翟暖暉指出：「雖然左派不承認放炸彈的責任，但這不能改變歷史。」

翟暖暉認為，六七暴動對香港的啓示是如何處理「大氣候」和「小氣候」之間的關係。他年前訪問北京時，與當時的中國國務院港澳辦公室副主任李後會面，詢問如果日後香港有人以「擁護祖國」為

名，發動類似六七事件的騷亂，北京將如何處理。李後堅定地回答：「有香港的法律！」

儘管翟暖暉不甚認同左派六七年的處理手法，但他坦言崇拜共產黨和毛澤東。他對香港問題的見解也與一般親中人士不同。雖然他目前擔任親中政論雜誌《廣角鏡》督印人，但他稱讚前港督彭定康在政改方案中擴大立法局功能組別選民基礎「做得很好」，認為彭定康打破中方訂下的遊戲規則，令功能組別選舉更民主。

七、充滿困惑的左派電影界元老廖一原

廖一原簡歷：

又名廖源，別名廖滌生，一九二零年在香港出生，祖籍廣東新會。一九三九年畢業於香港中國新聞學院，當時的講師包括後來成為中國外交部長的喬冠華。抗戰期間赴內地任戰地記者，先後擔任《力報》、《掃蕩報》等抗日報章編輯，結識了聞一多、李公璞等著名學者。五一年任《文匯報》社務委員，後轉往電影界工作，先後擔任新聯影業公司董事長、鳳凰影業公司董事長、長城製片有限公司董事長、銀都機構有限公司首任董事長。六七年出任各界鬥委會常務委員，同年十一月被捕，囚禁於摩星嶺集中營。現任銀都機構電影公司名譽董事長及華南電影工作者聯合會會長。九六年當選香港特區推選委員會委員，參與推選首屆特區行政長官。早年從事文藝創作，作品有《思前想後》、《我們這一群》等。近年一直擔任香港電影界慶祝「十·一國慶」籌委會名譽主席。今年七月一日，獲行政長官頒發紫荊星章。



六六年十月一日，廖一原攝於北京天安門廣場國慶觀禮台上。

一九六六年「十·一」國慶前夕，香港新聯影業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廖一原獲邀參加香港各界國慶觀禮團，前往北京觀禮；當時文化大革命已在國內揭開序幕。在觀禮期間，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副總理陳毅等國家領導人接見觀禮團成員。周恩來等人向他們闡明這場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在於「破四舊、立四新」（即破除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建立新的一套），以達致改變整個社會的精神面貌，以利於社會主義制度的鞏固與發展。但周恩來等領導人一再強調，海內外有別，文革只在已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中國國內進行，在香港絕對不應照搬照套，否則會犯嚴重的政治錯誤。

但文化大革命往後的發展，早已超越了周恩來原來的設想。這場長達十年的政治運動，令整個民族陷入萬劫不復的境地。廖一原表示，他們當時真是始料不及。同樣出乎廖一原意料之外的是，國內爆發文化大革命不到一年，一九六七年五月香港爆發了一場「反英抗暴」的鬥爭，而且長達一年之久。

廖一原向筆者表示，這場反英鬥爭主要是由於港英統治者長期實行高壓統治、剝削及壓制、迫害愛國力量所引發的，同時也受國內文化大革命的影響和推動。「五月風暴」爆發後，廖細味周恩來等人不到一年前的談話，以為「反英抗暴」只是「對港英進行文鬥和言文批判，令香港同胞的愛國情緒更昂揚」。但誰能料到鬥爭不斷升級，幾千同胞被港英投進監獄或打傷致殘，香港的經濟也受到很大損害，廖本人也成了為被港英監禁於集中營的階下囚。

三十一年後，現任銀都機構名譽董事長的廖一原，坐在九龍油麻地銀都機構的辦公室內，塵封的往事娓娓道來。五月六日新蒲崗大有街人造花廠事件後，香港社會鬧得沸沸揚揚。廖一原辦公桌上的電話響起長長的鈴聲，他拿起電話筒。他記不起來電者是新華社官員還是《大公報》社長費彝民。廖一原曾任《文匯報》編輯主任，與同屬左派報界中人的費彝民稔熟。原來左派陣營計劃成立各界鬥委會，來電者認為成立鬥委會是一件大事，須網羅各界的代表，因此邀請廖出任

電影界代表，並通知他五月十六日出席鬥委會成立大會。

他記得首次會議在中環中華總商會會所舉行(至於《文匯報》指會議在土瓜灣工聯會工人俱樂部舉行，他估計可能是為了保護參與會議的愛國商人，避免他們惹上麻煩)。五月十六日鬥委會大會選出十七名代表，廖一原按原先計劃當選為代表。五月十七日早上十一時，以工聯會理事長楊光為首的十七名鬥委會常委，分別乘坐四輛汽車前往港督府，抗議港英鎮壓工人，並要求進內向港督戴麟趾遞交「反對港英法西斯暴行抗議書」，但被港督副官哈里遜拒諸門外。眾人在港督府門外朗讀毛語錄，並由楊光宣讀抗議聲明。

各界鬥委會成立後，各界別的左派社團紛紛呼應，左派電影界也立即響應號召，成立電影界鬥委會。左派電影團體華南電影工作者聯合會也成立了鬥委會，「誓與全港工人、學生、同胞們團結起來，聯合起來，並肩對敵作戰到底」。五月十二日，左派清水灣電影製片廠，派出攝影師黃亞林等人前往大有街人造花廠現場，拍攝資料影片。但黃與另一名攝影師蔣仕被警察毆打，並被拘禁數天，後來獲法庭無罪釋放。清水灣電影製片廠也成立鬥委會，並舉行「控訴港英當局法西斯暴行大會」。攝影師黃阿林在會上「憤怒地控訴」港英當局「非法逮捕」他們兩人和其他被拘捕的愛國人士，並「揭露港英走卒對他們嚴刑拷打，也動搖不了他和蔣仕熱愛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的心」。

五月二十三日，鬥委會舉行擴大會議，決定成立常務委員會，原有十七名代表改任常務委員。雖然廖一原躋身鬥委會領導層，但他沒有參與反英鬥爭部署的討論，反而不時產生困惑和不理解。作為長期愛國份子，他沒有理由不支持與港英鬥爭，但相信許多鬥委會常委和他一樣，都不知道如何展開鬥爭。廖一原指出：「鬥委會開會只是大家碰碰頭，宣佈事項，為時甚短，很快就散會。會議沒有討論鬥爭方向和策略部署，所以我對會議內容的印象很模糊。」

廖一原表示，一些人以為鬥委會指揮「反英抗暴」行動，甚至下

令擺放土製炸彈，完全是誤解的。他指出，外界以為鬥委會是對英鬥爭的領導機構，其實它只是「掛牌機構」及「統戰機構」，連鬥爭策略也不曾討論。他說：「鬥委會只開了一兩次會，對後來的事態發展根本不清楚。即使主任委員楊光的情況相信也與我們差不多，我們只是掛個名銜，背後另有決策機構。」他對左派陣營大張旗鼓地成立全港規模的鬥委會也頗有保留，據他所知，部分親中商人其實不一定願意參加或成立鬥委會。他說：「反對港英鎮壓香港同胞是應該的，但是否一定要成立公開的組織，持續進行全港範圍的大規模鬥爭？事後回過頭看，肯定有人在幕後策劃和指揮操縱。」

他表示：「六六年文革爆發前，香港不斷發生勞資糾紛，大有街人造花廠工潮不過是另一次工潮罷了。左派工會在工潮初期派人慰問人造花廠被解僱的工人，支持他們與資方進行抗爭，爭取職業保障，這是應該的。為甚麼鬥爭後來不斷升級？」廖一原指出，左派陣營發動左派工會、學校、中資機構職工、左派社團，川流不息到現場慰問工人，而且手持毛語錄，給人很不尋常的感覺。他認為：「這可能是新華社在幕後全面發動左派社團、學生慰問、支援，無疑給予港英鎮壓的口實。」

左派騷亂的事態發展，使他感到非常疑惑和不安。左派人士到處張貼大字報，又發動「飛行集會」（示威群眾事前約定在街上某處集合，彼此詐作互不認識，到了預定集會時間會合，發表演說、宣讀抗議聲明和散發傳單，然後迅速散去），廖一原認為這些行動對廣大市民的日常生活造成很大困擾。他表示：「港英一旦發現有人搞飛行集會，必定派出大批警察封鎖附近街道，大量施放催淚彈，商舖因此關門，小販也爭相走避，直接影響他們的生計。」

他當時已覺得飛行集會的方式不妥當：「這不就是中共領導人李立三三十年代在上海採取的鬥爭方式嗎？這種鬥爭方式後來受到中共批判，稱為『立三路線』，這種鬥爭方式是不會得到香港市民支持的，許多市民更非常反感。」他又認為，左派鬥爭期間提出的口號，

許多都很不妥當，也缺乏策略。他說：「甚麼『黃皮狗』、『白皮豬』，華籍警察也是中國人，一些警察也是有良知的，左派卻將他們一棍打死。」

六七年六月底，左派陣營發起全港罷工、罷市，廖一原直言這種抗爭手法不智，因為首先損害了中下層市民和小商販的利益。他指出：「罷市期間商人損失慘重，國家的損失更為嚴重。內地運往香港的牲口和蔬菜原本已付運，運輸人員中途接到香港罷市的指示，唯有把火車停在車站。那時正值炎夏，許多豬隻就在車廂內餓死、渴死。香港的零售批發商也沒有生意可做，社會秩序也因而大亂，人心惶惶。」而巴士、渡輪罷駛也影響市民上班。廖又指出，左派大罷工未能迫使港英就範，被開除的左派工人轉業困難，左派陣營付出這麼大的代價實在不值得。

六七年七月鬥爭開始升級後，廖一原開始覺得不對勁。踏入六七年七、八月，港九各地出現「菠蘿陣」，市面一片恐慌。廖一原坐直了身子，以沉重的語氣說：「菠蘿陣嚴重影響廣大市民的生計和生命安全，北角一名小女孩更被炸死，市民人心惶惶。抗爭的原意是保護同胞的合理權益，目的不是要推倒港英。擺菠蘿陣首先損害的不是英國，而是廣大群眾的利益。」他相信，放置炸彈最初背後肯定有人策動，然後其他人爭相效尤。他表示，隨着鬥爭升級，中間群眾越來越疏離，不支持左派甚至非常反感。他說：「我認識的一些非左派朋友跟我說，左派這樣搞影響他們上班和日常生活。在這種情況下，左派已逐漸失去廣大市民群眾的支持，鬥爭是註定失敗的。」

左派鬥爭令香港市民蒙受損失，他也因位居鬥委會常委而淪為階下囚。六七年十一月十五日凌晨二時，大批荷槍實彈的軍警衝進尖沙咀加連威老道新聯電影公司，拘捕廖一原，並將他拘禁於港島摩星嶺集中營，翌年十二月才獲釋。當時港英當局沒有指根據甚麼罪名拘捕他，當年一些報章報道，港英懷疑他在電影界搞出「違法事件」，他直言這是「欲加之罪」。廖指出，他在獄中被單獨囚禁，受盡折磨，

囚室中没有床，大小便也没有人理會，每天膳食只有幾條菜和粗飯，「蟑螂糞便比米還要多」。獄方每天安排十分鐘「放風」時間，讓他們到集中營內的空曠地方散步。

廖一原相信，香港社會長期存在的社會矛盾及港英高壓統治，構成了「五月風暴」的土壤。他表示：「新中國成立後，國內欣欣向榮，相反港英在香港實行高壓統治，那怕一些小事也會採取非常殘酷的鎮壓手段。而且香港五、六十年代貪污情況嚴重，中下層市民對港英當局普遍存在反抗情緒。」在香港出生和長大的廖一原，以自己的成長經歷說明港英早年如何欺侮香港下層民衆：「那時候英國幫辦（警務督察）常常帶着幾名華籍警察在街上橫行霸道，漁民挽着鹹魚竟然被控『虐畜』。他們又不時無理毆打漁民和小販，或把貨物踢翻在地，欺負了你還要問你口袋有多少錢。」

當時左派界電影界也受到港英當局壓制，《林則徐》、《白毛女》、《青春之歌》等國產電影都被禁映。廖一原說：「電影內容只要稍涉民族意識，港英就會要求刪剪。一九五二年，十名愛國電影界人士也更被當局無理遞解出境。」

他指出，五、六十年代港英官員貪污腐化，黃賭毒風行，市民生活困苦，當時一齣名為《一家八口一張床》的電影，充分反映當時民生凋蔽情況。廖一原認為：「大部分市民對港英統治相當反感，卻是無可奈何。」六六年天星小輪公司提出加價五分錢，以蘇守忠為首的一些青年以靜坐、絕食的和平方式抗議小輪加價。廖一原表示，不要小看加價五分錢對中下層市民生活的影響，小輪提高票價一定會引起連鎖反應，導致物價上漲，而且當時許多市民每天工資只有一兩元。絕食示威者結果遭當局毒打至投進監獄。廖認為：「港英處理天星小輪事件的手法表明，港英不僅壓迫愛國進步力量，就連香港廣大市民通過和平手段，對關乎切身利益的事情表達意見，也要加以封殺。港英不只在政治問題上壓迫香港同胞，連民生問題也採取高壓手段。」

他認為，港英長期實行高壓統治，只要碰到一些引爆點，火山就

會爆發，人造花廠事件就成為騷亂的導火線。他分析說，港英長期實行的高壓統治是六七事件的內因，文化大革命的影響則是外因。「文革對反英抗暴產生影響，不然群眾不會到處貼大字報。」他表示，文革期間官方傳媒聲稱要打倒帝(帝國主義)、修(修正主義)、反(反動派)，紅衛兵又稱香港為「反帝城」，國內的極左思潮對香港帶來衝擊，是很自然的事情。

一九六六年底發生的澳門「一二三事件」，也對新華社和香港左派陣營產生鼓舞作用，開始躍躍欲試。當時澳門左派陣營發動反對澳葡政府的鬥爭，澳葡政府在壓力下低頭道歉，左派人士形容為「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香港新華社動員左派群眾前往澳門，「學習」澳門左派群眾的鬥爭經驗，為「反英抗暴」作好「思想準備」。

當時廖一原從報章獲悉澳門事件，他質疑澳門左派是否有必要發動如此大規模的反澳葡鬥爭：「澳門同胞確實長期受澳葡當局壓迫，但為何澳門左派『一二三事件』採取那麼激烈的手段？這恐怕完全是受國內文革影響，特別是受到林彪集團等北京極左路線的煽動，澳門某些人就趁機搞起來。」他認為香港左派某些領導人被澳門「一二三事件」的勝利沖昏了頭腦，以為「兩條半毛語錄就鬥垮澳葡」。他相信，香港左派陣營部分鬥爭手法，顯然照搬澳門鬥爭的經驗。廖認為：「文革帶來的衝擊和港英的高壓統治，固然是導致反英抗暴的重要原因，但出現如此激烈的鬥爭形式，恐怕與當時新華社負責人極『左』的方針及其領導分不開。」

「不是靠群眾運動收回香港」

廖一原五、六十年代與中共高層領導人的親身接觸，令他對左派陣營在六七事件後期的鬥爭手法感到大惑不解，覺得新華社和左派領導人當時的做法違背了中共長期的對港政策。鬥委會十七名常委五、六十年代常到北京會見中央領導人，周恩來、副總理兼外交部長陳毅、廖承志等中央領導人多次向他們講解形勢和處理香港問題的方針

政策。三、四十年前周恩來講話的情景，仍然歷歷在目。廖一原引述周恩來表示：「美國企圖顛覆新中國，中國全球戰略應以反美為主，對英國則有打有拉。」當時中共高層認為，英、美利益並非完全一致，時有矛盾；如果中國收回香港，英國就會站到美國那邊。

當時周恩來等人指出：「如果香港同胞的正當權益受損，中央會出面支持、維護。但假如集中對英進行鬥爭，我們的戰略方針就不再是以反美為主，你們應充分理解中央的意圖，不要常常令中央被動。」但廖相信：「中國暫不收回香港，不等於一旦港英當局侵犯香港同胞的正當權益，中央領導不會向英國進行鬥爭。例如港英五、六十年代遞解愛國人士出境，五二年『三一事件』，中國外交部都向港英政府提出嚴厲抗議，致力維護香港愛國同胞的權益。」

廖一原表示，早在五十年代，周恩來等中國領導人已明確指出，中央對香港採取「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政策。廖與其他香港左派人士五十年代中後期在北京時獲周恩來、陳毅、廖承志等國家領導人接見，當時周一再反覆向他們說明了「長期打算」的方針。廖認為：「長期打算不等於將香港永遠割讓給英國，而是因為香港可以『充分利用』，而將香港暫時由英國管治。中國五零年敢於出兵朝鮮與美國作戰，五十年代末期又敢於與蘇聯決裂，中央讓香港保持現狀，絕不是怕了英國。」他又指出，根據中共高層的想法，「長期打算」顯然不會是兩三年那麼短，但中央沒有定出明確期限。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強調，中國將來收回香港首先靠國家強大，「而不是靠群眾鬥爭來收回香港」。

新華社某些負責官員和左派機構負責人理應對周恩來的香港政策談話耳熟能詳，為何六七年會將「中央精神」拋諸腦後？廖一原相信與當時國內批判「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的政治形勢有關。他指出，文革期間國內突出針對「當權派」，許多機構負責人被批鬥，中國駐外機構的許多負責人也被召回國。中國駐法國大使館文化參贊司馬文森也奉召返國，剛在北京下機就被人五花大綁，稍後更給「造反派」

抓去揪鬥。而當時中國外交部已被「造反派」奪權，受王力和姚登山等人控制，外交部長陳毅已靠邊站。

他相信：「香港新華社一些領導幹部擔心被撤職或調回國內被鬥，他們爲了保住烏紗帽，遂主動發起鬥爭，擺出與帝國主義勢不兩立的姿態，以示政治上可靠，希望得到極左勢力把持的中央文革小組認同。」他指出，香港愛國群眾既然懷有抗拒港英殖民統治的情緒，新華社某些領導幹部就趁勢利用這種情緒，群眾在對港英反感的情況下不難聽從號召。但他說：「群眾後來發覺新華社領導發動鬥爭，原來是爲了達到自己的目的，覺得愛國熱情被人利用了。」

廖認爲，左派工會慰問人造花廠被解僱工人，支持他們與資方進行抗爭，本來是合理合法的做法。但他表示：「左派後來發動大規模的慰問行動，大批中資機構職員、工會、左派學校學生川流不息湧往現場，並且手持《毛語錄》，表示支持工人堅決鬥爭。這樣做無疑把事態擴大，左派的高調行動引來港英警方鎮壓和逮捕行動。」左派陣營對港英的其中一項指責，是「壓制學習毛澤東思想的權利」。但廖一原強調，港英當時沒有禁止左派學習毛澤東思想，拿這個作爲鬥爭理由，未免有點脫離事實。

他認爲：「現在回過來想，反對港英鎮壓香港同胞是應該的，但是否一定要成立香港各界鬥委會及各個界別的鬥委會這種公開組織，並向敵方全面暴露成員的身份，持續進行全港範圍的大規模鬥爭呢？事後回過頭看，肯定有人在幕後策劃和指揮操縱。」

儘管廖對運動發展抱有懷疑態度，但他當時在民族大義推動下參與鬥爭，「義無反顧，甚至不顧個人安危」。當時他從未希望中國早日收回香港，因爲他不認同收回香港較保持現狀更爲有利。他表示：「左派後來提出『港英不低頭，就走頭』的口號，鬥爭目標顯然變了質。左派提出這句口號，等於要將英國人趕走，完全違背周總理當年訂下的方針政策。」六七年六、七月間，左派發動罷工、罷市、飛行集會，甚至放置炸彈陣，連串問題頓時在他心中升起：爲甚麼要這樣

搞呢？為甚麼作出盡失人心的行動呢？

既然廖一原當時滿腹狐疑，為甚麼當時不挺身表達不同意見？他慨嘆在那種對立的形勢下是很困難的：「當時我對後來的過激手法很不理解，但我當時不便公開發表不同意見，怕被指為向群眾潑冷水。」他始終認為，不是不應該與港英進行鬥爭，但應以合法、說理的手法進行，而不應搞全港規模的罷工、罷市，更不該發動暴力鬥爭，損害市民的利益。對於有些左派人士為六七騷亂辯護，肯定當年的鬥爭，「那時是反對港英當局使用暴力」，廖一原認為：「九七前香港始終是英國統治，左派人士不肯徹底否定反英抗暴所犯下的嚴重錯誤。」

廖一原相信，六七事件不斷升級，是由於港英與左派陣營惡性互動的結果。五月二十二日，左派群眾遊行往港督府途中，警方毆打及逮捕遊行群眾，廖認為港英的行動引起左派更激烈的反抗。他說：「只要有壓迫就有反抗，壓迫越大，反抗越大。」而港英認為澳葡政府被左派鬥垮的事件前車可鑑，決定無論如何也要頂住香港左派。他表示當時經常出現紅衛兵準備衝過羅湖橋的傳聞，不斷製造中央打算收回香港的態勢。但八月二十二日北京紅衛兵火燒英國代辦處後，周恩來代表中國政府，迅即向英國政府道歉，英國因此摸清了中國政府暫時不會收回香港的立場。

六七事件由勞資糾紛引起，後來卻演變為左派口中的「民族壓迫」和暴力抗爭。廖一原批評左派陣營後來將勞資糾紛政治化，逐漸失去一般市民的支持和同情。他指出，六七年反英鬥爭後期一些極左做法脫離香港群眾，左派陣營也元氣大傷，在市民心目中的形象嚴重受損，新華社某些領導幹部實在難辭其咎。廖一原認為，左派陣營在事件中受到慘重挫折，許多參與罷工的工人被公司開除，失去職業及退休金，晚境淒涼。「一些當年滿腔熱情的左派群眾信念開始動搖，離開了左派陣營，有人甚至移民外國。」他認為，左派應吸取六七事件的慘痛教訓。

左派報章報道千人一面

廖一原坦言六七左派騷亂期間，左派陣營存在不少為求達到政治鬥爭需要而虛張聲勢，甚至誇張失實的情況。例如當時左派報章報道在五月十六日鬥委會成立大會上，電影界代表「無比激動」地說：「正當港英當局變本加厲的對我們中國同胞迫害，激發起全港中國同胞進行激烈的抗暴鬥爭時，我們偉大的祖國發出強有力的聲音。我國外交部嚴重抗議港英當局迫害香港中國同胞的聲明發出了，這是祖國和偉大領袖毛主席給我們強有力的支持。我們的攝影師到現場拍攝港九同胞慰問人造花廠工人的真實情形，（港英警察）為甚麼要毆打他們？逮捕他們？好吧，既然港英當局要橫蠻迫害我們，我們就堅決跟他們鬥過，昨天我們七、八十位電影工作者到九龍裁判署，我們都戴着毛主席像章，手持紅彤彤的毛主席語錄，進入法庭內和港英進行鬥爭，敵人驚惶失措，我們就是靠毛澤東思想這強有力的武器跟他們鬥。我們堅決響應鬥委會的號召和支持其四項嚴正要求，我們一切都準備好，只要反迫害鬥爭需要怎樣做，我們就怎樣做。」²⁰⁵

這位言詞激烈的「電影界代表」到底是誰？筆者將當年的剪報遞給廖一原細閱，但他記不起自己或誰人當時是否在大會上說過這番話，但曾在左派報章任職的廖一原形容這種報道手法「千人一面」，可信性實在成疑。他表示：「當時的左派報章通常是這樣的，你說半句話，它們就給你寫成八句。我看左報當年對鬥委會的報道誇大居多，絕大部分千篇一律、千人一面，都是高叫『毛澤東思想萬歲』。」

廖一原認為，六七騷亂也不是全無積極意義，客觀上推動了香港的社會改革，因為港英政府吸取了六七騷亂的教訓，開始調整統治方式。七一年接替戴麟趾擔任港督的麥里浩，更推行懷柔改良政策。他相信：「更重要的是，這場鬥爭進一步提高了廣大同胞的愛國覺悟，更令市民看到英帝國主義並不可怕，廣大市民日後逐漸敢於與港英進

行鬥爭。」

左派電影界文革期間飽受摧殘

五、六十年代期間，左派電影界曾在香港大放異彩，新聯電影公司與中聯、光藝、華僑電影公司並列為香港粵語片四大電影公司。同屬左派電影界的新聯、長城和鳳凰電影公司攝製的電影叫好又叫座，不少著名演員都屬這三家公司旗下。

但文化大革命期間，香港左派電影界也受到國內極左思潮的衝擊。廖一原表示，當時左派電影界也有極左份子，其中新華社副總編輯鍾允之就控制了左派電影界陣地。廖一原聞說六六年澳門「一二三」事件後，鍾允之組織左派電影界人士到澳門學習鬥爭經驗，又在反英抗暴抗期間積極指揮電影界的行動。鍾的丈夫黃光宇時任新華社宣傳部部長，是新華社內推行極左路線的官員，並在左派騷亂期間主張採取激烈行動。鍾在電影界將廖一原架空，迫得他一度靠邊站。一九七八年，復出主持香港工作的中共領導人廖承志出席香港電影界座談會時指出：「在文化大革命中，由於江青們的嚴重摧殘，（香港）一些電影製片公司被搞得支離破碎，一些電影界人士蒙受不白之冤，江青們給他們的罪名可大了，誣蔑他們執行文藝黑線，在海外『放毒』，又無理指責他們出賣祖國山河，弄得這些人受欺受壓，被冤被屈，氣憤難平。」²⁰⁶

長城、鳳凰、新聯三家公司過去十六年的二百六十二部電影，被認為是「執行文藝黑線的產物，在港澳及海外大量放毒」。²⁰⁷ 三家公司的負責人與主要的創作人員分批到國內「學習」，進行「靈魂深處鬧革命」，否定和批判自己過去所做的一切。

廖承志又指出：「港澳工作受到了林彪、四人幫的干擾，流毒傳到各個方面，首先表現在對同我們長期在一起工作，渡過了不少難關的朋友都不相信了，一定要派一些『馬仔』進去。這些馬仔是欽差大臣，一是當馬仔，二是打小報告。派個小特務進來，張牙舞爪，這是

江青的作風。你們電影界是否也有這個問題呢？」廖一原表示，鍾允之這類人正是廖承志所指的「馬仔」。

一九七零年五月，廣東省革命委員會第二軍管小組（當時是接手處理港澳工作的領導機構）在廣州召開專門為香港左派電影界舉辦的紀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的講話》發表二十八周年的學習會。由於這篇「講話」於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三日發表，這次「學習會」遂定名為「五二三」會議。第二軍管小組指定長城、鳳凰、新聯等左派電影公司的行政負責人員、編導演等藝術人員三十多人前去參加，學習會期長達一個多月。廖一原表示，舉辦這次學習的目的是要在香港電影、文藝界推行極左路線，規定今後所有作品一律要貫徹「以階級鬥爭為綱」的主題內容，一律要以工、農、兵為作品的主線人物，一律要以塑造工農兵的高大英雄形象為主要任務，同時要對長城、鳳凰、新聯三家公司十多年來執行周恩來等國家領導人一系列創作指導的方針政策所製作的全部作品進行批判。他強調：「這一系列的方針政策是依據香港社會現階段的實際情況而制訂的，完全屬於愛國主義範疇的。」

這次學習會議結果是長城、鳳凰、新聯三家公司的製片量銳減，生產萎縮以至停頓。五零至六六年間，新聯、長城、鳳凰三家電影公司平均每年合共製作十七部影片，七一和七四年製作一部也沒有，七五年才稍稍恢復生產。廖承志後來說：「五二三會議，香港電影工作者身受其害，拍電影一定要按照他們定的框框，主題思想千篇一律，教條主義，這樣的電影怎能叫做藝術呢？無論在待遇上，還是其他方面，都對我們電影界的老人冷淡對待。」他又形容當時香港左派電影創作縮手縮腳，許多題材不敢寫，寫出來的東西像課本一樣。

「五二三會議」要求香港左派電影界公司以工農兵為作品的主角，左派電影界逼於無奈拍了一些脫離香港現實的「樣板電影」。七十年代初期，左派電影公司製作了《女工》，描述香港一家電子廠內的「階級鬥爭」：經理制訂苛例，限制女工上廁所，超過限定次數就

要罰款。眾女工遂向這名經理發動「鬥爭」，結果經理在「群眾壓力」下跪地認錯。廖一原說：「經理不過是受薪階層，根本談不上甚麼資本家。這種內容僵化、脫離現實的電影，當然不受香港觀眾歡迎。」

香港左派經營的電影院也在十年文革期間飽受摧殘破壞。廖一原憶述說，自文革開始後，除了《平原遊擊隊》和《鐵道遊擊隊》等幾齣國產電影仍可上映外，香港左派電影院只能放映《紅燈記》、《沙家濱》、《智取威虎山》等幾部「革命樣板戲」電影，而長城等三家公司又沒有新作，弄得南華、銀都、高陞、普慶、南洋等戲院無片可放，翻來覆去就是那幾齣電影，以及記述毛澤東接見紅衛兵的紀錄片《毛主席是我們心中的紅太陽》。原來以放映外國電影為主要業務的油麻地普慶戲院也要改變經營方針，今後不准放映外國電影，只能與南華、南洋等戲院聯線，放映那幾齣樣板戲電影。所有左派戲院播放影片前都要加插為時數分鐘的毛語錄和語錄歌。

一九七零年春節，香港左派戲院上映內地革命樣板戲《紅燈記》，內容描述中共地下黨員李玉和抗戰期間在東北淪陷後遭日本特務機關拘捕，仍然堅持與日軍不屈鬥爭。廖一原說：「普慶戲院門前懸掛李玉和戴着手銬的巨型宣傳畫像。影片上映時適逢春節，路經戲院的途人遠遠看見就避開，繞道而過，並粗言責罵，說春節喜慶日子還掛出這些不吉利的東西。」

左派戲院在文革期間放映的影片往往乏人問津，唯有與左派社團合作，組織群眾到場。但廖一原說：「即使我們推出優惠票價，同時安排免費專車接送，仍然門庭冷落，連左派群眾也不太願看。分別有一千多個座位的普慶、南華、南洋戲院，往往僅得小貓三四隻。」他指出，文革前香港左派電影機構累積了近一千萬元盈餘，文革期間卻嚴重虧損，幾乎不能支撐下去。



廖一原(右一)七九年赴京出席中國全國文聯代表大會，與中國名畫家關良(右五)、劉海粟(右四)及香港著名攝影家陳復禮(左三)合照。

極左路線鬧出的笑話

在那個政治掛帥的年代，左派電影界製作影片時禁區處處，經常弄得哭笑不得。七四年鳳凰公司開拍電影《屈原》，適逢「四人幫」發動「評法批儒」運動。廖一原指出，劇本是根據郭沫若話劇本《屈原》改編而成的，事前經新華社宣傳部長黃光宇審閱及批准，但黃後來追問屈原究竟是法家還是儒家。當時「四人幫」認定中國歷史上只有儒家和法家兩個互相對立的政治思想流派，儒家思想是「反動」的，法家思想則是被視為「進步」。

導演鮑方不得不暫時停拍，更專程到廣州中山大學求教歷史系教授，得到的結論是屈原因反對享有特權的貴族階層而受守舊勢力迫

害，具有法家的傾向，新華社才批准繼續拍攝工作。

由於當時正值敏感時期，新華社社長梁威林和副社長祈烽很重視《屈原》的拍攝工作，特別數度抽空到清水灣電影製片廠視察。但影片上映前一天，廖一原接到新華社宣傳部的通知，指影片暫時不能上映。他心裏嘀咕：「電影廣告已經推出了，說好了明天上映，現在教我們怎麼辦？」原來當天的《明報》副刊一個小專欄提到，作者在電視台的放映間看到《屈原》（當時是在影片中選出片段和個別鏡頭，作為在電視上放映的宣傳廣告片），「香港左派膽子可大啊，這不是借屈原諷刺毛澤東和江青嗎？」新華社官員可能看到這篇文章後，作出這個荒唐的決定。鳳凰公司唯有以「影片拷貝損壞」，作為未能如期公映的藉口，但電影製片廠和戲院員工都大惑不解。到了四人幫倒台後，《屈原》才能於七八年在香港公映。

當時個別新華社官員的極左作風，也令一些左派演員受不了。六七暴動期間，鍾允之要求長城電影公司影星、「長城三公主」之一的夏夢參加「飛行集會」，但她當時正懷孕，不便參與，鍾允之卻公開批評她「怕死」。夏夢後來脫離左派電影界，就是因為無法接受新華社官員的極左作風。一些編導人員也跑來對廖一原訴說：「我們只是在電影公司打工罷了，現在這樣搞，這口飯實在吃不下去了。」而積極投入六七年「反英抗暴」的左派影星傅奇、石慧夫婦，也於九零年移民加拿大。廖一原表示：「他們離開香港，多少與不同意國內對一些事件的處理手法有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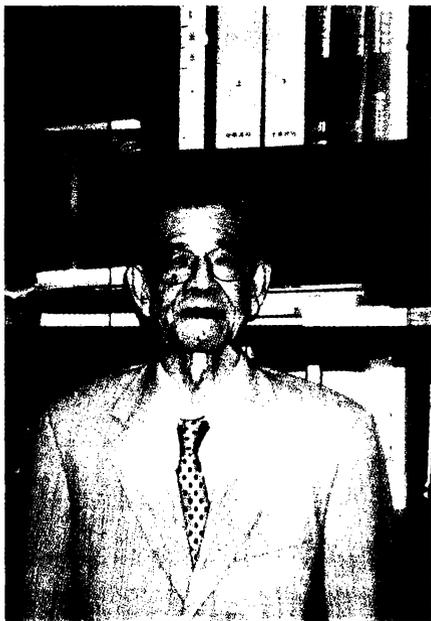
雖然廖一原是「老愛國」，但也曾對中國大陸一些政治運動感到困惑。中共建政初期，大陸發展情況相當不錯，令他感到非常鼓舞。但一九五七反右運動期間，數十萬中國知識份子和專家學者被打為「右派」。他當時對此感到不解：「他們只是提意見，就被打成『資產階級右派』、『反動人物』。」五九年蘆山會議期間中國國防部長彭德懷向毛澤東反映人民公社運動造成大量農民挨饑抵餓，甚至餓死，結果被免職。廖慨嘆彭德懷只是反映老百姓的心聲，卻換來被打

倒的命運，他對此很不理解。他表示：「彭德懷原本被視為英雄，但他竟然在一夜之間被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我實在不能接受這種處理方法。」

六六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對他的思想帶來更大衝擊。他表示：「我最初以為文革的目的不外是破除封建迷信，但是國家主席劉少奇長期參與革命事業，竟然一下子被打成『叛徒』，不經審判就遭解除職務，而且受到很惡劣的對待。」文革期間，大陸爆發武鬥，許多學術界和文藝界人士被打倒，「這些人士都是愛國人士，怎麼突然成了『反動學術權威』？」他又慨嘆大陸不少歷史文物被「造反派」砸毀，「國家還要不要文化？我的思想開始出現抗拒情緒。」他表示，文革禍國殃民，動搖了國家的根基，不啻是民族大災難。

他認為，七六年四五天安門事件，代表人民群眾覺醒。中共領導層七八年決定推行改革開放，令廖一原重燃對中國的希望。他表示：「為甚麼要打倒國民黨的統治？那是因為在國民黨統治下民不聊生。如果中共革命後國家生產不能正常發展，廣大人民的生活日益貧困，那又何必革命？」

訪問後記：筆者九七年曾訪問廖一原，但他不願多談六七左派騷亂，表示「回歸後再談吧，那時候比較方便」，相信不少六七事件參與者也有類似想法。廖一原九八年六月終於願意接見，詳談六七事件。



廖一原近照。

八、蔡渭衡拒當代罪羔羊

蔡渭衡簡歷：

一九二四年出生，原籍中國廣東三水，香港九龍華仁書院畢業。四九年中共建政後，蔡一直從事中國貿易，曾任英資泰和洋行進出口部總經理、和記洋行中國貿易部董事，堪稱香港的中國貿易先驅。八十年代中期開始擔任香港華人革新協會主席，曾任第五、六屆廣東省政協委員，九三年當選第八屆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香港區代表，九六年出任負責推舉首屆特區行政長官的推選委員會委員。



一九四六年，蔡渭衡(後排右三)與九龍華仁書院同學合影。

蔡渭衡不是六七暴動的積極參與者，更不是主要組織策劃者，但這場運動改變了蔡渭衡一生的命運。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六日，香港左派成立港九各界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鬥委會）。鬥委會首次會議在九龍土瓜灣工聯會工人俱樂部舉行，共有一百多名來自各左派社團的委員出席，當時擔任華革會秘書的蔡渭衡也出席了會議。蔡是否應新華社官員邀請加入鬥委會？他強調：「那時鬥委會就等於現在的國慶籌委會，許多愛國人士和左派團體負責人都獲邀加入。華革會是愛國社團，當時工聯會理事長、鬥委會主任委員楊光邀請我擔任委員，我就順理成章加入了鬥委會。」

蔡渭衡憶述說，一些左派工會會員在會上講述如何遭警察打得頭破血流，會議最後通過了兩點決議，分別是（一）要求港英當局賠禮道歉；（二）反對港英迫害的鬥爭須「有理、有利、有節」的決議。會議結束後，港英便衣特務立即跟踪各與會者。他表示，華革會一些職員說有人跟踪他，他原本打算收拾衣物，離家暫避。當時港英已開始封殺華革會，身為大律師的主席陳丕士不得不匿藏起來。蔡指出，鬥委會開了一兩次會議後，在港英壓力下無法繼續運作，鬥委會後來其實由工聯會領導層主宰大局，他也無法與工聯會取得聯絡，對鬥委會許多聲明和行動都不知情。

蔡還未準備就緒，噩運已驟然降臨身上。時隔三十年，蔡渭衡仍然無法忘懷這段「愛國有罪」的歷史。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八日晚上，當時任職和記洋行董事的蔡渭衡下班後，回到九龍油麻地寓所，一如往常與家人吃飯。電視台正播放新聞，他的孩子突然瞪眼看着電視，並叫起來：「爸爸，你看！」他隨即把目光轉向電視機，發現新聞正報道警察防暴隊搜查華革會會所的消息：灣仔軒尼詩道香港會所、九龍遊樂部和筲箕灣華革會平民醫療所，同時遭警察搜查，防暴警察在華革會搜出一些該會粵劇組排戲時使用的刀槍劍棒。蔡渭衡正憤慨、驚訝之際，大女兒跑到露台往下望，發現防暴隊員在大廈外集結，似是戒嚴的樣子。說時遲，那時快，大門砰砰作響，夾雜陣陣叱喝聲和

撞門聲：「快開門，否則……」

蔡打開大門，發現數名港英政治部探員在走廊站立，其中兩人手持衝鋒槍，如臨大敵地指向屋內，走廊上還聚集了不少防暴隊員。一名結領帶的政治部探員拿出一份港督簽發的拘捕令(Detention Order)，聲稱根據《緊急法例》拘捕他。蔡渭衡質問對方根據甚麼理由，那位探員表示：「根據緊急法令，港督可以在不宣佈任何理由的情況下拘捕任何人，為期不超過七天。」(The Governor can arrest anybody for a period not exceeding seven days, without giving any reason)話音剛落，其他探員麻利地向蔡渭衡扣上手銬，將他從家中押走。蔡發現街上正在戒嚴，停放着一輛私家車，還有一輛站滿防暴隊的軍車。蔡渭衡對身旁的政治部探員說：「我是手無寸鐵的文弱書生，不是汪洋大盜，你們為何出動如此大陣仗(大規模)的人馬？」

政治部探員把他帶到尖沙咀火車站對開的皇后碼頭，那裏停泊了



西環摩星嶺集中營今貌：廖一原、黃建立等人被囚禁於此。

一艘遊艇。一名探員刻意挖苦他：「你看，對你多優待，這是港督的座駕艇！」遊艇在中環夏慤道海傍的小碼頭泊岸後，蔡被送進一輛小汽車，車子沿半山區的道路向西走。押解我的政治部探員對他說：「好好欣賞香港的美麗夜色，看看中國銀行，看來你快要和他告別了！」蔡渭衡後來才知道，港英當局用來拘禁他的摩星嶺集中營，是專門收押政治犯的地方，最後大多難逃遭驅逐出境的命運。

汽車繞過西環，登上距離堅尼地城不遠的西環半山一座建築物，蔡渭衡後來才知道這裏就是摩星嶺集中營。現在由香港中環乘坐渡輪前往南丫島，繞過西環就可以看到面海傍的山坡上矗立着幾座洋房。蔡渭衡說：「不知就裏的人也許以為這是半山豪華住宅，只有曾經關押在這裏的人，才會知道這是陰森可怖的摩星嶺集中營。」車子駛進建築物內的停車場內，集中營營長從前方屋子裏走出來，發現政治部探員忘了替蔡渭衡蒙上頭套，連聲責問為何不按規矩辦事，把那名探員罵得狗血淋頭。原來所有犯人被送往摩星嶺集中營途中，都被套上頭套，蔡渭衡因此是集中營內最早知道自己被送往哪裏的囚犯。

那名政治部探員無言以對，立即將一個黑布袋朝他頭上套來，然後左右兩人拉着蔡來到問訊室。探員勒令他除下身上所有物件，包括衣褲、鞋襪、手表以至眼鏡，全身僅剩內衣褲。蔡憶述說：「我在集中營只穿『牛記笠記』（內衣褲），他們甚至將我的內褲帶子扯下來，在那裏真的一點尊嚴也沒有」。蔡渭衡辦理登記財物的手續後，一名政治部人員告訴他：「你的編號是 452，以後只能說編號，不准在這裏提你的名字，不准與任何人交談。」蔡接着再次被套上黑布頭套，時而聽到拉動鐵鏈和上鎖和聲音，又在營警連拖帶拉下穿越了數度大門。一陣開鎖、拉鐵鏈的聲音過後，營警脫下蔡渭衡的頭套，蔡發現正置身一只有七呎長，三呎闊的小房間，地上擺放了一塊僅可容膝的木板，權作睡床。木板佔據了房間的部分空間，除了站立或坐在木板上，毫無轉身的餘地。蔡剛踏進房間，營警「呼」的一聲關上倉門，門外迅即傳來陣陣拉鐵鏈、上鎖的聲音，蔡自此在摩星嶺集中營度過

了十八個月的黑暗歲月。

連同蔡渭衡在內，當年共有五十二名左派人士在摩星嶺被拘禁，包括中華總商會司庫湯秉達、著名演員傅奇、石慧、女導演任意之、左派新聯電影公司董事長廖一原、工聯會副理事長張烈、漢華中學校長黃建立、中華中學校長黃祖芬、畫家張雲、巴士工會及船塢工會負責人、新界西貢區鄉紳謝樹平、西貢公校校長凌宏仁、工聯會秘書陳安和林瑞融等。蔡渭衡說：「六七年六、七月間，一些愛國人士在未經審訊的情況下被擄進集中營。他們不知何故突然失蹤，家人到處尋找，到警署報案、抗議，當局都置之不理。兩三個星期後，港英才將真相告知被捕者的家屬。」

蔡定下神後察看四周情況，發現監倉由一道倉門和三面灰白的牆構成，倉門是厚木造的，漆上黑色。門上有一個約七吋丁方，裝上鐵柵的小窗，窗上鑲了一塊只能外面移動的木板。蔡渭衡和其他囚友形容集中營監倉為「七呎監倉五吋窗」。三面牆原本另有乾坤，分別裝有一個「電眼」（門窺鏡），而且只能從外面窺視倉內的情況。他表示：「每天二十四小時都有人通過電眼監視，我們毫無私隱可言。」蔡從監倉的構造推斷，所有監倉都是互相隔離的，監倉四周都被走廊包圍，犯人休想向隔壁敲牆通風報訊。

蔡坦言在集中營沒有被毆打，但「精神虐待非常嚴重」。監倉牆上裝有一個用鐵網圍住的強力抽風機，天花板也裝上一盞整天亮着的強光燈。蔡渭衡說：「這樣不怕空氣不流通，也不愁黑暗，但在這樣狹小密封的地方整天開動抽風機和強光燈，實在令人坐立不安。整天不停的嘩啦啦抽風機聲，振耳欲聾；撲臉而來的強風無處可躲，刺眼的燈光使我難以入睡。」抽風機送進來的風不斷吹向只穿內衣褲的身體，即使時值夏天也冷得蔡渭衡牙關打戰。僅有的禦寒物品是堆在牆角的灰黑色毛氈，是用粗糙的毛製造的，刺得渾身痕癢難當。「那十八個月受到的精神折磨，較嚴刑拷打還要難受，說它是暗無天日的黑獄，絕不為過。」

除了刺耳的抽風機聲音外，集中營內一片死寂。蔡渭衡百無聊賴之際，唯有細看三面牆壁，發現牆上隱約刻有一些字句，看來是用鐵釘或尖硬物刻上的。字句大部分已被擦去，只留下斷斷續續的痕跡，大多是「報國」，「寧死不屈」等字句，仿如「壯烈犧牲」前夕的遺言。蔡渭衡表示，據說港英政府當年曾在摩星嶺集中營秘密關押國民黨特務。

蔡耳畔忽然傳來陣陣微弱的歌聲：「一條大河波浪寬，風吹稻花香兩岸。我家就在岸上住，聽慣了稍公的吼聲……」原來是中國民歌《我的祖國》，悠揚的女高音令蔡精神一振。他後來才知道這是「長城三公主」之一的著名影星石慧，當時被關押在蔡渭衡隔鄰的監倉。石慧當年擔任華南電影工作者聯合會主席，她的丈夫、著名影星傅奇也和她一起遭港英當局拘禁。蔡正想叫問誰是歌者，卻聽到一聲叱喝：「不准唱！不准張聲！」石慧後來告訴蔡渭衡，她當年每逢聽到營內響起開鎖聲音，就高歌一曲慰問新來的「戰友」。

關在倉裏的犯人完全不知時間轉變，也分不清日夜，直至營警送飯來的時候，打開門上小窗的木板，犯人才能分辨日夜。每天的食物是用塑膠盆送來的「沙谷米」（即夾雜沙石的米飯）和臭鹹魚仔（小腌魚），以及用漱口盅盛載的半杯冷開水。蔡渭衡說：「雖然食物難以下咽，但我每天都盼望快點送飯來，因為我渴望尋回一點對時間的感覺。」

港英當局根據《緊急法例》拘捕蔡渭衡，法律上只能拘禁犯人七天，蔡被捕時也以爲當局只會扣押他七天。但蔡後來發覺自己太天真了：「港英鑽法律的空子，每隔七天發出新的拘捕令。營警每隔七天對我照本宣科，後來他也懶得再重複了。」他說：「這就是我當時享有的『人權』？我的人權去了哪裏？」

港府律政司羅弼時一九六九年解釋稱，六七年實施《緊急法令》的理由是政府確信被拘捕者與騷亂存在密切關係，這些人企圖破壞政府，對香港有嚴重威脅。他說：「那些在幕後組織及發起騷動的人

物，永不會在前線露面。但政府查知誰是組織者，爲了香港絕大多數人的利益，必須阻遏這些人繼續進行顛覆活動。如果社會絕大多數人的和平和安全受到威脅，爲了保障大多數人的安全，將少數人的自由暫時停止，是難以避免的。」但他承認，未經審訊而將人拘留，並無任何道德上的適當理由。羅弼時表示：「未經審訊而將人拘捕的權力，實在是一種『令人不愉快的權力』。但實際上由於環境的需要，許多國家都實施這種緊急法例。」當時部分人猜測《緊急法例》可能列入香港法律匯編，成爲當地的永久法例，但羅弼時認爲這樣做是難以令人接受的（見《星島日報》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五日）。

蔡渭衡入獄一個多月後，當局仍然不准家人探監，家人也不時受到威嚇和騷擾，整天生活在恐懼中。家人後來獲准每兩個星期探監一次，每次十分鐘。蔡最初四個月被單獨囚禁，除了負責看守他的營警外見不到任何人，營方甚至不准他與營警說話。當他離開單人倉時，幾乎失去了說話能力。蔡被帶到四人大房，「同倉」包括中華總商會司庫湯秉達、九巴工會負責人劉榮和工聯會秘書林瑞融。

他「享受」了一段四人大房的「好日子」後，再度被單獨囚禁。隨着六七暴動逐漸平息，英國外交部次官石寶德(Shepherd)到摩星嶺集中營巡視，希望紓緩與香港左派陣營的緊張關係。當石寶德巡經蔡渭衡等人的房間時，熟諳英語的蔡渭衡抓住這個機會破口大罵：「I have never touched any meat. (我很久沒有吃肉了)」石寶德和隨行的港英官員冷不防他有此一着，弄得相當尷尬，營長當然要還以顏色，再次將他單獨囚禁。蔡渭衡被關押期間，港英政府多次對他展開「心戰」。政治部人員多次向他「策反」，聲稱以重金換取他變節，並送他到瑞士尋求政治庇護，但他不爲所動。

蔡渭衡淪爲階下囚後，失去得力助手的和記國際主席祈德尊，急如熱鍋上的螞蟻。祈德尊對蔡的妻子說：「政府把你丈夫抓去，我們的業務沒人處理，這怎麼行啊？我們也是在商言商的啊！」身兼香港後備總察總監的祈德尊打算到集中營探望他這位老部下，但蔡渭衡拒

絕見他。蔡表示：「他是後備警察總監，我恐怕在當時的形勢下跟他見面，會引起我們陣營中人誤會。」但他對這位英國人的情義，其實心裏是相當感激的。和記國際在蔡被拘禁期間，照樣給他發花紅、獎金，蔡和家人也是靠這些金錢渡過這段艱苦歲月。祈德尊更吩咐下屬每天打掃蔡渭衡的房間及倒茶，耐心等候他回來上班。蔡渭衡入獄不久，重返和記國際工作。

日曆撕到六九年一月，負責看守蔡渭衡的營警說：「452(即蔡渭衡)，出來。」營警領他到營內的衣櫃，吩咐他穿好衣服，然後帶他到問話室。他發現房內的桌子上擺滿他的物品，營警說：「點算清楚私人物品，然後簽收。」一名政治部探員隨後對他說：「拘禁結束，現在釋放你。」兩名探員把他送進一輛私家車，車子將他載往寓所附近街道停下來，探員叫他下車。車子隨即絕塵而去，在集中營關押了十八個月的蔡渭衡一時間茫無頭緒，向途人問路後才摸上家門。事前毫不知情的家人看到他回來，顯得莫名其妙：「你回家了？」

蔡渭衡被拘禁期間，腦海裏泛起了連串問號：「為甚麼我好端端會在家裏被捕？我犯了甚麼罪？港英應該拿出罪證嘛，最少也應該說出我有甚麼犯罪嫌疑吧？」他出獄後才知道，防暴隊拘捕他那天，同時搜查了華革會會所，發現一批該會粵劇組使用的刀槍劍棒，港英事後大肆宣傳為「搜出大批攻擊性武器」，大概這就是港英拘捕他的「表面罪證」。根據《明報》報道，警方七月十八日晚上在華革會會所搜出大批「煽動性標語」、十四支木槍、兩把木鑷鉤、一把三角鏗、兩條水喉鐵及九十七個自製面罩。²⁰⁸

但蔡也明白當局不會愚蠢到這樣濫用《緊急法令》，他參與鬥委會的工作，才是港英拘捕他的真正原因。他表示：「鬥委會說起來好像文革時期國內的『革委會』，難怪當時香港有人把鬥委會和文革扯在一起。但鬥委會的結構和現在的國慶籌委會、慶祝香港回歸委員會差不多，成員來自各行各業的愛國人士，我作為華革會的負責人，參加鬥委會沒有甚麼大不了。」他又強調，鬥委會成立後一直號召群眾

對港英鬥爭應「有理、有利、有節」，「直至我被捕那天，反英抗暴的行動僅限於遊行示威。每天成千上萬人到港督府抗議，都保持良好秩序，只有一些小衝突。」蔡更因工作關係，連示威遊行也不曾參加。蔡涓衡慨嘆：「在那個年頭愛國是有罪的，要受很多屈辱，這可不是開玩笑。」

與顧汝德的一段「奇緣」

蔡出獄後也結識了後來成為港督彭定康身邊紅人的顧汝德(Leo Goodstat)。顧汝德當時在英文時事週刊《遠東經濟評論》(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任職副總編輯，六七暴動期間也曾撰寫多篇評論文章，筆下對港英當局的處理手法時有批評，甚至以「極權」(Totalitarian)形容港英的粗暴手法。華革會副會長、名醫吳達標看到《遠東經濟評論》的文章後，覺得顧汝德為左派「講公道話」，很有正義感，對顧汝德留下良好印象。蔡涓衡獲釋後，吳達標相約兩人到他家中吃飯，介紹顧汝德給他認識。

顧汝德後來邀請他到雜誌社閒談，但他的言行和辦公室的佈置卻令他起疑心。顧汝德的辦公室牆上掛了一幅毛澤東像，又擺放了多本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史太林的著作，還有紅彤彤的《毛語錄》。牆壁上掛起幾幅毛澤東詩詞，「馬、恩、列、史」和「毛澤東思想」一應俱全，紅彤彤的辦公室，這實在太奇怪了，當年《文匯報》、《大公報》社址佈置也不會這麼誇張。蔡涓衡說：「在那個年頭，學校懸掛五星旗都會有麻煩，他這樣做無非是令我覺得他是『自己友』，引導我多說點話。」顧汝德言談間經常批評英國，並對左派表示同情，蔡開始懷疑他是港英特務。蔡涓衡說：「顧汝德裝扮為『左派』，實在太幼稚了！」

踏入七十年代末期，中國實行對外開政策，在香港投資的外商也希望增加對中國貿易的了解。香港美國總商會多次舉辦中國貿易研討會，由於從事中國貿易的左派人士大多不諳英語，英文書院畢業的蔡

渭衡因此經常獲邀為主講嘉賓。顧汝德當時在香港大學教授中國課程，也多次與蔡同場演說，並以「中國問題專家」的姿態出現。九二年彭定康獲委任為港督，顧汝德獲彭定康垂青，擔任被稱為「智囊團」的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為彭定康出謀劃策，更在中英政制爭拗中扮演重要角色。蔡認為顧汝德對中國的認識「實在太膚淺了」，也沒有到過中國，對中國的實際情況可說一無所知，可笑的是英國人還以為他是「中國通」，「否則彭定康不會給他這樣搞」。但顧汝德的风光歲月也隨着英國管治結束而告終，於香港九七回歸前夕返回愛爾蘭老家。

六七暴動為香港市民帶來災難

回首三十年前的六七暴動，蔡渭衡承認事件對香港市民造成很大損害，確實為香港帶來了「災難的後果」。他直言當年左派發動大罷工的做法「蠢居」（不明智），弄得市民無車可乘，嚴重影響市民的日常生活。蔡渭衡說：「大罷工對左派來說也是損人不利己，左派工會須承擔工人罷工期間的工資，造成極大的財政損失。」

但他至今仍堅持港英當局當年採取高壓手段，是觸發六七暴動的主因。他強調：「反英抗暴是香港社會矛盾和長期積累的民怨的總爆發，如果群眾對港英當局沒有怨憤，情緒不會那麼高漲。」他指出，鬥委會的核心其實是工聯會，而工聯會背後「說穿了就是新華社」，「楊光等人不過是馬前卒而已」。蔡認為，新華社官員當年有相當大的責任，「如果群眾沒有新華社的煽動，情緒不會那麼激動。」但他頗為同情新華社領導層當年的處境，因為當時「四人幫」是中國當權派（作者按：當時中共當權派應為林彪集團和中央文革小組），新華社香港分社領導官員為了自我保護，不得不表現激進。他認為，左派工會是受共產黨領導的，要聽黨的話行事。當時中共極左派已奪權，架空了總理周恩來，企圖製造事端，香港左派工會遂採取一些過激的鬥爭手段。

他強調，鬥委會一直極力反對採取暴力或其他過激手段，只是後來鬥委會在港英壓力下土崩瓦解，左派基層群眾放任自流，出現「失控」的局面，部分群眾遂作出擺放「土製菠蘿」的過激行動。他指出，踏入六七年七月，港英當局先後搜查多間左派工會和社團，又拘捕了不少左派團體負責人，左派群眾充滿怒火，「港英鎮壓與群眾情緒存在互動關係」。蔡表示：「當年我們在集中營中也反對放置『菠蘿』的做法，認為這樣會累人累己。但有些菠蘿其實是港英放置的，旨在引起群眾對愛國人士反感。」

淪為六七暴動的代罪羔羊

蔡渭衡相當重視六七暴動責任誰屬的問題，他覺得許多人的看法不太公平。他表示，不少人認為六七暴動是中國大陸文化大革命的翻版，香港左派受「四人幫」極左路線的影響，也在香港搞「文革」，結果為香港惹來大禍。他認為，雖然當年義憤填膺地參加鬥爭的人是最大的受害者，無奈有口難言。蔡說：「這場席卷全港的風暴確實為社會帶來災難的後果，我們身受其害，也連累了同胞受罪，談起來很難得到不明前因後果者的同情。於是當年不堪港英殖民統治而起來支援鬥爭的廣大愛國同胞都變成『左仔』，默默地成了這場災難的代罪羔羊。」他認為，脫離當時的歷史背景而下論斷，是「很不公平的」，也「抹殺了同胞愛國愛港之心」。

九七年六七暴動三十周年前夕，蔡渭衡在香港親中報章《大公報》發表題為《有壓迫才会有反抗——析六七年「反英抗暴」歷史背景》的文章，認為香港回歸已成定局，人們高唱「自由、民主」，以「愛國愛港」為榮的時候，有人還寧願認「親中」而不敢說「愛國」，原因就是當年「愛國有罪」的陰影猶存。他在文章末段說：「歷史是不容割斷的，請還一貫愛國愛港的廣大同胞以清白與公平！」²⁰⁹

他對新華社和其他國內媒體九七年完全不提「反英抗暴」不以為

然，九七年香港回歸前夕，剛好是「反英抗暴」三十周年。當時香港的報章雜誌、電台、電視，幾乎所有傳媒無不大事報導這個使人難忘的歷史事件，惟獨親中報刊和機構，對此卻一言不發、隻字不提！有些傳媒說，曾經參加過「反英抗暴」的人「噤若寒蟬」。蔡渭衡從接近新華社人士獲悉，當時的香港新華社社長周南，要全盤否定「反英抗暴」，認為這是當年左派群眾的錯誤，因此左派人士雖然飽受委屈，也極力迴避提及這一敏感問題。蔡渭衡對此非常不滿，曾經為此到香港新華社要求澄清。

其實，「反英抗暴」責任誰屬，國內早有定論。國務院港澳辦公室主任廖承志七十年代接見因參與六七事件而入獄的左派人士時表示：「『反英抗暴』的錯誤，責在中央；但香港同胞的愛國熱情，是完全應該肯定的，絕不能挫傷愛國同胞的情緒。」蔡渭衡認為，這和後來香港新華社一些負責人把「反英抗暴」說成是「群眾自發性連動」，企圖卸責，或者加以「全盤否定」，是完全不一樣的。

從「典型的香港仔」到左派社團負責人

在香港長大的蔡渭衡形容自己是「典型的香港仔」，他的背景與早年經歷跟一般左派人士有顯著分別。他少年時代在以英語授課的九龍華仁書院就讀，能操一口流利英語。他的同班同學曾昭科後來加入香港警隊，其後晉升為警司，是當年最高級的香港華人警官，可是六十年代初期被港府懷疑為「中共間諜」，遭當局遞解往中國。

一九四一年日軍侵華、香港淪陷後，蔡渭衡部分同學到重慶、桂林等地參與抗戰。他說：「同學在抗戰期間逐漸分化，一些人分別加入國共兩黨，一些老同學後來還當上國民黨大官。」四零年日本進軍香港前夕，香港的中學生須選擇參加義勇軍、聖約翰救傷隊或防空救護隊，蔡渭衡參加了防空救護隊。翌年十二月日軍向香港發動進攻，蔡被派駐位於中環政府合署（九七後易名為特區政府總部）附近的防空洞。這防空洞與鄰近的港督府相連，每逢日軍以大炮空襲，戰時港督



楊慕琦均跑到防空洞躲避，蔡經常與他在洞內碰頭，時有交談。

由於駐港英軍兵力薄弱，熬不到聖誕節已向日軍俯首稱臣。港府投降前夕，楊慕琦自知難逃被關進集中營的命運，他勸蔡涓衡等人脫下防空救護隊制服離去，以免像英軍和港英官員那樣被關進集中營。蔡涓衡等人遂離開防空救護隊的行列，他原本打算取道桂林前赴重慶，可惜桂林已告淪陷，他唯有到廣東鄉間暫居。抗日戰爭的經歷，令蔡涓衡充滿民族情懷和反殖意識。

蔡涓衡攝於一九五二年，當時任

職於英資泰和洋行。

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英國重新接管香港，成立軍政府作為臨時管治機構。此時蔡涓衡從國內返港，加入軍政府物資管理處，擔任翻譯工作。不久軍政府結束，物資管理處改組為工商署，蔡到代理「黑牌威」、「長頸 FOV」洋酒的廣和洋酒行工作，後來加入英資泰和洋行，擔任貿易進出口部總經理。四九年中共建政後，香港商界開展中國貿易的不多，蔡可說香港拓展中國貿易的先鋒，更代表泰和洋行出席首屆廣州交易會。六五年泰和洋行成為和記國際集團(Hutchison International Group)的一員，蔡涓衡擔任和記中國貿易公司董事。他更於七十年代出任維大洋行、捷美輪船公司、東源機械、大同工業機械設備公司總經理，這些公司都以中國業務為主。一九八零年，中國金融市場開放，法國興業銀行邀聘蔡為中國事務高級顧問，直至九八年初。在此期間，蔡成功協助法國興業銀行在中國各地設立了十多家分行、代表處和合資財務機構。

蔡涓衡開展中國金融貿易之餘，也積極參與香港社會事務，與華

革會結下不解緣。一九四六年五月一日，楊慕琦重返香港擔任總督，宣稱當時英皇考慮「使香港居民與殖民地帝國的其他地方一樣，為管理自己的事務負起更大的責任」。楊慕琦看到香港社會出現反殖民主義浪潮的苗頭，遂向英國政府提出「楊慕琦計劃」，建議成立民選市議會，將部分權力交給市議會，逐步「還政於民」。當時一些專業人士和知識份子響應楊慕琦計劃，一九四九年，大律師莫應淮、陳丕士、香港大學中文系高級講師陳君葆、港大藥劑學高級講師黃新彥、醫生吳達標、東方醬油公司東主莊承宗等人成立香港華人革新會，希望參與香港政制改革，創會主席為黃新彥。

根據英國政府最近公開的一份名為《香港政制》(Constitution of Hong Kong)的秘密檔案，華革會四九年六月就「楊慕琦計劃」提出書



八十年代初，蔡渭衡與《文匯報》董事長李子誦(左二)、前中華中學校長黃祖芬(右二)及華仁書院舊同學曾昭科(左一)合照。曾昭科原為香港警司，六十年代初被港府懷疑為間諜，遞解往中國大陸。

面意見，要求全部市議會非官守議員應由選舉產生，並主張所有香港納稅人都擁有選舉權。文件又指出，四九年七月華革會聯同中華廠商會、九龍總商會等團體，發起港九社團聯席會議，會議代表聯署了向港督提交的請願書，要求港府立即推行政制改革。從檔案的內容來看，原來華革會成立後一直受到港英政府注視。檔案詳細記載了莫應澁、陳丕士、黃新彥等華革會創會成員的家庭背景、政治立場和取態，更提及傳說香港一批國民黨商人正打算聯袂參加華革會，原因可能是「共產黨將來可能企圖控制這個團體」。

英國政府後來否決了楊慕琦計劃，華革會遂由原本關注政制改革的團體，轉型為維護居民權益的社團。當時華革會訂下維護居民合法權利、發展居民福利的方針。華革會五十年代多次反對港英政府的不



一九八三年，華革會應中國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姬鵬飛邀請訪京，交換有關香港主權問題的看法，當時中英談判尚未開始。圖為蔡渭衡(前排左二)、華革會主席陳丕士(前排左三)、黃祖芬(前排左五，即港府現任律政司司長梁愛詩舅父)與姬鵬飛(前排中)、港澳辦秘書長魯平(後排右二)、李後(後排右四)等官員合照。

合理措施，例如發動反對加電費和反加租行動。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華革會是香港當時少數懸掛五星紅旗的團體。蔡渭衡說：「中華廠商會八十年代才掛五星旗，但首屆國慶籌委會主席就是華革會主席莫應漑。」他表示，五十年代香港每逢發生天災，中國政府都運送藥品、大米到港，委託工聯會、華商會所（中華總商會的前身）和華革會負責分發，足見華革會當時在親中陣營的份量。當時各左派中學校長都是華革會執行委員，例如漢華中學校長黃建立、中華中學校長黃祖芬、培僑中學校長杜伯奎、香島中學校長黃承等。

一九五二年，九龍石硤尾、東頭村木屋區發生大火，國內準備派出慰問團赴港慰問災民，港英當局不准慰問團入境，二十萬在尖沙咀火車站和彌敦道一帶等候歡迎代表團的左派群眾鼓噪起哄，後來爆發騷亂，左派稱事件為「三一事件」。由於華革會高層莫應漑和陳丕士代表群眾到羅湖「歡迎親人」，港府將責任歸咎華革會等左派社團，莫應漑被迫出境，華革會會員各散東西。陳丕士後來接觸香港華人文員協會，希望對方協助重組華革會，時任文員協會理事的蔡渭衡遂於五二年底加入華革會，初期負責組織部工作，後來逐漸躋身領導層。八十年代中期開始擔任該會主席，去年改選後轉任會長。但近年華革會出現會員老化的現象，社會影響力逐漸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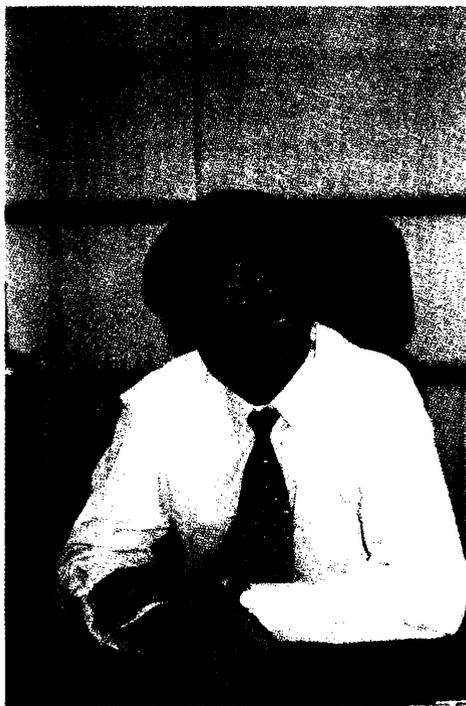
蔡渭衡近照。

九、葉國謙在漢華中學的火紅歲月

葉國謙簡歷：

葉國謙現年四十八歲，曾任立法局議員及臨時立法會議員，現任民主建港聯盟副主席及立法會黨團秘書。六七暴動期間就讀左派漢華中學，並出任漢華學生鬥委會委員，組織該校學生的反英示威活動。在漢華中學畢業後留校任教，目前任該校校長助理。

一九六七年葉國謙年僅十五歲，正在漢華中學就讀中學四年級，卻因緣際會參與了「反英抗暴」。他並且當上校內反對港英的學生領袖，義無反顧地投入反英鬥爭。三十多年後，這位當年的「熱血青年」、「反英先鋒隊成員」已成為香港政界的活躍人士，九五年更躋身屬於港英建制的立法局。他說：「經過那個火紅年代，我已不再相信一些極端的口號、主張，口號越革命不等於正確。」



葉國謙近照。

葉國謙出身中下階層，自幼對殖民地政府抱有強烈的不滿情緒，並嚮往「社會主義祖國」。他的父親任職的士司機，同時是左派工會活躍成員，擔任摩托車業職工總會（摩總）主任，經常代表的士司機與的士車行談判。當年葉父收入微薄，僅能勉強維持六名

子女的生活。葉國謙憶述說：「我們處於社會底層，我與學生弟弟國忠出生時，父母窮得奶粉也沒錢買，要靠工會工友捐助。工友守望相助的精神令我印象深刻，工會對我的思想也有很大影響。」

他年幼時常聽父親講述洋人如何欺壓香港華人，又提到四、五十年代洋人動輒踢華人屁股，當時許多公眾場所更堅立「華人與狗不得內進」的標誌。葉表示：「當我長大後看到香港政府絕大部分高職都由英國人壟斷，隨便英國一個警察『散仔』（普通警員），跑來香港卻輕易當上幫辦（督察），任何稍有民族意識的香港人都會忿忿不平。」洋人欺負華人的現實，在他小小心靈留下深深的烙印，覺得很不是味兒。

由於葉國謙父親抱有愛國思想，理所當然地安排他和弟弟國忠升讀位於港島西環的漢華中學。這所左派學校的教學模式，更強化了葉國謙的愛國觀念。漢華中學推行「愛國教育」，教師常常在課堂上歌頌中共領導革命的功績，及新中國的經濟成就。葉表示：「學校禮堂長期懸掛毛澤東和國家主席劉少奇的畫像，又在國慶舉行升旗禮，當時我們對祖國很有感情。」漢華每天早上舉行「早讀堂」，學生在教師帶領下閱讀《文匯報》，並討論時事，同時學習《毛語錄》。校方每天安排自修課，教導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及唯物主義等理論。

當年漢華中學經常組織學生前往深圳參觀，實地接觸當地民衆，又到深圳劇院看電影。葉國謙踏足內地後，對國內與香港社會狀況的強烈反差留下深刻印象。他說：「我看到國家日漸強大，文革前經濟一直迅速發展，而且治安良好，人際關係融洽，令我非常嚮往。」

即使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初期，葉對文革仍然持正面看法：「我相當認同紅衛兵『破四舊』的口號，憧憬破除舊思想、舊風俗，建立新世界。」一九六六年底，葉國謙與一批同學在澳門工聯會安排下，前往澳門參觀、「學習」，期間工聯會安排他們參觀炮竹廠，並組織「講用會」，向他們介紹澳門「一二三事件」的鬥爭經驗。到澳門參觀的經驗，對他們產生頗大衝擊。

六七年五月六日人造花廠事件中，防暴隊毆打及拘禁二十一名罷工工人。葉國謙說：「我覺得資本家不合理的解僱工人，這次事件原本只是勞資糾紛，港英卻完全站在資本家的立場，動用防暴隊毆打工人，剝奪了工人的罷工權利，這種處理手法很不公平。我作為熱血青年，當然支持工人抗爭。」他表示，左派學生當時反對英當局粗暴處理勞資糾紛，他無法預料事件後來會發展為政治事件。

五月十一日，部分前往人造花廠慰問罷工工人的左派學校學生，被警察毆打和逮捕。葉國謙曾與一些同學出於好奇心，前往新蒲崗人造花廠看看，幸而沒有被警察逮捕。他不明白為何罷工工人只是在工廠門外靜坐請願，卻遭到軍警鎮壓的命運。五月十五日，中國外交部向英國駐華代辦提出抗議，指港英當局製造大規模「血腥暴行」，是英國政府「勾結美帝國主義反對中國的陰謀的一部分」，要求港方立即接受「香港中國工人和居民的全部正當要求」。左派教育界當天舉行集會，聲討港英當局的「暴行」。

五月十六日，左派陣營成立鬥委會，左派反英鬥爭逐漸升級。從五月十九日開始，左派工會、學生及中資機構員工湧往港督府抗議，港督府門外和附近的花園道滿是穿着白恤衫和藍色長褲的左派學校學生。漢華中學學生成立了為數十多人的學生鬥委會，葉國謙當選漢華學生鬥委會委員。他曾帶領數百名學生遊行至港督府，又在門外張貼大字報，並揮舞「紅寶書」，高聲朗誦毛語錄口號。葉國謙的學生弟弟國忠，當年也是參與示威遊行的積極份子。葉國忠曾是臨時市政局副主席，現任油尖旺區議員。

但五月二十二日港英軍警武力鎮壓港督府門外的左派示威(左派稱為「花園道血案」)，葉國謙剛好沒有在場。他說：「漢華不少學生被捕，在場同學告訴我，港英軍警最初使用催淚彈和噴漆，後來更揮動警棍毆打學生。港英沒有對我們留有餘地，照樣粗暴鎮壓。」他表示，港英以為動武就能嚇倒學生，但港英越是高壓，學生反抗越大。他又說：「現在遊行示威是等閒事，當年警察卻動武鎮壓。」

港府新聞處和部分非左派報章當時批評左派陣營通過威逼利誘的手段，利用年幼無知的學生進行反政府示威。葉駁斥這種說法純屬港英的抹黑手段：「當時經濟環境不太好，學校有那麼多錢給我們嗎？我們出於追求公義的想法投入鬥爭，行動完全是自發的，絕對理直氣壯，義無反顧。」

六月一日，左派學校學生宣佈成立「港九學生界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聲言要砸碎港英當局的「法西斯枷鎖」。六月二十七日，港九三十二所左派學校停課一天，以示支持左派工人聯合大罷工。《人民日報》六月三日和七月五日先後發表社論，號召香港的左派青年學生與工農運動相結合，在鬥爭中發揮先鋒隊的作用。事實上，左派工人和學生是左派陣營在反英鬥爭中的主要力量，當年工人被稱為抗暴主力軍，學生則被冠以「抗暴先鋒隊」的稱號。學生界鬥委會更聲言要「在反英抗暴鬥爭中學好毛澤東思想，把香港辦成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

組織「飛行集會」

港英當局大規模鎮壓後，遊行集會受到嚴格限制，左派學校學生轉而採取「飛行集會」的活動形式。他指出：「飛行集會是指各人約定時間在某地點會合，之前裝作互不認識，到了預定時間迅速集合，演講、宣讀抗議聲明及散發傳單，然後在警察趕到前迅速散去。當時工友在外圍保護我們，減低我們被捕的機會。」葉憶述說，那時還未有影印機，他們要通宵達旦手寫傳單。

六七年暑假期間，左派學校學生鬥委會分散到各地區發動遊行、集會、散傳單等活動。葉國謙承認，學校教師對他們搞飛行集會有「引導作用」。六七年八月，港府教育司簡乃傑向左派學校發出緊急法令，對這些學校的活動作出嚴格限制，各左派學校隨即上街示威，高呼打倒簡乃傑。當時左派形容香港教育制度為「奴化教育」，左派學校和傳媒發動口誅筆伐。葉認為：「當時教育司署確實是奴化教育

的堡壘，學生對中國歷史文化缺乏了解，這種現象近年還未扭轉過來。」

六七暴動期間，大批左派學校學生被捕入獄，其中被左派報章宣傳為「反英小鬪將」的漢華中學中五女學生張普璇，正是葉國謙高一屆的學長。六七年八月，張普璇被控「發表煽動性演說」，被判入獄一年。葉國謙表示，當時張極受漢華和其他左派學校學生尊崇，視為敢於與港英鬥爭的英雄。

他相信，左派與港英當局的衝突不斷升級，是因為港英將事件提升至政治事件來處理，而在左派心目中事件已不僅是勞資糾紛，而是一場「民族壓迫」。他相信，如果雙方冷靜處理，局勢可能不會那麼嚴重。他表示：「愛國群眾在文革極左思潮影響下，認為中國應早日收回香港。當時我也覺得既然國家已經強大了，沒有理由繼續讓英國佔據香港，應該推翻港英殖民統治。」他形容自己當時「日盼夜盼祖國盡快收回香港」。

六七年七、八月開始，一些左派群眾在街頭放置土製菠蘿(炸彈)，葉國謙認為放菠蘿失去民心。他說：「初期一般市民持同情態度，但菠蘿陣出現後左派迅即失去市民的支持。一旦發現炸彈，行駛中的巴士都要停下來，車上乘客要下車疏散，對居民造成很大不便。我曾經在巴士上聽到身旁的乘客大罵『左仔阻住搵食』，放置菠蘿的極端做法確實激起民憤。」他認為放炸彈絕不是左派有組織的行動，可能個別左派群眾在復仇心態驅使下，一時衝動幹出來的。但他不相信所有炸彈都是左派擺放的，可能是港英當局「插贓嫁禍」，挑起市民對左派的不滿情緒。

他承認左派後期策略錯誤，鬥爭手法過左，採取了一些過激行動，鬥爭後期更發展至以推翻港英統治為目的。葉相信，可能北京和香港左派領導層方向未明，導致局面失控。但他堅持社會矛盾是促成六七事件的主要原因，而港英對人造花廠工人的鎮壓行動成為衝突的引發點。他說：「在那個年頭，香港經濟環境很差，許多人要從事兩

三份工作，才能維持生計。當時勞工缺乏保障，港英又常常站在資本家立場。」他相信，歷史是不同事件累積的結果，六六年天星小輪騷亂和澳門一二三事件，都與六七事件存在一定聯繫，證明歷史發展在偶然中存在必然。葉國謙認為，六七事件初期一般民衆傾向同情左派，我們在集會遊行期間也碰到許多英文書院學生，證明這場運動不只左派圈子參與。他說：「如果只有我們這一兩萬人參與，運動那能持續那麼長時間？」

六七左派騷亂以失敗告終，原先鬥志昂揚的左派陣營也受到嚴重挫折。葉國謙表示，當年左派工人的挫折感最爲明顯。他說：「左派工會提出大罷工『一罷到底』，結果不但未能迫使港英就範，許多工友更因參與大罷工而失業，一些原本任職牛奶公司、電車公司等英資公司的工人挫折感特別強烈，不少被開除的工人一度生活困難。他承認，文革期間左派學校在學習方面「較放鬆」，六七騷亂期間更曾發起罷課，一些學生擔心長期下去對繼續升學構成影響，遂轉往其他學校就讀，但「數目應該不太多」。

葉國謙直到今天仍然不覺得運動失敗，至少左派陣營清楚表達了對港英統治的不滿，令港英開始察覺不能單靠高壓手段維繫統治，改採懷柔手法。他說：「當局開始重視青年工作，在各地區開設社區中心，又舉辦文康活動，爭取青年的認同。」

十、對六七暴動感到愧疚的左派報人羅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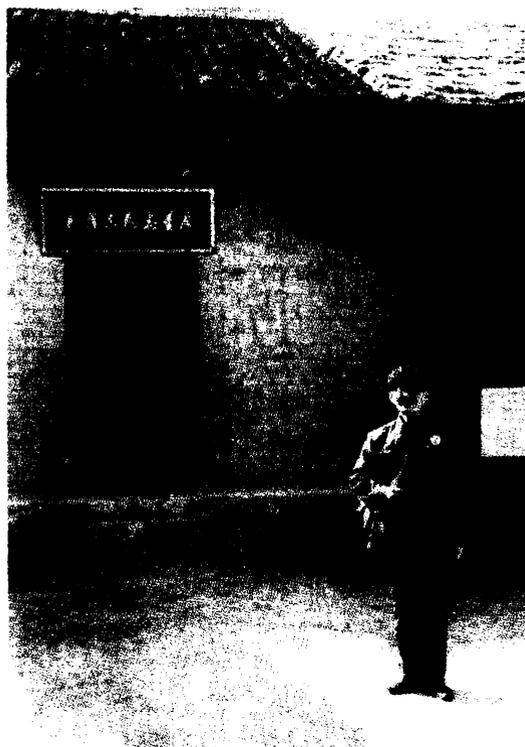
羅孚簡歷：

羅孚，廣西桂林人，一九二一年出生，原名羅承勛。早年在大陸投身新聞工作，長期主編副刊。一九四八年南下香港，在香港左派報章工作三十多年，先後擔任《大公報》副總編輯及《新晚報》(已停刊)總編輯，並負責中共對香港文化界的統戰工作。一九八二年，北京指羅孚觸犯間諜罪，涉嫌向美國提供情報，被軟禁在北京長達十年。九三年羅孚獲准返港，九七年香港回歸前夕移居美國洛杉磯。筆名絲韋、柳蘇，作品包括《絲韋卷》、《香港、香港》等。

六七年左派暴動期間，《大公報》副總編輯羅孚義無反顧地投入這場鬥爭，認為這是「正義的鬥爭」，必將在全世界「樹立城市武裝鬥爭的榜樣」。他表示：「我在運動高潮期間完全沒有覺得不對，甚至連命都可以不要。」八十年代初期，北京當局指羅孚觸犯間諜罪，他被軟禁在北京，羅孚開始反思這場席捲全港的鬥爭，覺得自己當年的行徑「對不起香港市民」。

羅孚認為，六七暴動主要是香港左派受到國內文化大革命影響而產生的。羅指出，長期主持香港工作的中共領導人廖承志曾經於六十年代初期說過：「國內有甚麼政治運動，香港就要受到影響。」香港六七年爆發被形容為「香港式文革」的左派騷亂，正好應驗了廖承志的觀察。

一九六六年國內文化大革命揭開序幕，香港社會頗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香港左派陣營也開始蠢蠢欲動。羅孚指出，雖然文革剛開始，香港左派陣營就接到北京的指示：香港不搞文化大革命，不搞「四大」一大字報、大辯論、大批判、大串連，但當時新華社香港分社一些中下層幹部已在社內張貼大字報，醞釀批判領導官員。他相信，新華社領導官員為求爭取表現，向中央表明「我們也在革命，並



羅孚文革期間前往湖南韶山「學習」，手持《毛語錄》，攝於毛澤東故居門前。

羅孚文革期間前往湖南韶山「學習」，手持《毛語錄》，攝於毛澤東故居門前。對於部分左派人士強調社會矛盾是六七事件的主要起因，羅孚對這種說法略有保留：「在資本主義社會，勞資矛盾幾乎天天都存在，當年香港勞資糾紛可說俯拾皆是。為甚麼新蒲崗人造花廠事件演變成激烈的反英抗爭？那間塑膠花廠不過剛好被看中了、選上了而已，主要就是新華社領導官員為了爭取表現，藉機發動鬥爭。」

左派發動反英鬥爭後，在各方面幾乎照搬大陸文革的一套，宛如「港式文革」。當時數家香港報章的新聞版基本上只有兩條消息，分

沒有睡覺」，於是設法發動群眾鬧事，對港英進行鬥爭。

六六年底澳門「一二·三」事件，澳門左派成功迫使澳葡當局就範，成為香港六七左派暴動的前奏。羅孚指出，新華社香港分社事後組織香港左派機構職工、學生和工人到澳門參觀，學習當地的鬥爭經驗，他本人和其他左派新聞界中人都曾到澳門學習。羅孚表示：「六七年新華社社長梁威林和副社長祈烽到深圳開會，總結澳門鬥爭的勝利，決定要在香港大幹一場，新蒲崗人造

別是「反英抗暴」的報道和北京新華社拍發的文革進展。《文匯報》和《大公報》每天在頭版摘引毛語錄，作為左派反英鬥爭的行動指引和「最高指示」，最常用的是「帝國主義者如此欺負我們，這是需要認真對待的」、「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等語錄。兩報每天連篇累牘地刊登充滿文革語言的反英報道和評論，並刊出大量聲援左派陣營的「讀者來信」。羅孚說：「那些讀者來信當然也有來自讀者的，但基本上是『編者寫信』，自寫自編，否則哪會有一天幾個整版的來信。」

兩份主要左派報章又開闢學習毛澤東思想的專版。羅孚憶述說，祈烽說報紙不需要副刊，部分副刊欄目因被批判為封、資、修而一度撤銷。由澳門左派控制的綠村電台也配合香港的鬥爭，每天播放「特種狗經」，嘲諷香港警察為「黃皮狗」，又諷刺支持港英當局的《華僑日報》社長岑維休為「狗」。

當時負責《大公報》編輯工作的羅孚鑑於副刊「禁區處處」，唯有在副刊撰寫《像章小記》，每天就當時風行中國大陸的毛澤東像章大做文章（見附錄）。他直言重新看到這些舊作「就要臉紅」，「罵自己真是荒唐」。羅孚表示，當時新華社和左派領導層左得可怕，新華社領導官員就曾說過「中國可以不要外匯」，因為「再過兩年國家預算會刪掉外匯這一項」。而文革流毒也對香港左派的言行產生極大影響，例如國貨公司職工以為自己是無產階級，不願為「資產階級」服務。他又說：「報館許多同事把收藏多年的字畫交給機構或扔掉，以免被批評為封資修。文革末期我的幾個兒子因不能在香港升學，要安排他們到英國讀書，報社內有人批評我身為領導，卻送兒子到英國，是甚麼方向？」

像許多左派人士一樣，羅孚當年真誠地投入那場鬥爭，並出任《大公報》反英抗暴鬥爭委員會執行小組組長。他說：「當時我堅信這是一番正義的事業、革命的事業，是要像毛語錄那樣『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的。」「帝國主義壓迫我們，這

是要認真對待的」，是當時左派報章最常引用的毛語錄。而在鬥爭高潮中，左派中人採取敵我分明的態度，與左派圈子以外的朋友斷絕來往。羅孚表示：「那時簡直到了六親不認的地步，當時我就與《明報》社長查良鏞斷絕來往。」查良鏞筆名金庸，是香港著名武俠小說家，原本在《新晚報》任職，五十年代末期獲羅孚和《文匯報》總編輯金堯如支持，創辦《明報》。《明報》六七年批評左派陣營發動鬥爭，支持港英當局採取強硬態度，左派因此對查良鏞恨之人骨，並謔稱他為「豺狼鏞」。

六七年八月初《香港夜報》、《新午報》和《田豐日報》三家左派外圍報章負責人被捕，並被勒令停刊，新華社恐防港英攻擊左派報



羅孚(左)替《大公報》一位記者掛上毛主席像章。這位記者在六七暴動期間參與示威，被警棍打破了頭，並被捕坐牢，獲釋後報館舉行歡迎儀式，並由羅孚贈送顯示榮耀的毛像章。

館，下令各左派報館員工堅決抵抗，「要與報館共存亡」。羅孚表示：「當時我們隨時準備在港英武裝力量進攻我們的機構時，和他們搏鬥，被抓去坐牢，甚至當場犧牲性命。」當時羅孚乾脆搬到報館居住，二十四小時在報館守候，準備與港英軍警「戰鬥」。他表示：「後來我被吹捧為英雄，回到廣州接受致敬和慰問，被人家捧起來拋到在半空中。」他又說：「六七年八月二十二日北京紅衛兵火燒英國代辦處的消息傳來的時候，我們高興得跳起來。」

六月三日由中央文革小組控制的《人民日報》，發表題為《堅持反擊英帝國主義者的挑釁》，聲言「七億人民誓為強大後盾」，要「把英帝國主義鬥垮鬥臭」。文章暗示中央隨時可以收回香港，令香港左派大受鼓舞。但羅孚表示，據說毛澤東作出了「盤馬彎弓故不發」的指示，他的一些朋友後來告訴他「反英抗暴」錯了，上面已經在批評，那時候真有些五雷轟頂的味道。

他透露，六七至六八年間，左派陣營內部曾對「反英抗暴」作出總結，但當時沒有公開說做得不對。羅孚又憶述說：「祈烽在七八年的國慶籌委會成立儀式上，以含蓄迂迴的方式談到六七『反英抗暴』，婉轉地承認反英抗暴是錯誤的。」羅孚指出，這番話僅在左派內部小範圍傳達，因為當時還是英國統治，不可能公開作檢查。

羅孚回想當年的左派騷亂，覺得是一場鬧劇。他表示，左派大罷工未能達到預期目的，例如無法達到使交通全面癱瘓的目標，左派群眾發動的武鬥和「人民戰爭」也不成氣候。他認為，港英當然有過火的行動，但只是在人造花廠抓了一批工人，左派沒有必要作出更過激的反應。《香港夜報》社長胡棣周指六七事件只有左派圈子參與，參與的中間群眾不多。羅孚認為這種觀察基本上是正確的：「港英實行殖民統治，當然要迫害香港居民，居民當然有反抗情緒，這就是鬥爭的基礎。但市民有不滿情緒並不一定會有所行動和參加行動，如果這些行動損害他們的利益，例如罷工、罷市，就更不會參加了。」

雖然他承認反英抗暴搞錯了，但左派群眾是好的，他們的愛國熱



羅孚(右一)與前《澳門日報》總編輯王家禎(中)、《香港夜報》社長胡棟周合照。

情和積極性應該受到保護。「他們奮不顧身，不顧個人利益，接受號召，聽從指揮，拚死拚活地鬥。有人因此失去了工作，失去了馬上就要到手的退休金，有人犧牲了，有人生活陷入極大的困難；有人受到一些照顧，有人據說至今也沒有得到甚麼照顧！」他認為，六七暴動後左派遭受嚴重挫折，士氣嚴重低落，而且在市民心目中形象受損，與主流社會的距離越拉越遠。

向香港市民致歉

一九九三年三月，羅孚在《當代》月刊發表《為香港式文革致歉》的文章，就六七暴動向香港市民致歉。他在文中寫道：「我所做的一些脫離實際的極左宣傳，多少起了蠱惑人心的欺騙作用的。儘管

這也是奉命行事，但依然有我自己應負的責任，我是為此難過的。」他又說：「我願借此公開表示我的歉意和懺悔！親愛的朋友們，犧牲了和還健在的朋友們，我向你們致敬！所有認識和不認識的人們，當年受過損失和不便的人們，我向你們致歉！我不代表任何人，只是表示我個人的微意。我的歉意也是不足道的，只是表示一點點心意，因為我没有別的方式可以表達了。我不要求諒解，因為我並不原諒自己。」²¹⁰

但羅孚認為，六七暴動也有一定積極意義：「六七暴動突顯了香港的社會矛盾，港府在事件結束後為了爭取市民支持，加快了社會改革，例如發展普及教育及推廣文化娛樂活動。」當時有人形容港英在騷亂後的政策為「寧要飛仔，不要左仔」。他又表示，過去從來沒有人敢與港英鬥爭，六七事件催化了香港一般市民與港府抗爭的意識，間接導致七十年代初期的中文運動和保衛釣魚台運動。

附錄：〈春風已到玉門關〉文章

「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這首唐詩是許多人都記得的。

「新栽楊柳三千里，引得春風度玉關。」這是千年以後，清朝左宗棠的詩。他帶兵出關，到新疆去鎮壓那裏的少數民族，沿途種了許多柳樹，他大言不慚地自稱「引得春風度玉關」，事實上，不但許多柳樹都沒有活，他的鎮壓更加深了少數民族的苦難。

現在，才是真正的「春風已到玉門關」！

「春風已到玉門關」，這是今年一月底，甘肅省革命委員會成立時，《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社論的題目，真是洋溢着詩意的題目。

這是一個難得的甘肅革委會成立的紀念章。毛主席像，紅太陽，

放射閃光。像下面三面大紅旗迎風飄揚，一座城樓，兩座油井，雙線金邊。直徑四十公厘。背面有「春風已到玉門關，蘭州軍區，一九六八、一、廿四」。一月二十四日正是甘肅革委會成立的日子。

油井自然是玉門的油井，城樓想來也是玉門的城樓吧。

「春風已到玉門關」這是革命的春風。「春風楊柳萬千條」，革命的春風吹得玉門關外的楊柳都生機勃勃，「祈連山在歡笑，牛龍江在沸騰」，「皋蘭山下，紅旗捲起千重浪；黃河兩岸，歌聲匯成萬頃波」。這不是普普通通的詩意，這是史詩，革命史詩的動人一頁。

羌笛的哀怨早成過去，左宗棠之流虛偽的誇大，也徒成可鄙的笑料，真正的東風是在人民的世紀、毛澤東思想的新時代裏，吹得玉門內外的一片春光。

《大公報》，一九六八年七月

十一、遭無妄之災的左派教員張雲

六七事件爆發時，張雲只是新界一所鄉村小學的教師。他沒有加入左派門委會，也沒有參與左派組織的遊行示威，卻因為教學期間表露親北京的思想傾向而身陷囹圄，在摩星嶺集中營度過了十二個月。張雲原為新界荃灣河瀝背村原居民，四十年代港府在荃灣區興建城門水塘，張與其他村民被當局遷徙往大埔魚角村。張抗戰前在大埔師範學校就讀，抗戰結束後在新界塔門任教一年多，其後入讀位於大埔的香港官立鄉村師範專科學校，四九年畢業後在大埔汀角明德學校任教。張雲自言崇拜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他表示：「我小時候很痛恨外國人，特別是看到香港同胞被印度人踢屁股，對當中國人感到很



一九六九年七月，張雲前往「紅太陽升起的地方」——湖南韶山，參觀學習時留影(後排右六)。

自卑，我因此將希望寄托在共產黨和新中國身上。」自《文匯報》在香港創刊，他一直是該報的忠實讀者，並經常在校內宣揚愛國思想。

但他表示，港英當局的情報工作無孔不入，明德學校一些教師常向當局打他的小報告。他聲稱明德學校校長岑錫權是「港英派來的人」，禁止低年級學生配戴毛像章。六七年四月七日，岑向各班學生宣佈：「今天教育司署視學官來查學，你們掛在胸前的像章一定要除下。」他更鞭打一名反對脫下毛像章的俞姓學生，引起一些學生和家長的「極端憤慨」，左派報章更給他送上「反動份子」的標籤。

六七暴動爆發後，張雲沒有加入新界的左派鬥委會，新界的左派人士也知道他有教職在身，沒有邀請他參與他們組織的活動。儘管張雲與左派組織保持一定距離，仍然無法置身事外。他表示，當局指使黑社會份子恐嚇他，威脅毆打他，企圖迫使他自動離職；但他不為所動。六七年八月，港府教育司署以張雲「損害校長權威」、「鼓勵學生違反學校紀律」為理由，撤銷他的教師資格。²¹¹雖然教育司署指他有權上訴，但他認為這根本是政治迫害，即使上訴也不可能有結果，因此懶得花時間跟政府糾纏。他表示：「港英不過是拿我開刀，達到殺雞儆猴的目的。」

張雲被取銷教師資格後一度失業，但仍然堅持親北京言論。六七年九月三十日凌晨三、四時，數輛警車掩至魚角村，數十名警察和便衣探員張雲家門外佈防。探員勒令張的家人開門，進門後將尚在睡夢中的張雲吵醒，隨即將他押往大埔警署。一名警官對他表示：「警方根據港督頒佈的緊急法例拘捕你，你是我們首個根據緊急法例拘捕的人。」根據當局六七年七月二十八日開始行使的《緊急法例》第三十一條(一)項，港府布政司有權在不經審訊的情況下拘禁犯人，拘押期可長達一年。港府指推行這項緊急法例，是為對付「在幕後策劃陰謀和煽動騷亂的人」，以「保護市民大眾」，最長可為期一年。但警方沒有解釋他究竟犯了甚麼罪行。他相信，港英當局覺得他在學校和大埔鄉郊人緣甚佳，得到不少學生、家長和校董支持，擁有一定影響



張雲與嶺南大師趙少昂合照。

力，因此對他相當疑忌。《星島日報》當時形容張雲與凌宏仁、溫果行和張史文為「新界四大天王」。張表示《星島》的說法未免過了頭。

警方後來將他送往九龍尖沙咀山頂警署，再乘搭水警輪前往灣仔警署，最後將他押送至摩星嶺集中營。他說：「我在押送往摩星嶺的過程中被頭套蒙頭，不知道被送到哪裏，後來才知道自己送到摩星嶺。」與他一同被拘禁於摩星嶺的左派人士，還有左派電影界人士廖一原、著名影星傅奇、石慧夫婦等。張雲在獄中的編號為 468，最初數月被單獨囚禁。囚室窄小得僅能容納一張單人床，獄方每星期帶他到操場閒逛，俗稱「放風」。



No E.D. 2/222 (R)

EDUCATION DEPARTMENT,
HONG KONG.

BY REGISTERED POST

Mr. Cheung Wan,
RT. 3285/59,
c/o Ming Tak School,
Ting Kok,
Tai Po, N.T.

I, Philip Ivor Price, Senior Education Officer, in exercise of the powers conferred on the Director of Education by paragraph (b) of Section 27 of the Education Ordinance and delegated to me, hereby cancel your registration as a teacher on the grounds that it appears to me that you have been guilty of professional misconduct in that it has been reported to me that you have acted against the authority of the Headmaster of your school and encouraged pupils to act in a manner likely to subvert the discipline of the school.

This notice in writing is served upon you in accordance with Section 36(1) of the Education Ordinance. Also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visions of Section 36(1) a copy of Sections 36, 37 and Sections 39 to 43 of the Education Ordinance is supplied herewith. Your attention is particularly drawn to subsection (2) of Section 37 which requires you to deliver to me your certificate of registration.

Dated this 18th day of August, 1967.

P. I. Price
(P. I. Price)
Senior Education Officer

YP/gfp.

張雲六七年被教育司署撤銷教師資格的通知書。

他表示，獄中生活條件相當惡劣，犯人僅以鹹魚仔、黃豆、夾雜沙石的粗飯餬口，犯人在寒冬只能洗冷水浴，獄方有時爲了「迫害」囚犯，限制個別犯人的大小便時間。但他不甘就範，在囚室大叫大嚷，要求負責看守他的獄吏帶他上廁所。他在廁所故意拖延，獄吏嫌他麻煩，乾脆給他一塑膠便桶。

張雲表示，集中營一名負責情報工作的警司經常擺出「假慈悲」的臉孔。他說：「他們經常詢問我的家庭狀況，有甚麼需要幫助，又叫我跟他們合作。他還問我有甚麼朋友，但我不理他。」六八年三月一天晚上，集中營人員企圖遞解傅奇、石慧往台灣，張雲等得到消息後在集中營抗議，高叫「反對港英無理遞解傅奇、石慧」、「打倒港英」等口號。三月十四日，傅奇、石慧夫婦被遞解出境，但中方在羅湖橋拒絕接收兩人。擾攘三十三個小時後，港英唯有取消遞解行動，安排他們乘車回港，並將他們送返集中營。

踏入六八年下半年，營方開始放鬆對犯人的管制，例如讓他們看報。獄方又將單獨「放風」改爲兩人同時「放風」，後來逐漸增至三、四人，並可以互相交談。張雲獲釋前數月更被調往可容納七、八人的大囚室。六八年九月，他終於被當局釋放，被關押時間整整一年。

張雲出獄後際遇相當坎坷。雖然左派社團和學校家長組織活動歡迎他「勝利出獄」，他出獄時拍下的照片也「榮登」《文匯報》，但他因捲進左派騷亂而家計陷入困境。他最初獲朋友介紹到大埔順益國貨公司任職送貨員，但薪酬異常微薄；後來其他朋友介紹他出任新界左派農牧工會秘書。張在農牧工會的月薪只有兩、三百元，不足以養活妻兒，但他六七年被政府取消教師資格時月薪近一千元。他的妻子爲了幫補家計，當了十多年建築工地雜工。張雲坦言左派組織沒有向他提供經濟援助，「我覺得愛國是應該的，不會要求甚麼回報，也不會後悔」。張雲出獄後與中國關係日趨密切，六八年出獄後多次前往廣州支援香港同胞鬥爭委員會（支港委員會）聽報告，並學習馬列毛

思想。他指出，支港委員會當年經常接待香港左派工會組織。七十年代初期，張雲更遠赴中共「革命勝地」延安「學習」，至今依然非常崇拜毛澤東。

六七暴動期間，新界鄉郊地區雖然沒有市區那麼動盪，也絕不平靜，元朗、西貢等地均成立了鬥委會，一些鄉村也張貼了反英大字報。新界一些農村的愛國份子搞「試驗田」，左派香島中學和培僑中學師生常到新界下鄉勞動。

近年部分六七事件參與者公開表示歉意，但張雲持不同看法。他說：「有些人覺得當年做錯了，我不同意。當年左派可能受國內文革影響，但事件最重要的起因是香港同胞長期受港英迫害。如果不是港英迫害得那麼厲害，群眾的反應不會那麼激烈。」他指出，當年市民到國貨公司、油麻地普慶戲院等與左派有關的地方，都有港英特務從後跟踪；當年港英同時大力壓制新界左派力量，六七年數十名鄉村村代表因持「愛國思想」而遭港英當局取消代表資格，例如汀角、船灣村村代表就曾被褫奪資格。當時船灣一些農村婦女阻截警車，阻止警方進村抓人。張雲表示，港英當局當年派人到船灣貼大字報，向村民插賊嫁禍。

但他同意「中央領導有責任」，事實上當時中央內部也出現激烈鬥爭。他也認為左派陣營後期鬥爭手法過激，但他當時不敢公開批評，因為怕被批評為「反動」。回首當年往事，他無悔於當年的愛國言行：「愛國是無罪的，教導學生愛國是應該的，我也沒有幹傷天害理的事。」

雖然他堅持愛國信念，但他強調對中國不對的地方也會提出批評，他甚麼人都敢批評。張雲對中國現狀也頗多不滿，他認為：「中國歷史的經驗顯示，貪污腐敗必定招致滅亡，中共這樣搞下去必定滅亡。」他又批評中共鎮壓八九民運，他因此自言「新華社過去不太理我」，也沒有邀請他出任公職。張雲這種特立獨行的性格，難怪沒有因「愛國」而撈到甚麼油水。他強調，從來不會為利益而愛國。

十二、無怨無悔的李連生

李連生簡歷：

新界大埔原居民，現年六十三歲。八五年創立新界社團聯會，現任該會會長。九三年當選八屆全國人大香港區代表，九七年底再次當選九屆人大香港區代表。九六年當選香港特區推選委員會委員，參與推選首任行政長官。

踏入一九六八年，左派暴動已接近尾聲。西曆一月正是臘鼓頻催的時節，新界大埔左派人士李連生在一個寒意襲人的晚上，與村民一起書寫對聯，為即將來臨的春節作好準備。李深夜十二時才回家，正準備就寢之際，三名警員來到他的家門口，猛力敲打大門，沉重的敲門聲劃破了寂靜的長空。他心知不妙，立即開門。對方道明來意：「我想你也明白，希望你和我們合作，跟我們到警署一趟。」

李連生擺出鎮定的模樣，還打趣問他們是否需要戴上手銬。他臨走前吩咐妻子：「如果我遲遲不回來，你就到警署追問我的下落吧。」三名警員隨即將他解往元朗警署，翌日李連生被控以「恐嚇他人」及「威脅縱火焚燒學校」的罪名。李連生被扣押於港島域多利羈留所兩個月之久，就在那裏度過了農曆新年。但他在羈留所並不寂寞，碰到不少老朋友，例如新界農牧工會副理事長。各人決定共同進退，堅決不肯認罪，哪怕法庭判罰款五分鐘也不會繳交。

李連生被控「威脅縱火焚燒學校」，相信與六八年的一段往事有關。當時他在大埔六鄉小學就讀二年級的堂弟和一名同村兄弟，攜帶《毛語錄》回校，被教師在書包中搜出。兩人稍後被校長和教師審問，據說其間遭施以體罰，李的堂弟雙腿瘀腫，無法行走。李連生看不過眼，與叔父一同到學校討公道。李對校長表示：「我堂弟沒有在校內宣傳毛澤東思想，毛語錄也不是我們叫他帶回學校的，你們的行為顯然是政治歧視。」他要求校長道歉，但被對方拒絕。他指那位校

長一向持反共立場，對方自此對他懷恨在心。

六七年左派騷亂爆發後，當時任職建築工地工人的李連生沒有直接參與示威遊行等活動。但早在騷亂爆發前，他已是新界活躍的左派人士，並因參與左派工會而受到當局注意。他相信：「港府懷疑我在背後策劃，總是想辦法整治我，而我與六鄉校長的衝突，就成為港英動手的藉口。」

李首次上庭時拒絕認罪，第二次開庭時六鄉校長出庭指證他。法官判處罰款三百港元，但他覺得接受罰款的安排無疑等於承認犯了錯誤，決定拒絕繳付罰款。法官後來改判他入獄三個月，李聞判後與其他一同受審的左派人士同呼「打倒港英」、「毛主席萬歲」、「抗議政治迫害」等口號。法官作出最後判決前，李連生的外母着急地說：「你是不是沒有錢啊，我替你付三百元吧。」但他拒絕了外母的好意。



李連生近照。

在那個左派陣營激情澎湃的年頭，許多人像李連生那樣寧可踏進監獄，也要藐視港英法庭的判決。他對法庭的判決非常不滿：「校長毆打學生沒有罪，反而判我有罪，這是甚麼法律？」

走遍新界宣傳愛國思想

一九五七年，李連生參加左派僑港種植公會。該會總部設於九龍荔枝角道，五十年代發展相當蓬勃，全盛期曾在全港開設三十多個據點，遍佈新界、香港仔、黃竹坑等地。種植公會在各地區開辦小賣部及合作社，售賣毛巾、葉綠素牙膏、生抽王、肥皂、生油、罐頭食品

等國貨(中國大陸土特產)。李連生說：「國貨公司到六十年代才逐漸普遍，我們可說是香港推廣國貨的先驅。」當年新界鄉村缺乏升學機會，種植公會遂開辦「識字班」，教導鄉村小孩認字讀書。李連生當時擔任義務「管教員」(即導師)，教小孩讀書之際，順道宣傳愛國思想。

種植公會同時宣揚「愛國」思想；李連生憶述稱，他們常於晚間攜同盛滿肥皂、生抽的大藤籃到新界各大小村落，開動大汽燈高唱山歌，宣傳國貨及愛國思想。公會又到處宣揚共產黨統一中國，推行分田到戶，令窮人「當家作主」的功績。公會也熱烈響應大陸的政治運動，五八年「大躍進」期間，李連生等人被種植公會派往廣東「學習」試驗田的耕種方法。眾人返港後到大埔鄉間進行實驗，但發覺不符合成本效益，沒有在鄉間全面推行。他又表示，當年新界左派經常替鄉民義務勞動，例如在山坳傾瀉期間搶險、義務替人抬棺木。他說：「有人笑我們是傻子，但我們按毛主席思想為人民服務。」

李連生表示，新界鄉郊地區滿佈港英當局的「爪牙」，種植公會如此高調活動，各成員的背景自然被當局掌握得一清二楚。一九五九年，港英政府以種植公會「不受歡迎」為理由，解散該會，並將理事長馮庸、副理事長等六名骨幹成員遞解出境。李連生相信：「港英擔心我們在新界鄉村坐大，威脅它的管治，才是解散種植公會的真正理由。」

港府六六年在在大埔興建船灣淡水湖，也令李連生與當局結下樑子。當年香港經常缺乏食水，經常制水，當局決定在大埔沿海興建船灣淡水湖，因此要求位於工程範圍的大滘、小滘、金竹排、橫嶺頭、涌尾、涌背六條村落的村民遷往大埔墟。李連生認為，港府長期採取敵視中國的態度，興建淡水湖背後有政治目的，港英擔心中國控制香港的食水供應，因此不惜斥巨資抽掉海水，修築大壩儲水。

身為小滘村原居民的李連生指出，港府千方百計遊說村民他遷，希望村民合作，協助解決幾百萬香港人的食水問題。他表示，船灣一

帶海產豐富，不少村民以捕漁為生，港府建淡水湖的計劃對村民生計構成頗大影響。當時港府提出每平方尺土地兩角半的賠償價，一些村民認為賠償方案不合理。李連生等小窩村民強烈反對，小窩村民是六條村落中最遲搬走的一群。他相信，他帶頭反對賠償方案，成為港英仇視他的近因。

六七年左派暴動爆發後，新界各地區紛紛出現左派鬥委會。李連生指出，左派群眾在新界西貢、大埔、沙頭角、元朗鄉郊較為活躍，不時出現示威遊行，元朗橫台山更被稱為新界「紅區」。據他所知，這些反英活動大部分由原僑港種植公會的積極份子暗地策劃。當時新界一些群眾三五成群組成「戰鬥隊」，在左派報章刊登反英聲明，聲言要打擊「黃皮狗」、「白皮豬」（英國警察）。新界區曾出現零星襲擊行動，例如長洲一水警輪被魚炮炸沉，大埔船灣一些婦女曾攔截警車及襲擊港英警察。六七年九月中旬，西貢井欄樹兩千多名村民在山上襲擊二百多名軍警。十月十八日，西貢沙角尾以游擊戰的手法，設下炸彈陣，將百多名企圖進村拘捕左派份子的軍警圍困。李連生憶述說，六七年六月底，各界鬥委會發動「三罷」（罷工、罷市、罷課），新界左派人士也發起遊行聲援，新界區巴士也罷駛。但李認為，當時新界大部分反英活動都是左派群眾自發的，並非各界反英抗暴鬥爭委員會指揮的。

暴動期間，新界鄉議局與港英當局站在同一陣線，全力支持港府平息動亂，「維持新界秩序」。李連生表示：「當時親政府鄉紳一旦發現某些村落有『左仔』，就會向新界理民府檢舉，這些鄉紳後來因功獲封為太平紳士。」一些左派群眾企圖以炸彈襲擊大埔鄉事委員會主席黃源章，但行動失敗。港府為了確保新界鄉紳的安全，特別向黃源章、林樹春（現任鄉議局副主席林偉強之父）、鄉議局主席彭富華等人發放佩槍。李連生承認，由於歷史原因，由新界左派人士組成的新界社團聯會，與鄉議局「不太協調」。

李連生六八年初被判入獄後，被送往港島赤柱監獄，囚禁於第五

倉，同倉的犯人包括因「三報事件」被判入獄的《香港夜報》社長胡棣周及《田豐日報》社長潘懷偉。李的囚室僅闊三呎，長五呎，原本由一人佔用，後來因囚犯數目太多，要兩人擠在一起。他形容自己「坐政治監」，受到惡劣對待是在所難免的。他表示：「我被押往赤柱監獄時，就挨了獄卒揮拳相向的『見面禮』。碰上有病的時候，獄卒一拳打過來，打完再給你看醫生。」

李在獄中的生活待遇也頗為惡劣。他在獄中每頓飯只能吃上六茶匙的白飯，飯菜一般是馬鈴薯和幾條鹹魚仔，每天只有十多分鐘外出散步、大小便的「放風」時間。即使冷得只有五、六度，仍然要洗冷水浴，冷得牙關打戰。

李連生在左派暴動期間入獄的往事，一度對他十多年後籌組新界社團聯會構成干擾。一九八四年，李向警方申請註冊成立新界社團聯會。一般來說，港府處理社團註冊的個案通常只需數星期，但李連生提出申請半年，遲遲沒有回音。他後來向警方社團註冊主任追問，對方表示「申請基本上沒有問題，但你在六七年有點事，希望你能交代一下。」李向註冊主任解釋了一小時之久，當局後來批准申請，社團聯會終於在八五年正式成立。他直言「港英有機會就找麻煩」。社團聯會被視為工聯會在新界的對等機構，會員數目超過十萬，足以在新界與鄉議局分庭抗禮。

六七年騷亂期間，李連生愛國熱情高漲，對港英恨得咬牙切齒，恨不得北京早日收回香港。事隔多年，李連生堅持左派群眾沒有犯錯，不能抹殺群眾的愛國熱情。他認為，中央領導在事件中的責任更大。他說：「如果中央下命令要求香港群眾節制，群眾可能不會那樣搞。」談到土製菠蘿(炸彈)時，李連生強調並非所有炸彈都是左派人士放置的，部分炸彈是港英栽贓，嫁禍左派人士。

他同意文化大革命確實對六七事件有影響，六六年底澳門事件也對香港左派群眾產生一定推動作用，但六七騷亂並非直接受文革影響。他認為：「文革六六年爆發，為甚麼香港一年多沒有出事，卻在

六七年爆發衝突？就是因為港英插手新蒲崗勞資糾紛，偏幫資方，觸發社會長期存在的矛盾。」他表示，港英當年極力壓制愛國思想，連公開看《文匯報》也可能被捕，六七事件是香港群眾對港英高壓統治的反彈。雖然港英近二十多年採取懷柔策略，但李認為港英的統治目的不變，只是改採軟硬兼施的手段，令市民馴服，更方便統治罷了。

十三、訪前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梁上苑

梁上苑簡歷：

原籍廣東梅縣，一九一三年出生於馬來西亞吉隆坡。一九三七年
在中共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工作，五零年調往中國外交部工作，歷任
中國駐印尼大使館文化專員、駐緬甸大使館參贊、新華社香港分社副
社長、外交部西歐司副司長等職。去年七月在北京病逝，享年八十七
歲。

問：據你所知，六七:left派暴動的真正起因為何？

答：我們評論歷史事件，只有先分析其複雜的歷史背景，然後才
能理解事件的真正起因，香港的反英抗暴也必須如此觀察。香港工會
聯合會現任理事長鄭耀棠認為，六十年代香港社會充滿不平等，是六
七暴動的主要原因。當年擔任工聯會理事長的楊光則強調：「那時是
反對港英當局使用暴力。」我認為這種說法不夠全面，誰都知道，
「反英抗暴」是國內文化大革命對香港的影響而發生的。社會矛盾是
長期存在的，可以說當年香港每天都有勞資糾紛，六七年新蒲崗勞資
糾紛為甚麼很快變成反英抗暴，而且一直依照文革模式發展下去？香
港一些社會人士把六七事件稱為「香港式的文化大革命」或「左派騷
亂」，更可說明文革影響具有決定性的作用。

當年被捕判刑的翟暖暉和監禁在集中營的蔡渭衡卻認為應歸罪於
港英殖民統治的「黑暗」以及「由殖民統治的無能所促成」，他們只
強調某一方面，不完全符合當時的現實情況。我的看法是：反英抗暴
的真正起因是國內文革帶來的衝擊與港英的高壓統治及其暴政手段。

問：新華社香港分社領導層究竟扮演了甚麼角色？順應群眾激烈
情緒還是推波助瀾？

答：衆所周知，從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中共中央的香港政策是
「長期打算，充分利用」，中共領導人曾多次表示不願用武力收回香

港。在反英抗暴期間，周恩來曾嚴令制止解放軍越過深圳邊界，國內沒有提供任何武器軍火或炸彈給香港左派使用，而在輿論上也從不宣傳收回香港。這些事實說明不是北京方面發動反英抗暴，而是新華社香港分社（即中共港澳工委）所發動的，同時扮演了指揮的角色。

如果港澳工委沒有得到北京的支持，是無法發動反英抗暴鬥爭的。中央的政策本來很明確，港澳工委也很清楚，但當年的林彪和四人幫的極左思潮卻對香港工作常加干擾，他們也掌握了一些輿論陣地，例如中央文革組長陳伯達已接管了《人民日報》。香港新華社便鑽了這個漏洞，以中共黨內常見的「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方式應付，就是先造成了既定事實，使中央不能不負起責任。這一點很有關鍵性，否則就不能理解反英抗暴的全部過程。

五月二十二日港英警察在中環花園道毆打左派群眾後，新華社曾派副社長朱曼平赴京請示。朱回港後透露，周恩來認為香港左派的行動等於「迫中央上馬」，顯然周恩來是不想發動鬥爭的。當時北京領導層對香港發生的事態沒有共識，儘管毛澤東和周恩來同樣不想收回香港，但毛澤東要擺出「盤馬彎弓」的姿態嚇唬英國人。周恩來不同意文革的各種政策，但也不敢公開反對文革和紅衛兵運動。他要解決國內各方面的問題，不可能照顧對外關係的各種事項。林彪集團和港澳工委就此鑽了反英抗暴的空子，結果便產生無人負責也不能追究責任的局面。

一九六七年六、七月份，《人民日報》發表不少社論和評論文章，極盡煽風點火的能事。港澳工委領導人便把這些文章當作指示，當作「聖旨」，也就是等於批准反英抗暴的合法性，同時準備大幹特幹，要同港英決一死戰。可是新華社的指揮員頭腦裏充滿極左思想，不去考慮全局的形勢和雙方力量的對比，幻想二十年代省港大罷工的威風事件重新出現，盲目地動員自己的一切力量。新華社發動約六萬人參與聯合大罷工，其中不少是港英政府或英資財團職工。但所謂「聯合大罷工」僅限於左派，不能發揮很大威力，反而很多人丟了工

作，丟了工作陣地，一直要由港澳工委出錢維持他們的生活，變成沉重的經濟包袱。

緊接着左派又從六月二十九日開始發動大罷市，看來這不是北京中央政府的全面部署，但有各省當局和運輸部門的支持。大罷市也不能致港英死命，而某些市場卻被人奪去，負面的影響不小，可說是傷痕纍纍，長期無法恢復。新華社發動這樣大規模的罷工和罷市，不能說是領導層順應群眾激烈情緒或是推波助瀾，而是帶領左派群眾「敗走麥城」！

問：新華社內部對運動方向是否存在分歧？基層幹部是否較梁威林、祈烽等領導人更左？

答：港澳工委內部可能有不同看法，但僅限於積極性的表現方面，誰都不敢反對反英抗暴這個運動方向。左派基層幹部和群眾，原想仿照國內紅衛兵大搞一場，例如貼大字報、破四舊、強迫領導靠邊站等，可是周恩來掌握的國務院早已通令禁止駐外機構和使領館搞文革的一套。當時新華社領導和左派群眾同樣充滿極左思想，已取得共識針對港英進行鬥爭，更把百年前英國強佔香港的怒火燃燒起來，匯成反英的狂潮，也分不出誰採取過激立場。左派群眾盲目服從領導，甚至認為這是中央的決定，事實上卻是違反中央規定的方針，與中央背道而馳了。

問：左派群眾佈下「真假菠蘿陣」，是群眾放任自流，還是新華社或個別激進幹部鼓動的結果？

答：在整個反英抗暴的過程中，除了初期對人造花廠工人的自發性慰問，其他一切鬥爭都是港澳工委領導的有組織的行動，「真假菠蘿陣」也不例外。不管是誰提出建議，是誰進行鼓動，應該說都是新華社領導的鬥爭。港澳工委經過六、七月份熾熱的鬥爭，施展出罷工罷市的撒手鐮，仍然對港英起不了致命打擊的作用，而北京紅衛兵火燒英國代辦處，也對港英毫無損傷，這些領導人正無計可施之際，才想出這並不高明的一招。

大概從八月初開始，香港左派就擺出真假炸彈陣，這就是在鬧市的電車軌道上或公共場所的角落，擺出上面寫有「危險勿近」之類字樣的手提包或包裹。這些東西一出現，港英警察馬上封鎖交通，軍火專家馬上到來，不管真的或假的一概引爆。交通一旦封鎖，便「亂晒大籠」，而引爆炸彈也需要時間，市民感到很不方便，「媽媽聲」也就出口，罵左派為「左仔」，表示鄙視其幼稚性和可笑性。這些東西很明顯不能殺傷敵人，受害者通常是無辜小孩，有些小孩就是這樣被炸死炸傷的。據說當時的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祈烽還洋洋得意，認為這是「絕招」，可以為城市鬥爭提供「新的革命鬥爭方式」。由於國內不供給炸彈原料，所以後來放的都是假炸彈，已有點近於胡鬧之勢。

從反英抗暴整個運動來看，梁威林、祈烽等人的領導一直處於下風，沒有打過勝仗。雙方剛交手，港英當局可以隨時調動軍警進行鎮壓，可以頒佈緊急法令，隨時拘捕左派社團領導人。香港左派卻損兵折將，隨時隨地被抓進監牢，無法抵抗軍警，他們用盡全部力量搞了罷工和罷市，仍然沒有效果，最後只能搞出所謂「真假炸彈陣」的鬧劇。結果左派戰鬥力逐漸消失，自身困難越來越多，被開除的罷工工人需要吃飯，死難者的家屬也要救濟，港澳工委束手無策。真假炸彈陣更弄得怨聲載道，完全喪失人心。反英抗暴引起的市面蕭條冷落，損失數額之鉅難以計算，卻是所有香港市民遭殃。反英抗暴就是這樣糊裏糊塗的鬥爭，但北京沒有追究錯誤的責任，新華社也沒有官員受到懲罰或警告，因為這是一筆糊塗賬。

這裏應該指出，面對港英軍警的鎮壓，左派群眾英勇戰鬥，其間有很多可歌可泣的事跡。他們不怕坐牢，戟指痛罵港英走狗，《經濟導報》記者許雲程與三聯書店副經理蕭滋都是在「五二二」花園道事件中被打得血流披臉，仍在高呼「愛國無罪，抗暴有理」的口號，他們確實是受害者，不愧為反英抗暴的英雄。

註釋

1 毛澤東就曾經說過：「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見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毛澤東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8年。

2 《明報》，1999年10月16日。

3 John Cooper, *Colony in Conflict : The Hong Kong Disturbances May 1967 – January 1968* , Hong Kong: Swindon Book Company, 1970.

4 《明報》，1966年4月6日。

5 《一九六六年九龍騷動調查委員會報告書》，頁113 – 115。

6 《騷動調查報告書的一面》，《學苑》，1967年4月。

7 《一九六六年九龍騷動調查委員會報告書》，頁89。

8 《一九六六年九龍騷動調查委員會報告書》，頁100。

9 《一九六六年九龍騷動調查委員會報告書》，頁91。

10 香港社會民主黨，《九龍騷動事件調查報告》，頁19。

11 《學苑》，1967年4月4日。

12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5 May 1966.

13 馬家輝，《化外心情、憤怒年代—與蘇守忠的一段短談》，《明報》，1997年4月5日。

14 《信報》，1997年6月16日。

15 《明報》，1966年4月7日。

16 《文匯報》，1966年4月9日。

17 〈澳門暴動檔案解密〉，《亞洲週刊》，1998年3月23日至3月29日，頁27 – 29。

18 《周恩來年譜》（1949 – 1976）下卷，北京：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1997年5月，頁99。

- 19 金堯如，〈《中共香港政策秘聞實錄》〉，香港：田園書屋，1998年6月，頁86 – 87。
- 20 金堯如，〈《中共香港政策秘聞實錄》〉，頁87 – 88。
- 21 金堯如，〈《中共香港政策秘聞實錄》〉，頁92 – 93。
- 22 《大公報》，1967年2月26日。
- 23 《明報》，1967年5月5日。
- 24 根據青洲英坭董事會的聲明，兩名工程師遭工人襲擊，被毆打的工人也沒有受傷的證據。見《明報》，1967年5月5日。
- 25 John Cooper, *Colony in Conflict*, p.7.
- 26 Robert Ted Gurr, *Why Men Rebel*,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0.
- 27 香港社會民主黨，〈《九龍騷動事件調查報告》〉，頁20。
- 28 〈《一九六六年九龍騷動調查委員會報告書》〉，頁101。
- 29 劉蜀永，〈《香港史新編》〉，香港三聯書店，1998年4月，頁259。
- 30 岑逸飛，〈《對香港騷動的分析》〉，〈《盤古》〉，1967年6月號，頁12 – 18。
- 31 龍戰，〈《我們還有話說》〉，〈《學苑》〉，1967年7月13日。
- 32 《明報》，1967年8月25日。
- 33 〈《騷動的漏網新聞》〉，〈《盤古》〉，1967年6月號，頁5 – 10。
- 34 *Hong Kong 1967*, Hong Kong: Government Printer, 1968, P.337.
- 35 《明報》，1967年5月6日。
- 36 《明報》，1967年5月9日。
- 37 John Cooper, *Colony in Conflict*, p.8.
- 38 《大公報》，1967年5月7日。
- 39 《明報》，1967年5月7日。
- 40 《文匯報》，1966年4月9日。
- 41 《大公報》，1966年4月9日。

- 42 John Cooper, *Colony in Conflict*, p. 8.
- 43 《葉錫恩自傳》，頁200。
- 44 《大公報》，1967年5月8日。
- 45 《大公報》，1967年5月9日。
- 46 《大公報》，1967年5月9日。
- 47 《大公報》，1967年5月11日。
- 48 《大公報》，1967年5月12日。
- 49 John Cooper, *Colony in Conflict*, p. 12
- 50 《大公報》，1967年5月12日。
- 51 《大公報》，1967年5月13日。
- 52 《明報》，1967年5月14日。
- 53 《大公報》，1967年5月14日。
- 54 《大公報》，1967年5月15日。
- 55 《工商日報》，1967年5月14日。
- 56 《大公報》，1967年5月16日。
- 57 歷史檔案處檔案編號：GR15/3371/67 II
- 58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18 May 1967, p.420421.
- 59 《大公報》，1967年5月16日。
- 60 《周恩來遙控「反英抗暴」內幕》（上），《九十年代》，1996年5月，頁70 - 76。
- 61 《文匯報》，1967年5月17日。
- 62 《大公報》，1967年5月17日。
- 63 陳揚勇，《苦撐危局—周恩來在1967》，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1月，頁353。
- 64 《文匯報》，1967年5月18日。
- 65 北京京劇團演員，六十年代初期在歷史學家吳晗編寫的《海瑞罷官》中，飾演海瑞。
- 66 《周恩來》電視紀錄片解說詞，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頁180

- 181 -

- 67 丁友光，《中共會不會收回香港》，《明報月刊》，1967年7月號，頁34-37。
- 68 《大公報》，1967年5月21日。
- 69 金堯如，《中共香港政策秘聞實錄》，頁96。
- 70 《華僑日報》，1967年5月20日。
- 71 《大公報》，1967年5月20日。
- 72 《大公報》，1967年5月22日。
- 73 《香港夜報》，1967年5月12日。
- 74 《大公報》，1967年5月24日。
- 75 《明報》，1967年5月23日。
- 76 John Cooper, *Colony in Conflict*, p.31.
- 77 Hong Kong 1967, the Government Printer, 1968, p.1-20.
- 78 《葉錫恩自傳》，香港：明報出版社，1995年7月，頁200。
- 79 《文匯報》，1967年5月24日。
- 80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155。
- 81 《周恩來遙控「反英抗暴」内幕》（上），《九十年代》，1996年5月，頁70-76。
- 82 陳揚勇，《苦撐危局—周恩來在1967》，頁355。
- 83 《盤古》，1967年6月號，《騷動的漏網新聞》，頁5-10。
- 84 《聯合報》，1967年5月19日。
- 85 《大公報》，1967年6月3日。
- 86 鄧開頌、陸曉敏主編，《粵港關係史（1840-1984）》，香港：麒麟書業有限公司，頁313。
- 87 吳昊，《香港電影民俗學》，香港：次文化堂，1993年，頁8-9。
- 88 〈紅心赤膽威懾港英—記反英抗暴小將張普璇〉，《香港風暴》。

- 89 〈地下黨在管治香港？〉，《開放》，1998年8月號，頁62 - 63。
- 90 《大公報》，1967年6月29日。
- 91 《明報》，1999年3月4日。
- 92 《文匯報》，1967年6月30日。
- 93 《大公報》，1967年7月3日。
- 94 《文匯報》，1967年7月3日。
- 95 金堯如，《中共香港政策秘聞實錄》，頁141 - 142。
- 96 《九十年代》，〈六七年香港左派暴動始末〉，1996年5月號，頁62 - 69。
- 97 John Cooper, *The Colony in Conflict*, p.50 - 51.
- 98 《文匯報》，1967年7月2日。
- 99 *A Report on the Public Service 1967/68*, Hong Kong: Government Printer, 1968, P.21 - 22.
- 100 Hong Kong Hansard, 17 May 1967.
- 101 〈百分之百的法西斯伎倆〉，《大公報》，7 - 6 - 1967。
- 102 Hong Kong 1967, p.7
- 103 《華僑日報》，1967年5月31日。
- 104 《明報》，1967年7月28日。
- 105 《新界鄉議局第十八屆議員就職典禮專刊》，1968年7月。
- 106 Hong Kong Hansard 1967, 12 - 7 - 1967, p.365 - 367.
- 107 《南方日報》，1967年7月11日。
- 108 陳揚勇，《苦撐危局—周恩來在1967》，頁355。
- 109 《大公報》，1967年7月24日。
- 110 《文匯報》，1967年7月10日。
- 111 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編印，《香港風暴》，頁26 - 27。
- 112 《大公報》，1967年7月13日。

- 113 《明報》，1967年7月13日。
- 114 《葉錫恩自傳》，頁201。
- 115 〈被捕前後一周樹源同學訪問記〉，《學聯報》，1967年8月10日。
- 116 《大公報》，1967年7月14日。
- 117 《大公報》，1967年7月16日。
- 118 《大公報》，1967年7月21日。
- 119 《大公報》，1967年7月27日。
- 120 《大公報》，1967年9月1日。
- 121 《大公報》，1967年7月30日。
- 122 《大公報》，1967年7月14日。
- 123 《香港風暴》，頁35。
- 124 Hong Kong 1967, Hong Kong Government Printer, 1968, p. 16.
- 125 《明報》，1967年8月25日。
- 126 《大公報》，1967年9月1日。
- 127 《大公報》，1967年8月26日。
- 128 〈在外交部「奪權」前後〉，《周恩來的最後歲月》，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12月，頁204 - 243。
- 129 〈周恩來遙控反英抗暴內幕〉，《九十年代》，1996年6月號。
- 130 嚴家其、高皋，《中國文革十年史》，香港大公報社，1986年11月初版，頁253。
- 131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通鑑》第三卷（1966 - 1976），北京：紅旗出版社，頁38。
- 13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周恩來》，陝西人民出版社/珠海出版社，1998年2月，頁181。
- 133 《人民日報》，1967年8月23日。
- 134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通鑑》第三卷（1966 - 1976），北

京：紅旗出版社，頁38。

135 〈在外交部「奪權」前後〉，《周恩來的最後歲月》，頁204 – 243。

136 〈在外交部「奪權」前後〉，《周恩來的最後歲月》，頁204 – 243。

137 《大公報》，1967年9月6日。

138 《大公報》，1967年9月23日。

139 《香港風暴》，頁41。

140 《周恩來年譜》（1949 – 1976）下卷，頁211。

141 《香港風暴》，頁133。

142 John Cooper, *Colony in Conflict*, p. 271.

143 *Hong Kong 1967*, p. 162 – 165.

144 〈周恩來和香港問題〉，《瞭望》新聞周刊，1996年第15期，頁22 – 23。

145 金堯如，《中共香港政策秘聞實錄》，頁4 – 5。

146 《香港問題讀本》，中國國務院港澳辦公室社會文化司編著，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7年5月，頁24 – 25。

147 陳揚勇，《苦撐危局—周恩來在1967》，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1月，頁352。

148 《周恩來年譜》（1949 – 1976）下卷，頁155。

149 陳揚勇，《苦撐危局—周恩來在1967》，頁353。

150 《周恩來年譜》（1949 – 1976）下卷，頁169。

151 陳揚勇，《苦撐危局—周恩來在1967》，頁356。

152 陳揚勇，《苦撐危局—周恩來在1967》，頁367。

153 〈關於反英抗暴鬥爭的幾個問題〉，《文匯報》，1967年7月3日。

154 〈中共對港無意動武〉，《明報》，1967年7月31日。

155 《明報》，1969年6月25日。

156 Derek Davies, A Position Of Strength,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3 August 1967, p.260 – 263.

157 許家屯，《許家屯香港回憶錄（上）》，台北：聯經出版有限公司，頁40。

158 《明報》，1969年9月23日。

159 冼玉儀，〈社會組織與社會轉變〉，《香港史新編（上冊）》，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7年5月。

160 《學苑》，1967年7月13日。

161 呂大樂、趙永佳，〈香港的社會運動與民主政治〉，《明報月刊》，1997年6月，頁26 – 29。

162 鄭郁郎，《在香港看香港》，香港：懷樓書店，1967年11月，頁9。

163 周永新，《目睹香港四十年》，1990年，頁40。

164 Ian Scott, Political Change and the Crisis of Legitimacy in Hong Kong, p.104.

165 呂大樂，《唔該，埋單：一個社會學家的香港筆記》，香港：閒人行有限公司，1997年，頁26。

166 冼玉儀，〈社會組織與社會轉變〉，《香港史新編（上冊）》，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7年5月。

167 Star, 7 – 8 – 1967

168 Derek Davids, What's to be done now?,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June 1, 1967.

169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LXII:22 (May 29, 1967)

170 Guardian, 14 – 7 – 1967

171 Hong Kong Standard, 6 – 8 – 1967

172 The China Mail, 21 – 8 – 1967

173 〈本港各階層人物對香港前途的看法〉，《盤古》，1967年7月號，頁16 – 18。

- 174 《學聯報》，1967年9月14日。
- 175 《學聯報》，1967年7月12日。
- 176 《明報》，1967年9月14日。
- 177 Hong Kong Standard, 11 – 6 – 1967
- 178 《學苑》，1967年7月13日。
- 179 《新亞學生報》，1967年6月30日。
- 180 Ian Scott, Political Change and the Crisis of Legitimacy in Hong Kong, p.127.
- 181 《明報》，1978年9月5日。報道特別指出：「以上報道根據參與集會者的轉述，並非祈烽演講的原來詞句，但相信基本原意並無出入。」
- 182 江東，《香港左派半世紀浮沉錄》，《信報》，1997年6月24日。
- 183 《亞洲週刊》，1997年7月7日至7月13日。
- 184 李後，《回歸的歷程》，香港三聯書店，1997年，頁59。
- 185 許錫揮、陳麗君、朱德新，《香港跨世紀的滄桑》，廣東人民出版社，1985年，頁285。
- 186 〈「六七暴動」的非論述〉，《信報》，1999年8月26日。
- 187 劉蜀永主編，《簡明香港史》，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8年4月，頁279 – 280。
- 188 《文匯報》，1967年10月27日。
- 189 《大公報》，1998年8月24日。
- 190 許行，〈香港政論雜誌回顧〉，《開放》，1998年5月號，頁44 – 50。
- 191 《文匯報》，1967年5月17日。
- 192 《文匯報》，1967年7月19日。
- 193 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鬥委會）編印，《香港風暴》，1968年，頁22 – 23。

- 194 《大公報》，1967年6月1日。
- 195 《文匯報》，1967年8月5日。
- 196 《文匯報》，1967年8月7日。
- 197 《田豐日報》，1969年1月7日。
- 198 《當代》月刊，1993年8月15日，頁31。
- 199 《黃大仙坊眾成立鬥委會，誓師以牙還牙鬥港英》，《新午報》，1967年6月15日。
- 200 詳見《當代》月刊1993年11月15日。
- 201 《大公報》，1967年8月19日。
- 202 《明報》，1967年9月5日。
- 203 《大公報》，1967年9月8日。
- 204 《一九六六年九龍騷動調查委員會報告書》，香港政府印務局，1966年，頁98。
- 205 《文匯報》，1967年5月17日。
- 206 〈發展香港愛國電影事業〉，《廖承志文集》，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0年，頁557-556。
- 207 廖一原、馮凌霄等著，〈新中國成立之後香港愛國進步電影的發展及其影響〉，北京：《當代電影》，1997年第三期，頁1-15。
- 208 《明報》，1967年7月19日。
- 209 《大公報》1997年5月7日。《大公報》刊登蔡渭衡回憶六七騷亂的文章，涉及一段小插曲。蔡指出，他原先將文章交給香港《經濟日報》刊登，但《經濟日報》遲遲沒有登載，也沒有解釋原因。他向香港區人大代表、《大公報》總編輯曾德成提起這件事，曾立即說：「好，我們給你登。」曾德成六七年是聖保羅書院學生，當時因在校內派發反英傳單而被捕入獄。
- 210 羅孚，〈為「香港式文革」致歉〉，《當代》月刊，1993年3月15日，頁87-89。

211 教育司署高級教育主任 P. I. Price 向張雲發出的函件英文原文為：You have been guilty of professional misconduct in that it has been reported to me that you have acted against the authority of the Headmaster of your school and encouraged pupils to act in a manner likely to subvert the discipline of the school.

附錄：

一、六七暴動文件匯編

(1) 《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抗議書》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六日)

我國外交部昨日發表聲明，最緊急、最強烈抗議港英當局對香港中國同胞的法西斯暴行。聲明莊嚴宣告，中國政府和七億中國人民堅決支持香港中國同胞的英勇、正義的鬥爭，並且堅決做香港中國同胞的強大後盾。消息傳來，全港九工人、學生和各界同胞熱烈歡呼，人心振奮。我國外交部的聲明，是我們最敬愛的偉大領袖毛主席對香港同胞最親切的關懷，表達了我國政府和七億中國人民支持香港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的決心。我們熱烈歡呼：「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我們感謝祖國政府和人民的支持，我們以無心感激的心情堅決擁護我國外交部的嚴正聲明和正義要求。

我們必須指出，港英當局無理侵犯九龍城砵居民的正當權益，以後又包庇資方，壓制工人，把香港人造花廠的勞資糾紛變為毆打工人、記者和毒打帶有《毛主席語錄》的學生的血腥暴行。接着又拘捕前往警署抗議的樹膠塑膠業總工會主席和工人代表。連日來更變本加厲，出動大批警察，使用警棍、防暴槍、催淚彈、直升飛機、血洗東九龍，對手無寸鐵的工人、學生、攝影師、記者和各界居民進行大規模的血腥鎮壓。在美蔣特務配合之下，港英當局還在不斷搜捕我愛國同胞，並且非法審判和野蠻毒打被捕的愛國者，事態正在發展和擴

大。大量事實表明，港英當局製造這次大規模的血腥暴行，是經過長期準備、精心策劃的。同美帝勾結的港英當局，其矛頭指向我們的愛國工人、愛國學生和愛國同胞。這是港英當局加緊追隨美國戰爭政策和侵略政策，勾結美帝反對中國的陰謀的一部分。港英當局一方面配合美帝在越南的戰爭升級，繼續把香港作為美國侵略越南的基地；另一方面害怕我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仇視香港同胞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港英當局妄想使用暴力鎮壓來遏制光焰無際的毛澤東思想的影響，遏制香港同胞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眾運動，因而製造了這次滅絕人性的血腥鎮壓。毛主席教導我們：「帝國主義者如此欺負我們，這是需要認真對付的。」為此，我們向港英當局提出最強烈的抗議和四項嚴正要求：

（一）立即停止一切非法的逮捕、審訊、判罪、毒打、刑罰等法西斯的血腥鎮壓行動；

（二）立即宣佈無罪釋放所有被捕的愛國同胞；

（三）嚴懲這一血腥暴行的兇手，向受害者道歉，並賠償其一切損失；

（四）保證不再發生類似事件。

我們最嚴厲警告港英當局：必須立即無條件接受我們的四項要求和我國政府的五點要求，否則，一切嚴重後果由港英當局全部承擔。既然你們把這場反迫害鬥爭挑起來，我們就一定跟你們鬥到底。我們是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香港中國同胞，我們有毛主席撐腰，有祖國的支持，有七億偉大中國人民作堅強後盾，我們有決心把迫害鬥爭進行到底，不獲全勝，決不罷休。

讓我們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遵照毛主席的教導：「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全世界人民要有勇氣，敢於戰鬥，不怕困難，前仆後繼，那末，全世界就一定是人民的。一切魔鬼通通都會消滅。」我們的反對港英迫害鬥爭是正義的，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中國人民是無敵的，我們一定能夠取得最後

勝利。

港英當局必敗，中國同胞必勝！

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

最偉大的領袖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

(2) 港九各業工人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 發言人談話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四日)

與美帝勾結的港英當局，爲了進一步追隨美帝戰爭政策和侵略政策，最近有計劃、有預謀、有組織對香港愛國工人同胞進行一場滅絕人性的血腥暴行，掀起一場嚴重的反華事件，對我偉大的中國人民進行挑釁。必須指出，這場反迫害鬥爭是港英當局血腥鎮壓中國同胞所迫出來的。最近數月的事實已經證明：你們一縱容，美蔣特務就囂張；美蔣特務一破壞，你們就包庇；你們一插手，勞資糾紛就惡化；你們一鎮壓，局勢就緊張；你們越「防」越暴，群眾當然越反越烈；你們壞事做盡，還滿口仁義道德；你們一邊呼籲緩和局勢，一邊聲言出動英軍鎮壓。你們不可不知，你們的軍警出操雖然懂得換腳，打起仗來武器卻會易手。你們的集中營一共有多少平方公呎？能容得下整個港九的「一不怕死，二不怕苦」的愛國同胞嗎？你們敢把迫害升級，我們也敢在任何一個地方跟你們鬥，可以在廠內鬥，也可以在街上鬥，可以在法庭監獄中鬥，也可以在「港督府」之內鬥，文鬥武鬥，隨你的便，長鬥短鬥，任你選擇。我們是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工人，我們是有抗暴鬥爭的光榮傳統，我們早已下定決心，一定要把反迫害鬥爭進行到底。

全港工人已經提出四項正義要求，我們一定要港英當局接納。不達目的，決不罷休。港九工人說話是算數的，我們的容忍是有限度的。如果港英當局膽敢勾結美帝蔣幫升級，那就來吧！我們一定奉陪到底！毛主席說：「帝國主義的反革命事業儘管每天都在做，但是在嘴上，在官方的文書上卻總是滿篇的仁義道德，或者多少帶一些仁義道德，從來不說真話。」昨天港英當局高級權威人士的談話正是這樣的「官方的文書」。毛主席又說：「『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這就是

張伯倫政策的必然結果。」張伯倫以損人的目的開始，以害己的結果告終。這將是一切反動政策的發展規律。」港英當局目前執行的政策就是這樣的張伯倫的政策。

唯怯懦者最殘暴，惟堅定者最安詳。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船。我們應該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我們需要的是熱烈而鎮定的情緒，緊張而有秩序的工作。」我們全港九愛國同胞應當迅速作好一切準備，有組織地、有計劃地迎接新的戰鬥。

（3）〈堅決反擊英帝國主義的挑釁〉

《人民日報》社論（一九六七年六月三日）

一場反抗英帝國主義血腥迫害的偉大戰鬥，在香港發生了。從五月初以來，香港愛國同胞不顧英國軍警的武力鎮壓，高舉《毛澤東語錄》，湧上了街頭。各行各業的工人紛紛宣佈罷工和停工。他們前仆後繼，不怕犧牲，同英國軍警和暴徒展開英勇的搏鬥。這場轟轟烈烈的大規模的反帝群眾運動，正在猛烈發展中。

香港英國當局，不顧我國政府的一再警告，不但沒有對他們製造的法西斯暴行低頭認罪，反而變本加厲地向中國人民挑釁。他們繼續非法逮捕和審訊我愛國同胞，對被捕者實行駭人聽聞的毒打和虐殺。他們頒佈了一連串的所謂「緊急法令」，製造「迫害有理、抗暴有罪」的「法律根據」，企圖以更大規模的搜捕和迫害，撲滅我愛國同胞的反帝抗暴鬥爭。他們還開來航空母艦，公開叫嚷要「顯示力量」。英帝國主義簡直發瘋到了極點！

英帝國主義以為靠幾根警棍，幾道法令，幾條軍艦，就可以把中國人民嚇倒。這完全是痴心妄想。有壓迫就有反抗。香港的愛國同胞說得好，港英當局的暴行「升級」，抗英鬥爭也就要「升級」。他們警告英帝國主義者：這場鬥爭還剛剛開了個頭，更加威武雄壯、更加氣壯河山的戰鬥還在後邊！我港九愛國同胞既然已經展開了反擊，就一定要堅持鬥爭，抗頑敵，追窮寇，把英帝國主義鬥垮，鬥臭！

英帝國主義是香港萬惡的殖民統治者，是香港四百萬中國同胞的敵人，七億中國人民的敵人。一百多年來，這個腐朽的、野蠻的帝國主義，對我港九同胞進行了殘酷的壓迫。香港的軍警、特務、法庭、監獄等等，都是壓迫我港九同胞，使我廣大同胞陷於貧困的境地。它還用最腐朽、最墮落的西方文化，來毒化和腐蝕我港九同胞。近年來，英國政府又勾結美帝國主義，力圖把香港變成美國侵越戰爭的基

地和反華的基地。英國殖民統治下的香港，是罪惡的淵藪，黑暗的地獄。一百多年來，英帝國主義在香港幹盡了壞事，血債累累，罪惡滔天，必須清算！

港九愛國同胞正在進一步同英帝國主義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英帝國主義是一個反面教員，他們用法西斯暴行，迫使港九同胞展開一場仇視、鄙視和蔑視英帝國主義的運動，從政治上、經濟上和文化上採取一切可能的行動，向英帝國主義的殖民統治發動強大的反擊。一定要大張旗鼓地、千軍萬馬地揭發和宣傳英帝國主義一百多年來在香港犯下的滔天罪行，發動群眾進行血淚的控訴，讓香港的同胞家喻戶曉，使他們徹底地認清侵略成性的英帝國主義的反動腐朽的本質。

這一場鬥爭，主要地應當依靠香港的工人階級，他們是革命的生力軍。還應當充分地發動廣大的青年學生，使青年學生運動同工人運動結合起來。以香港的工人階級為核心，發動香港廣泛階層的愛國同胞，把鬥爭矛頭集中地指向英美帝國主義，首先是指向直接統治香港的英帝國主義。

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真正的銅牆鐵壁是甚麼？是群眾，是千百萬真心實意地擁護革命的群眾。這是真正的銅牆鐵壁，甚麼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們，我們卻要打破反革命。」

不管英帝國主義目前在香港多麼囂張，多麼猖狂，只要香港的愛國同胞進一步團結起來，組織起來，結成浩浩蕩蕩的革命隊伍，展開波瀾壯闊的反帝群眾運動，就能夠形成一座真正的革命的銅牆鐵壁，這是英帝國主義所絕對打不破的。相反，萬惡的英帝國主義卻要在這座銅牆鐵壁面前碰得粉身碎骨！

英帝國主義繼續在香港胡作非為，對我愛國同胞進行血腥迫害，這是香港愛國同胞絕對不能容忍的，是七億中國人民所絕對不能容忍的。

港九愛國同胞們，進一步動員起來，組織起來，勇猛地向着萬惡

的英帝國主義展開鬥爭吧！隨時響應偉大祖國的號召，粉碎英帝國主義的反動統治！香港的命運取決於香港愛國同胞，取決於七億中國人民，而不取決於腐敗衰朽的英帝國主義。

港九愛國同胞們，英勇地戰鬥吧！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取得了偉大勝利的祖國千百萬紅衛兵支持着你們。億萬革命群眾支持着你們。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七億中國人民，誓作香港愛國同胞的強大後盾。

港九愛國同胞們，向着偉大的勝利奮勇前進吧！

(4) 周恩來關於堅決支持香港愛國同胞反英抗暴鬥爭的講話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四日)

帝國主義、現代修正主義和各國反動派、對我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進展和毛澤東思想的巨大影響，怕得要命，恨得要死。他們用盡各種方法，妄圖阻遏毛澤東思想的傳播。最近英帝國主義在香港對我愛國同胞的殘暴鎮壓，就是這種陰謀的大暴露。

大家都知道，在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影響和推動下，香港愛國同胞抓起了一個學習和宣傳毛澤東思想高潮。爲了破壞和阻止香港愛國同胞學習和宣傳毛澤東思想的群眾運動，英國政府和香港英國當局對我愛國同胞進行一系列大規模的殘酷鎮壓。就在昨天，又開槍打死了一名工人，非法逮捕了數十人。所有這些，不能不激起我愛國同胞的強烈反抗。香港愛國同胞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同英帝國主義者英勇搏鬥，並且發動了一場轟轟烈烈的仇視、鄙視和蔑視英帝國主義的群眾運動，徹底揭露英帝國主義一百多年來在香港所犯下的滔天罪行。香港的工人階級、青年學生、農民、漁民以及其他愛國同胞正在進一步團結起來，組織起來，組成浩浩蕩蕩的反帝抗暴大軍。今天，他們開始了一場規模宏偉的反帝抗暴大罷工，我們表示堅決的支持。

香港和九龍歷來就是中國的領土。香港愛國同胞的一切正當權利，特別是他們學習和宣傳毛澤東思想的神聖權利，絕對不容許任何人侵犯。在震撼世界的無產階級大革命運動中，取得了偉大勝利的中國人民，絕對不能容忍英帝國主義對香港愛國同胞的殘酷迫害。中國人民決心根據形勢的需要，給予香港愛國同胞以一切支援，直到取得最後勝利。香港的命運取決於香港的愛國同胞和七億中國人民，而絕不取決於一小撮英帝國主義者。英國政府和香港英國當局必須放清醒

些。如果英國政府和香港英國當局執迷不悟，不顧中國人民和中國政府的警告，繼續對香港愛國同胞進行殘酷鎮壓，硬要同中國人民為敵到底，那麼，他們就必然要受到更大的懲罰，他們應當承擔由此而產生的一切嚴重後果。

(5) 〈放手發動群眾，進一步壯大反英抗暴鬥爭隊伍〉

《人民日報》社論（一九六七年七月五日）

六月二十四日開始的規模壯闊的香港五萬工人聯合大罷工，震撼了港英帝國主義，顯示了工人階級的强大威力。香港其他階層的愛國同胞，積極響應這次大罷工，奮起以各種形式展開群眾性的鬥爭。學生罷課，小商小販和部分愛國的工商界罷市，聲勢浩大的各行各業的群眾鬥爭，正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給予港英帝國主義以越來越嚴重的打擊。

革命的群眾運動越是深入發展，鬥爭就必然要更加尖銳，更加激烈。反動勢力越是接近死亡，也必然地越要猖獗。港英法西斯當局爲了維持其搖搖欲墜的反動統治，正在進行着瘋狂的掙扎。它接連不斷地殺害我愛國同胞，逮捕判刑上千人；它繼續頒佈法西斯法令，大批解僱罷工工人，對香港工人和愛國同胞進行威脅利誘，使用了各種各樣的卑鄙手段，破壞我香港同胞的抗暴鬥爭。

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教導說：「不管中外反動派如何猖獗（這種猖獗是歷史必然性，毫不爲奇）我們是能夠戰勝他們的。」一切內外黑暗勢力的猖獗，不但表示了這些黑暗勢力的還有力量，而且還表示了它們的最後掙扎，表示了人民大眾逐漸接近勝利。英帝國主義是困獸猶鬥，它們的壽命已經不長了。

目前，擺在香港愛國同胞面前的任務，就是再接再厲，把這場反英抗暴鬥爭堅持下去，奪取偉大的勝利。爲了實現這個目標，就應該放手地發動群眾，以工人階級爲核心，團結香港一切可以團結的反帝愛國力量，不斷鞏固和壯大反英抗暴鬥爭的隊伍。

香港同胞的反英抗暴鬥爭，是侵略與反侵略的鬥爭，是中華民族一百多年來反帝鬥爭的繼續。萬惡的英帝國主義在香港幹盡了壞事，

犯下了數不清的罪行，欠下了還不完的血債。它是香港四百萬同胞最直接最兇惡的敵人，是中華民族的敵人。一切有愛國心的香港同胞，應該而且一定會遵循毛主席的教導，團結在反帝愛國的旗幟下，投入反英抗暴偉大門爭的洪流。

香港的四百萬同胞，大多數是愛國的，是反對帝國主義的，是要革命的。香港的工人、農民、漁民和其他勞動人民，以及所有愛國的同胞，忠於我們的偉大祖國，忠於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他們熱烈地嚮往強大的社會主義祖國，他們為祖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成就而歡欣鼓舞。特別是祖國正在進行的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使他們受到了極大的教育。廣大的香港愛國同胞，熱情地學習偉大的毛澤東思想，用毛澤東思想來武裝自己。在這場反英抗暴的尖銳鬥爭中，香港愛國同胞的革命覺悟空前提高。這是在香港放手發動群眾，打擊英帝國主義的最重要的條件。

香港的工人，作為反英抗暴鬥爭的生力軍，要對一切愛國的人們作好團結工作，發動他們參加反英抗暴鬥爭，歡迎他們的一切愛國行動。有些人即使目前還不能加入反英抗暴的戰鬥行列，只要不是漢奸，也要向他們做工作，團結他們。

工人的罷工是目前香港反英抗暴鬥爭的主要戰場，店員、城市貧民、小商小販、學生、知識分子，以及一切愛國的同胞，都應當用各種鬥爭形式，同英帝國主義作鬥爭。特別是香港幾十萬青年學生，應當積極行動起來，同工農群眾相結合，在反英抗暴鬥爭中發揮先鋒的作用。這樣，就能夠形成對港英帝國主義的重重包圍，給以狠狠的打擊！

在香港，我們所要直接打擊的對象，是英帝國主義，是一小撮英國殖民主義者和極少數死心塌地為英帝國主義效勞的民族敗類。那些在敵人營壘中為敵人做過一些壞事的人，他們應當認清形勢。棄暗投明，將功贖罪。而對於那一小撮英國殖民主義者和那些罪大惡極、怙惡不悛，甘心充當敵人的劊子手的鷹犬，香港同胞完全懂得怎樣去處

理他們，那就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我們要嚴厲制裁這些壞傢伙，殺人要償命，血債要用血來還。「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哪有這個道理！誰要想在香港殺害我愛國同胞，而又不受到應得的懲罰，那是絕對辦不到的。

現在，在祖國七億人民的支援下，香港愛國同胞們，正在進一步動員起來，匯合成波濤洶湧的汪洋大海。敵人不投降，就叫它在香港反帝革命群眾鬥爭的汪洋大海中活活地淹死！

二、六七左派暴動大事表

	事件
1967年4月16日	九龍新蒲崗香港人造花廠貼出十項關於調整工資福利的規定，部分工人感到不滿，向資方提出交涉。但資方沒有積極回應。
1967年5月6日	港英防暴隊與香港人造花廠工人發生衝突，多名工人被毆傷，二十一名人被捕，數名左派工會代表往警署抗議亦遭扣押。
1967年5月7日	膠業總工會發表聲明，抗議港英鎮壓工人，並舉行控訴大會；工聯會代表向警方提出抗議，要求釋放被拘押的工人。
1967年5月8日	工聯會發表聲明抗議港英蓄意製造血案；膠業總工會成立反迫害鬥爭委員會。
1967年5月9日	新華社職工集會，譴責港英血腥暴行
1967年5月11日	港英當局在新蒲崗等地開槍射擊工人、學生群眾，數百人被打傷，百餘人被捕，東九龍實行宵禁。澳門左派群眾到英國領事館抗議。
1967年5月12日	港英續在新蒲崗、黃大仙、東頭村等地鎮壓左派示威者；港九各業工人反迫害鬥委會成立；新華社職工代表到港督府抗議。
1967年5月13日	摩總、中電等十三家公司成立反迫害鬥爭委員會。
1967年5月14日	港九各業工人反迫害鬥委會表示，一定要把反迫害鬥爭進行到底
1967年5月15日	中國外交部發表聲明，支持香港左派陣營的抗爭行動。《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警告港英當局「懸崖勒馬」。

續表

	事件
1967年5月16日	左派成立港九各界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鬥委會）。左派各業工人與十一個左派社團鬥委會到督府抗議。 上海示威群眾衝進英國駐滬代表住所，搗毀傢具。
1967年5月17日	鬥委會十七名代表前往港督府，向港督戴麟趾抗議，但戴麟趾拒絕接見。
1967年5月19日	左派群眾開始前往港督府抗議
1967年5月22日	左派示威者與港英警方發生流血衝突，警方拘捕一百六十七名示威者，左派聲稱逾百人受傷。 三百多個社團在報章刊登聲明，支持港府「維持治安」。
1967年5月23日	巴士、電車、煤氣等左派工會發動間歇性停工抗議。 鬥委會舉行擴大會議，委員總數增至三百多人。
1967年5月24日	周恩來指出，對港英的鬥爭要堅持有理、有利、有節，又批評有關部門的極左做法。
1967年5月26日	英國航空母艦「堡壘號」駛往香港，與駐港英軍進行軍事演習。
1967年5月27日	中國外交部長陳毅表示，中國政府對港英的行動「絕對不能坐視不管」。
6月3日	《人民日報》社論呼籲香港左派群眾「隨時響應祖國號召，粉碎英帝國主義反動統治」，左派大受鼓舞
6月8日	九龍土瓜灣工務局電機部、中華煤氣廠、電燈公司左派工人與防暴隊發生衝突、徐田波、黎松、曾明等工人喪生
6月9日	防暴隊搜查觀塘銀都戲院，其後更吊銷牌照
6月10日	《人民日報》發表〈針鋒相對，堅決鬥爭〉評論員文章，呼籲全國工農、解放軍，用實際行動支援香港同胞的鬥爭。

續表

	事件
6月24日	左派發動「聯合大罷工」，二十多個行業的左派工會參與，約六萬名工人響應。 周恩來表示「堅決支持」香港左派的罷工行動，北京會給予「一切支援」。
6月27日	左派學校罷課一天。
6月29日	左派發動為期四天的「聯合大罷市」，香港食品價格一度上升。
7月8日	三百多名大陸民衆越過沙頭角邊境，與香港警察發生槍戰，五名警察身亡。
7月10日	周恩來傳達毛澤東對香港「不動武」的指示
7月12日	署理布政司何禮文表示「爭取主動的時間已來臨」，港府當晚首次出動英軍，搜查多間左派工會。 左派群眾首次引爆土制炸彈。
7月14日	警方拘捕傅奇、石慧夫婦，關押於港島摩星嶺集中營。
7月15日	鬥委會呼籲左派群眾「武裝起來」，拿起武器「懲罰港英」。
7月16日	《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呼籲香港左派「更加放手發動群眾」。
7月28日	左派中華中學宿舍發生爆炸，一名學生被炸斷手臂。港府認定該校學生研製炸彈，下令封閉。
8月4日	港府出動英軍，搜查北角僑冠大廈，拘捕鬥委會副主任委員黃建立。
8月9日	警方拘捕《香港夜報》社長兼《新午報》董事長胡棣周、《田豐日報》社長潘懷偉、南昌印務公司董事長李少雄及經理翟暖暉，並勒令三報停刊。

續表

	事件
8月20日	中國外交部向英國駐華代辦提交緊急照會，要求英國在四十八小時內釋放胡棣周、潘懷偉等人。
8月22日	北京紅衛兵火燒英國代辦處
8月24日	商業電台播音員林彬上班途中被暴徒投擲汽油彈，被活活燒死。
8月28日	一名英軍軍火專家在九龍獅子山引爆炸彈時，重傷不治。
9月4日	胡棣周、潘懷偉、翟暖暉等等被判入獄三年。
9月6日	港府頒佈緊急法令，將爆竹及煙花列為「違法物品」。
9月18日	鬥委會主任委員楊光承認反英鬥爭的勝利「時間可能會稍為長一些」，「有時起伏，有高有低」。
9月28日	聖保羅書院預科學生曾德成在校內派發反英傳單，被判入獄兩年。
12月	周恩來下令左派不要再搞真假炸彈陣，左派騷亂進入尾聲。

三、鬥委會常務委員名單及近況

姓名	當年職務/職業	近況	備註
楊光	港九工會聯合會主席	工聯會顧問	鬥委會主任委員
費彝民	《大公報》社長	已故	鬥委會副主任委員
謝鴻惠	德信行經理、中華總商會會董		鬥委會副主任委員
黃建立	漢華中學校長	漢華中學校監	鬥委會副主任委員
王寬誠	中華總商會副會長	已故	鬥委會副主任委員
胡九	香港洋務工會副主席	已故	
劉謙	摩托車業職工總會九巴分會主席	已故	
伍宜	香港煤氣公司華員職工總會主席		
郭添海	摩托車業職工總會主席		
鄧全	香港電車公司工會代表		
廖一原	新聯電影公司董事長、中華總商會會董	銀都機構名譽董事長	
陳紘	中國銀行副經理	中國銀行顧問	
任意之	鳳凰電影公司導演、編劇	已故	
潘德聲	新華社副總編輯		
黃燕芳	港九紡織染業職工總會主席		
湯秉達	中華總商會司庫	已故	
黃富榮	香島中學學生		

門委會其他委員名單

姓名	當時職務	近況
張烈	工聯會秘書	
吳理廣	香港海員工會主席	
梁樹棟	港九牛奶公司華員職工會主席	
陳妹	香港電車公司職工會副主席	
曾炳壽	電話公司港九華員職工會主席	
陳錦謙	九龍電力公司華員職工總會主席	
陳照康	香港電燈公司華員職工會主席	
陳章	港九內衣總工會副主席	
洪展		
方翠		
吳炎	摩托車業職工總會港巴分會主席	
李澤添	鞋業職工會理事長	工聯會會長、 港區人大代表
梁謀	僑港廣義堂坭水業工會總務主任	
梁錦		
潘靖	香港石印業職工總會主席	
羅德楊		
馮耀	政府水務局華人職工會主席	
呂煥	政府軍部醫院華員職工會主席	
盧華安	九龍船塢勞工聯合會主席	
張泉		
萬容	港九漁業職工會主席	
李崧	醫生	
程錦媛		
李述龍	香島中學校長	
張躡峰	中業中學校長	
黃祖芬	中華中學校長	已故/現任律政司司長 梁愛詩舅父

續表

姓名	當時職務	近況
吳康民	培僑中學校長	全國人大香港區代表、 基本法委員會委員
鄒劍卿	旺角勞工子弟學校校長	
何肖章	深水埗女織車衣工人學校校長	
張昌仁	勞工子弟學校教師	
郭承林	漢華中學學生	
李長虹	中華中學教師	
周倫達		
吳智強		
馬展雲		
莊世平	南洋商業銀行董事長	全國政協常委
賴初昌		
洪傳滔		
張學明		
蔡福就	中國旅行社副經理	中國旅行社董事長
高卓雄	中華總商會副會長	已故
鄧典初	中華總商會副會長、廣州鋼窗廠 總經理	已故
梁燦輝	南北行公會主席、中華總商會會 董	已故
郭宜興	中華總商會常務會董、青島啤酒 代理商	已故
孫城曾	正豐莊總經理、中華總商會會董	
郭徵甫		
蘇務滋	費彝民之妻	現居香港
阮祿安		
黃堅		
巫晉舒	華人文員協會幹事	

續表

姓名	當時職務	近況
蔡渭衡	華人革新協會秘書	全國政協委員
李子誦	《文匯報》社長	
周明		
李宗福		
楊榮光		
黎裘		
餘成德		
王德海		
胡棟周	《香港夜報》社長、《新午報》 董事長	從商
鄺拾	報檔東主	已故
陳陌軍		前《經濟導報》董事長
劉芳	中聯電影公司經理	
李澤清		
鮑方	鳳凰電影公司導演兼演員	無線電視演員
傅奇	長城電影公司演員	九零年與妻子石慧 移居加拿大，女兒傅明憲 曾任無線電視藝員
許敦樂	南方電影公司經理	
布治雄	清水灣片場職員	
刁明		
潘國麟		
吳叔同	中華書局董事長兼總經理	現居台灣
曾麗璋		
何裕佳		
周錫蘭		
吳海	中業中學同學會主席	
陳丕士	大律師/華人革新會主席	

續表

姓名	當時職務	近況
陳君葆	香港大學中文系教授 華革會核心成員	
李俠文		前《大公報》總編輯
李冲	新華社副總編輯	
陳凡	《大公報》副總編輯	
張學孔		
黃四		
李光弼		
李振武		
黃光炎		
馬廷棟		前《大公報》高層
江龍		
姜明	演員，演員江漢之父	
廖潔靈		
譚偉正		
賀仰光		
李仰光		
老松		
王兆豐		
周爽		
劉士偉		
林國炳		
顏彬聲		
鄧焜	大同機械廠東主	
錢壽林		
譚星		
關能基		
張中駢		

續表

姓名	當時職務	近況
黃阿林	清水灣電影製片廠攝影師	
蔣仕	清水灣電影製片廠攝影師	
曾建華		
胡小峰		
盧敦	導演兼演員	二〇〇〇年去世
廖彬		
朱福勝	天廚味精公司職員	
簡煥章	愉園體育會副主席	九七年去世
鮑穎中	小提琴家	
張光亮	《大公報》記者	
白潔之	華人革新協會醫藥福利委員會主任	
張子宏	商務印書館香港辦事處經理	已故（晚年定居上海）
方志勇	上海書局總經理	已故
張秋萍	三聯書局海外出口部主任	已故
須漢興	大千印刷廠經理	
嚴北江	新民主出版社職員	
廖恩德	醫生	已故/已故香港區全國 人大代表廖瑤珠父親
孔愛菊		
韓秀英		
謝婉		
曹淑娥		
李流丹		
容新		
鄭倫		
徐日		
馮海		

續表

姓名	當時職務	近況
胡有		
許培		
左炳榮		
胡淦倫		
陳銳		
李耀棠		
黃學		
梁昌		
張恩		
羅洪生		
李發祥		
何奇功		
黎草田	作曲家、作曲家黎小田之父	已故
廖永堅		
劉華		
林珠享		
馮注		
蔡觀仁		
胡士澄		
馬月華		
楊鴻		
黃永剛	旺角勞工子弟學校副校長	
張顯楊		
葉如亭		
車敏青		
陳才偉		
黃學卒		
劉衡仲		

續表

姓名	當時職務	近況
林孝言		
金通明	中國保險公司總經理	
徐湛星		
陳素昭		
黃澤		
鄒棟林		
劉浩清		
黎瑞格		
黎慶祥		
余成德		
余鴻翔	《文匯報》總經理	
莊承宗	東方醬油公司東主	
李作基		
陳伯流		

資料來源：《大公報》（1967年5月24日）

四、六七暴動期間香港各級議會非官守議員名單

行政局	立法局	市政局
首席非官守議員羅理基 (Albert Rodrigues)	律敦治 (Jehangir Ruttonjee)	貝納祺
關祖堯	簡悅強	胡百富
祈德尊 (John Douglas Clague)	李福樹	張有興
馮秉芬	馮漢柱	Alison Mary Spencer Bell
高登 (Sidney Samuel Gordon)	唐炳元	葉錫恩
簡悅強	謝雨川	Solomon Rafeek
李福樹	Kenneth Albert Watson	胡鴻烈
桑達斯 (John Anthony Sanders)	胡百全	黃夢花
	羅仕 (George Ronald Ross)	胡寶星
	司徒偉	沙利士
	黃宣平	黃宣平
	李樹培	李樹培
	James Dickson Leach	林思顯
		羅保
		霍士傑
		羅德璋
		伍秉堅
		王澤森
		Derek John Renshaw Blaker

五、左派暴動統計數字一覽

(六七年五月至十二月)

(1) 傷亡數字

(a) 喪生

警員	10
英軍	1
消防	1
其他(包括左派示威者)	39

(I) 殉職警員死因

在炸彈爆炸中喪生	2
被滋事者刺斃	2
被槍殺	6

(II) 殉職英軍死因

在炸彈爆炸中喪生	1
----------	---

(III) 殉職消防員死因

	1
--	---

(IV) 其他死者死因

在炸彈爆炸中喪生	12
被警方槍殺	17
在縱火事件中喪生	2
被警方發現時已死去， 或被發現受重傷，其後不治	5
在騷亂中喪生，但與警方行動 無關	2
被警方扣留期間死去	1

總數：51

(b)	傷者類別	
	警員	212
	英軍	29
	消防員	4
	小販管理隊	2
	其他	585
		總數： 832
(2)	被檢控人士	
(i)	參與騷亂	318
(ii)	非法集會	465
(iii)	違反戒嚴令	232
(iv)	藏有炸彈 (真炸彈)	40
(v)	藏有炸彈 (假炸彈)	45
(vi)	爆炸罪行	33
(vii)	藏有煽動性標語	209
(viii)	發表煽動性言論	81
(ix)	參與恐嚇性集會	185
(x)	其他罪行	328
		總數： 1936
(3)	炸彈	
	由炸彈處理隊引爆的懷疑爆炸彈	8074
	真炸彈	1167
(4)	警方搜查的可疑單位	1281

六、參考書目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5月。

陳揚勇，《苦撐危局——周恩來在1967》，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1月。

《周恩來的最後歲月》，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12月。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周恩來》，陝西人民出版社/珠海出版社，1998年。

嚴家其、高皋，《中國文革十年史》，香港大公報社，1986年。

國務院港澳辦公室社會文化司編，《香港問題讀本》，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7年5月。

王賡武編，《香港史新編》，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7年5月。

劉蜀永，《簡明香港史》，香港三聯書店，1998年4月。

呂大樂，《唔該，埋單——一個社會學家的香港筆記》，香港：間人行有限公司，1997年。

葉錫恩，《葉錫恩自傳》，香港：明報出版社，1995年。

鄧開頌、陸曉敏主編，《粵港關係史（1840-1984）》，香港：麒麟書業有限公司，1997。

許錫揮、陳麗君、朱德新，《香港跨世紀的滄桑》，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5年。

金堯如，《中共香港政策秘聞實錄》，香港：田園書店，1998年6月

許家屯，《許家屯香港回憶錄》，台北：聯經出版有限公司，1994年。

李後，《回歸的歷程》，香港三聯書店，1997年。

《一九六六年九龍騷動調查委員會報告書》，1966年12月。

香港社會民主黨，《九龍騷動事件調查報告》，1966年

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編印，《香港風暴》，1968年。

周永新，《目睹香港四十年》，香港：明報出版社，1990年。

鄭郁郎，《在香港看香港》，香港：懷樓書店，1967年11月

吳昊，《香港電影民俗學》，香港：次文化堂，1993年。

《明報月刊》，1967年。

《盤古》，1967年。

《學苑》，1967年。

《學聯報》，1967年。

《新亞學生報》，1967年。

《亞洲週刊》，1998年。

《九十年代》，1996年。

John Cooper, *Colony in Conflict: the Hongkong Disturbances May 1967 – January 1968*, Hong Kong: Swindon Book Company, 1970.

Ian Scott, *Political Change and the Crisis of Legitimacy in Hong Kong*.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9.

Robert Ted Gurr, *Why Men Rebel*,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0.

Sally Blyth and Ian Wotherspon, *Hong Kong Remembers*,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Hong Kong 1967, Hong Kong: Government printer, 1968.

Hong Kong: Standaxd, 1967.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1967.

太平洋世紀研究所簡介

太平洋世紀研究所是一個獨立的、無黨派的學術研究、諮詢與出版機構。

它的學術興趣，着眼於太平洋地區。批評與繼承大西洋中心時代的文明，保持並超越其積極後果而克服其消極作用，將開創「太平洋世紀」的新時代。太平洋世紀研究所，就是為這個新時代催生。

太平洋世紀研究所的研究宗旨，是以中華復興為目的，即：促進中華民族的革新、發展、進步與融合，促進中華民族在太平洋地區和「太平洋世紀」發揮經濟、政治、外交和文化的健康影響力，從而促進太平洋地區和整個世界的繁榮、安定與合作。「太平洋世紀」的來臨，為中華民族的復興帶來了機會；而如果沒有中華民族的革新，發展、進步與融合，則「太平洋世紀」將不過是一句空話。轉型中的中國，雖然經濟持續發展，但依然面臨複雜而艱巨的眾多難題：從政治穩定，到公民自由；從民族自治，到國家統一；從市場建設，到社會公平；從精神重構，到國際安全，都需要學者的熱切關懷與客觀研究。太平洋世紀研究所將體現這樣的關懷，從事這樣的研究。

太平洋世紀研究所的學術活動，以香港為立足點，進而聯絡華人社會和國際社會，覆蓋多學科，以政治、社會、經濟、文化和國際關係為主。香港是進入並覆蓋太平洋的資訊中心，太平洋世紀研究所佔有「地利」來利用這種資訊優勢；香港又是海外華人眼中的祖國文化中心，太平洋世紀研究所將借此廣泛聯絡散居世界各地的華裔學者；香港本地學者則兼有中西文化之長，近年來又有一批海外學成的大陸學者來港從事教學和研究，兩者合而形成一個強有力的社會、人文科學研究社群。太平洋世紀研究所就是為這一社群服務的學術機構。

傳真：(852) 2683 5208

■ 有關六七暴動的研究寥寥可數，張家偉這本新著，是率先利用香港回歸後所帶來的對六七暴動研究機會的成果。本書可以為讀者對六七暴動的前因後果提供一個不錯的輪廓，也初步填補了六七暴動研究空白。

—— 劉兆佳(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系講座教授)

■ 張家偉君獨能洞識六七暴動產生了改寫香港歷史的作用，進而深入檢驗史實，訪問各界人士，整理成書，為歷史作初步存證，他的貢獻是很實在的。此書的出版，應能增加大家對香港政治發展的認識和研究。

—— 翁松燃(台灣埔里暨南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系教授)

■ 六七暴動已經過去一個世代了，這方面的歷史紀錄仍然空空如也。現在難得有張家偉先生這本新書，還訪問了當年雙方許多位當事人細說經過和對事件的體會，這實在是很難得的事，而這本書還是到目前為止這方面唯一的著作。

—— 羅孚(前《新晚報》總編輯、《大公報》副總編輯)

■ 一九六七年的「反英抗暴」或所謂「左派暴亂」已經過去三十多年了。但北京方面和香港左派領導至今對此沒有明確的說法，所以這次暴亂在香港的歷史意義仍有很多人不清楚。作者撰寫這本專書，整理這段歷史，是非常有意義的事情。

—— 梁上苑(前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

ISBN 962-8274-29



9 789628 274291